



经典丛话

文苑精英系列

江西教育出版社

金瓶梅



如果要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中最为匮乏的是什么？那么答案之一就是对于文化经典的热情。尽管自诩为当代的经典之作早已使经典这个非同寻常的字眼沦落为流行时尚的同义词，但它的实质意义和真实生命却依然无可挽回地消逝了。经典的意义和生命正消逝在它的廉价发卖之中。

经典曾是一个至高无上而又激动人心的词。它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典范，构成一种文化的最为基础和最为核心的部分，从而具有无可争议也毋庸置疑的价值示范作用。因此，经典必然地有它的文化依托即传统；并且，经典必然地只有少数，它应当也可以为社会大众所认同，却与流行文化有着价值高下即不等值的鸿沟。当大众流行文化假经典之名堂而皇之通行无阻时，值得悲哀的并不仅仅是经典，而是由经典所代表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换言之，经典价值的失落，意味的是文化信仰的瓦解。对一个社会而言，它几乎是混乱、无知和堕落的标志。

那么 ,当我们现在说要恢复经典的尊严时 ,它的意义便不可能主要局限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内 ,也不再纯粹是指古典的复活或对它们的重新诠释 ;经典的尊严只有在它以文化示范的形式体现并融入当代的生活才会有实际而真实的意义 ,并且 ,它将建立在共通或共同人性的基础之上而富有全人类性 ,经典的尊严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人类信仰。

在这种意义上 ,经典所要对抗的不仅是世俗生活习性的腐蚀 ,它还要挣脱单一意识形态的专制。经典的生命有其本质上的自由 ,它在各个时代、各种文化中都将表现出难以限定的丰富性。经典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的典范 ,正在于它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价值源泉的体现。我们的文化创造就是在它的示范和启示下才得以进行并完成。

虽然重温经典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是一种奢侈得可笑的不合时宜之举 ,然而只要在物欲横流的堕落中还存在着一丝向往崇高的微弱希冀 ,经典便是我们灵魂自救的方舟。这也就是我们策划出版《经典丛话》的基本目的。在这套“丛话”的两个系列(《文苑撷英系列》和《域外书话系列》)中 ,我们试图提供的固然不乏对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学理性知识和见解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展示出经典的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以及各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经典永不衰竭的渴求和因之表现出的

巨大精神努力。在这其中,今天的读者会发现,经典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丛话”中的《文苑撷英系列》全部以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为对象,而《域外书话系列》顾名思义则以世界各国的经典作家作品为话题。两个系列各辑为八种,选编者均为当今学者、专家,“丛话”的策划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刘景琳先生主持,人人工作室同仁受托主编助成其事。

有羁旅之劳、怀困惑之思的人们,何烦稍住匆匆脚步,一同来轻叩这一扇扇经典之门……

目 录

选编者言

第一辑

- 与董思白书 轶宏道 3
- 觞 政 轶宏道 4
- 与谢在杭书 轶宏道 5
- 游居柿录 轶中道 6
- “ 锋焰远逊《水浒传》 ” 轶日华 7
- “ 指斥时事 ” 的大名士手笔 轶德符 8
- 伪画致祸 轶德符 10
- 汤裱褙 轶树丕 11
- “ 语句宛似罗贯中笔 ” 轶本峻 12
- 奇书《金瓶梅》 轶无咎 13
- “ 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 ” 轶 冈 14
- 世说《金瓶梅》 轶石居士 15
- 王 洲中年著《金瓶梅》 轶起凤 16
- 替世人说法 轶耀亢 18

慎读《金瓶梅》	轅涵光	20
说“狼筋”	轅人获	21
香祖笔记	轅士祯	22
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	轅公燮	23
“诲盗诲淫 久干例禁”	轅斋老人	25
说部之大山水	轅家鹤	27
小说《金瓶梅》	轅 棧	28
《红楼梦》借径在《金瓶梅》	轅新之	30
劝诫类钞	轅 谦	31
茶余客话	轅葵生	32
得一录	轅 治	33
江苏省例	轅日昌	35
极力描绘市井小人	轅懋建	36
读书偶得	轅慈铭	38
《金瓶梅》所写有据	轅 溥	40
《金瓶梅》乃治人之书	轅鉴我斋	41
文昌帝君谕禁淫书天津证注	轅 舫	42
闺艳秦声评	轅伦氏	44
小说丛话	轅保贤	45
小说丛话	轅 殊	46
小说闲评录	轅血生	48
金瓶梅	轅炜	49
南亭笔记	轅宝嘉	50

小说小话	轶人	51
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	轶生	52
杂说	轶人	54
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	轶小配	55
谈小说《金瓶梅》	轶文濡	56
《金瓶梅》赘语	轶文濡	59
笔记	轶名	60
《金瓶梅》考证	轶县	61
樽边录	轶栩	63
《金瓶梅》演义考	轶静方	64
稗乘谭雋	轶锡钧	66
小说丛话	轶生	6
呵冻小记	轶村	74
答胡适	轶独秀	75
答钱玄同	轶适	76
寄胡适之	轶玄同	77
秋水轩笔记	轶名	79
寒花 _盒 随笔	轶名	80
骨董琐记	轶之诚	82
小说话	轶弢	83
古今小说评林	轶焘	85
古今小说评林	轶铁冷	88
闲话《金瓶梅》	轶竹坡	89

评《金瓶梅》轶 龙..... 101

第二辑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轶 迅..... 115

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 轶雁冰..... 121

《金瓶梅》：社会小说之上品 轶..... 124

《金瓶梅》杂话 轶 英..... 126

《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轶 晗..... 131

李瓶儿的故事 轶固生..... 139

《金瓶梅》的意识 轶 丁..... 141

《金瓶梅》的技巧 轶 丁..... 146

《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 轶天畴..... 150

由《金瓶梅》图像谈到春宫画 轶五知..... 155

《金瓶梅》蜕变的遗迹 轶沅君..... 159

闲话《金瓶梅》 轶汉鏞..... 163

《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 轶开沛..... 165

关于《金瓶梅》的著作年代 轶鸿勋..... 173

《金瓶梅》的社会意义 轶西成..... 178

《金瓶梅》的缺陷 轶希凡..... 183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轶振铎..... 185

《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暴露小说 轶大杰..... 190

论《金瓶梅》 轶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197

第三辑

《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 轶朔方..... 203

屠隆与笑笑生 轶 霖	208
《金瓶梅》之谜新解 轶远芬	213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 轶 兵	218
《金瓶梅》作者考证的意外收获 轶阳健	223
书当成于万历间 轶 霖	226
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 轶 霖	231
从花太监看《金瓶梅》的写作年代 轶 诏	236
《如意君传》与《金瓶梅》之关系 轶 辉	238
《金瓶梅》是假托宋朝实写明事 轶 辉	241
《金瓶梅词话》的思想特征 轶培恒	246
我读《金瓶梅》 轶宗一	254
写在“细说《金瓶梅》”后 轶宗一	260
中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 轶桂声	263
《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 轶 兵	267
《金瓶梅》的人生价值观 轶魏宗新	276
《金瓶梅》：一个关于“善”的寓言 轶庆雨	280
《金瓶梅》中的宗教文化 轶繁华	286
《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 轶先觉	288
如何看待《金瓶梅》的性描写 轶承玉	293
《金瓶梅》中的人物关系 轶一玄	297
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 轶时人 ...	305
西门庆与科举 轶繁华	310
西门庆缘何成“大款” 轶振华	314

西门庆夸海口	轶振华	317
关于“潘金莲现象”	轶明奇	322
金莲杀夫与性别角色和角色模式	轶德荣	328
潘金莲、吴月娘争宠小议	轶德荣	333
裙钗队里的人情世理	轶建平	339
帮闲一绝	轶国梁	346
对丑的审视	轶宗一	352
《金瓶梅》的世俗美	轶昌恒	356
两个武松、两个西门庆、两个潘金莲、两个王婆	轶昌恒	360
《金瓶梅》的语言艺术	轶礼权	363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诗词韵文赏析	轶兵	367
从“观灯”看《金瓶梅》	轶风	377
漫谈金瓶宴	轶诏	383
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点	轶敢	386
《金瓶梅》与六安茶	轶群	392
《金瓶梅》里的酒具	轶群	393
新发现的《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	轶诏	394
多伦多访“金”散记	轶汝梅	397
从《三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续书	轶汝梅	401
“洁本”与“全本”	轶云波	404
《金瓶梅》能否拍电视？	轶云波	407
由《金瓶梅和屠隆》一书想到的	轶兵	410

第四辑

- 《金瓶梅》不是淫书 轶 健 415
- 吴月娘的这顿牢骚话 轶 魏子云 423
- 凌云翼的关键 轶 魏子云 429
- 《金瓶梅》成书说的问题 轶 魏子云 431
- 《金瓶梅》中的“新河” 轶 魏子云 433
- 英雄武松与淫妇潘金莲 轶 陈益源 436
- 《金瓶梅》的写实艺术 轶 小述宇 440
- 《如意君传》与《金瓶梅》 轶 美 韩 南 445
- 《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 轶 美 郑培凯 449
- 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 轶 美 马幼垣 452
- 贾三近与《金瓶梅》 轶 美 王冠才 457
- 《金瓶梅》的作者呼之欲出 轶 加拿大 马 森 461
- “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 轶 法 雷威安 465
- 《金瓶梅》的特质 轶 日 小野忍 471
- 《金瓶梅》的素材 轶 日 小野忍 474
- 《金瓶梅》对后世的影响 轶 日 志村良治 476
- 西门家的传说 轶 日 泽田瑞穗 478
- 潘金莲的眸 轶 日 泽田瑞穗 481

选编者言

人在小时候 ,是最容易产生英雄崇拜的。

五十年代初 ,江南农村盛行“说书” ,那时我跟着大人一有空就去泡在镇上一家茶馆里 ,听艺人讲说那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水浒》、《三国》、《杨家将》、《岳家军》……其中的各路好汉豪杰 ,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水浒传》中的英雄武松 ,身高马大 ,威武勇猛 ,一身正气 ,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 ,令我十分羡慕。每次 ,我听到他在酒店中一口气喝完十八碗好酒 ,明知山中有猛虎 ,却偏独自一人提棍向景阳冈走去 ,在大青石边果然遭遇老虎 ,在搏斗中折断了木棍 ,赤手空拳 ,三下五除二 ;“呼 !呼”几拳 ,就把那只青额吊睛的大老虎打瘫在地时 ,常常心花怒放 ,不禁笑出声来 ,连叫 :“好 !”“好 !”听到武松外出归来 ,察知花花公子西门庆和嫂嫂潘金莲通奸偷情 ,并害死武大 ,决心为兄报仇 ,杀了潘金莲和那拉皮条的王婆后 ,飞身追杀西门庆 ,从高高的狮子楼上跳下 ,血刃西门庆 ,被迫到官衙自首等故事时 ,心头十分激动 ,眼前仿佛闪动着这位

打虎英雄的英姿。有一段时期,我被武松迷得有点魂不守舍,经常不等吃完晚饭,就往茶馆里跑,为此还挨过母亲的几次责打。以后上学了,这份英雄崇拜之心仍然不死。茶馆店是少去了,可“小人书”却捧上了手,《水浒》、《三国》中的英雄从艺人的口中来到了画面上,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他们和我一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忽然有一天,我听说那个被武松亲手杀死的西门庆又活过来了,他在清河县的一条街上开起一家中药铺,并且娶妻生子,又有几个小妾,日子过得十分顺畅,甚至是趾高气扬——这是二十年前,我在大学中文系的讲堂上得到的“最新消息”。经过四处打听,才知道这故事来自于一本名叫《金瓶梅》的书。作者是一个名叫兰陵笑笑生的文人。在他的笔下,神通广大的西门庆又“借尸还魂”了。他从高高的狮子楼上跳下后,没有被武松杀死,而是另觅了一条活路,经过几年的“隐姓埋名”后,又在清河城里抖起威风来了。他上结官府,下连地痞流氓,整日同一群帮闲小人和裙衩儿女鬼混,既有权,又有钱,还有势,做了许多坏事,最后得病身亡。这自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但在那个年代,能读到《金瓶梅》的,绝非凡人小子。这本书在建国以后也印过,但数量少得可怜,有资格购买和阅读的,只有几个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和日夜为民操劳的国家高层领导人,普通的平头百姓乃至如我辈凡人,是连瞧一眼的资格都没有的。了解至此,我阅读此书的心也就死了。

谁知临近大学毕业,有人传来消息,说我就读的中文系资料室有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不过这书不能外借。不用说对我们学生,就是教我们的老师也难饱眼福。《金瓶梅》只不过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为什么如此“养在深闺人不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真值得探讨。越是神秘之物,越是引起怀着追求真理而入高等学府中文系求学的莘莘学子的探秘之心。我们可敬的传业授道者们以及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的系领导,也十分同情我们,终于决定在写毕业论文的阶段,允许学生进入系资料室阅读《金瓶梅》。不过,前提条件是“撰写毕业论文的需要”和系主任的亲笔签名。严密封闭的门好不容易透开了一条缝,我几经思考,终于报了一个“李贽的童心说和龚自珍的文学思想”的毕业论文题目(那时,可不敢报《金瓶梅》或是《金瓶梅》研究有关的选题),也算是沾了一点“明清文学研究”的边,打了个小小的“擦边球”。当我手里拿着系主任亲笔签名的借条,兴冲冲地来到那间狭小的系资料室,在昏黄的灯光下,贪婪地读着那本神秘的小说时,不禁感慨万千,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或许是冥冥之中命运之神的安排,我也未曾料到,正是这一点,却决定了我大学毕业分配乃至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我被留在母校工作,在担任学术刊物编辑的同时,业余时间也从事古代文学,尤其是《金瓶梅》和我国古代小说(主要是话本小说)的研究,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

人们说《金瓶梅》是一本奇书,这话一点不假。我国古代四

大奇书中 ,要称《金瓶梅》是奇书中的奇书了。这不仅是指它问世后四百余年间的坎坷遭际 ,是奇而又奇 ,大概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而且也指它的作者、成书年代、成书过程等一系列的问题 ,至今还多是一个个学术“ 悬案 ” ,几乎成为人人皆知的重大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谜。

伴随着《金瓶梅》的问世 ,人们为廓清笼罩在它头上的迷雾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也毋庸讳言 ,直至今日 ,我们离真正揭示《金瓶梅》一书的诸多谜团 ,还有相当的路要走。例如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 ,署名为“ 兰陵笑笑生 ” ,其真名实姓究竟是谁 ? 他为何要如此“ 隐姓埋名 ” ,让后人去费尽心血思量再三 ? 再如 《金瓶梅》究竟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的 ,还是明代文人个人独立创作的 ? 如果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 ,他们为什么要创作 ? 又是怎样创作的 ? 如果是文人个人独立创作的 ,为什么书中的情节描写有许多前后错乱 ,乃至是矛盾的现象 ? 又如 《金瓶梅》的写作年代是在明代嘉靖年间 ,还是万历年间 ,抑或是隆庆、万历年间 ? 关于它的创作主旨是讽世 ; 指斥时事 ” ,还是暴露黑暗 ,或者是肯定“ 人欲 ” ,表现作者的人生理想 ,抑或是“ 宣淫 ” 等等 ,不一而足 ,至今还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围绕着这部“ 奇书 ” ,学者们展开着热烈的讨论。而在民间 ,有关《金瓶梅》的各种传闻故事很多 ,书中的人物活跃在百姓的茶后酒饭之间 ,有的还被编成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在广泛流传。更有好事者 ,接过“ 兰陵笑笑生 ” 留给我们的

这笔文化遗产 ,在续写《金瓶梅》的新篇章。仅已知和存世的作品就有《续金瓶梅》(包括《隔帘花影》和《金屋梦》)、《三续金瓶梅》、《玉娇李》、《新金瓶梅》、《金瓶梅传奇》等等 ,让人眼花缭乱。一部《金瓶梅》,竟然牵动着如此众多人的心 ,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吧。难怪有人要发出“说不尽的《金瓶梅》”的感叹!

《金瓶梅》尽管说不尽 ,但我们还是要说 ,而且看来还一直要说下去 ,因为它毕竟是我国古代文化长廊中的一幅精彩绝伦的社会风俗画 ,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的问世 ,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金瓶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广泛的读者群 ,它迄今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人类广泛传播。如果不说《金瓶梅》,又怎能对得起创作这一中华灿烂文化的前贤先辈?又如何面对众多殷殷期待者的灼热目光?作为一个钟情于祖国和民族文化遗产的中国人 ,一个喜爱《金瓶梅》的读者和研究者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说《金瓶梅》呢?要说《金瓶梅》,难度确实很大 ,但我们还是要一直说下去。我们就是抱着这一想法来编选此书的 ,希望能给关心《金瓶梅》的读者提供一份新的参考资料和精神食粮。

有关《金瓶梅》的故事 ,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产生了。四百余年间 ,口口相传 ,代代延续 ,留下了数千万的文字 ,要说得详尽一点 ,恐怕几天几夜也不够。为了珍惜读者的时间 ,我们只能从中选择极少的部分 ,其侧重点是可读性较强的文艺类随笔和

散文。鉴于《金瓶梅》研究的实际状况,书中也选入了部分有代表性、且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每篇一般不超过3000字。

发生于小说《金瓶梅》的故事,大约是和它的研究差不多同步前进的,所以本书内容的编排在总体上也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全书编为四辑。第一辑所收作品,从《金瓶梅》问世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历经三百多年,而选入此书的仅是区区几万字,自是片言只语而已,如浮光掠影般地一闪而过,但其间的珍羽,想来也不致遗漏太多,读者略可知其梗概。倘有兴趣者,可按图索骥,探得《金瓶梅》的壶奥。第二辑辑入了自本世纪初至“文革”结束时期的部分作品。这将近六十年时间,人们习惯把它分为“现代”和“当代”。从《金瓶梅》的研究看,在本世纪初,就引起过许多眼光敏锐的学者,如鲁迅先生等人的重视。尤其是《金瓶梅词话》于1932年在山西的被发现和影印出版,在现代中国曾掀起过一个小小的研究浪潮,有许多著名学者都参与其中,我们理应留下他们的足迹。建国后,《金瓶梅》的命运坎坷,但仍有不少人在关注着它。书中选入的几篇作品,大体上反映了历史的面貌。之所以较多地选入了那些个人或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的几个篇章,是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本时代《金瓶梅》命运的忠实记录。其时,《金瓶梅》被人视作“禁书”,遭到人为的禁锢,文学名著也尘封于世,但热心的人们依然无法忘情于它。尽管前进的步伐凝滞,但地火中积蓄的能量

也为后来的辉煌作了很好的准备。第三辑所选,都是1978年至1998年间的佳作。此一时期,人们通常以“新时期”为名。《金瓶梅》研究也迎来了它的生机勃勃的艳阳天。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中,《金瓶梅》研究渐成风尚,曾经显赫一时,名声大振;“金学”变成显学,研究著作和论文如雨后春笋,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辑入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一些,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除《金瓶梅》的故事外,大凡有关它的作者、写作时代、成书过程、思想和艺术成就、续书等一系列问题,莫不涉及。透过本书,大约也可知其一二。编排上我们大致以内容分类,在统一于全书的前提下,也稍显出一点灵活性。第四辑所收作品,为我国台港地区和欧美以及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学人之作。《金瓶梅》在今天已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重点学术课题之一。囿于编者的视野及本书的体例,难免挂一漏万,然而其兴旺的景象还是宛然如现。

倘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些许思想启迪,为暂时沉寂的《金瓶梅》研究添一把柴火,则是我们的最大欣慰了。

最后想说的是,此书能编就,全仰仗诸位师友的鼎力相助。他们把佳作无保留地寄来供编者选用,有的还特意赶写新作,以使本书增添新的亮色,这使我们深受感动。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但囿于篇幅和体例所限,我们不能不有所割爱,不仅在篇目上,而且在内容上,都作了较多的删节,每想及此,心中常感不安。对有的作者,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至今还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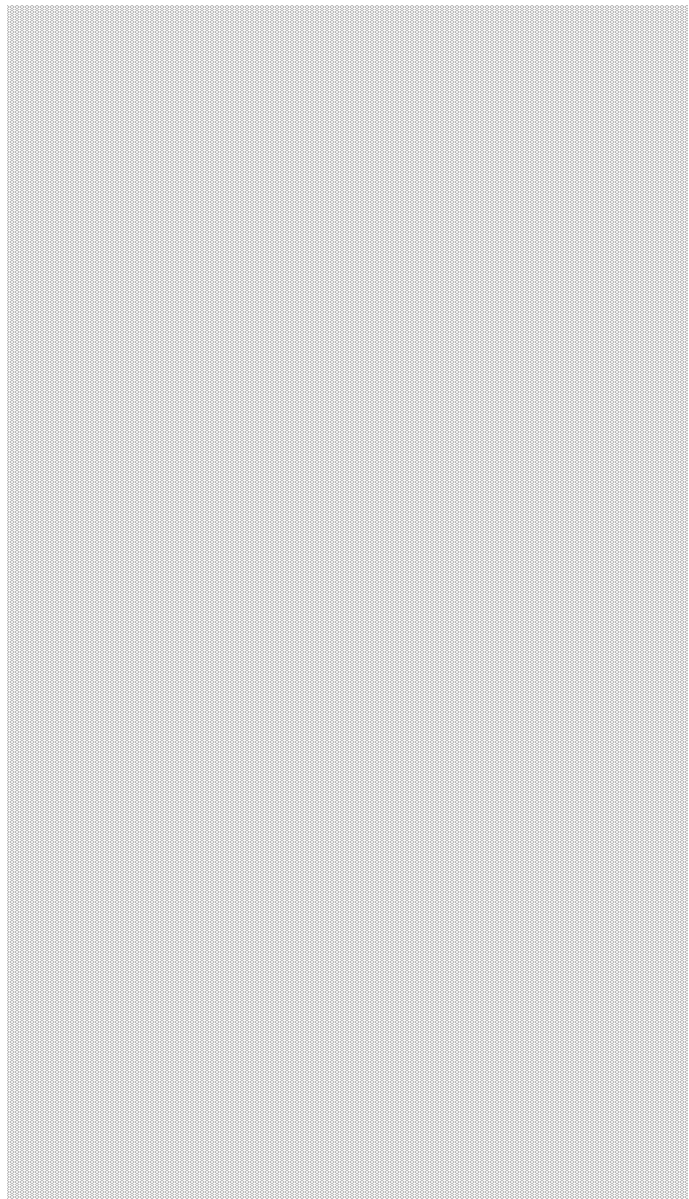
能和他联系上,入选佳作及其内容的取舍未能征求本人的意见,错误或缺失想必难免。这是要向他们致歉并请求原谅的。

张兵 1998 7 5 于上海
复旦大学凉城新村“四树斋”

第一辑

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

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袁宏道

一月前 ,石笈见过 ,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 ,观七十二峰绝胜处 ,游竟复返衙斋 ,摩霄极地 ,无所不谈 ,病魔为之少却 ,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 ?伏枕略观 ,云霞满纸 ,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 ?抄竟当于何处倒换 ?幸一的示。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刘炫《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酒谱》、朱翼中《酒经》、李保绩《北山酒经》、胡氏《醉乡小略》、皇甫崧《醉乡日月》、《侯白酒律》，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蒙庄》、《离骚》、《史》、《汉》、《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说》、《颜氏家训》、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

袁宏道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莫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李日华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 ,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 ,而锋焰远逊《水浒传》。

〔 标题为编者所加 〕

沈德符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箠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贗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勛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

世化为淫夫 ,上烝下报 ;潘金莲亦作河间妇 ,终以极刑 ;西门庆则一 朕 憨男子 ,坐视妻妾外遇 ,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 ,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 ,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 ,仅首卷耳 ,而秽黷百端 ,背伦灭理 ,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 ,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 ,则直书姓名 ,尤可骇怪 ,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 ,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 ,此书不知落何所。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漕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贗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给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弁洲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

汤裱褙善鉴古，人以古玩赂严世蕃，必先贿之，世蕃令辨其真伪，其得贿者必曰真也。吴中一都御史偶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临本馈世蕃而贿不及汤，汤直言其伪，世蕃大怒，后御史竟陷大辟，而汤则先以诳骗遣戍矣。余闻先人曰，《清明上河图》皆寸马豆人，中有四人樗蒲，五子皆六而一子犹旋转，其人张口呼六，汤裱褙曰：“汴人呼六当撮口，而今张口，是操闽音也。”以是识其伪。此与东坡所说略同，疑好事者附会之。近有《一捧雪传奇》，亦此类也，特甚世蕃之恶耳。

屠本峻

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赏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瓮肠。

张无咎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尝辟诸传奇：《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他如《七国》、《两汉》、《两唐宋》，如弋阳劣戏，一味锣鼓了事，效《三国志》而卑者也。《西洋记》，如王巷金家神说谎乞布施，效《西游》而愚者也。至于《续三国志》、《封神演义》等，如病人呓语，一味胡谈。《浪史》、《野史》等，如老淫土娼，见之欲呕，又出诸杂刻之下矣。

〔标题为编者所加〕

“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

薛 冈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所宜焚者，不独《金瓶梅》，《四书笑》、《浪史》当与同作坑灰，李氏诸书存而不论。

〔标题为编者所加〕

听石居士

不观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然则此集传播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诗谭亦可。

〔标题为编者所加〕

宋起凤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之于法。弇洲愤懑怗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蝶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按弇洲《四部稿》有三变：当西曹至青州，机锋括利，立意迂□，尚近刻画；迨秉郟节，则峻刻之迹尽去，惟气格体法尚矣；晚年家居，滥受羔雁谀墓祝觞之言，二氏杂进，虽耽白苏，实白苏弩末之技耳。是一手犹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笔，斯诚门客所为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

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媿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秘书，岂秘书比乎？亦楚《樛机》类欤！闻_舟洲尚有《玉(娇)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颃(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

〔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篇词是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草表这《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平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己，受尽轮回之苦。淫人妻妾，依旧妻妾淫人；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毡（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依言生于此门，

死于此户 ,无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 ,倒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 ,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 ,也就不顾那鹞贤烈、油尽灯枯之病 ,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 ,看做平常 ,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眼见得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 ,少年文人家家要买一部 ,还有传之闺房。念到淫声邪语 ,助起兴来 ,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 ,照样做起 ,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大狱 ,真是一番罪案。我今为众生说法 ,因这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 ,都是戒人为恶 ,劝人为善 ,就编这部《金瓶梅》讲出阴曹报应 ,现世轮回。紧接这一百回编起 ,使这看书的人知道 ,阳有王法 ,阴有鬼神 ,这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杀一命 ,还一命 ;淫一色 ,报一色 ;骗一债 ,还一债 ;受用不多 ,苦恼悔恨 ,几世的日子冤报不了。又说些阴阳治乱 ,俱是众生造来大劫 ,忠臣义士财色不迷的好人 ,天曹降福 ,使人好学 ,借此引人献出良心 ,把那淫胆贪谋 ,一场冰冷 ,使他如雪入洪炉 ,不点自化 ,岂不是讲道学的机锋 ,说佛法的喝棒 ,讲《感应篇》的注解。今把做书的大意说明阁起 ,且讲正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慎读《金瓶梅》

申涵光

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每怪友辈极赏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反悦其似耶？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

〔标题为编者所加〕

褚人获

尝见小说载：一富人内室亡金，诘群婢不承，欲买狼筋治之，一婢惊惧欲逃，遂获。（编者按：事见《金瓶梅》第四十四回）皆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盗？后偶阅《续博物志》载：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为狼筋者。有老僧云，贫道昔曾以一千于贾胡市得三枚，状如巨蛹，两头光带黄色。泾冲段祐宅失银器十余，集奴婢环庭，炙之，虫_裸动，一女奴脸唇_侧动，讯之，乃窃器者。按《续博物志》称为晋李石撰，但中有南唐元宗事及开宝年号，岂晋人而至宋尚存？抑书或成于宋代欤？

〔标题为编者所加〕

俗人传讹袭谬，有绝可可笑者，兖州阳谷县西北有冢，欲呼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坛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传》，潘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县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枷通衢，殊批曰：“无耻犯人某某示众。”然二氏终不悟也。从侄鵬过阳谷县亲见之。

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

顾公燮

太仓王_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_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贗者以献。先是，_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会俺答入寇大同，_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轺劾_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_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抄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

故意微伤脚迹 ,阴搽烂药 ,后渐溃腐 ,不能入值。独其父嵩在阁 ,年衰迟钝 ,票本批拟 ,不称上旨。上_寤 厌之 ,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 ,以至于败。噫 !怨毒之于人 ,甚矣哉 !

〔标题为编者所加〕

闲斋老人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 ,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 ,人人乐得而观之。余窃有疑焉。稗官为史之支流 ,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 ,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 ,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 ,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西游》元虚荒渺 ,论者谓为谈道之书 ,所云意马心猿 ,金公木母 ,大抵心即是佛之旨 ,予弗敢知。《三国》不尽合正史 ,而就中魏、晋代禅 ,依样葫芦 ,天道循环 ,可为篡弑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 ,亦具可发人深省 ,予何敢厚非 ? 至《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 ,久干例禁 ,乃言者津津夸其章法之奇 ,用笔之妙 ,且谓其摹写人物事故 ,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 ,皆各穷神尽相 ,画工化工合为一手 ,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呜呼 ! 其未见《儒林外史》一书乎 ?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 ;曰《儒林》,迥异元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

人者 ,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 ,被人看破耻笑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 ,品地最上一层 ,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 ,不可枚举 ,而其人之性情心术 ,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 ,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 :“善者 ,感发人之善心 ;恶者 ,惩戒人之逸志。”是书有焉。甚矣 !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 ,而非若《水浒》、《金瓶》之致为风俗人心之害也。则与其读《水浒》、《金瓶梅》 ,无宁读《儒林外史》。世有善读稗官者 ,当不河汉予言也夫。〔标题为编者所加〕

陶家鹤

今天下山水，一大游局也。故善游者，历三涂五岳九州之广，浮大河长江四海之阔，睹宫阙之巍焕，入茂林丰草之深幽，穷山神之栖止，探虎豹之窟宅，举凡舟车所不能至，獐 猿之所不能居者，皆遍揽无遗焉。然后与之观小山小水，宜其弃置而不顾。即间有一拳石、一勺水，视千仞之岗、万里之流者，再目之而神气已竭矣。缘其人胸次淡如、眼界廓如故也。若但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据邱岭（丘陵）以为崇，指池沼以为渊，管窥蠡测，又乌语山水之大哉。余意读说部亦然。《水浒》、《金瓶梅》，其次《三国》，即说部中之大山水也。

〔标题为编者所加〕

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余谓小说初无一佳者。其他庸劣者无足论,即以前二书论之,《水浒传》官阶地里,虽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为鲁达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义时,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过数程,杨志奚急行数十日尚未至,又迂至山东郓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难铺排,然亦必各见圭角,始为著书体裁,如太史公《汉兴诸王侯》是也。今于鲁达、林冲,详为铺叙,至卢俊义、关胜辈,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无一见长者;又于马麟、蒋敬等四五人,层见叠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笔,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庄”后,文字益加卑鄙,直与续传无异,此善读书人,必能辨别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属

乱其间 ,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 ,无论宋、金正史。弁 洲山人何至谦 陋若此 ! 必为贻作无疑也。世人于古今经史 ,略不过目 ,而津津于淫邪庸鄙之书 ,称赞不已 ,甚无谓也。

〔标题为编者所加〕

《红楼梦》借径在《金瓶梅》

张新之

《红楼梦》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

《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者为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今日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红楼梦》。《聊斋》以简见长,《红楼》以烦见长。《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红楼》是整章,则无从学步,千百年后人或有能学之者,然已为千百年后人之书,非今日之《红楼》矣。或两不相掩未可知,而在此书,自足千古。故闲人特为着佛头粪,其他续而又续,及种种效颦部头,一概不敢闻教。

〔标题为编者所加〕

徐 谦

孝廉某，嫉严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一书，原一时游戏之笔，不意落稿盛行，流毒无穷。孝廉负盛名，卒不第。己丑南宫，已定会元矣，主司携卷寝室，挑灯朗诵，自喜得人，至晨，将填榜，则卷上点点血痕，盖鼠交其上而污之也，遂斥落。止一子，在江宁开茶室，后流为丐死。

绣像《水浒传》镂版精致，藏书家珍之，钱遵王列于书目，其像为陈洪绶笔。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版刻亦精。此书为嘉靖中一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指分宜，林灵素指陶仲文，朱勗指陆炳。又云：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当即世所传之《后金瓶梅》。前书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补，肤浅，且多作吴语。后来唯《醒世姻缘传》仿佛得其笔意。然二书皆托名齐鲁人，何耶？

窃世教当极弊之时 ,非得有仔肩世道之人 ,出而整顿之 ,则流极将不可问。孔子之删定笔削 ,孟子之息邪说放淫辞 ,圣贤救世之心 ,昭然若揭。自此以后 ,去圣渐远 ,文人学士 ,家自为说 ,标新领异 ,百喙争鸣 ,固已畸重畸轻 ,醇疵互见矣。乃迄于今 ,则高文典册 ,秘阁尘封 ,小说演义 ,家弦户诵 ,甚至淫辞艳曲 ,灾及枣梨 ,海内风行 ,流毒无尽 ,功令虽有严禁之条 ,而奉行者多以为具文 ,坐视其荡惑人心 ,败坏世教 ,而曾不少为整顿 ,可慨也。先儒惟陆清献公有《国策去毒》一书 ,尚有删定遗意 ,此外更不少概见。近时始有右汾山人《劝毁淫书录》 ,痛言淫书之害 ,大声疾呼 ,洵足发聋振聩。江苏绅士遂有禁毁淫书之举 ,计费万余金 ,各书坊均取具永禁切结 ,诚盛典也。惟收毁淫书 ,搜罗必难遍及 ,况利之所在 ,旋毁旋刻 ,望洋惊叹 ,徒唤奈何。向尝于无可如何之中 ,拟一釜底抽薪之法 ,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 ,除《水浒》、《金瓶梅》百数十种业已

全数禁毁外 ,其余苟非通部应禁 ,间有可取者 ,尽可用删改之法 ,拟就其中之不可为训者 ,悉为改定 ,引归于正 ,抽换板片 ,仍可通行 ,所有添改之处 ,则必多引造作淫词及喜看淫书一切果报 ,使天下后世撰述小说者 ,皆知殷鉴 ,不致放言无忌。如用药然 ,大黄巴豆 ,一经泡制 ,即堪治病。抽换淫书一法 ,洵足以济毁禁之穷 ,标著作之准 ,宜约集同人 ,筹款设局 ,汇集各种小说 ,或续或增 ,或删或改 ,仍其面目 ,易其肺肝 ,使千百年来习传循诵脍炙人口诸书 ,一旦汰其芜秽 ,益以新奇。更如治盗然 ,引邪而归正 ,即化莠而为良 ,荡瑕涤垢之余 ,即训俗型方之选 ,此世道人心千秋大局 ,因非寻常操选家区区小补者比也。孟子曰 :“经正则庶民兴 ,斯无邪慝矣。”关心世教 ,力挽狂澜 ,当必有应运而兴者。安得与之把臂入林也哉 ?

巡抚部院丁札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藉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莫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喻闲荡检之说，默^贖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谕令各书铺，将已刷成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交，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乃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藉端滋扰。……计开应禁书目：……《隔帘花影》、《金瓶梅》、《唱金瓶梅》、《续金瓶梅》……

常州陈少逸撰《品花宝鉴》，用小说演义体，凡六十回。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懂，市井细人多乐之。又得金圣叹诸人为野狐教主，以之论禅悦，论文法，张皇扬诩，耳食者几奉为金科玉律矣。《红楼梦》《石头记》出，尽脱窠臼，别开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声，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竹枝词所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记一时风气，非真有所不足于此书也。余自幼即嗜《红楼梦》，寝馈以之。十六七岁时，每有所见，记于别纸。积日既久，遂得二千余签。拟汰而存之，更为补苴掇拾，葺成《红楼梦注》。凡朝章国典之外，一切鄙言琐事，与是书关涉者，悉汇而记之。不贤者识其小者，似不无小补焉。其禅悦文法，托诸空言，概在所屏，似与耳食者不同。今忽忽十余年，未能脱稿，殊自惭也。嘉庆

间新出《镜花缘》一书，《韵鹤轩笔谈》亟称之，推许过当，余独窃不谓然。作者自命为博雅君子，不惜獭祭填写，是不径作类书，而必为小说耶？即如放榜谒师之日，百人群饮，行令纠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毕其一日之事，阅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犹津津有味，何其不惮烦也！《红楼梦》叙述儿女子事，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陈君乃师其意而变其体，为诸伶人写照。吾每谓文人以择题为第一谊，正谓此也。正如《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师之，极力摹绘阀阅大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

〔标题为编者所加〕

阅《孟邻堂文钞》，其与明史馆提调吴子瑞书，辨王民望、唐荆川事，谓民望之死，非由于荆川。民望逮下狱时，荆川在南讨倭，已逾七月。至次年冬民望死西市，而荆川已先半载卒于泰州舟中。可证野史言^舟洲兄弟遣客刺荆川死之妄。其说甚确。然引万季野说云，民望与鄢懋卿同年相契，力恳其劾己以求罢。懋卿谓上于边事严，喜怒不可测，止勿劾。民望乃自属草，付其门人方辂上疏劾之。帝果大怒，遂下狱论死。是民望之死，实自为之，与严氏亦无涉。然果尔，则^舟洲兄弟，何以切齿分宜？世蕃之刑，至买其一胛，持归祭奠，熟而啖之。据沈德符《野获编》，言介溪以^舟洲兄弟皆得第贵，怒世蕃，谓其不肖，世蕃遂谋中伤之。而民望闻杨忠愍之死，为之悲叹，属其子振恤其家，祸以起。他书亦言分宜因^舟洲与忠愍游，又经纪其丧，适以求古画于民望不得，怒遂不解。盖论者谓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荆川指其中一人闭口喝六，证为

賸物，固属附会东坡指李公麟画故事。而王氏父子结衅严氏，则固有之事也。如杨氏言，则以荆川阅兵劾疏，实阴为民望解，鄢懋卿又力沮民望之求劾，似其死全出世宗意矣。

〔标题为编者所加〕

方 濬

《水浒》、《金瓶梅》二书倡盗诲淫，有害于世道人心者不小。按《金瓶梅》载武松、潘金莲等事，其说不一。包倦翁《闸河日记》云：“阿城古甄治，陈王墓在焉，今属阳谷，唯阿井周围百步属东阿，故东阿有贡胶役，而土人颂之曰：‘山东有二宝，东阿驴胶，阳谷虎皮。虎皮今藏阳谷库，土人传为武松打死于景阳岗者也。景阳岗在阿城东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阳谷知县武姓者，甚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门有庆大户，尤被其毒。民人切齿，呼之为‘武皮匠’，言其剥削也；又呼为‘卖饼大郎’，言其于小民口边求利也。’”据此，似作者不为无本。

〔标题为编者所加〕

稗史亦史也，其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也，何独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栋折轴，愜心贵当者盖寡。自王新城喜读说部，其书始寔盛，而求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亦不过世行之《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盖《西游记》为自治之书，邱真人见元门之不竞，借释教以警元门，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躯命本诚正以立言也。《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治人之书。一则施耐庵见元臣之失臣道，于盗贼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则王凤洲痛亲之死冤且惨，义图复仇雪耻，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护己，影射仇家名姓，设为稗言，投其所好，更鸩其篇页，思有以中伤之。其苦心苦于卧薪吞炭，是则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

〔标题为编者所加〕

苏、扬两州，向皆有《金瓶梅》版，苏城版藏杨氏。杨氏长者，以书业为生理，家藏《金瓶梅》版，虽销售甚多，而为病所累，日夕不离汤药，娶妻多年，卒不育子。其友人戒之曰：“君早已完娶，而子嗣甚艰，且每岁所入，徒供病药之费，意者君以《金瓶梅》版印售各坊，人受其害，而君享其利，天故阴祸之欤？为今之计，宜速毁其版，或犹可晚盖也。”杨惊语，即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自此家无病累，妻即生男，数年间，开设文远堂书坊，家业遂成。其扬州之版，为某书贾所藏，某开设书坊三处，尝以是版获利，人屡戒之，终不毁。某年暑月，偕其子到苏，子因他事先归，某在寓中，得病将不起，同人送之归，行至中途，某竟死舟次，及抵家飞报其子。其子奔丧至，见尸已腐坏，血水涌溢，蝇蚋纷集，尸虫攒啞焉。其颡有_痕，睨而不视，遽远避之。比掩棺，晚不能殓，但以衣盖尸上而已。谚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以印售淫版，竟至如此结

局，较之杨氏之闻言即毁者，其得失何如哉？某既死，有儒士捐金买板，始就毁于吴中。

《金瓶梅》一书，凡男女之私类，皆极力描写，独至月娘者，胡僧药、淫器包，曾未沾身，非为冷落月娘，实要抬高月娘。彼众妇者，皆淫媚贱婢，而月娘则良家淑女也；彼众妇者，皆鹑奔相就，而月娘则结发齐眉也。作者特用污泥莲花之法，写得月娘竟是一部书中第一人物，盖作者胸中横着正经夫妻四字，故下笔遂尔大雅绝伦。凡此皆文体也，奇文每多忽略看过，此篇未可以小词忽之。文无大小，看其结构如何。篇中起伏顿挫，关锁呼应，绝如《水浒》；摹写情事，杂用方言，如《金瓶梅》，其雕心刻骨，雅秀绝伦，则兼撮《西厢》、《牡丹亭》之长。而能自出机杼，不袭一字，食古而化，乃成斯文。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具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凄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且其中短筒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征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

凡著小说者，于作回目时不宜草率。回目之工拙，于全书之价值与读者之感情最有关系。若《二勇少年》之目录，内容虽佳极，亦失色矣。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

《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写淫之处，此外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遍性矣。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的人物，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宗旨在于写淫，又何必取此粗贱之材料哉？论者谓《红楼梦》全脱

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若其回目与题词,真佳绝矣。

书名往往好抄袭古人，亦是文人一习。小说家尤甚：有《红楼梦》，遂有《青楼梦》；有《金瓶梅》，遂有《银瓶梅》；有《儿女英雄传》，遂有《英雄儿女》；有《三国志》，遂有《列国志》；传奇则《西厢记》之后，有《西楼记》，复有《东楼记》、《东阁记》。他如此者，尚不可枚举。

余尝以《金瓶梅》一书名满天下，疑虽淫_媒荡志，有干例禁，其文笔之斐_晋，神情之酣畅，当有并驾《秘辛》，超乘《外传》者。辗转向友人假得一部，开函读之，三日而毕。究于其中笔墨妙处，毫未见得。尚疑鹵莽，再三展阅，仍属不见其妙。且文笔拖沓懈怠，空灵变幻不及《红楼》，刻划淋漓不及《宝鉴》，不知何以负此重名。岂各处销毁，传本日少，人情浮动，以耳为目，遂有享敝帚于枕中，珍漏脯为席上者耶？

某某年道光御便殿，召见最亲幸之某旗员。时长昼如年，道光倦甚，因问有何消遣之良法。某对曰：“臣以为读书最佳。”道光曰：“读书固佳，然书贵新奇，耐人寻味，内府群书，朕已遍览，不识外间有何妙书，足供寓目否？”某率尔对曰：“妙书甚多，即如奴才所见之《金瓶梅》、《红楼梦》、《肉蒲团》、《品花宝鉴》等，均可读之以消遣。”道光闻而茫然，略记其名，颌首称善。明日于军机处，见潘文公，笑问曰：“闻卿家藏书甚富，如某某等书，谅必购置。”公大惊，伏地叩头不起。道光曰：“第欲问卿借书，何遽至此？”公乃婉奏：“此皆淫书，非臣家所敢蓄，不识圣聪何以闻之？”道光默悟，即降手谕，将某严行申斥。

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水浒传》之宋江、《石头记》之贾宝玉，人格虽不纯，自能生观者崇拜之心。若《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几于全知全能，正令观者味同嚼蜡，尚不如神怪小说之扬戩、孙悟空腾拿变化，虽无理而尚有趣焉。其思想之下劣，与六花藏才子书，及各种盲辞中王孙公子、名士佳人之十足装点者何异？彼《金瓶梅》主人翁之人格，可谓极下矣，而其书历今数百年，辄令人叹赏不置。此中消息，惟熟于盲、腐二史者心知之，固不能为赋六合，叹三恨者之徒言也。

天僂生

特达之士，哲疑之才，知人命之至速也，束身砥行，思树功伐，垂令名，劳思焦虑以赴之。其卒也，则或求之而得，则或求之而不得。至于求之而不得，见夫邪曲之害公也，顽嚚之蔽明也，忧谗畏讥，惧终其身无可表_襮，乃不得已遁而为小说。吾国数千年来，为小说者，不下数百，求其与斯旨合者，……时则若王氏之《金瓶梅》。元美生长华阀，抱奇才，不可一世，乃因与杨仲芳结纳之故，致为严嵩所忌，戮及其亲，深极哀痛，无所发其愤。彼以为中国之人物、之社会，皆至污极贱，贪鄙淫秽，靡所不至其极，于是而作是书。盖其心目中，固无一人能少有价值者。彼其记西门庆，则言富人之淫恶也；记潘金莲，则伤女界之秽乱也；记花子虚、李瓶儿，则悲友道之衰微也；记宋蕙莲，则哀谗佞之为祸也；记蔡太师，则痛仕途黑暗，贿赂公行也。嗟乎！嗟乎！天下有过人之才人，遭际浊世，把弥天之怨，不得不流而为厌世主义，又从而摹绘

之 ,使并世者之恶德 ,不能少自讳匿者 ,是则王氏著书之苦心也。轻薄小儿 ,以其善写淫_媒也宝之 ,而此书遂为老师宿儒所诟病 ,亦不察之甚矣。

《金瓶梅》、《肉蒲团》,此皆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此非著作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者之难其人矣。推是意也,吾敢谓今之译本侦探小说,皆诲盗之书。夫侦探小说,明明为惩盗之书也,顾何以谓诲盗?夫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若《金瓶梅》、《肉蒲团》,淫者见之谓之淫,侦探小说则盗者见之谓之盗耳。呜呼!是岂独不善读书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过耶!社会如是,捉笔为小说者当如何其慎之又慎也。

黄小配

更由前之说，串剧本者既大半跟源小说而来，有新小说而后有新剧本，犹有新事而后有新戏，则小说之改良，尤为首要矣。论者曰：有《水浒传》出，而元末之英雄四起；有《金瓶梅》出，而西北淫浇之风渐知畏忌，盖其感人者深耳！今也，新风普渡，小说之价值如骤登龙门。其进步如此，风气亦因之而渐进。是小说之至要，固今日人群所公认。

王文濡

不作《小说谈》久矣。客之阅我杂志者，书来屡以为言，勉应其意，聊贡数则，专说《金瓶梅》事。其书不久当发现于世，爱读者当不河汉我言也。

《金瓶梅》何以为才子之作？以其所描写为下等社会情事也。中上两等社会，吾人固习见而习闻之。执笔状之，则连篇累牍，势不难举，身所接_搆，心所蕴蓄，目所见，耳所闻，一一如数家珍。况我国下等社会，情事尤为复杂，描写更难着笔。西人小说家，如司各脱、迭更司辈，其著作脍炙人口者亦以此。元美为有明一代作家，文字古奥，直追秦汉，何以降心为此？即曰有所为而为，恣淫可也，导淫诲淫不可也。今之青年，知识初开，身础未固，误于喜观此书而夭其天年者，自有此书以来，其孽已蔓延而不可胜数。政令所在，非不循例以禁之，而下之流传贾利如故也。由是观之，元美不为千秋万世之罪人耶？以元美之才、元美之行，不应留此秽史，供人指摘，向蓄此

疑久矣。今春过某氏(某氏素富藏书,以藏此书故不愿宣其姓氏),见有此书原本,则与俗本全异,为乾隆时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所藏抄本,以赠大兴舒铁云,铁云转赠诸秀水王仲瞿者。仲瞿有考证四则,中有评注,则其妻金云门氏之笔也。

简首有蒋剑人序。计此书经过之历史,由马而舒,由舒而王,由王而蒋,由蒋而归于某氏。近某书局请于某氏,借抄以刊行之,以存王本之真,以正俗本之误,甚盛举也。

原本之异于俗本者,王氏仲瞿之考证四则言之详矣。至其内容所在,俗本专写西门之淫滥,原本专写西门之贪酷,其纳贿害人各事,按诸正史,一一皆可指实,非凭虚臆造者。同一用俗语演成,而命意措词,原本之借下等社会,描摹上等社会之情事,匣剑帷灯,有不脱不粘之妙。且所指尤不止于此者。明代君主之专制,政府之万恶,触类抒写,淋漓尽致,使读者知西门之所以亡家,即有明之所以亡国也。人第见其父死非罪,切齿严氏,特作是书为口诛笔伐之举,以报其陷父之仇,而不知其思深虑远,逆料危亡之不远,而有此沈挚迫切托词隐意之警告,其爱国之心,忧时之计,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谚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吾于元美信之矣。

俗本之作伪于何时?王氏谓明季浮浪文人所作。予意殊不谓然。有清开国之初,《金瓶梅》有殿本,清书与汉文相对照。其意之所在,当时人士,厌习清书,借此以饵诱之,使其同化于不觉也。予闻友人蒋桐生说,我得朱氏藏有殿本一部,伊曾见之。桐生人甚笃实,朱氏亦素有藏书之名,其言非响壁虚造可知。鄙意作伪者不在明季而在清初。皇太后之下嫁,洪承畴之尚主,躬为其事,

不以为奇，佞臣媚子，因而托名元美，造作此书，为献媚宫闱计，如明宪宗时万安之贡春药等伎俩而已。当时文人，如牧斋等，廉耻道丧，亦复无所不至，又安知非若辈所为耶？恨不起仲瞿于九原而质问之。

〔标题为编者所加〕

王文濡

小说以叙述下流社会情况为最难着笔。非身入其中，深知其事者，断不能凭空结撰，摹绘尽致，此文人学士之所短。而旧小说如《金瓶梅》等书，所以旷世不一见也。西人亦然，小说名家如林，而工于此道者，在英则有迭更司，在美则有马克·吐温，在法则有查拉，在俄则有杜瑾纳夫。前后相望，不过数人，数人之撰著，又皆脍炙人口，其如难能可贵则一也。

〔标题为编者所加〕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纳，狱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间。会荆川解职归，遍阅奇书，渐叹观止，乃急草此书，渍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必逐页用纸粘舌，以次披览也。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募觉舌木强涩，镜之黑矣。心知被毒，呼谓其子曰：“人将谋我。我死，非至亲不得入吾室。”逾时遂卒。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抢地而至，蒲伏于其子之前，谓曾受大恩于荆川，愿及未盖棺前，一亲颜色。鉴其诚，许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及殓，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环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支体以为报也。二说未知孰是。观袁中郎《锦帆集》，有“伏枕读《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等语，则是书名重已久，然实芜秽不足观，不只卷末建醮托生一回荒诞不经也。

王 晔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_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_搆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旧说如此，窃有疑。元美为一代才人，文品何等峻洁，不应有此秽褻之作，阴险如东楼，既得其情，安得不为斩草除根之举。明知之而故纵之，亦非东楼之为人。得此原本而诸疑豁然矣。

曾闻前辈赵瓯北先生云：《金瓶》一书为王元美所作，余尝见其原本（随园老人曾有此本），不似流传之俗本，铺张床第等秽语，纸上傅药以毒东楼，其说支离不足信也。元美当父难发后，兄弟踵嵩门哭吁贯罪，嵩以谩语慰之，而卒陷其父于死。元美与严氏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奸焰熏灼，呼天莫诉，因作此书以示口诛笔伐。西门者影射东楼也，门下客应伯爵等影射胡植白启常王材唐汝楫诸人也。玳安等仆影射

严年也。金瓶梅影射东楼姬妾也。西门倚蔡京之势影射东楼倚父嵩之势也。西门之盗人遗产谋人钱财,影射东楼之招权纳贿筐筐相望于道也。西门之伤发而死影射东楼之遭劾而死也。一家星散孝哥死后,吴月娘寄居永福寺,影射东楼服罪,家财籍没,奸嵩老病寄居墓舍,抑郁以终也。忠孝而作此书,而顾以淫书目之,此误于俗本而不观原本之故也。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压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此书曾于舒文处见抄本)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伪,何物圣叹从而扇生毒焰,扬其恶潮耳。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毁之(按今本每回后有圣叹长批,大半俗不可耐或亦是后人伪记)。

按此原本乃小玲珑山馆主人赠舒文者,不知与云松观察所见之本有无异同(赵所见为随园本否,他日当问之),珍珠密字,楷法秀丽,余妻尤爱玩不置,绣余妆罢,意为之注,颇能唤醒恶人不浅,拟与舒文力谋付梓,为元美一雪其冤。

《金瓶梅》及《隔帘花影》等书有呼“达达”字样。“达达”二字，不知所出。友人尝举以问余，余笑曰：此二字盖越谚，今犹习问（闻）之，越人笑骂尝有“妈同我达达”之语，是其“达达”之意，即犹“云云”之谓也。

《肉蒲团》一书又名《觉后禅》，又名《耶蒲缘》，描写甚于《金瓶梅》。或问撰人姓氏，余断为李笠翁。或问所据，予以区区二字为证。自称辄区区之辞，书中未尝前见，惟笠翁十种曲用之，故予断定《肉蒲团》及《觉世十二楼》两书皆出笠翁之手。且其结构之精，思想之妙，用笔之畅，造句之畅，实有非笠翁不办者。

钱静方

《金瓶梅》一书，淫褻鄙陋，其描摹小人口吻，无不逼真，云系前明王凤洲先生所作，或云凤洲门人所作。相传嘉靖中叶，严氏擅政，东楼之恶，尤过介溪，有人皆欲杀之势。作者探知东楼多内宠，喜阅淫书，每阅一纸，必以食指蘸唾，拈其纸角，因作此书，不惜污其笔墨，以迎合其意。书成，于纸角均以鸩毒溅之，因东楼近侍以献，不意溅毒尚轻，而东楼性极聪明，阅书过捷，竟得无恙。此系传闻之言，不知确否。此书所载，大都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介溪、东楼；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勳则指陆炳；其他诸人，亦各有所属。

书从《水浒》武松一回衍出，意必海市蜃楼，空中结撰，初不料其姓氏亦有依据。《香祖笔记》载：兖州阳谷县西北有西门冢。大姓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妻吴氏、妾潘氏族。则小说所载，或亦风影其辞欤？

《金瓶梅》之后，又有《玉娇李》一书，与前著出自一手。各设报应因果，谓武大后

世化为淫夫 ,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 ,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 驢 憨男子 ,坐视妻妾外遇 ,以见轮回不爽。其朝代为金 ,其帝则称完颜大定 ,而贵溪、分宜相构事 ,亦隐寓焉。至嘉靖时人 ,或竟直书姓名 ,殊可骇怪。然笔锋恣横酣畅 ,似尤胜于《金瓶梅》也。说见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今此书易名《隔帘花影》 ,坊间有购之者 ,余尝见之。

《金瓶梅》一书，袁中郎珍为上品，有舟中看《金瓶梅》云雾满几案之语。作者或为明中叶人，或遂谓为王_介洲手笔者。_介洲文骨高骞，自谓唐宋以下书不观，身后乃有人以此诬之，亦可矜也。有谓是书实出明兵部主事吴人某之子。某为主事时，荆川唐顺之方总督蓟辽，以公谒之。例总督皆挂兵书衔，分为堂属，某抗不为礼，荆川遂摭他事劾杀之。其子仇唐甚。是时荆川已罢官家居，方搜求异书为娱老计。其子乃穷旬日力草是书，渍砒于纸以进。荆川大喜，尽日夜读之，以指蘸唾沫，且揭且阅，夜未半，发病卒。此一说也。又一说与此同，特为严东楼事。

《金瓶梅》如急湍峻岭，殊少回旋；《石头记》如万壑争鸣，千岩竞秀。《金瓶梅》如布帛粟食，仅资饱暖；《石头记》如琼裾玉佩，仪态万方。此皆以文论也。

词家北宋得美成，南宋得梦窗，而白石峙其中，为蜂腰焉。以我所见，说部中《水

许》、《金瓶梅》、《石头记》殆亦相似。《水浒传》大刀阔斧，气象万千，为之初祖。《金瓶》一变而为细笔，状闾阎市井难状之形，故为隼上。《石头记》则直为工笔矣。然细迹之，盖无一不自《金瓶》一书脱胎换骨而来。《金瓶》第一回“武大郎冷遇武二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冷热”二字于篇首揭出，即为全书之干。热处有冷，热即为冷之端；冷处应热，冷即为热之果。映带生发，不出二者，令读者时有腊月三十夜闻楼子和尚高唱之感。《石头记》首题“真假”，已更勘进一层，然“冷热”为“真假”之现象；“真假”即“冷热”所由来。花落子盈，初无二致，阐发天人之际，激扬清浊之中，无余蕴矣。《石头记》一部大书，线索却在甄士隐发端。佛火蒲团，霜钟清磬中，吐露出浮华草露之感。与《金瓶梅》发端一词所谓玉堂金马、竹篱茅舍，一例都无据。翻云覆雨，横颠竖倒，世事都如许者，盖有同感焉。

《石头》多词曲，《金瓶》多小曲；《石头记》绘阅阅大家，《金瓶梅》写井市编户；各有所当也。然《石头记》词曲，恰未臻上乘。

绛珠魂返后之大观园，与春梅遣嫁后之紫石街，宏深
闾阎 蔓草荒烟，同写出盛衰不常之感，盖石既空顽，而梅魂不返矣。

读小说不如评小说 ,以欲评小说 ,方肯用心细细读 ,方有趣味。不然 ,任他读了若干遍 ,未得一点好处。

小说最好用白话体 ,以用白话 ,方能描写得尽情尽致。之乎也哉 ,一些也用不着。

或谓小说不必全用白话 ,白话不足发挥文学特长。为此说者 ,必是不曾读过小说者 ,必是不曾领略得小说兴味者。

小说难作处 ,全在白话。白话小说作得佳者 ,便是小说中圣手。

小说之为好小说 ,全在结构严密 ,描写逼真。能如此者 ,虽白话亦是天造地设之佳文。

中国小说最佳者曰《金瓶梅》 ,曰《水浒传》 ,曰《红楼梦》。三部皆用白话体 ,皆不易读。

《水浒传》写豪杰义气 ,《红楼梦》写儿女私情 ,《金瓶梅》则写奸盗邪淫之事 ,故《水浒》、《红楼》难读 ,《金瓶梅》尤难读。能读此三书 ,而能大彻大悟者 ,便是真能读小

说书人，便是真能读一切书人。

《金瓶梅》是异样妙文，《水浒》、《红楼》亦是异样妙文，吾无从轩轻，而吾亦不必强为轩轻。

吾所谓能读小说者，非粗识几字，了解其中事实如何如何也。善读小说者赏其文，不善读小说者记其事，善读小说者是一副眼光，不善读小说者又是一副眼光。

《水浒》评的好，《金瓶》评的亦好。圣叹以真能读小说之眼光指示天下读者不少。

圣叹评小说得法处，全在能识破作者用意用笔的所在，故能一一指出其篇法章法句法，使读者翕然有味。评《红楼》者即远不如。

与其作小说，不如评小说。盖以我之作者，不知费几许经营筹画，尚远不能如前人所作，不如举前人所已经经营筹画成就者，而由我评之，使我评而佳，则通身快乐，当与作书相等。

与其评寻常小说，不如评最佳最美之小说。盖评寻常小说，既需我多少思量，且感得一身不快，不如评最美最佳之小说，头头是道，不觉舞之蹈之也。

世间最美最佳之小说，能有几部？则前人亦必如我之不肯放松，一一评过。前人既经评过，又何劳我之再评？不知人生百年，有如一场春梦。我既引为乐事，前人虽先我为之，我又何必不为？我之所评者，自我心中扒剔而出，我既不认我抄袭前人，又不认前人与我暗合，我自与我排忧解难耳。

我欲评此三书，第一当先评《金瓶梅》，以《金瓶梅》第一难读，又第一难评故。

《金瓶梅》乃一最佳最美之小说，以其笔墨写下等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故。若以《金瓶梅》为不正经，

则大误。《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若以《金瓶梅》为导淫，则大误。

《金瓶梅》不许未成年之男女读，以彼血气未定必致误会故。《金瓶梅》不许无知识之男女读，以彼毫无见解必致误会故。

读《金瓶梅》须正襟危坐读之，细玩其通篇文理，索解其言外命意，方是善读者。

《金瓶梅》以绝世妙文，以受误读者之厄，致不能公行于世。误读《金瓶》者，真罪过不小。

《金瓶梅》洋洋洒洒一百回大书，作者非敢草率作去，评者亦不敢草率评来。总之《金瓶》笔墨非今人所能为。

作者满肚皮穷愁郁愤，著《金瓶梅》一书，犹存忠厚之旨，不出真名，藉《水浒传》武松报兄仇一案推演出来。愚者谓书中主人为西门庆，既属大误，即智者谓书中主人非西门庆而实另指一人，亦复大误。盖《金瓶梅》专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即无不可为普天下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一齐写照也。

《金瓶梅》者，合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名者成一书名也。作者或另有命名之意，读者亦不必过事刻舟求剑。日人翻印，改名曰《多妻鉴》亦可。

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以冷热两字对锁作起，立意甚佳。

《金瓶梅》开卷以酒色财气作起，下却分四段以冷热分疏财色二字，而以酒气穿插其中，文字又工整，又疏宕，提纲挈领，为一书之发脉处，真是绝奇绝妙章法。

写“财”之势利处，足令读者伤心；写“色”之利害处，足令读者猛省；写看破财色一段，痛极快极，真乃作者一片婆心婆口。读《金瓶梅》者，宜先书万遍，读万遍，方足

以尽惩戒,方不走入迷途。

“尸横灯影,血染空房”,是好色人的下场,是奸恶人的下场。为好色人奸恶人当头一棒,警醒几何。

有钱人家子弟而不善为教育,未有不坏事流于奸邪者。观作者于西门庆大书特书曰“饶有几贯家资,……却又百般爱惜,听其所为,所以这人不甚读书”。可以警只知溺爱,不使儿子学正道者。无处不见作者苦心也。

于总冒下,一段总起西门交游,见其朋友中无一非“无益有损”酒肉之友;一段总起西门家庭,见其家庭无一非已造之淫孽。

叙西门结识之朋友,身分都尽,而独提重应、谢二人,其余无非陪客。叙西门之妻妾,又身分都尽,而独提重月娘、大姐二人,其余又无非是陪客。

写热结十弟兄,各人心事丑态,一一毕现。无端而死一卜志道,固在从旁衬出十弟兄之冷淡,以直照西门之死后。实缘作者欲出李瓶儿,不得不出花子虚;欲出花子虚,又不能另行提出一头。故预先藉卜志道一死,便于将花子虚拉入热拜之中,好隐约中将瓶儿带出,以极文心之妙也。是作者苦心经营处,读者不可为之瞒过。

结拜十弟兄,何以必要在玉皇庙?以便于观马、赵、温、黄四大元帅也。何以欲观马、赵、温、黄四大元帅?以欲出元坛身边之虎也。何以欲出元坛身边之虎?以便引吴道官说出景阳冈有虎,使接入下半回观打虎人文字不突兀也。奇绝妙绝章法,真令普天下作者拜倒。

为欲说出景阳冈有虎耳,却一连陪了三个笑话,务使文字不板不孤,且令一时闲谈情事俱尽。

写看武松,处处作十二分写,写得异样声势。如此空灵笔墨,真是好看煞人。使西门庆看武松,欲西门心中目

中有一武松也。故看毕乃顺势递入下半回文字。

自是以下,直至第六回,俱是本《水浒》事实演出来。读者取《水浒》两两比较读之,当见有增处,有减处,有详处,有略处,有全易处,有稍改处,自成一篇章法,自成一种手笔,可以知同一文字变化之妙。

于武二弟兄会见时,百忙中插入武大往事、金莲出身一大段文字。叙王昭宣府一节,详金莲恶之所从出也。叙张大户一节,原金莲之得嫁武大也。此节情事,较《水浒》为足。

写金莲勾挑武松一段文字,真如火如荼。武二天人,到处俱见神威。不想《金瓶梅》一部禽兽世界中,有此顶天立地汉子。写武二兄弟分别,语语皆从血性中出来,尤可歌可泣。

写金莲恶,写王婆尤恶。金莲虽淫秽,犹自无毒夫心肠,非王婆唆恶不及此,老虔婆真咄咄可畏哉!要知天下即今酿成伤风坏俗、毁伦灭理之事者,皆此老虔婆类也。

单提郓哥捉奸一段,则文字不易特折,故借街坊邻舍一句顺递而下,便接来毫无痕迹。

写毒杀武大一段,真是鬼蜮森森文字。于西门口中说“我若负了心,就是武大一般”二语,预伏七十九回情事,发人警省,是作者苦心劝世处。

由第七回插入叙孟玉楼一节。书中写玉楼处,另是一种身分。玉楼虽不贞,然犹凭媒妁之言,出嫁成礼,与始乱终娶有异,且无鸠夫气夫之事,与金莲、瓶儿固迥然不同。书中特设玉楼一人,所以为金莲渲染也。张四一段,无甚深意,特特描写社会人情耳。杨姑妈硬主张,具见财之足以动人。

第八回将金莲一冷,从侧面将娶玉楼、嫁大姐许多事

情 ,淡淡带过 ,是文字避重就轻法 ,亦以从侧面渲染 ,方见得文字妙处也。

第九回为欲作《水浒》翻案文字 ,故一面令西门庆偷娶潘金莲 ,一面令武都头误打李皂隶也。西门庆不必偷娶潘金莲 ,若武二归来 ,见嫂氏犹在 ,必追寻武大病死原由 ,将不能转换章法故。武都头不必误打李皂隶 ,若李皂隶不为西门氏替死鬼 ,则武二必报兄仇 ,西门将无活命故。作者藉此欲另作成一部书 ,故不得不翻案也。

第十回写武松充配孟州 ,由西门入京浸润所致 ,见西门之恶始著也 ,见民贼在上 ,使奸恶小人得志 ,鱼肉人民 ,若此类者不可胜道也。

十回下半 ,全为欲出青(春)梅耳。作者于青(春)梅俱以特笔写之 ,故绝不写其淫逸。写淫逸最甚者 ,莫甚于金莲 ,作者深恶而痛绝之 ,比之狗彘不若也。以狗彘不若者 ,而西门偏好之 ,明西门之不得列于人类也。《春秋》之笔严矣。

说部之书，滥觞于唐，大盛于宋，繁衍至今日而极，然名目虽多，而佳构则绝少，求能脍炙人口者，要不过一《红楼》、一《水浒》、一《三国》、一《聊斋》、一《西游》而已。《金瓶梅》虽曾见称于前哲，以体褻而版少，大不易购，坊间贗本，尤不足观，故尔没没。此外诸书，率可以上述五种为纲领而类括之也。

玄同先生谓《聊斋志异》全篇不通，虽未免过当，然作者实无文章天才，有意使典为文，若丑妇人搽胭抹粉，又若今之村学究满嘴新名词，实在令人肉麻。吾国^割记小记，以愚所见，最喜《今古奇观》，文笔视《聊斋》自然得多，取材见识也略高，所述杜十娘、宋金郎二事，旧剧家盛演之，观者咸大欢迎，而原书之声价反在《聊斋》下，毋乃世人惑于堆砌之套语浮词乎？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即名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吾观迂腐之眼观之，亦非青年良好读物，此乃吾国文学缺点之一。足下及玄同先生以为如何？

胡 适

……先生与独秀先生所论《金瓶梅》诸语，我殊不敢赞成。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着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

钱玄同

……《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佚、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即脱胎此书，盖信）。徒以描写淫褻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径以此书与《红楼》、《水浒》等齐列。然仔细想来，其实喜描淫褻，为中国古人之一种通病。远之如《左传》，详述上烝，下报，旁淫，悖礼逆伦，极人世野蛮之奇观；而叙陈灵公淫乱之事，君臣相谗之言，尤为荒唐到极（今之主张读《经》者，欲令知识甫开之童子将此等文章朝夕讽诵，师长则细细讲解。礼教国之教育，原来如此）。近之如唐诗、宋词，说淫话处亦不为少。至于元明之曲，则有直

叙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厢》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即《水浒》、《红楼》中,又何尝无描写此类语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品花宝鉴》当在第二流)。惟往昔道德未进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家不务撰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波助澜,刻画描摩,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睬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究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进(但可谓之未增进耳,若谓益不如前,亦非公允之论),而血气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则不能不谓前世文学家理想之幼稚矣。然社会进化,是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故今日以为今之写实体小说不作淫褻语为是,而前之描摩淫褻为非;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先生所谓“《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此说最是,故玄同以为但令吾侪今日则诋《金瓶梅》、《品花宝鉴》为淫书,二十一世纪时代之人则诋《碎簪记》、《双秤记》、《绛纱记》为淫书,便是在轨道上天天走不错的路。如是,则无论世界到了三十世纪、四十世纪,……一百世纪,而《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纪中叶有价值之文学,《品花宝鉴》自是十九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碎簪记》、《双秤记》、《绛纱记》自是二十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正如周秦诸子,希腊诸贤,释迦牟尼诸人,无论其立说如何如何不合科学,如何如何不合论理学,如何如何悖于进化真理,而其为纪元前四世纪至六世纪之圣贤之价值,终不贬损丝毫也。

唐顺之条上海防善后九事，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赴闻，予祭葬。顺之，武进人，吾乡先达也。相传顺之有一仇家，以重金购得《金瓶梅》原本，而以砒霜浸制其卷叶，顺之阅书最速，以手指蘸口津随看随蘸，及卷竟而唇麻木，遂中毒死。以正史较之，则故里传言之讹可知也。正史又云：“顺之于学无所不观，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此言亦有据。乡人相传，顺之寓居青果巷盘谷楼，其楼梯曲折而盘屈，登者不易，顺之笔砚几席之间，常有伏弩，以防人行刺云云。今盘谷楼归刘氏，余每过之，辄低回不忍去。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介洲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页。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觐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贗。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

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一夜，读书静室，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如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须留遗书嘱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书数行，笔头脱落，以管就烛，佯为治笔，管即毒弩，火热机发，镞贯刺客喉而毙。凤洲大失望。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尔。荆川索之切。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者尔。不解荆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为严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报也？

《茶余客话》云：“《绣像水浒传》镂板精致，藏书家珍之，钱遵王列于书目，其像为陈洪绶笔。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板刻亦精。此书为嘉靖中一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指分宜，林灵素指陶仲文，朱勛指陆炳。”又云：“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当即世所传之《后金瓶梅》。前书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补，肤浅，且多作吴语。后来惟《醒世姻缘》仿佛得其笔意。然二书皆托名齐、鲁人，何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云：“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伯远携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诤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按：今传世《金瓶梅词话》，五十三至五十五回与通行本不同，有“乘船出游”事，口气亦不类，殆即所谓吴语。《词话》之序，题“万历丁巳”，正四十五年，未知即味水所见否？

昔在京购《金瓶梅》，劝业场有设书肆者，询其有无斯书，肆主曰：“虽有而未敢置此。”约余明日往取。余明日即至，肆主曰：“吾意先生与吾戏，故未携来，明日必不再误。”明日余因故未往，后十余日，复至劝业场，另询一肆，肆主不悦曰：“又问《金瓶梅》，适有一家受罚矣！”余急问何家。伊指以相告，乃前与余相约者。因询受罚之状，曰：“先一人入肆，托为买书，既出书与之，而买书者即回头唤巡警入，方知为探访局之委员。书为其携去，另罚洋五元。”余意彼肆主人，必以余亦探访局所使，急入其肆白之。而肆主对余干笑。余亦笑曰：“其书尚有否？”曰：“无矣！前盖不知违禁，今既知之，决不敢再卖。”复谑余曰：“他书尽有，先生何独购斯书？”盖其疑终莫能释，冤哉！出之琉璃厂，某书坊竟出是书三四部，版本各异。余曰：“汝存书如斯之夥，不畏警察耶？”伊云：“警察何以知之？”余即以劝业场事告之。伊仓皇失色，敛书而入。再问之，

亦不答，斯又疑吾为私探矣，冤哉！因忆鲁智深沽酒不说从五台山上来，特法其智，乃始得之。此余犯法行动，今以揭以示人，未知官府将科余罪居何等？想可援自首之例，从未减也。

《金瓶梅》虽是白话体，但其中什九是明朝山东人俗话，其书之事实、文法以及布局，绝无可取，不知何以有“四大奇书”之目，而与《水浒》、《三国》、《西游》为伍？真不可解。于此可见古今认识字人，并够得上看小说者，亦寥寥无几也。

长篇小说中，有以俗话为白话者，如《金瓶梅》是也；有以官话为白话者，如《儿女英雄传》是也；有白话而夹杂以文言者，如《红楼梦》中之“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等词是也；有白话而夹杂以俗话者，如《水浒》中之“干鸟么、干呆么”等语是也；其完全白话之小说，予生平实未之有见，其俗话、官话、文言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为首屈一指。纯粹之白话，不独“了”字、“呢”字、“哩”字、“的”字、“吗”字等类之语助词不可多用，若北方之普通话不能通行南方，南方之普通话不能通行北方者，如“爸爸”、“爹爹”、“你老”、“老板”、“堂客”、“师母”等类之名词，亦宜少用，即“红东东”、“绿悠

悠”、“甜滋滋”等类形容词，亦不许乱用也。

《金瓶梅》一书，丑秽不可言状。其命意，其布局，其措词，毫无可取，而世人乃目为“四大奇书”之一，此可见世上并够得上看小说书之人而亦无之也。可哀也已！

男女之事，世界上人类有不可免之事，亦人人所能知能行之事，实在用不着作者做书以示人。乃今作者居然做出此一部之《金瓶梅》，则是作者必有其所以忍俊不禁之原故。今观其书，不过为奸夫西门庆、淫妇潘金莲，延长数年之生命，以畅遂其淫欲而已。然则作者之费笔费墨、费纸费光阴，无非为奸夫淫妇出一番心力。作者于此可谓一钱不值也已。

《水浒》之写西门庆、潘金莲也，谓破落户之交通官府，无恶不作而写之者也，为官府之糊涂颠倒而写之者也，为平民之不自度量而娶骄情之大户使女而写之者也，为虔婆恶鸨之引诱妇女犯奸而写之者也，为豪侠之士杀人报仇而写之者也。彼《金瓶梅》者，徒震惊《水浒》五字诀、十分光之妙文，乃窃取之，而增续无数之狗尾蛇足。昔金圣叹骂《续西厢》者，为其专画下半截美人。作者殆除却下半截，此外绝无所谓者乎！

《金瓶梅》以前，未有淫书，作者诚足为作淫书者之始祖矣。但其他之淫书，其所写之若男若女，无论如何污秽齷齪，决不至如西门庆、潘金莲之甚。盖奸夫淫妇之罪恶，亦自有轻重之分。即如《水浒》中潘巧云之于海阁黎，贾氏之于李固，犹为彼善于此者，一则尚无谋杀杨雄之心，一则谋杀卢俊义而未成也。今作者偏有取于罪恶重大之西门庆与潘金莲，苟非作者淫凶之性，与之俱化，亦必作者惟恐世人之不淫凶，而必欲牵率之以同归于恶兽之类。是即作者耻独为恶兽之意志也乎。

今之人之赞颂《金瓶梅》者,以为作者能描写下流口吻,此亦何奇之有?《儿女英雄传》中,对于北方市井无赖口吻,亦写之不一写矣。夫描写各种人口吻,乃是作小说者应有之知识与笔力,安得以之推崇淫凶之作者?

统观《金瓶梅》全部,直是毫无意识。其布局之支离牵强,又无章法可言。至其措词,则全是山东土话,可厌已极。独其写男女之事,勤勤恳恳,有如孝子慈孙之称述祖训者然,使人翻阅一过,有如春日行街市中,处处见有野狗觅偶也。

燕北闲人自谓圆成了何玉凤婚事,不枉出了一身臭汗。我知作《金瓶梅》者将西门庆、潘金莲出力写做一处,亦必自谓不枉。然我却要替笔墨纸张大哭其冤枉也。

《金瓶梅》之可厌处,最以其出死力写西门庆、潘金莲,其好恶实拂人之性。而《野叟曝言》之极力写文素臣,其可厌正不下于《金瓶梅》之写西门庆、潘金莲者,以其本领太大,实违反乎人情也。

刘铁冷

某君话小说，拟甄选五部之善本，次第其高下，欲以矜式后人，诮为有功世道人心之举。无论名小说大手笔之作者，一人有一人之心胸，一书有一书之宗旨，不易轩轻，此正如或问袁简斋本朝诗谁为第一，同一可笑。而列《金瓶梅》于一等，敢问某君有子女，不识亦教其读《金瓶梅》否？

竹坡闲话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_也，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虽然，上既不可问诸天，下亦不能告诸人，虽作秽言以丑其仇，而吾所谓悲愤鸣_也者，未尝便慊然于心，解颐而自快也。夫终不能一畅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谓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楼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愤，而终于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无言，而吾亲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欲无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且也为仇于吾天下万世也，吾何如以公论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隐，又不能下告士师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应手之荆聂，以济乃事，则吾将止于无可如何而已。

哉！止于无可如何而已，亦大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转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愤，是用借西门氏以发之。虽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磨镜一回，皆《蓼莪》遗意，啾啾之声刺人心窝，此其所以为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对峙一亲哥哥，未复以二捣鬼为缓急相需之人，甚矣，《杀狗记》无此亲切也。闲尝论之，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然而伦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妇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热亦无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热而明日冷，则今日之真者，悉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嗟嗟，假者一人死而百人来，真者一或伤而百难赎。世即有假聚为乐者，亦何必生死人之真骨肉以为乐也哉。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故其开卷即以冷热为言，煞末又以真假为言。其中假父子矣，无何而有假母女；假兄弟矣，无何而有假弟妹；假夫妻矣，无何而有假外室；假亲戚矣，无何而有假孝子。满前役役营营，无非于假景中提傀儡。噫，识其假，则可任其冷热，守其真，则可乐吾孝弟。然而吾之亲父子已荼毒矣，则奈何！吾之亲手足已飘零矣，则奈何！上误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之同类，则奈何！是使吾欲孝

而已为不孝之人，欲悌而已为不悌之人，欲忠欲信而已放逐逸间于吾君吾友之侧，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辜而遭此也哉！曰：以彼之以假相聚故也。噫嘻，彼亦知彼之所以为假者，亦冷热中事乎！假子之于假父也，以热故也。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热故也。彼热者，盖亦不知浮云之有聚散也，未几而冰山颓矣，未几而阙阅朽矣。当世驱己之假以残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飘泊无依，所为假者安在哉！彼于此时，应悔向日为假所误，然而人之真者，已黄土百年。彼留假傀儡，人则有真怨恨，怨恨深而不能吐，日酿一日，苍苍高天，茫茫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眼泪洗面，椎心泣血，即百割此仇，何益于事。是此等酸法，一时一刻，酿成千百万年，死而有知，皆不能坏，此所以玉楼弹阮来，爱姐抱阮去，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无绝期矣。故用普净以解冤偈结之。夫冤至于不可解之时，转而求其解，则此一刻之酸，当何如含耶？是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以消遣哉！甚矣，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上不能告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_雷而作秽言，以泄其愤，白云含酸，不是撒泼。怀七囊锤，以报其人，是亦一举，乃作者固自有志，耻作荆聂，寓复仇之义于百回微言之中，谁为刀笔之利，不杀人于千古哉。此所以有《金瓶梅》也。

然则《金瓶》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不禁望洋而退。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

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据，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

冷热金针

《金瓶》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然于其点睛处，则未之知也。夫点睛处安在？曰：在温秀才韩伙计。何则？韩者冷之别名，温者热之余气，故韩伙计，于加官后即来，是热中之冷信；而温秀才，自磨镜后方出，是冷字之先声。是知祸福倚伏，寒暑盗气，天道有然也。虽然，热与寒为匹，冷与温为匹，盖热者温之极，韩者冷之极也。故韩道国，不出于冷局之后，而出热局之先，见热未极而冷已极。温秀才，不来于热场之中，而来于冷局之首，见冷欲盛而热将尽也。噫嘻，一部言冷言热，何啻如花如火，而其点睛处，乃以此二人，而数百年读者，亦不知其所以作韩、温二人之故。是作书者固难，而看书者为尤难，岂不信哉！

《金瓶梅》寓意说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

者无论。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同声一哭。因瓶生情，则花瓶而子虚姓花，银瓶而银姐名银，瓶与屏通，窥春必于隙底，屏号芙蓉，玩赏芙蓉亭，盖为瓶儿插笋。而私窥一回卷首词内，必云绣面芙蓉一笑开。后玩灯一回灯赋内，荷花灯、芙蓉灯，盖金瓶合传，是因瓶假屏，又因屏假芙蓉，浸淫以入于幻也。屏风二字相连，则冯妈妈必随瓶儿而当大理屏风，又点睛妙笔矣。芙蓉栽以正月，艳冶于中秋，摇落于九月，故瓶儿必生于九月十五，嫁以八月二十五，后病必于重阳，死以十月，总是芙蓉谱内时候。墙头物去，亲事杳然，瓶儿悔矣，故蒋文蕙将闻悔而来也者。然瓶儿终非所据，必致逐散，故又号竹山，总是瓶儿心事中生出此一人。如意为瓶儿后身，故为熊氏姓张，熊之所贵者胆也，是如意乃瓶胆一张耳。故瓶儿好倒插花，如意茎露独尝，皆瓶与瓶胆之本色情景。官哥幻其名意，亦皆官窑哥窑，故以雪贼死之。瓶遇猫击，焉能不碎？银瓶坠井，千古伤心。故解衣而瓶儿死，托梦必于何家。银瓶失水矣，竹篮打水，成何益哉。故用何家蓝氏作意中人，以送西门之死，亦瓶之余意也。

至于梅又因瓶而生。何则？瓶里梅花，春光无几，则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宠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为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故主。而吴典恩之事，必用春梅襄事。冬梅为奇寒所迫，至春吐气，故不垂别泪，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至周舟同音，春梅归之，为载花舟。秀臭同音，春梅遗臭，载花舟且作粪舟。而周义乃野渡无人，中流荡漾，故永福寺里，普净座前，必用周义转世为高留住儿，言须一篙留住，方登彼岸。

然则金莲，岂无寓意哉？莲与芰类也。陈，旧也，败也。敬、茎同音，败茎芰荷，言莲之下场头，故金莲以敬济而败，侥幸得金莲，芰茎之罪，西门乃打铁棍。铁棍，芰茎影也，舍根而罪影，所谓糊涂。败茎不耐风霜，故至严州，而铁指甲一折即下，幸徐_翥相救，风少劲即吹去矣。次后，过街鼠寻风，是真朔风。风利如刀，刀利如风，残枝败叶，安得不摧哉！其父陈洪，已为露冷莲房坠粉红。其舅张团练搬去，又荷尽已无擎雨盖，留此败茎，支持风雪，总写莲之不堪处，益知夏龙溪为金莲胜时写也。温秀才，积至水秀才，再至倪秀才，再至王潮儿，总言水枯莲谢，唯余数茎败叶，潦倒污泥，所为风流不堪回首，无非为金莲污辱下贱写也。莲名金莲，瓶亦名金瓶，侍女偷金，莲瓶相妒，斗叶输金，莲花飘萎，芰茎用事矣。

他如宋蕙莲、王六儿，亦皆为金莲写也。写一金莲不足以尽金莲之恶，且不足以尽西门、月娘之恶，故先写一宋蕙莲，再写一王六儿，总与潘金莲一而二，二而三者也。然而蕙莲，荻廉也，望子落廉儿坠，含羞自缢，又为叉竿挑廉一回，重作宣染。至王六儿，又黄芦儿别音，其娘家王母猪，黄芦与黄竹相类；其弟王经，亦黄芦茎之义，芦茎叶皆后空，故王六儿好干后庭花，亦随手成趣。芦亦有影，故看灯夜又用铁棍一觑春风，是芦荻皆莲之副，故曰二人皆为金莲写。此一部写金写瓶写梅之大梗概也。

若夫月娘为月，遍照诸花，生于中秋，故有桂儿为之女。扫雪而月娘喜，踏雪而月娘悲，月有阴晴明晦也。且月下吹箫，故用玉箫。月满兔肥，盈已必亏，故小玉成婚，平安即偷镀金钩子到南瓦子里耍。盖月照金钩于南瓦上，其亏可见。后用云里守入梦，月被云遮，小玉随之与兔俱隐，情文明甚。

李娇儿乃桃李春风墙外枝也。其弟李铭,言理明外暗,可发一笑。至賁四嫂与林太太,乃叶落林空,春光已去。賁四嫂姓叶,作带水战,西门庆将至其家,必云吩咐后生王显,是背面落水,显黄一叶也。林太太用文嫂相通,文嫂住捕衙厅前,女名金大姐,乃蜂衙中一黄蜂。所云蜂媒是也。此时爱月初宠,两番赏雪,雪月争寒,空林叶落,所为莲花芙蓉,安能宁耐哉。故瓶死莲辱,独让春梅争香吐艳。而春鸿、春燕,又喻韶光迅速,送鸿迎燕,无有停息。来爵改名来友,见花事阑珊,燕莺遗恨,其妻惠元,三友会于园,看杜鹃啼血矣。内有玉箫勾引春风,外有玳安传消息。箫有合欢之调,蕙莲、惠元以之。箫有离别之音,故三章约乃阳关声,西门听之,能不动深悲耶?惹草拈花,必用玳安,一曰嬉游蝴蝶巷,再曰密访蜂媒,已明其为蝶使矣,所谓玳瑁斑花蝴蝶非欤?书童则因箫而有名,盖篇内写月写花写雪,皆定名一人,惟风则止有冯妈妈。太守徐_峴,虽亦一人,而非花娇月媚正经脚色,故用书童与玉箫合,而萧疏之风动矣。未必云私挂一帆,可知其用意写风,然又通书为梳,故书童生于苏州府长(常)熟县,字义可思。媚客之唱,必云画损了掠儿稍。接手云,賁四害怕,梳子在坐,篦子害怕,妙绝《艳异》遗意,为男宠报仇。金莲必云,打了象牙,明点牙梳,去必以瓶儿丧内。瓶坠簪折,牙梳零落,萧疏风起,春意阑珊,阳关三叠,大家将散场也。《金瓶》之大概寓言如此,其他剩意,不能殚述,推此观之,笔笔皆然。

至其写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试细细言之。玉楼簪上镌“玉楼人醉杏花天”,来自杨家,后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妈妈而吐气,分明为杏无疑。杏者,幸也,身毁名污,幸此残躯留于人世,而住

居臭水巷。盖言无妄之来，遭此荼毒，污辱难忍，故著书以泄愤。嫁于李衙内而李贵随之，李安往依之。以理为贵，以理为安，归于真定枣强。真定言吾心淡定。枣强言黽勉工夫，所为勿助勿忘，此是作者学问。王杏庵送贫儿于晏公庙任道士为徒。晏，安也，任与人通，又与仁通，言我若得志，必以仁道济天下，使天下匹夫匹妇，皆在晏安之内，以养其生，皆入于人伦之中，以复其性，此作者之经济也。不谓有金道士淫之，又有陈三引之，言为今人声色货利，浸淫已久，我方竭力养之教之。而金道又使其旧性复散，不可救援，相率而至于永福寺内，共作孤魂而后已，是可悲哉。夫永福寺，涌于腹下，此何物也？其内僧人，一曰胡僧，再曰道坚，一肖其形，一美其号。永福寺，真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故皆于死后，同归于此，见色之利害，而万回长老，其回肠也哉。他如黄龙寺，脾也。相国寺，相火也，拜相国长老，归路避风黄龙，明言相火动而脾风发，故西门死，气如牛吼，已先于东京言之矣。是玉皇庙，心也，二重殿后一重侧门，其心尚可问哉。故有吴道士主持结拜，心既无道，结拜何益？所以将玉皇庙始而永福寺结者以此。更有因一事而生数人者，则数名公同一义，如车（扯）淡、管世（事）宽、游守（手）、郝（好）贤（闲），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黄四，梅李尽黄，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带水战一回，前云聂（捏）两湖、尚（上）小塘、汪北彦（沿），三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安沈（枕）、宋（送）乔年，喻色欲伤生，二人共一寓意也。又有因一人而生数名者，应伯（白）爵（嚼），字光侯（喉），谢希（携）大（带），字子（紫）纯（唇），祝（住）实（十）念（年），孙天化（话），字伯（不）修（羞），常峙（时）节（借），卜（不）志（知）道，吴（无）典恩，云里守（手），字非（飞）去，白赖光，

字光荡,赧(背)第(地)传,傅(负)自新(心),甘(乾)出身,韩道(捣)国(鬼),因西门庆不肖,生出数名也。又有即物为名者,如吴神仙,乃镜也,名无奭,冰鉴照人无失也。黄真人,土也,瓶坠簪折,黄土伤心,未用楚云一人遥影,正是采云易散。潘道士,拚也,死孽已成,拚着一做也。又有随手调笑,如西门庆父名达,盖明捏土音,言西门庆之达,即金莲所呼达达之达。设问其母何氏?当必云娘氏矣。桂姐接丁三官,打丁之人也。李(里)外传,取其传话之意。侯林儿,言树倒猢猻散。此皆掉手成趣处。他如张好问、白汝晃(谎)之类,不可枚举,随时会意,皆见作者狡猾之才。若夫玉楼弹阮,爱姐继其后,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依二捣鬼以终,是作者穷途,有泪无可洒处,乃于爱河中捣此一篇鬼话,明亦无可如何之中,作书以自遣也。至其以孝哥结入一百回,用普净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万恶,惟孝可以永锡尔类。今使我不能全孝,仰曾反思尔之于尔亲,却是如何?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悠悠苍天,曷有其极,悲哉悲哉!

苦孝说

夫人之有身,吾亲与之也。则吾之身,视亲之身为生死矣。若夫亲之血气衰老,归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是凡为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独具之奇冤也。至于生也不幸,其亲为仇所算,则此时此际,以至千百万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为无已。呜呼,痛哉!痛之不已,酿成奇酸,海枯石烂,其味深长,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独立默坐,苟独立默坐,则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如虫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悦耳目,娱心志,一安其身也

哉！苍苍高天，茫茫厚地，无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几矣。然吾闻死而有有知之说，则奇痛尚在，是死亦无益于酸也。然则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夫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幻化之谓也。推幻化之谓，既不愿为人，又不愿为鬼，并不愿为水石，盖为水为石，犹必流石人之泪矣。呜呼，苍苍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难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岂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蓀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傲，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其寓意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情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至于以悌字起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恻，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学风影等辈，借端恐_说，意在骗诈。夫现

今通行发卖原未〔本〕禁止〔止〕,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夫邪说当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劈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若不预先辨明,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是用抒诚以告仁人君子,其予量之。

《金瓶梅》杂录小引

凡看一书,必看其立架处,如《金瓶梅》内,房屋花园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处也。何则?既要写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开既难使诸人连合,全合拢又难使各人的事实入来,且何以见西门豪富。看他妙在将月、楼写在一处,娇儿在隐现之间。后文说挪厢房与大姐住,前又说大妗子见西门庆揭帘子进来,慌的往娇儿那边跑不迭,然则娇儿虽居厢房,却又紧连上房东间,或有门可通者也。雪娥在后院,近厨房。特特将金、瓶、梅三人,放在前边花园内,见得三人虽为侍妾,却似外室,名分不正,赘居其家,反不若李娇儿以娼家聚来,犹为名正言顺。则杀夫夺妻之事,断断非千金买妾之目。而金梅合,又分出瓶儿为一院,分者理势必然,必紧邻一墙者,为妒宠相争地步。而大姐住前厢,花园在仪门外,又为敬济偷情地步。见得西门庆一味自满托大,意谓惟我可以调弄人家妇女,谁敢狎我家春色,全不想这样妖淫之物,

乃令其居于二门之外，墙头红杏，关且关不住，而况于不关也哉！金莲固是冶容诲淫，而西门庆实是慢藏诲盗，然则固不必罪陈敬济也。故云写其房屋，是其间架处，犹欲耍狮子，先立一场，而唱戏先设一台。恐看官混混看过，故为之明白开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后好看书内有名人进进出出，穿穿走走，做这些故事也。他如西门庆的家人妇女，皆书内听用者，亦录出之，令看者先已了了，俟后遇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而西门庆淫过妇人名数，开之足令看者伤心惨目，为之不忍也。若夫金莲，不异夏姬，故于其淫过者，亦录出之，令人知惧。

《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开手第一回，便先写出第一个淫人来，一见武松，使出许多淫态，露出许多淫情，说出许多淫话。设非正直如武松，刚强如武松，其不为金莲之所淫也盖罕。《水浒》以武松为天人，其以此也夫！吾故曰淫书也。

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武松一失足，便不得为英雄，且不如西门庆，并不可以为子为弟，直不得呼为人。人皆当以武松为法，而以西门庆为戒。人鬼关头，人禽交界，读者若不省悟，岂不负作者苦心乎？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

然吾谓究竟不宜看。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不能为者，大抵稟气所拘，人欲所蔽。而吾谓人皆可以为西门庆，其不果为者，大抵为父母之所管，亲友之所阻，诗书之所劝，刑法之所临，而其心固未必不作非非想也。假令无父母、无兄弟，有银钱、有气力，有工夫，无学问，内无劝诫之

妻外有引诱之友，潘金莲有挑帘之事，李瓶儿为隔墙之娇，其不为西门庆也盖亦罕。无其事尚难防其心，有其书即思效其人，故曰不宜看者，此也。

武大死于金莲之手，实先死于王婆之口，后死于西门之药，是三人者，情有分别，罪无差等也。贪财好色，神昏意迷，有一碍手碍眼之人，竟非杀之而不快，是殆亦骑虎之势，不得不然乎？夫以潘金莲之狠，西门庆之凶，王婆子之毒，凡有血气者，读至此未有不怒发冲冠，切齿拍案，必须将此三人杀之而后快。何得轻轻放过，而令其骄奢淫佚，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无所不至，快快活活，偷生五、六、七年。恶人富而淫人昌。作者岂真有深仇大恨，横亘于心胸间，郁结于肚腹内乎？而故为此一部不平之书，使天下后世之人，咸有牢骚之色，愤激之情乎？然则看此书者，亦可冷眼观之矣。

批书者，总以玉楼为作者自况，不知从何处看出，而一口咬定，惟恐旁人不理会，时时点出，是可怪也。夫玉楼诚不愧为佳人，然亦有不满人意处。夫死不满两年，家资颇颇过得，宗保亦是乃夫胞弟，纵不能守，亦何必如此其亟，且又若此之草草也。岂一见西门庆，便魂飞魄散，如潘金莲不能自主，如李瓶儿不能自由耶？妇人急色若斯，便非善良。做大做小，亦需探听明白，杨（张）四之言不足信，有名有姓有财有势之西门大官人，一访便知。纵然谋死人家亲夫，事未宣布，彼月娘尚在，为吴千户家女儿，琴童虽幼，亦可访问出来。不能做大，且不做老二，抑屈于妓女之下，岂玉楼之初心乎？然何以一见便收插定也，谓非急色得乎？

“贞节”二字，扣定妇人女子，未免头巾气。但有财如此，有貌如此，人皆仰而望之。乃一见一个白净小伙，便以终身相许，虽非蠢妇人，亦是丑妇人，作者何取乎而以之自况也？或曰：玉楼为媒人所误耳。是诚然矣。自古英雄志士，一误不能翻身，正自不一，矧一玉楼乎？玉楼不知而嫁之，为玉楼惜可也。若作者明知西门庆不是东西，既自以为玉楼，又何必定嫁西门，为终身之玷乎？岂作者亦尝为仇人门下士乎？自比妇人，自比再丑之寡妇，自比误嫁匪类之粗愚而美艳之妇人，果有其事，不得不振笔直书，凭空结构，我操其权，何必作此无味狡狴乎？我固谓所批有然，有不然。

潘金莲入门矣，春梅入室矣，李瓶儿隔墙消息已动矣。武松已去，正西门庆得志时也。作者至此，振笔直书，阅者自此，纵目流览。曾亦思：孟玉楼是诳来的，潘金莲是劫来的，李瓶儿又是夺来的。时势如此，尚何言乎？天道如斯，尚可问乎？

今之世上，果有西门庆乎？而吾未见其人也。今世竟无西门庆乎？而吾曾闻其事也。西门庆故无如我何，我又奈西门庆何哉！西门庆纵奈我何，我又将西门庆若何哉！于是，有痛恨西门庆者，吾谓不必恨也；有羡慕西门庆者，吾谓不必羡也。恨之者不愿为西门庆，羡之者亦不能作西门庆。谚语有云：闲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

皆谓此书为淫书，诚然，而又不然也。但观其事，只“男女苟合”四字而已。此等事处处有之，时时有之，彼花街柳巷中，个个皆潘金莲也，人人皆西门庆也。不为说

破,各人心里明白,一经指出,阅历深者曰:果有此事;见识浅者曰:竟有此事!是书盖充量而言之耳,谓之非淫不可也。若能高一层着眼,深一层存心,远一层设想,世果有西门庆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恶之不暇,阳世之官府,将以斩立决待其人,阴间之阎罗,将以十八层置其人。世并无西门庆其人乎?举凡富贵有类乎西门,清闲有类乎西门,遭逢有类乎西门,皆当恐惧之不暇,防闲之不暇。一失足则杀其身,一纵意则绝其后。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糊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观此书者,以淫人自居乎?以不淫自命乎?如以西门庆自许,须防备身后。

潘金莲之事未结,紧接孟玉楼入门,方接潘金莲偷娶,又接李桂姐开苞,随接李瓶儿偷期。独金莲作两次写。孟玉楼与金莲不离,二李之事,总插金莲在内,是金莲为书中第一淫货,固与西门庆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者也。金莲偷琴,西门辱之;西门偷瓶,金莲挟之。自此以后,金莲气愈盛,而西门恶益盈矣。

或问西门之遇淫妇,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易,人事乎?抑邪缘乎?对曰:兼而有之。使西门而有父亲之管束,无银钱之花用,虽有邪缘,亦如大海之萍,旋聚而旋散而已。使金莲而无挑帘之逢,瓶儿非隔墙之便,虽尽人事,亦如镜中之花,可望不可即而已。故曰二者兼有也。

世有两相情愿,终日居而不得其时,不得其地,未几生离死别,海角天涯,此之谓有情而无缘。世亦有貌不相爱,意不相投,而有事交关,有人撮合,竟至时偏凑巧,机转难推,此之谓有缘而无情。其或因情而缘转深,因缘而情愈密,不但男女,朋友亦有然者,斯固一言难尽也。此

刻之西门与瓶儿，淫而已矣。盖有缘而无情，若使无缘，子虚不死，若谓有情，竹山难问。迨至缘合情深，瓶儿死矣，是又有情而无缘也。

一个丧心病狂、任情纵欲匹夫，遇见一群寡廉鲜耻、卖俏迎奸妇女；又有邪财以济其恶，宵小以成其恶，于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至，胆愈放而愈大，心益迷而益昏，势愈盛而愈张，罪益积而益重。闻之者切齿，见之者怒发。乃竟有羨之慕之，辄思尤而效之，是果人情也耶？不内自省而欲思齐焉，不能改而思从之焉，吾恐其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也。人不得而诛之，雷将从而劈之矣，法不得而加之，鬼将从而啖之矣。此其人何以能生乎？纵逃显戮，难免冥诛，纵漏官刑，难混人口。此其人虽死而亦不令其速死也，不知尚有羡慕西门庆者否？

批此书者，每深许玉楼而痛恶月娘，不解是何缘故？夫批书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也。

其深惜玉楼者，岂以玉楼非先奸后娶、实系诳诱入门者耶？玉楼实有自取之道，前已言之矣。以后之玉楼，姑且勿论，但以目下之玉楼言之：金莲偷仆，则为之掩饰，金莲看灯，则同其放浪，至责备瓶儿之语，与金莲异口同声，忘却自己，夫始终与潘氏相比者，尚得为贤良妇人乎？贞静既难言，幽闲亦未必，妇人除此四字，更何取乎？虽然，降志辱身，避凶趋吉，此则玉楼之所长也。较之潘、李、孙三人，固超乎远矣，若视为妇女中之骄之者，则恐未必。

或其貌足以胜人 ,德恐有难言者 ,吾亦非苛论也 ,扬之太过者 ,不能不少抑之耳。

若吴月娘 ,一千户家女耳。非有祿母之训导 ,又无诗书之濡染 ,不同阀阅之家 ,又非科第之室 ,一小武官之女 ,而嫁与市井谋利之破落户 ,既属继配 ,又遇人不淑。此而责之以守身以礼 ,相夫以正 ,治家以严 ,又要防患于未萌 ,虑事于久远 ,无乃期望太深乎 ?男子所不能行者 ,而求备于妇女乎 ?试思瓶儿之不可娶 ,不过大略言之 ,事之不成 ,又系自己失约 ,并非月娘之打扰 ,如此便已反目 ,至不与交谈。设或阻其佳期 ,断其好事 ,安知脚踢拳打之事 ,独不施于上房之身乎 ?吾未之信也。观人亦需论其大处 ,妇人之所最重要者 ,节。西门死后 ,月娘独能守 ,较之一群再醮货何如乎 ?赞美妇女者 ,但有从一而终 ,守贞不二之语 ,则以前所有处分 ,皆可悉予开复矣。妇人之所最忌者 ,妒。西门生前 ,月娘独能容。否则内哄外斗 ,上下不安 ,投井悬梁 ,诟谇不已。目所见而耳所闻者 ,真难举数也。必如是而始谓之贤乎 ?《诗》之美后妃也 ,亦不过不妒嫉三字而已。批书者何期望月娘之大 ,而责备月娘之深也。我非谓吴氏不可多得也 ,偏好偏恶 ,待人接物皆不可 ,而况形于笔墨 ,使人咸知其有所偏也 ,初无益于孟 ,亦无损于吴。盖孟者 ,梦也 ,我亦梦中说梦 ;吴者 ,无也 ,我亦无里求无而已矣。

甚矣女子小人 ,断不可使其得志也。圣人谓其难养 ,近之远之皆不可 ,此盖言其大同也。其细小琐碎处 ,令人自去寻思 ,阅历深者 ,自能理会。自古及今 ,大而天下国家 ,小而身心性命 ,败坏丧身于女子小人之手者 ,正指不胜屈。又有小人而女子者 ,阍宦是也。女子而小人者 ,婢

妓与仆妇是也。其性属阴 ,其质多柔 ,其体多浮 ,其量隘 ,其识浅 ,同是口眼耳鼻 ,别具肝肠肺腑 ,令人可恨 ,兼令人可哂。善读书者 ,于此回蕙莲 ,其光景情形 ,详细玩味 ,便可触类旁通 ,则所以待女子小人者 ,思过半矣。

夫蕙莲亦何足怪哉 !吾甚怪夫今之所谓士大夫者 ,或十年窗下 ,或数载劳中 ,或报效情殷 ,捐输踊跃 ,一旦冷铜在手 ,上宪垂青 ,立刻气象全非 ,精神顿长 ,扬威耀武 ,眇视同僚 ,吹毛求疵 ,指驳前任 ,几若十手十目不足畏 ,三千六千不能容。当兴之利不知兴 ,应去之弊不能去 ,坐堂皇曰打 ,退私衙曰钱 ,劝之不听 ,讥之不解。其不至于身败名裂也 ,尚自诩曰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 ?吁嗟乎 !此皆蕙莲之流也。

杀其夫 ,占其妻 ,已成西门庆惯伎。自被武松放过 ,胆一日大似一日 ,手一日辣似一日。武大郎尚在暗中 ,花子虚仍是偷作 ,迨至来旺 ,居然大锣大鼓 ,明目张胆 ,大明大白 ,于众闻共睹之下 ,直做出来矣。

来旺本有自取之道。诬贼一层 ,显系金莲主谋 ,玉楼参赞 ,西门庆出场 ,吴月娘实不知情 ,方一开口 ,便遭呵叱。西门庆前犹挖壁拨门之贼 ,今则明火执仗之盗。为之画策者有人 ,为之助力者有人 ,为之旁敲侧击、内外夹攻者有人。虽有百月娘 ,亦奈之何哉 !尚得曰 :“大姐姐不管一管” ,是果能管乎 ?果敢管乎 ?果容管乎 ?为管之者 ,助纣为虐 ,来旺儿入提刑院矣。

月娘被喝之后 ,其言曰 :“乱世为王” ;“九尾狐狸精出世” 。明明作者不肯抹煞月娘 ,而使之出头受辱 ,并出此言也。岂专指金莲一人乎 ?玉楼固在其中矣。何以知之 ?玉楼劝蕙莲曰 :“你爹正在气头上 ,待会俺们再劝他。”厥后不但不闻玉楼之劝 ,要放来旺 ,金莲尚不知 ,玉

楼去报信 ,并激之曰 : “看你本事 ” ,含笑而道之。背后一而再 ,再而三 : “大姐姐又不管 ” ,分明指使金莲出谋 ,而暗中参议。是金莲阳暴 ,玉楼阴险 ,其病根总在于嫉妒。谓予不信 ,细味玉楼之言 : “合你我一般 ,什么张致。”金莲之言 ,若与西门庆“作了第七个老婆 ,把潘字倒过来”。观此金、玉二人之意 ,不但欲置来旺于死地 ,即蕙莲亦不令其能活也。

蕙莲果死矣 ,本有所死之道。然人皆知死于雪娥之打 ,而不知实死于金莲 ,更不知实死于玉楼。至于蕙莲取死之道 ,已伏于玉楼叱之曰 : “你这媳妇子 ,与你有什么说处 ” ,并看蕙莲穿金莲之鞋 ,一声儿也不言语。又云“嗔道 ,贱臭肉 ,坐着见俺 ,待起不起的 ” ,杀机早动于此矣。屡言“大姐姐不管 ”者 ,正唆金莲之管之也。使月娘真管 ,能容 ,恐三娘未必能入此门矣。若玉楼者 ,吾甚畏之。

此本前数回花团锦簇 ,热闹繁华 ,可谓极一时之盛。然总觉富贵之中带些俗气 ,又夹杂些争斗气。至该一回 ,又觉清平之时 ,带有杀气 ,并又缠绕些冤苦气。《易》曰 : 履霜坚冰至。不必望下看 ,已知此后秋冬气多 ,春夏气少矣。或谓阴阳消长之机 ,必然之理 ,非人之所能为也。而不然也 ,此其故不得推诿于天 ,亦不得归咎于命也。

使西门庆若能改过自新 ,行仁施德。武大郎之冤魂 ,花子虚之怨气 ,终有一时发泄。即所悖入之财 ,亦必一旦消亡 ,而况贪不知止 ,淫不知节 ,其能长久如是乎 ? 恐无此天理 ,亦无此人情 ,实无此世事。善读者尝当身于书外 ,勿留意于眼前 ,固早恍然于其间 ,而西门庆之必不可效法矣。

此书好处 ,能于用情时写出无情来 ,并能于非理事写出有理来。此实绝非真情 ,全非正理 ,而天下确有此等人 ,确有此等事 ,且遍天下皆是此等人 ,皆是此等事 ,可胜浩叹哉 !

西门庆之于王六儿 ,亦与潘六儿等。但惜武大郎不如韩道国有度量 ,深幸韩道国不似武大郎无计较 ,否则韩道国亦大郎之续也。若花子虚亦幸而病死耳 ,否则不为韩道国 ,即作武大郎矣。

西门之于潘、王 ,淫而已矣。乃独于李瓶儿有情何哉 ? 其身分与境遇与性情 ,稍有不同耳。王、潘以色 ,李则色兼财者也。故此番发送瓶儿 ,直谓瓶儿自己发送自己可也。非有大排场不能充其量 ,一切举动 ,全不合理。乃举国则不以为非 ,且从而附和之。仅于应伯爵口中一点 ,其腹诽者 ,自有人焉。杜中书云 :“ 曾生过子 ,于礼也无碍。 ”此言必出自中书者 ,此其所以为中书欤 ? 彼市井人 ,何足语此。

作者写西门庆罪恶 ,不至十分不止 ,至十分而犹不止也。家中纵性 ,院内恣情 ,亦足以杀其躯矣。乃令其波其门下室家 ,伙计妇女 ,由近及远 ,由亲及疏 ,亦足以绝其嗣矣。乃又令其辱及旧族之家 ,缙绅之妇 ,真可谓流毒无穷 ,书恶不尽。若再令其活在人间 ,日月亦为之无光 ,霹雳将为之大作。

此回本为上回伏线 ,又为下回安根 ,两回作一回看可也。桂儿之狠 ,胜似银儿 ,月儿之毒 ,更甚于桂儿。银儿温柔 ,桂儿刁滑 ,月儿奸险 ,只此三人 ,互相报复 ,已陷西门庆于不赦之条 ,永无超生之路矣。然而西门庆乐此而不悔也。阅者其慎旃 !

此一回欲使陈、庞凑合一起 ,而又无因凑合之 ,又有孙雪娥在旁碍眼。故必先令闻其名 ,然后罗而致之 ,方不为无因。于是有刘二撒泼一事 ,此截搭渡法也。但渡要渡得自然 ,不要渡得勉强。刘二不过要房钱耳 ,有金宝钗子在 ,何至殴打冯金宝 ;既打冯金宝 ,为何又打陈敬济 ?或谓酒醉故也 ?既已并打矣 ,自有众人说散 ,何为又送守备府 ?小人虽狗仗人势 ,然亦自有斟酌 ,何至凶暴至此 ,视守备衙门直如张胜衙门也。路非咫尺 ,事非重大 ,刘二送三 ,张胜收之 ,周志又复打之 ,此其间方引出春梅来 ,许多纠缠 ,着意只在此一处。然未免有许多生拉硬扯 ,并非水到渠成 ,有不期然而然之趣 ,此作者未尝用心之过也。然亦有用心之过处 ,春梅已闻敬济之名 ,又不便见敬济之面 ,有雪娥在焉 ,作者可谓细心矣。乃顷刻之间 ,使春梅做出多少故事来。作者以为撒娇 ,阅者以为丢丑 ,越看越丑 ,丑至令人不敢看。不但露出丫头原形 ,直画出泼妇本色 ,作者何必丑诋春梅一至于此也。批者又何不云羞杀春梅 ,丑绝春梅乎 ?雪娥为春梅所买 ,即欲逐而卖之 ,甚易易也。必须装此丑态 ,出此丑言 ,始能出春梅而入敬济乎 ?此一层未免多费笔墨矣。噫嘻 !又安知非作者有意描写春梅丑态 ,以醒阅者眼目 ?直若明告之曰 :玉楼与春梅 ,其为人底里 ,试看其收场 ,便可知矣。

西门庆家中 ,并无一个好东西 ,不要称赞玉楼 ,推许春梅 ,方不是瞎子也。不然 ,孙雪娥亦何必定令其为娼 ,盖亦以写西门庆之恶 ,出西门庆之丑也。必用雪娥者 ,娇、玉、莲、瓶 ,皆其夺诸人者 ,惟雪娥乃其所自有之四娘也。不使月娘偷人嫁人 ,还是作者存心忠厚处。

此回已将西门庆家中诸妇女 ,除五妾四婢而外 ,如小玉、如意等 ,亦均各还其一个下落 ,乃放笔描写寡妇孤儿之忍辱受气 ,屈己求人 ,耐一片凄凉 ,遭百种苦恼 ,奴仆叛于内 ,友朋哄于外 ,皆所以定西门庆罪案 ,并非为月娘述家常也。

看前半部 ,须知有后半部 ;看后半部 ,休抛却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 ,皆昔日之所收罗埋伏 ,而发泄于一朝也。若竟忘记西门庆 ,专注意于吴月娘 ,是所谓胶柱鼓瑟 ,刻舟求剑 ,亦殊失作者之本旨 ,而不必与言批书 ,并可不必与言论事 ,直一磕睡汉而已。

但就批者之意而言 ,月娘不过一昏愚妇人 ,不过一势利妇人 ,不过一残忍刻薄妇人。书中之昏愚、势利、残忍、刻薄加倍于月娘者 ,岂少也哉 !即此一回 ,平安之偷窃 ,吴典恩之负心 ,皆归咎于月娘 ,要亦西门庆刑于之化之所致也 ,要亦西门庆作孽之多之使然也。奈何西门庆一死 ,而竟忘《金瓶梅》一书为西门庆之作所哉 !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 ,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 ;不淫者不谓之淫 ,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或谓《金瓶梅》善书也 ,非也。善者见善谓之善 ;不善者谓之不善 ,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 ?曰 :不奇也。人为世间常有之人 ,事为世间常有之事 ,且自古及今 ,普天之下 ,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既不同于《封神榜》之变化迷离 ,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 ,夫何奇之有 ?

故善读书者 ,当置身于书中 ,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混 ,斯好恶得其真矣。又当置身于书外 ,而彰瘴劝惩之心不可紊 ,斯见解超于众矣。又须于未看之前 ,先将作者之意 ,体贴一番 ;更须于看书之际 ,总将作者之语 ,思索几

遍。看第一回 ,眼光已射到百回上 ;看到百回 ,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书自为我运化 ,我不为书捆绑 ,此可谓能看书者矣。曰淫书也可 ,曰善书也可 ,曰奇书也亦无不可。

作者或有深意 ,批者并无会心 ,阅者当自具手眼 ,别出心思 ,作如是观可也 ,不作如是观亦可也。作如是观 ,当有全部在胸中 ,不可但有前半截 ,竟无后半截也。不作如是观 ,当无一字在腹内 ,不可记得一、二回并不可记得一、二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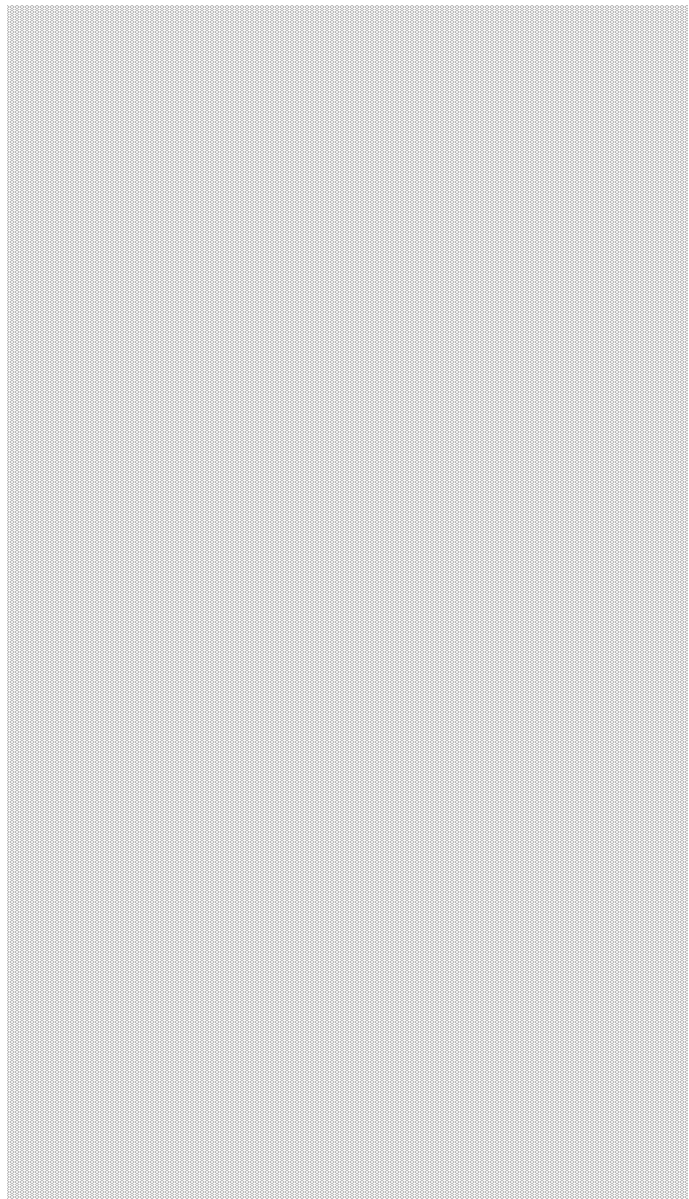
从来无所羡慕者不作书 ,无所怨恨者不作书 ,非曾亲身阅历者作书亦不能成书。作《金瓶梅》者其果有所欣羨耶 ? 其果有所仇恨耶 ? 其果曾阅历一番否耶 ? 我不得而知之。然而 ,我固无所羡慕 ,无所怨恨 ,而我之所经历者 ,耳之所闻 ,目之所睹 ,意与此书相同者 ;亦有与此书相异者 ;且有与此书相同而实异者 ;与此书相异而暗同者 ,故知作者殆亦有见矣 ,有所闻矣 ,亦尝身亲其境矣。

自始至终 ,全为西门庆而作也 ,为非西门庆而类乎西门庆者作也。批者亦当时时、处处、事事有一西门庆 ,方是不离其本旨。奈何只与春梅掇臀 ,玉楼舔痔而与月娘作对头 ,犹诋诃然曰 :此作者之深思也 ,吾得其间矣。嗟乎 ,妄甚 !

第一辑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

传》为“外典”（《觴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



鲁 迅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觴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万历庚戌（一六一〇），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由此复生谰言，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

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鸨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赅枉法无不为。然潘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瘵痲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_儒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妇人(潘金莲)道：“怪奴才，可可儿的来，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搅着些字纸和香儿，一处放着。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堕阿鼻地狱。”又指着秋菊骂道：“这奴才当我的鞋，又翻出来，教我打了几下。”分付春梅：“趁早与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说道：“赏与你穿了罢。”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娘这个鞋，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那妇人骂道：“贼奴才，还叫甚么□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分付“取刀来，等我把淫妇鞋剁作几截子，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剁个样儿你瞧。”西门庆笑道：“怪奴才，丢开手罢了，我那里有这个心。”……(第二十八回)

……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让至翡翠轩，……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

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第四十九回）

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勳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则主要如西门庆，自当别有主名，即开篇所谓“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结末稍进，用释家言，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净引其母及众往，指以禅杖，孝哥“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一，出离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

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羨，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俚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了，其原因，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书中所叙，是借《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后复爱潘金莲，鸨其夫武大，纳她为妾；又通金莲婢春梅，复私了李瓶儿，也纳为妾了。后来李瓶儿，西门庆皆先死，潘金莲又为武松所杀，春梅也因淫纵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时，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到济南去，路上遇着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终于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

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夙仇的，像这部《金瓶梅》中所说的西门庆，是一个绅士，大约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究属何人，现在无可考了。至于作者是谁，我们现在也还未知道。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_行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说》冠其首。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

〔标题为编者所加〕

沈雁冰

……宋以前性欲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皇)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这也是处在礼教的严网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说之尚未脱离**稗史体**(即专以帝皇及武侠士为题材的小说)的形式亦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

《金瓶梅》于明代万历庚戌(一六一〇年)始有刻本,作者不知何人;相传谓是王世贞,则因沈德符《野获编》云出嘉靖间大名士手,故世人拟为王世贞;或谓乃王之门人所作(谢颐序)。此书描写世情,极为深刻,尤多赤裸裸的性欲描写。《飞燕外传》与《迷楼记》等皆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话作,故描写性欲之处,更加露骨耸听。全书一百回,描写性交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极变化,实可称为集性交描写之大成。全书事实,假《水浒传》的西门庆为线索。故事的开端即为西门庆私通潘

金莲 鸩死武大 ,占金莲为妾。后武松来报仇 ,寻西门庆不获 ,误杀李外传 ,刺配孟州 ;西门庆由此益放恣。有李瓶儿 ,其夫花子虚故与西门庆相识 ,家资富有 ;西门庆阴使党羽勾花子虚嫖娼 ,而自与李瓶儿私通。后花子虚以虚症死 ,瓶儿遂挟家产归西门庆为妾。西门庆又娶孀妇孟玉楼 ,亦有私财甚多。因此西门庆愈纵欲无度。复得胡僧春药 ,淫心益炽 ;家奴妻有姿色者 ,无不私通。潘金莲因善媚 ,尤得宠。一夕 ,西门庆醉归 ,金莲以胡僧春药七丸进之 ,狂荡竟夕 ,西门庆竟脱阳而死。从此西门庆家一天一天的败落。潘金莲及其婢春梅与庆媾陈敬济私通 ,事发被斥卖 ;李娇儿孟玉楼等亦下堂求去。庆妻吴月娘后带儿子孝哥避金兵 ,欲奔济南 ,路遇普净和尚 ,引至永福寺 ,以因果现梦化之 ,孝哥遂出家。

《金瓶梅》出世后 ,就有许多人摹仿。万历时有名《玉娇李》者 ,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此书今已失传 ,沈德符曾见首卷 ,谓“ 稊黠百端 ,背伦蔑理……然笔锋恣横酣畅 ,似尤胜《金瓶梅》”。至于书中故事 ,则托为因果报应 ,与《金瓶梅》中人物相呼应。又有《续金瓶梅》,题“ 紫阳道人编 ”,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李》仿佛 ,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转生为男女 ,各食孽报。描写性欲 ,亦仿《金瓶梅》,然而笔力不逮。

何以性欲小说盛于明代 ? 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 ,朝野竞谈“ 房术 ”,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 ,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 ,陶仲文进红铅得幸 ,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起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 春方 ”——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

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漂亮朋友》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注重此点以评《金瓶梅》。然而后世摹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意于性交描写,甚至薄物小册,自始至终,无非性交,这真是走入了恶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这一类小书,在印刷术昌明的今日,流传于市井甚盛;他们当然不配称为性欲描写的文学,并且亦不足为变态性欲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团》一书,意境稍胜,其宗旨在唤醒世人斩绝爱欲,所谓“须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有实济”,所以特地描写淫褻之事,引人入胜,而后下当头棒喝。但是此书不多的篇幅仍旧自始至终几乎全是描写性交,不曾于性交之外,另写社会现象;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很减低了它的价值的。

以文艺眼光过之之感想，《金瓶梅》一书，为自好者所不愿道。予为小说迷时，一书不读，认为遗憾，故亦极力搜索观之。当时只觉其为淫书，弃置十年，未尝再读。其后余对小说，颇欲加以研究，人近中年，亦不嫌其有挑拨性。于是又于工作之暇，检视一周。窃以为除却诲淫之处外，固亦不失为社会小说中上品也。

书中写西门庆，只是一个凶狠的淫徒，风流温存，一概不懂。而于挥霍钱财，则不甚吝惜，此颇写出富家子弟之一般现状。十兄弟应伯爵、谢希大等均长于西门庆，而以西门庆有钱，称之为兄，骂尽世人，其间十兄弟之逢迎西门庆无所不至。而其于拜兄弟时，出八分银子之分子，及西门庆死后若干日，尚伪为不知，皆能写出市井小人龌龊原形。又西门死后，婢妾分散，僮仆拐逃，将如火如荼人家，写得冷淡冰消。亦有章法，打破以前小说之团圆主义。此书实

出《儒林外史》、《红楼梦》前，而《外史》之写社会龌龊，《红楼》之写家庭盛衰，亦即各袭《金瓶梅》之技，发扬而光大之也。《金瓶梅》之于少年，诚不应看，然其书之价值，实在《杏花天》、《灯草和尚》之上。用文学眼光看之，固不忍一笔抹煞也。

书中写女性，均是一班淫荡之人，而人各有其个性。如潘金莲之毒狠，李瓶儿之柔懦，吴月娘之胡涂，李娇儿之刁滑，均各有一副面孔。其各女子口吻，亦颇妙肖。徒以写淫荡之处，太赤裸裸地，遂不能为文艺界公开之研究物，良可惜耳。

〔标题为编者所加〕

—

读郭源新先生《谈金瓶梅词话》，见其引用王昙《金瓶梅考证》中一节，说是：

原本与俗本有雅驯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在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毁之！

颇觉有些疑问。第一，眉公所著书，只有《秘籍》中《狂夫之言》正续五卷，并无《狂夫丛谈》。第二，《狂夫之言》以及《秘籍》全部，无关于《金瓶梅》之记载。第三，眉公对于《金瓶梅》意见虽不可知，其弟子李日华，确曾于日记中评过此书，说是：

十一月五日(万历四十三年)。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译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刘刻《味水轩日记》全稿

日华极崇拜眉公,据日记,眉公晚年且时过日华居,无论从二人思想上,抑生活关系上,很少会有相反意见的。所谓“极赞赏之”,事实上是否可靠,我认为很难说。至于是不是由于王氏记忆错误,遂至张冠李戴,把袁宏道的话记在陈眉公账上,也不是绝无可能。这说法只好作为一个疑问。

二

袁中郎谈《金瓶梅》,在全集中凡三见,一是《觴政》作为“逸典”;二是与谢在杭书所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三是与董思白书,问思白: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中郎对此书的认识,与此书的来源,可以概见。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在“金阊道中”替《金瓶梅词话》作序,曾借此以重,并广其意说:

《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其意,盖为

世戒 ,非为世劝也。……不然 ,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

这很明白是对中郎《金瓶梅论》的曲解 ,或有意为之掩饰。

三

《金瓶梅》在当时是极流行的 ,作家中藏有此书的不少 ,且极被称许。但作者究竟是谁呢 ? 在郭源新与吴晗(《文学季刊》二期 :《金瓶梅 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所搜辑到的证据而外 ,我还在屠本峻的《山林经济籍》中看到如次的一跋 :

屠本峻曰 :不审古今名饮者 ,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 ? 按《金瓶梅》流传海内 ,甚少书帙 ,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 ,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 ,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 ,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 ,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 ,王太史宇泰出此 ,云以重赏购抄本二帙。予读之 ,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 ,又见抄本二帙 ,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书 ,不为托之空言也 ,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瓮肠。

——《觴政》十之《掌故》

《金瓶梅》非王世贞作 ,于此又得一证。后来逐渐的疑到他的身上 ,大约是因一二传说巧合 ,或由他家最初藏有此书讹传附会 ,也未可知。

四

王晔考证中谓《金瓶梅》本有原本、俗本，其不同处在于词藻之雅驯与否，此点已经郭氏斥之。惟《金瓶梅》是否还有他种本子，据我所知，尚有相当疑问。沈德符《景情》《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一则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种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出则家到户传，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词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贗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父，朱勳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此则曾经郭、吴两作引用，在《金瓶梅》考证上，提供了不少材料，如刻本、改作，特别是涉及了原书的内容。郭、吴所未见到的，则是到了同治年间，石公孙袁照编《袁石公遗事录》，曾借此以作反证。《遗事录》在节录沈文以后，

复加按语说：

谨按《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勳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

袁照此记目的，无非在替石公辩解，以巩固或强调其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但从沈、袁所说内容与一般本子的不同上，却不能不使我们发生一个疑问，即是《金瓶梅》是否真有他种本子？

五

想起张岱《陶庵梦忆》卷四，载有《往不系园看红叶》一则，说在红叶会中：“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是夜，彭天锡复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可见《金瓶梅》一书，当时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广大的注意，说书家且有将其演绎成“平话”者。

吴 晗

小说在过去时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亵”的作品。因此小说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没不彰。更有若干小说家不但不敢署名，并且还故意淆乱书中史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这一作品的著作时代。《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是，一个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时代性的记述，虽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离开他的现实生活，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无论他如何避免，在对话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总不能不带有那时代的意识。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题材，无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要从这些作者所不经意的疏略处，找出他原来所处的时代，把作品和时代关联起来。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为一个同情他

的后代人所删削遮掩，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这举动同样不为我们所欢迎。这一事实可以拿《金瓶梅》来做一例证。

假如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比改订本更早的本子的时候，也许我们要被作者和删节者瞒过，永远不能知道他们所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们得到一个较早的《金瓶梅词话》刻本，在这本子中我们知道许多从前人所不知道的事。这些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断定这部书的著作年代，并且可以明白这部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为什么这样一部名著却包含有那样多的描写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页九至十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四道：“我见此入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在崇祯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页）和康熙乙亥本《第一奇书》（第七回第九页）中，孟三儿的答话便删节成：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若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天衣无缝，使人看不出有删节的痕迹。

朝廷向太仆寺借银子用，这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自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

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

由此可知太仆寺之贮马价银是从成化四年(公元 1468)起，但为数极微。到隆庆二年(公元 1568)百年后定例卖种马之半，藏银始多。到万历元年(公元 1573)张居正作首相尽卖种马，藏银始达四百余万两。又据《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太仆，则马价银归之。……隆庆中……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至神宗万历六年……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

则隆庆时虽曾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到了张居正死后(公元 1582)神宗始无忌惮地向太仆支借，其内库所蓄，则靳不肯出。《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载居正当国时：

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在居正当国时，综核名实，令出法行，所以国富民安，号称小康，即内廷有需索，亦往往为言官所谏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说：

万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

其用途专充互市抚赏 《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说：

万历五年召理戎政。……言……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后，朝政大变，太仆马价内廷日夜借支，官监佞幸，为所欲为，专以货利导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脉传》说：

居正死，起故宫。疏陈五事：言……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锱铢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功夫，太仆积银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选传》：

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

但还搜刮不已，恣意赏赐，如《明史》卷二三三《张贞观传》所记：

三王并封制下 ,.....采办珠玉珍宝费至三十六万有奇 ,又取太仆银十万充赏。

中年内外库藏俱竭 ,力靳内府银不发 ,且视太仆为内廷正供 ,廷臣请发款充军费 ,反被譴责。万历三十年时 :

国用不支 ,边储告匱 ,.....乞发内库银百万及太仆马价五十万以济边储 ,复忤旨切责。

——《明史》卷二二〇《赵世卿传》

万历时代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情形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说得很具体 :

太仆寺马价银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 ,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两。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 ,随收随放支 ,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 ,且在边功不时之赏 ,其空虚乃尔 ,真可寒心。

明神宗贪财好货 ,至为御史所讥笑 ,如《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所载四箴 ,其一即为戒贪财 :

十七年.....献四箴。.....传索帑金 ,括取币泉 ,甚且掠问宦官 ,有献则已 ,无则譴怒 ,李沂之疮痍未平 ,而张鲸之贖复入 ,此其病在贪财也。

再就嘉靖隆庆两朝内廷向外库借支情况作一比较，《明史》卷二〇六《郑一鹏传》：

嘉靖初……宫中用度日侈，数倍天顺时，一鹏言：今岁灾用拙，往往借支太仓。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嘉靖二十三年……上奏曰：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岁顿尽。……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改北部，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

据此可知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在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数。穆宗享国不到六年（公元 1567—1572），朱衡以隆庆二年九月任工部尚书，刘体乾以隆庆三年二月任户部尚书，刘氏任北尚书后才疏谏取太仓银而不及太仆，则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银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后。由此可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数决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到了张居正当国，励行节价，足国富民，在这十年中帑藏充盈，无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
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标题为编者所加〕

许固生

在《金》书中李瓶儿尚称不得一个主角，同吴月娘等也差不多。不过书名既是依据她们三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而题就的，所以关于她的来历也叙述一下。

关于李瓶儿的来历，本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以为是配角，要给潘金莲作对头的一个，所以也不必一定采取旧事放在这本书内衍展叙述。不过在本书内却曾特别的叙述她的来历，并且还佚出一个《水浒》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李逵来。由此看去这个人物似乎并不是在《金瓶梅》中出世的，原文：

看官听说：原来花子虚浑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来一对鱼瓶来，说小字唤做瓶姐，先与大名府中梁中书为妾……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在翠玉楼上，李逵杀了全家老小，梁中书与夫人（正

夫人)各自逃生。这李氏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走上东京投亲,那时花太监,由御前班值,升广南镇守,因侄男花子虚卒妻室,就使媒人说亲,娶为正室。

从这一段看去,很近于《水浒传》宋江大闹大名府梁中书一回,不过在《水浒》中只有“杜迁、宋万去杀梁中书一门良贱”,而且只说到梁中书的逃去,并没有李逵和李妾拐珠的事。李逵仅仅显了一面说完了。因为这段事不像取之于《水浒》了,或者另是做出这个人物来攀附宋代事实?或者也真另有所本,在元明李逵的古话说部、杂剧中有这类似的故事,也未可知。若据现在元代的杂剧存目,关于李逵的张本却很多,如《黑旋风负荆》、《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大闹牡丹园》等等,不下十数出。存佚各有。这段本事是否在当时也有如是一段剧本,现在不能查明了。所以关于这一个不甚能独立的人物,也只能如此存疑了。

前边三段,约略的说明了一下,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金瓶梅》一书,也如同《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书,是一样的采取旧事古话纂修成的。不过他们不能相侔的地方也很多。《金瓶梅》是集成几个故事而成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则是从一个系统的故事纂修而成的。《金瓶梅》是用借尸还魂的办法来表现作者当时的社会状况。《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则是纯系讲史的说部而已。因此就这几方面来看它们的价值,《金瓶梅》却要高出很多。而《金瓶梅》纂修的艺术功夫,也正是他独特过重的地方,非其他章回小说可以比拟的了。

阿 丁

《金瓶梅》的中心思想 ,在于讽世 ,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它描写上自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 ;它描写人情的险恶 ,世态的炎凉 ;它描写富贵是人之所好 ,美色是人之所爱。它描写嫉妒 ,它描写愤恨 ,它描写谄佞 ,它描写刁滑 ,总之是把整个的现实社会 ,为之露骨的摄出。如其说《水浒》是反抗现实社会的小说 ,《儒林外史》是暴露智识阶级的丑态 ,《红楼》为描写人情的杰作 ,那末我可说《金瓶梅》一书是兼而有之的。或者还可说《金瓶梅》是更深刻更现实的代言人。

《水浒》的梁山泊社会 ,不免稍带几分理想 ,《儒林外史》多偏于热中科举的丑相 ,《红楼》虽是善写人情 ,但反掠与暴露气氛较少 ,只是写一大家庭的奢侈与堕落 ,且不免多带富贵气与名士气 ,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描摹 ,普通家庭的世相 ,似尚不及《金瓶梅》范围的广大 ,与对于大众社会亲切的认

识。

正因《金瓶梅》所写多家庭琐事，大众实相，平淡无奇，不为一般人所注意，而遂注意于其男女交合之事了吧。它不似《水浒》有惊人动魄的故事，《儒林》有寒酸可笑的穿插，及《红楼》之儿女缠绵的言情，材料愈现实愈平淡，而能在平淡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来，这就是不可及处，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处。

它为要描写整个社会的腐败，有一线的安排：上至徽、钦二帝，蔡太师、朱太尉……中以西门庆为主角，西门庆的家庭为中心，下至奴婢贩夫走卒。它以为纲纪不整，在国家则奸佞弄权，在家庭则妻妾无状，遂致形成整个社会的紊乱，外侮日逼，民不聊生。“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书中是不一见而屡见的。

在那时的朝廷如何呢？原书第三十回有说：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这就为《水浒》全书的骨子，同时也为《金瓶梅》的底层。因朝政不纲，卖官鬻爵，西门庆遂得倚势凌人，作威作福，遂由《水浒》的一段文字，而演化出伟大的结构——一百回的《金瓶梅》来了。

西门庆本是中产阶级的人家，因勾搭权奸，位至提刑，且广开店铺，大事买卖，遂成为有钱有势的大户。上

与蔡太师、朱太尉、蔡状元等相连结，家拥六位妻妾，使女奴仆无数，外结十位把弟兄，一生除迎上欺下，喝酒呼卢外，唯一是玩弄女色，把西门庆活描出一个污吏土豪来。

他不但在妻妾间淫欲无度，而且污奸使女，霸占仆妇，又私通上等人的太太。我们只要看第六十九回的林太太和西门庆的勾搭一节，就知道一般社会的情形，也足见作者用笔的刻薄了。

……文嫂导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而入。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衣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交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傍边列着枪刀弓矢。迎门朱红匾上书“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这是一幅多么堂皇正气的人像！但下文是怎样呢？

不想林氏悄悄从房门帘里望外观看西门庆，身材凛凛，语话非俗，一表人物，轩昂出众，……就是个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其良酒色徒。一见满心欢喜。……文嫂催逼他出去，见他一见儿，妇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请他进来见罢。”

便活画出一个色荒的妇人来了。上面说是“节义堂”，下面却“一见满心欢喜”，这是多么刻毒的对照！

在第三十六回，蔡状元之迁就西门庆，与西门庆之奉

承蔡状元及安进士 ,也可见儒林堕落的一斑。其中有说 :

先是蔡状元举手 ,欠身说道 :“京师瞿云峰 ,甚是称道贤公 ,阅阅名家 ,清河巨族。久仰德望 ,未能识荆 ,今得晋拜堂下 ,为幸多矣。”

到次日 ,蔡状元 ,安进士跟从人夫轿马来接。西门庆……教两个小厮 ,方盒捧出礼物。蔡状元是金缎一端 ,领绢二端 ,合香五百 ,白金一百两 ;安进士是色缎一端 ,领绢一端 ,合香三百 ,白金三十两。……于是二人俱席上出来 ,谢道 :“此情此德 ,何日忘之。”

这就可见新进贵人的丑态 ,与西门庆之巴结了。也得当一回《儒林外史》看。

至于西门庆的淫乱与使用人等的胡闹 ,单看第八十一回中短短的一段 ,便可尽情的知道了。

话说韩道国与来保两个 ,自从西门庆将二千两银子 ,打发他在江南等处置买货物 ,一路餐风宿水 ,夜住晓行 ,到于扬州去处。……先是韩道国旧日请的婊子扬州旧院王玉枝儿 ,来保便请了林彩虹妹子小红。……这韩道国又邀请众人摆酒 ,与鸭子王一妈做生日 ,使后生胡秀 ,置办酒肴果菜。……至日落时分 ,胡秀才来 ,被韩道国带酒骂了几句。……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 ,走到下边 ,口里喃喃呐呐说 :“你骂我 ,你家老婆在家里仰扇着挣 ,你在这里合蓬着丢 !宅里老爹 ,包着你家老婆 ,合的不值了 ,才交你领本钱出来做买卖。你在这里快活 ,你老婆不知怎么受

苦哩！……”

这短短一段，便得见主与仆间及仆与仆间之如何下流的情形，同时我们也就知《金瓶梅》一书是描写整个社会的荒淫丑恶，断不在一家间的琐细，它原是包括《红楼》、《水浒》、《儒林外史》各色的姿态啊！

〔标题为编者所加〕

《金瓶梅》唯一的特长，即是在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全书有结构，有埋伏线；“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但结局仍是有一条总脉，归到一处。不似《儒林外史》之随处结束，随处展开；又不如《水浒》之到头无总归宿。

它以“武松景阳岗打虎”开始，由武松而引出武大，由武大而说到潘金莲，由潘金莲而连结西门庆，再由西门庆为主而展开一大局面；中间且生出李瓶儿、春梅、陈经济、应伯爵等副角，外加王婆、薛嫂、黄真人等的三姑六婆。穿插官场，添加风月，遂演成为洋洋大观的《词话》。

从第一回到第七十九回，男主角为西门庆；自第八十回到九十九回，继之者为陈经济；自第一回到十二回，女主角单表潘金莲；自第十三回起至六十二回止，李瓶儿与潘金莲夹写；自六十三到八十七回，因瓶儿已死，除金莲外带写春梅；自八十八回起，

则独写春梅了。因全书以金莲、瓶儿、春梅为主，所以名为《金瓶梅》，非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序》里所谓“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樗枿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

在全书人物，一一轻便带出，非如《水浒传》表出之生硬突兀；但其重要者，又一一为之依次归宿，理络分明，所以其结构是得以称颂的。但各个个性描写，虽未能如《红楼》之细腻，《水浒》的鲜明，可是重要几个，如潘金莲之泼辣，李瓶儿之委婉，吴月娘之平顺，春梅之灵俊，孟玉楼之凡庸，西门庆之豪诈，陈经济之巧滑，应伯爵之谄顽，刘二之刁狠，都很活现。现且抄录几段看看，以见一斑。

……谢希大又拿两盘烧猪头肉和鸭子递与他。李铭双手接着，下边吃去了。伯爵用箸子又拨了半段鲟鱼与他，说道：“我见你今年还没食这个哩，且尝新着。”西门庆道：“怪狗材，都拿与他吃罢了，又留下做甚么？”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阑上来，饿了我不会吃饭儿？你们那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正说着，只见画童儿拿出四碟鲜物儿来：一碟乌菱，一碟荸荠，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门庆还没曾放到口里，被应伯爵连碟子都挝过去，倒的袖了。

——第五十二回

……月娘听了一声儿没言语，一面叫得金莲来，问他说：“是你屋里的猫唬了孩子？”金莲问：“是谁说

的？”月娘指着：“是奶子迎春说来。”金莲道：“你着这老婆子，这等张睛！俺猫在屋里好好儿的卧着不是？你每乱道怎的！把孩子唬了，没的赖人起来，瓜儿只拣软处捏，俺每这房里是好缠的！”月娘道：“他的猫，怎得来这屋里？”迎春道：“每常也来这边屋里走跳。”那金莲接过来道：“早时你说，每常怎的不挝他？可今日儿就挝起来？你这丫头也跟着他恁张眉瞪眼儿，六说白道的！将就些儿罢了，怎的要把弓儿扯满了，可儿俺每自恁没时运来。”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里去了。

——第五十九回

看上二段，便得见应伯爵之如何谄顽油猾，潘金莲之如何泼辣狡诈了。一个便似小丑，一个便如泼旦，其个性各活现纸上。至用笔之细腻灵活，尤莫如原书之首二回及第八十七回。忽写金莲之娇娆，忽写武松之刚直。而如王婆之巧滑，武大之愚庸，直欲于纸上呼之而出。现再将八十七回中录一段如下：

次日，武松裹帻穿衣，来到王婆门首。金莲正帘下站着，见武松来，连忙闪入里间去。武松掀开帘子来，问：“王妈妈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扫面，连忙出来应道：“是谁叫老身？”见是武松，道了万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旧时保养，胡子楂儿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边又学得这般知礼。”……婆子初时还不吐口儿，便道：“他是在我这里，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后听见武松重谢他，

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说。”那妇人便帘内听见武松言语要娶他看管迎儿，又见武松在外，出落得长大，身材胖了，比昔时又会说话儿，旧心不改，心下暗道：“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来。……

你看这时武松写得如何谦抑！并王婆之见钱眼开与金莲之闪烁风骚，都历历如见。但其后怎样呢？

须臾烫上酒来，请妇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让，把酒斟上，一连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见他吃得恶，便道：“老身酒够了，放我去，你两口儿自在吃盏儿吧！”武松道：“妈妈且休得胡说！我武二有句话问你！”只闻飏的一声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长刃薄背厚札刀子来，一只手笼着刀靶，一只手按住掩心，便睁圆怪眼，倒竖刚须，便道：“婆子休得吃惊！自古冤有头，债有主，休推睡里梦里，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

又是多么安排停当，与转变得迅速。“只闻飏的一声响”七字，真如疾雷暴雨，用得奕奕有神。全书中都是风情艳语，嫉妒巧舌，而写武松打虎与这里杀嫂一段，又是多么凛凛，就可见得大作家的手法，是无处不佳的了。

〔标题为编者所加〕

张天畴

《金瓶梅词话》,大家都当作一部淫书来读。诚然,文字里面有着不少的秽褻部分,描写性动作比吾家竞生还要来得露骨。但是如果把秽褻文字删去,单读其他的部分,其雕塑书中人物的个性,以及反映出《金瓶梅》时代的社会相,可以和《水浒》、《红楼梦》鼎峙而三;虽然有些地方写得太琐碎,以平凡的材料来入说部;但正惟其写得琐碎平凡,才能够表现出作者的独到之处。同时《金瓶梅》书中的描写社会相,重实际而不落空想,这像是要比别的说部真实得多。如西门庆贿通官吏,仗势压逼平民,奸淫妇女;应伯爵的帮闲作乐,奉承土豪劣绅,笔力所至,而描写得异常逼真,若非作者的观察力特别敏锐,真不容易写成这部伟大的说部!

从《金瓶梅》时代一直到现在至少有半世纪。然而,像《金瓶梅》那种的社会相,至今还不曾十分的改样,贪官污吏,土豪劣

绅、奸夫淫妇，以及帮闲人物却依然在现时代里蠕动，大批地出现，而捞钱手术之高妙，汇缘技巧之进步，俨乎绅播，从外表上看来，也岂是当时的西门庆之流所能望及肩项？至于内心之凶恶，当然要比西门庆更加厉害了。

西门庆的罪恶，固属尽人而知，不必在这里说明。但是那班帮闲者帮同作恶，阴柔奸险，倒不妨把他的言行揭露出来，使现今的帮闲人物，不能专美于后，有所对照。

说到《词话》里的帮闲人物，一共有十位，为首的名叫应伯爵，自然是此中的佼佼者。但是吴典恩（西门庆的舅子）也不弱。后来西门庆差他一伴同来保到东京蔡太师那里去押送生辰担，因为蔡老头子赏识他的仪表不凡，居然赏给一个清河县的正丞，做了朝廷的官儿。不过，无论吴典恩怎样的会得钻营，可在西门大官人面前，他的帮闲技巧及地位，却敌不过应伯爵。除此以外，如孙天化、云离守、花子虚、祝日念、白来创等，则较吴典恩为次；但在当时的清河县里，也可算是“绅士尾巴”了。西门庆每次到勾栏院中去逛乐户的时候，总少不了这班人的插科打诨，白吃白喝的做着凑趣工作。《词话》里的第十一回，西门庆疏笼李桂姐那时，作者说明了这班帮闲人物的姓名和身分：

西门庆立了一伙，结识了十个人做朋友，每月会茶饮酒。头一个名唤应伯爵，是个泼落户出身，一份儿家财都嫖没了，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闲贴食，在院中顽耍，诨名叫做应花子。第二个姓谢名希大，乃清河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自幼没了父母，游手好闲，善能踢的好气球，又且赌博，把前程丢了，如今做着

帮闲的。第三名吴典恩，乃本县的阴阳生，因事革退，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以此与西门庆来往。第四名孙天化，绰号孙寡嘴，年纪五十余岁，专在院中闯寡门，与小娘传书寄柬，勾引子弟，讨风流钱过日子。第五是云参将的兄弟，名唤云离守。第六是花太监侄儿花子虚。第七姓祝，名唤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时节。第九姓白，名唤白来创。连西门庆共十个。

除了西门庆，这九位人物自然各有各的帮闲本领；虽然作者不曾把他们每个人的特点一一叙述出来，但且看应伯爵的善于跟富家子弟逛院子，谢希大的游手好闲，能踢一脚好气球，吴典恩的专在县前与官吏保债，孙天化的与小娘传书递简，勾引子弟，讨风流钱过活，确乎是一种平常人所不能及的特殊本领。可见得帮闲的技能，亦不容易学得。虽则现今的帮闲技能与以前的时代有所不同了，可是假如你会得踢毽子，打拳头，唱几出大花脸的调调儿，以及……从“学而优则士”那条路线上去谋出路，也何尝没有做个把官儿的希望？这是政治上的帮闲人物，又当别论了。总之，中国的社会是永久灰色的，拿漂白粉来洗涤也不会干净，《金瓶梅》的时代是如此，现在的时代也不见得就改了样，将来呢？鬼知道！

花子虚是有几个钱的人，是个太监侄儿，太监死了，一份财产都在他的手里，要比其他专吃白食的强得多，可是和“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见《词话》第二回）的西门大官人来一比，则自然有大小巫之分。因此“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

钞,让西门庆做了大哥,每日轮流会茶摆酒。”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帮闲的人们总把有钱有势的暴发户当作主子看待,应伯爵辈的附和西门庆,把他作为这班狐群狗党的领袖,当然也不会有例外的。

西门庆自结识了这班朋友之后,每日地盘流着会茶摆酒还不算,有时候还得要到勾栏院去走走,窑姐儿、李桂姐,就成了他们性的对象的玩弄品。《词话》的第十二回中,为了要暴露这班帮闲人物的卑劣性,所以有着如下的特写:

七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生日来到,吴月娘见西门庆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厮玳安,拿马往院中接西门庆……这玳安不敢怠慢,骑马一直到勾栏李家,只见应伯爵、谢希大、祝日念、孙寡嘴、常时节众人正在那里伴着西门庆,搂着粉头,花攒锦簇,欢乐饮酒……

当玳安小厮进了勾栏院,递上了潘金莲寄给西门庆的情书,不提防被桂姐儿抢到手中,撕开了叫祝日念读给她听,原来那信上写了一首名叫《落梅风》的词,写得非常的香艳动人。上面写着这样的句子:“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心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祝日念在当众读完了这首词,说是潘金莲寄来的,那知燃起了桂姐儿的酸劲儿,便撇了酒席跑回到房里去躺在床上;这时,气恼了西门大官了,把信扯得粉碎。于是这班帮闲的人们看到主子发怒,大家便把玳安

乱踢了几脚 ,马上伴着西门庆去安慰桂姐儿。

大抵帮闲人物的口齿是很伶俐的 ,奉承凑趣 ,然后才讨得了主子的欢心。当祝日念这班人陪了西门庆走进房里去劝李桂姐 ,他便向桂姐儿调侃的说 :“桂姐 ,你休听他 哄你哩 ! 这个潘六儿 ,乃是那边院里新叙的一个婊子 ,生得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半取笑 ,半认真地想把这事情岔了出去 ,可以减少桂姐儿的醋劲 ;接着 ,西门庆就笑着打祝日念骂 :“你这贼天杀的 ,单管弄死了人。紧着她恁麻犯人 ,你又胡说。”经此番打诨 ,桂姐儿的酸劲儿固然消了一大半 ,可是窑姐儿是惯于用诱惑手段的 ,吃假酸生假气是她们笼络嫖客的艺术 ,便撒娇地向西门庆说 :“姐夫差了 ! 既然家中有人拘管 ,就不消在外间梳笼人家粉头 ,自守着家里的便了。才相伴了多少时 ,那人儿便就要抛离了去 ?”这时 ,应伯爵看这事情下不了台 ,便插嘴的说 :“说的有理 ! 大官人 ,你依我 ,你也不消家去 ,桂姐也不必恼。今日说过 ,那个再恁恼了 ,每人罚二两银子 ,买酒肉 ,咱大家吃。”毕竟是帮闲人物口吻 ,原来劝人家的争吵是为了自己的酒肉打算。“小人之志在饮食” ,这话在《金瓶梅》时代的社会间就通行。

总算亏得这班帮闲人物的出力 ;“四五个嫖客 ,说的说 ,笑的笑 ,在席上猜枚行令 ,顽耍非酒 ,把桂姐窝盘住了”。于是“西门庆把桂姐儿搂在怀中赔笑 ,一递一口儿饮酒” ,才把刚才的事情告了结果。

谢五知

自近世裸体照片与春画出 ,于是君子儒者始叹人心之不古 ,实则道学文人之于女色 ,其激烈尤有甚于画眉者。况乎“春画”、“春文”皆自古有之 ,于今为烈耳。

破题道过 ,再申愚意。

我觉得春画的发达 ,是跟着春文——也可称为“桃色文字” ,依据“桃色新闻”等——来的。十余年来 ,有了性学博士之《性史》 ,然后才有坊间的大批春画。当《性史》由一辑出到第二十余辑 ,正热闹的时候 ,同时也是春画制造最多 ,售卖最广的时期。还记得前七八年 ,只要你一到青云阁 ,只要一买信封或小说等 ,便有人鬼鬼祟祟地拿春画给你看 ,若是你真是买主 ,还恭敬地请你到屋里边去慢慢鉴赏领略。内城的东安市场也大致相同 ,但近年来却少见了。上海是《性史》的发源地 ,这类的书籍特别多 ,所以至今四马路上 ,还有人跟着行人至死不放 ,非叫你买春画不可。无论是怎样维

新的志士 ,或提倡裸体游行的先觉 ,虽然不以为这东西能使青年堕落 ,但至少它总是诱惑青年 ,及诲淫的工具。

我是相信春画与性色文字有密切底关系的 ,在以前便是所谓“淫书” ,也是因有淫书才有春画。想当年一般人所得见的春画 ,除了相传庙里的欢喜佛像 ,那又是一种意义 ,容后再谈 ,其次便是以春画为“厌胜”之物。至于纯粹为春画而春画的 ,其史的发展源流 ,殊不可考 ,我仅见过明朝初年的五色春图 ,那是流行于高等社会或文人骚客之间的 ,是私相授受传观的。讲到官的 ,恐怕要算明本带有图像的《金瓶梅》。因为有《金瓶梅》这部淫书 ,于是有好事者按文象图 ,这是一般人所得见的春画。不知道在《金瓶梅》以前 ,凡普通社会的读物里 ,是否还有带春色图像的书籍。

在愚见以为最珍贵最完全的老本《金瓶梅》 ,和今日的《性史》之类及春画 ,论它性质同本身 ,都是陷害血气未定之青年的东西。它们本身上除却某种的价值外 ,只有行辈先后 ,时间早晚的区分 ,没有所谓“雅”“俗”的不同。然而我竟看见理学前辈 ,鼻梁上架着花镜 ,手中死握着《金瓶梅》 ,而大骂今日性书盛行 ,春画害人子弟 ,实未悟《金瓶梅》 ,不仅害人子弟 ,且已误人父兄矣。新书因俗而被骂 ,揆之论理 ,殊失之平。

惟有春画 ,在书籍里面 ,没有很多材料 ,可以考据它的源流 ,这也是关于儒教理学与民俗方面的问题。据一般记载 ,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厌胜”“避邪”用的 ,发始极早 ,据说上古拜物之后 ,便有春画 ,这是属于迷信的 ,其俗至今犹存。一种便是纯粹春宫图样 ,专供风流人士之观赏。关于前者避邪厌胜之说 ,我们乡间有种风格 ,说

五黄六月当暴雨大雪的时候 ,若遇到雷公下来击人 ,倘是女人 ,可将裤子脱下来 ,顶在头上 ,自可避难。有时雷公来势太猛 ,已经下来 ,而碰见裸体女人 ,便回不去 ,在地乱滚 ,有如雄鸡。妄言尽管妄言 ,但至今还有力量 ,为人信仰。所以好些乡愚 ,以为春画可以避邪避鬼 ,其功效同于《易经》 ;至其内容 ,无论是经书 ,是春画 ,倒不注意。而市面上有一种“风花雪月”大钱 ,上面有裸体男女二人 ,有人以红布系之给小孩带在身上 ,则其意义 ,亦在此不在彼矣。

考《路史》载何俊有记曰 :

余家有汉画 ,世所未见。其画非缣非楮 ,乃画于车螯壳上 ,乃是姑苏沈辨之至山东卖画买回者。闻彼处盗墓人云 :“每发一冢 ,则其下有数十石 ,其画皆作人物 ,如今春画 ,有干男色者 ,其笔甚拙。”夫车螯 ,唇也 ,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 ?余观北齐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册》云 :“攀唇辍而雨泣。”则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盖置于枢之四旁 ,以防狐兔穿穴 ,其画春情 ,亦似“厌胜” ,恐蛟龙侵犯之也。由是言之 ,春宫秘戏 ,其传最古 ,今人置春画于皮衣箱内 ,谓可避虫 ,其亦厌胜之意欤。

——见无名氏《韵鹤轩集》

观此 ,则春画的起始 ,或者先由于粗线条的厌胜图 ,后来由粗而精 ,慢慢的演变为精细的春宫秘戏 ,乃是由迷信进而为艺术的历程。

若单就它本身上说 ,中国社会的一切形态和习俗 ,到

大宋朝便发展完成，所以如今好些习惯风尚，除了满清的一少部分外，其余完全是沿袭赵宋的一切。春画之成为春宫，宋代已有，到了明朝，始大盛行。似乎明代的风流才子特别多，我们今天还可看到唐公伯虎所画的极细的春宫图。虽然是拓片而非原物，但其精巧，则较之艺工所刻的《金瓶梅图》，又高出远甚。我们还读到又满楼所刻的《民抄董宦事实》，董其昌固以书画著名，谥称文敏，然而他的行为，虽没看见他的春画，而风流好色的程度，恐怕比之唐公，有过无不及。颇像《问樵闹府》中的大白脸，以告老太师，而抢夺霸占士绅妇女，以致激起公愤，被乡人把他房屋烧了，书物毁了。于此可得结论，因为明朝的才子多，所以明朝的春画盛。而淫书也为古今第一，被称为文学名著。

看过唐寅的春册和《金瓶梅》的图像，使我感觉到所谓性灵文学与春宫画，都是有明的特色；而春宫与性灵，又有连带关系。决非故意玩笑之谈，未知高明以为然否？〔编者按：本文原题为《春画》，现标题乃原文之副题〕

冯沅君

在《金瓶梅词话》中，有两点显示我们从小说蜕变的遗迹。一、书中人每以韵语代替普通语言。二、每回的回目常不整饬。

在古代中国文学史上，有种散文与韵文混合而成的文体，这是赋。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种散文与韵文混合的文体，这是唱经文与变文。前者以汉代为最盛，它的支派有《七发》、《七依》、《封禅文》、《典引》、《答客难》、《解嘲》等。后者的影响较前者为大。在中国近代文学的领域内，几乎每个角落都反映着这种影响。唱经文与变文，因为是散文与诗混合成的，故可说可唱。由此分化下来的，约可分为二类：有以唱为主的，为剧曲，而诸宫调附焉。有以说为主的，为平话，长篇章回小说应是平话的变种。所以原始的小说并不是纯粹散文的“说话人”，在“说话”时实是说唱并用。这种遗迹在平话与章回小说中都可寻到，而《金瓶梅词话》所保留者较其余诸书都显

著。

读《金瓶梅词话》时,最能使我们感到奇特而注意的是书中人常常以韵语,尤其是曲,来代替普通的语言。如:

且说老虔婆见西门庆打的不像模样,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说了几句闲话。西门庆心中越怒起来,指着骂道:有《满庭芳》为证:“虔婆你不良。迎新送旧,靠色为娼,巧言词将咱诳,说短论长。我在你家使够有黄金千两,怎奈卖狗悬羊!我骂你句真伎俩,媚人狐党,衡一片假心肠!”虔婆亦答道:“官人听知。你若不来,我接下别的。一家儿指望他为活计,吃饭穿衣,全凭他供柴爨米。没来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无意,不思量自己,不是你凭媒娶的妻。”西门庆听了,心中越怒,险些儿不曾把李老妈妈打起来。

这便是以曲代言的一例。此外如卷一,页七十四;卷六,页七百零二;卷六,页七百零六;卷八,页一千零五十七;卷九,页一千零八十六;卷九,页一千零九十八;卷九,页一千一百;卷九,页一千一百一十三;卷九,页一千一百二十七;卷九,页一千一百五十七;卷九,页一千一百六十一;卷九,页一千一百六十四;卷九,页一千一百八十八;卷九,页一千二百零六,都有这类例子。至于以其他韵语(也可以说是诗)代言的虽不甚多,但其中颇有很长的。如:

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这咱才来。”蔡老

娘道：“你老人家听我告诉：我做老娘姓蔡，两只脚儿能快。身穿怪绿乔红，各样髻髻歪戴。嵌丝环子鲜明，闪黄手帕符_搽。入门利市花红，生下就要管待。不拘贵宅娇娘，那管皇亲国太。教他任意端详，被他褪衣_刮划。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不管脐带胞衣，着忙用手撕坏。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顾偏多，请的时常不在。”

这些以韵语代语言的例子都应与《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中的十篇商调《醋葫芦》有同样的功用或来源，虽然书中并无“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和“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等辞句。换句话说，这些代言语的韵语都是用以供“说话”时歌唱的，至少也是这种体例的遗迹。不然的话，一个人在骂架的时候居然会骂出一支曲子来，不是太不近情理吗？

将一书分为若干回，每回上附以对偶的回目，这并不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原始形态。就现存的古小说来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武穆演义》等，每书大都是分为若干段，每段都有个标题。这种体制约始于宋元时，而终于明代中叶，这些标题无疑的是后来章回小说的回目的滥觞。但是椎轮为大辂之始，朴拙者常是精巧者的前身。由这种简略无文的标题发展到对偶工整的回目，这绝非一蹴可及的，其间必有个过渡者。在明人小说中可以代表这种过渡状态的，郭本《水浒》而外，便该数《金瓶梅词话》了。

《金瓶梅词话》全书凡一百回。在这一百条回目中，

字句参差 ,不成对偶的几居全数之半。如 :

第一回 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在“开卷第一回”即是如此。这种粗拙的回目到崇祯本《金瓶梅》便修改成工整的了。于是第三回的“王婆定十件挨光计 ,西门庆茶房戏金莲”便改为“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 ,第八回的“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也修改为“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这种由拙而工的修正 ,乍看去似乎无甚深意 ,实际上它正说明小说回目演变的史迹。

章回小说本托始于“说话人”所用的底本 ,话本。大抵在“说话”时 ,因为较长的话本不能一次便说完 ,遂将它分为若干段 ,以便分回来说。更因为要使顾客对于所听者的内容了解得更清楚一点 ,因而每段加上标题 ,以便“说话”时措辞有个中心点 ,不至于支蔓。加标题的原始用意既只在使顾客对于所听者的内容能更清楚的了解 ,供“说话人”的参考 ,自然不注意到字句的工拙。《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等书的标题都应属于这一类。嗣后 ,遵依着文艺进展的一般程序 ,由粗拙而精工 ,同时小说的欣赏人也由听者变而为读者 ,于是字句参差的标题进而为整齐的“则目” ,最后终有对句工整的回目出现了。在小说史上这自然是个小问题 ,但不是个不值一顾的问题。

〔标题为编者所加〕

冯汉鏞

《金瓶梅》一书,许多人都认为是一部淫秽的小说,独清初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则称它是“以淫说法”。刘氏这种论调,我是极端赞同,因为在《金瓶梅》的末尾,叙述西门庆为潘金莲淫死的时候,就有一首诗叹曰: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

这首诗的意思,完全是劝人不要贪色丧身。同时这书的最后几回,叙西门庆死后,婢妾淫奔,也是以西门庆为譬喻,劝人生前不要淫,免得死后自己的妻妾也被人淫。从这点看来,谓该书是“以淫说法”,的确不是假话。

这书虽然是以淫讽人,但是一般人都

认为它是淫书，所以在清朝顺治九年及康熙四十八年，乾隆元年及同治七年，俱曾先后颁布禁止在案。即如现在世界、大达、锦章等几家书店所印行的《金瓶梅》，内中文字，亦都有删削，其所以删削者，就是因为这书描写淫的情景，太细腻了的缘故。……

《金瓶梅》既不是因报父仇毒顺之而作（本来此书就不是王世贞作的），那么，一定就有人会有这样的怀疑问题：“《金瓶梅》是为什么作的，是游戏文章吗？”我对这怀疑的回答是：“作《金瓶梅》也是有用意的。”考《顾曲杂言》说：

《金瓶梅》一书，为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严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勳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

按《杂言》所说，知作这书的用意，是讥斥时事，而不是游戏笔墨。至于这书的描写淫欲，一方面在“以淫说法”；另一方面则在借淫秽以警朝政的紊乱。

又这部书，自印行后，有许多人因其文墨晓畅，喜欢看它；也有许多人，因其描写风流细腻，喜欢看它；再加上袁中郎的《锦帆集》，有“伏读《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等语，来赞美它，使它身价十倍，所以虽屡经清代的禁绝，而尤能风行于今日，也就是这个缘故。

潘开沛

要研究《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除了依靠以往的记载之外,就是依靠作品的本身。“五四”以来的许多学者和研究《金瓶梅》的专家,过去,在锐意穷搜有关《金瓶梅》的记载和材料方面,已下了不少的功夫;可以说,能够找到和可以利用的材料,他们都已经找到和利用了。但是,其结果,除了推翻了从“嘉靖间大名士”到王世贞作的传说之外,到底它是谁作的,是怎样产生的,却一直得不到要领。新的材料,新的证据,至今无人发现;所以要想依靠以往的文字来解决我们的疑问,已不大可能,现在唯一能做得到的,而且比较靠得住的,就是利用这部书的本身。我所想要做的,也就是想从书里来发现书的作者,及其产生的过程。

首先我们要问《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我说:不是像《红楼梦》那样由一个作家来写的书,而是像《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成长篇小说

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在书的本身。

第一、《金瓶梅》是一部平话(《茶香室丛钞》十七:“《平妖传》、《禅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话也……”),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金瓶梅》平话(以讲演为主),原来就是说书人自己编的,并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写给普通人看的。这在《金瓶梅》里,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说书人自己的语调,可以证明这一点。如词话本第一回三页:“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说书人直接向听众说明事情时,总是以说书人的身分来对听众说话)一回十二页:“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女……”(“看官”是指听众,而不是指看书的人)一回十六页:“话休絮烦,自从武松搬来……”四回六页:“话休饶舌,那妇人自当日……”十回六页:“看官听说,原来花子虚浑家……”十四回八页:“话休饶舌,后来子虚……”十八回一页:“话分两头,不说蒋竹山在李瓶儿家招赘,单表来保来旺二人……”十九回三页:“且不说吴月娘等在花园中饮酒,单表西门庆从门外……”当然,文人也可以假借说书人的口吻来写书,可是因为它是平话,所以这语调只能说是说书人的自然的口头禅。

第二、全书每一回都穿插着词曲、快板、说明。

一种词曲是由书中的妓女来弹唱的,如十一回十一页桂姐唱“驻云飞”:“举止从容,压尽勾栏占上风。行动香风送……”

一种词曲是由书中人物来自唱,如一回十一页由金莲“弹个山坡羊为证”:“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

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直接形容人物的,如二回五页说书人用弹唱来形容金莲的容貌:“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鬃髻,口面上缉着皮金,一径里^遶出香云一结……”

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形容气候的,如一回十六页:“但见:万里彤云密布,空中祥瑞飘帘,琼花片片舞檐前。剡溪当此际,濡^浹子猷船……”

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形容景色的,如十九回一页:“但见:正面丈五高,心红漆绰屑。周围二十板,砧炭乳口泥墙。当先一座门楼,四下几多台榭……”

一种词曲是由说书人来描绘一件事情的,如十一回九页,说书人用词曲来挖苦和讽刺勾栏:“有词为证:陷人坑,土窖般暗开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叠;检尸场,屠铺般明排列……”

由书中人物用快板(顺口溜)来自道的,为数也不少。如四十回的赵裁缝自道:“我做裁缝姓赵,月月主顾来叫。针线紧紧随身,剪尺常掖靴^鞦……”三十回的接生婆自道,六十回的赵太医自道等等。

所有书中的词曲、快板,很显然地都是说书人为了说书时的演唱而引用或编撰的。据《野获编》的记载,《金瓶梅》里六十多种的词曲,是万历间最流行的时尚小令,一般的妓院歌女、富贵人家的男女、说书人、以至城市平民差不多都会唱的,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这正如现在,城市的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会哼几句京戏一样。而这些流行的词曲,当然更为说书人所熟悉,以致他们可以随手

拈来,恰合其时地引用。所以不一定要“大名士”才能做得到,就是“大名士”也不见得就能做得到,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很难熟悉下层社会的生活。如写刘二开的娼店和陈经济做道士的种种卑劣行为,是非生活在下层社会者,所不能熟知和写出来的。

第三、《金瓶梅》在写作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内容重复,穿插着无头无脑的事,与原作旨意矛盾,前后不一致,不连贯,不合理以及词话本的回目不讲对仗、平仄,字数多少不一等等。例子,这里就不再举了,因为另有文章专谈这事。我们从这许多写作上的毛病,看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书本身存在着的这些毛病,刚刚证明了《金瓶梅》不是一个什么“大名士”、大文学家所独自创作的作品,而是说书人,许多说书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相同的时间内个人编撰和互相传抄,不断地修改、补充、扩大、演绎的结果。

正因为是出于许多艺人之手,他们是在随编随讲的情况下创作的,又是在听众的“拥护”下继续创作的,后来的人又是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继续创作的,所以不能不使最后完成的一百回本(当时当然是抄本),存在着许多漏洞和毛病。当时的听众,只不过图一时的高兴,听一场又一场,听过去也就完了,谁去管它有什么毛病没有。同时,说书人一说就过去了,也很难发现它有什么问题。艺人们自己,只是师父传徒弟,这一家抄那一家的稿本,学一回,讲一回,学和抄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讲得到研究。他们又没有学过做诗做对,而只是模仿别的平话(尤其是《水浒》)来创立回目,所以使回目不讲对仗、平仄、字数。而且编撰者为了生活,只顾往前编,只顾满足听众的要

求,哪里来得及细细推敲呢。及至《金瓶梅》的抄本,到了文人的手里时,除了添补一些残缺的地方之外,只不过对回与回之间的连贯,和个别字句加以润色而已。等到这本书送到出版者手里时,出版者也不过只是与文人合作做一做点滴的勘校工作,便拿去付刻了。——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现在从词话本中看到了《金瓶梅》的不少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看不到《金瓶梅词话》,而只看到崇祯本和康熙张竹坡的评刻本的话,有许多事情就不能知道了,如删掉了皇帝借太仆寺马价银的话,和修改回目等等。

第四、我们再进一步从全书的结构、故事和技巧来看,也可以看出是经过许多人编撰续成的。

我们先从最初的编撰意图方面来看,一回三页:“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

按照这一段开场白看来,原编撰人的目的,只是打算把《水浒》里的武松杀嫂的故事,加以扩大而已;全本书,原来至多编撰到八十七回“王婆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就完了。以全书人物看来,也只有金莲与瓶儿二人最受宠,春梅还只是配角,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和特别受西门庆的宠爱。所以原书的名字,不一定就是后来的《金瓶梅传》,也许只是《金瓶传》或别有名称。因为只有

《金瓶传》就够了，完全用不着添一个梅字。由此推断，从八十八回起，以春梅为主角的以下各回，当是后来别人续作的。

其次，从整个故事来看，八十八回以后，春梅和陈经济假认为姑表兄妹的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根本就无法通过周守备那一关。这显然是后来的续作者搞的玩意，因为不这样，他还想不出更巧妙的其他的办法来安排这几个人物，使故事继续演变下去。

全书写至八十七回金莲被杀，本可就此结束，然而书中的人物，如吴月娘的孝哥、春梅、经济、雪娥、孟玉楼等等都还没有结果，所以八十八回以后就完全是为了使这些人得到结果的故事，这也是续作者的苦心。

再次，从全书的写作技巧或编撰技巧看来，以前五十回为最好，虽然尚存在若干小问题。可能最初只有这五十回，以后才由别人续作。五十一回到八十七回，问题最多，也许就是参加编撰的人较多的表现。八十八回以后的十三回，便差得多了，春梅的淫荡行为，不过是金莲行为的再现，陈经济入守备府后的行为，也不过是抄袭西门庆家的情况。然而除了八十九回道坚对月娘的态度没有与前面照应，一百回西门庆的轮回不合理之外，这十三回中其他的小毛病却不多，这就是因为续作者的精神，比较贯注的原故。同时比以前各回，写了更下层的民间生活。

全书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大段落，即五十回以前、五十一回至五十七回、五十八回至八十七回、八十八回至一百回。

为什么别人要续作呢？第一、该是由“百回”的观念引起的。似乎什么书都得百回才合格，五十回当然太少，

故事才开始呢。八十七回,似乎很不合适,减少了又可惜,不如补足百回为上,于是别人就继续编下去。第二、该是受因果报应的观念而续作的。就八十七回结束,便还有许多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应该一一各得到报应。于是将陈经济死于刀下,春梅死于男子身上,孝哥出家……等等。第三、听众不满足。没有看到每个人的结果,都希望再听下去,于是只好继续一边编一边讲。

第五、从作者的直接描绘和一些淫词秽语中,也可以看出是说书人的创作。如二回五页,当西门庆被金莲的叉杆打在头上时,“便立住了脚,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但见他黑鬓鬢赛鸦翎的发儿,翠湾湾的新月的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身儿……手儿……腰儿……脐肚儿……脚儿……胸儿……腿儿……”(这是《水浒》中所原有的),接着还有一首弹词。这也很显然地是说书人补叙进去的,不像小说家的创作。西门庆只是回头一看,他再怎样看得仔细,也绝不能仔细到这地步:不但见到了容貌的各部分,甚至连衣服裤子里的各部分都见到了!

《金瓶梅》里的淫词秽语很多,除历史背景外,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书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说西门庆贪色好淫而引起,但另一方面,也还是由于说书人为了博得听众的欢心和满足听众的低级兴趣,而不惮其烦地加以描述而来的。这从以往上海的说书情况,和以往湖南的花鼓戏以及许多弹词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低级兴趣的存在。

再如《水浒》的《王婆受贿说风情》的一回里,“两个就

王婆房里脱衣解带，共枕同欢”时，说书人也插了一段形容性交的弹词；在《金瓶梅》里，这首词只改了个别的字。所以，像《金瓶梅》里所杂夹的淫词秽语，并不是从《金瓶梅》开始的，而是早已有之了，这本书只不过是加以扩大，和比较多一些。它之所以多，前面已说过，但它和那些同时的专谈性交的小说又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张鸿勋

关于《金瓶梅》的著作年代,今天也没有法子可以知道,不过它产生的大约年代,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旁证上推测出来。

有的人认为《金瓶梅》是明嘉靖年间产生的(沈德符主此);有的人认为它是万历年间产生的(吴晗主此)。我认为这两个说法没有多大的出入,既然确切的年代无法知道,那么它大约的年代就在十六世纪中叶,再具体地说,是在嘉靖与万历年之间。

(一)前面说过,最早记载了《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觴政》一书,《觴政》自序署的日期是万历三十四年(公元一六〇六年),可以知道它是写成于此年的,因而《金瓶梅》写成的年代最迟也不会晚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另外,欣欣子在他的序中说: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暉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顰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

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

这里所列举的‘前代骚人’和作品,元稹、罗贯中不用谈了,除《如意传》、《于湖记》两篇不知作者外,其余的五个人中,只有丘琼山卒年最晚。他死于明弘治八年(公元一四九五年),序上既然称他为“前代”,可见欣欣子一定在他以后的若干年,也就是笑笑生在他以后若干年,恰当嘉靖年间。由这两点看来,可以说《金瓶梅》是写在嘉靖与万历之间,也就是十六世纪中叶的作品。

(二)再由《金瓶梅》中所引的小曲来考察它产生的时代。冯沅君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她的统计说:

《雍熙乐府》与《词林摘艳》都是嘉靖时编成的,而在《金瓶梅词话》所引的八九十条中,见于《雍熙乐府》者凡六十条,见于《词林摘艳》者凡四十六条。这种现象很可以证明《金瓶梅词话》与这两部曲选纵非同时的产品,其年代当相去不远。因为三书的作者或编者所采用的当然都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曲子。

冯沅君这个统计和解释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在《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四回中,记述申二姐唱歌的情形:‘我唱个十二月儿‘挂真儿’,与大妗子和娘们听罢。于是唱道:‘正月十五闹元宵,满把焚香天地也烧’一套。’我们认为申二姐所说的‘挂真儿’就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挂枝儿’。因‘挂枝儿’是民间小曲,文人记载时,

“枝”、“真”音近，只记它的音，所以才有“挂枝儿”与“挂真儿”的不同，其实是一个东西。正如《水浒》上白秀英所唱的“诸般品调”就是“诸宫调”一样。这套“挂枝儿”申二姐没有唱完，但从头两句看来，它可能是从正月唱到十二月成一套，这和稍后的“挂枝儿”稍有不同，以后的“挂枝儿”很少有联套形式。“挂枝儿”据沈德符说：“嘉、隆间乃兴‘闹五更’……；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野获编》）所谓‘比年’，推其时代，大约也在万历中叶以前，和《金瓶梅》的出现，正是同时的。”

其次，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中说：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按田汝成此书写成于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说，他记的“近世所拟作”的《红莲》等篇，写成的时代大约也在此时。《红莲》大约是指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它收在《清平山堂话本》中，也收在《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三回中，它是当王姑子宣卷时，所唱的故事。《红莲》故事在当时流传很广，《金瓶梅》将它收了进去，可见《金瓶梅》的写作年代当在嘉靖年间左右。因为“近世”是指成书的年代嘉靖二十六年左右，《红莲》既然成于此时，则《金瓶梅》大约也是成于此时了。

根据上面例证，可以断定《金瓶梅》写成在嘉、万之间。

(三)从回目的改变上看。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从原始的标题到不工整不对偶的回目再到工整、对偶,这中间是经过一个演变过程的,大致上到了明代中叶时,小说回目就开始成为工整对偶的形式了。现在看明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它是参差不工整也不对偶的,而到了崇祯年间刊行的《金瓶梅》却都被改为整齐对偶的了。现在举它们的前三回来看看:

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

第一回 :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第二回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贪贿说风情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计 西门庆茶房戏金

莲

崇祯刊本《金瓶梅》:

第一回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哥冷遇亲哥

嫂

第二回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子贪贿说风

情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

《金瓶梅词话》回目不工整的原因,是笑笑生创作这部作品时(嘉、万之间),当时的风气使作者没有把回目作成工整、对偶的形式,这时“拟话本”的作品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金瓶梅词话》在回目上,无意间给我们留下了时间的痕迹。

所以,从《金瓶梅》的回目演变上看,也可以推断出它产生的年代大约是在明代中叶前后,即嘉、万年间。

(四)清代昭_棣在他的《啸亭续录》中说:“《金瓶梅》……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麇杂其间,最属可笑,是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当然,笑笑生作《金瓶梅》不一定要参考“正史”之类的材料,但昭_棣所论却也给我们指示出一条道路;是否可以在地理沿革、官位、典章制度……上找出与时代有关材料,像吴晗先生就指出了“太仆寺马价银”、“皇木”、“女蕃子”等,由它们来估定《金瓶梅》的产生时代在万历年间。

上面我们根据了《金瓶梅》本身的材料,已知道它产生的大约年代后,也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它的思想内容了。

〔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西成

《金瓶梅》的巨大社会意义 ,在于揭露晚明时期建基于剥削制度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腐化生活 ,但这不是作者在这时期已具有了明确的阶级观点 ,而是由于作者“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 ,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幻想” ,因而可以“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从这个角度说 ,作者的世界观即使是反动的 ,但我们仍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时代的真实 ,这正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对于俄国人民一样。又如巴尔扎克在政治上尽管是一个保皇党 ,但由于他真实地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 ,因而“他就看出了仅能在当时找得着的真正的人物”(恩格斯 :《给哈克纳斯的信》)。《金瓶梅》的作者虽然没有提出阶级矛盾这一属于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 ,但他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生活反映出来 ,使人们看到他们腐朽堕落的本质 ,实质上就

是对这一阶级的否定。何况作者在作品中表现了鲜明的批判态度,指出封建社会的官场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如果说,指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正是反映了剥削制度的残酷,那么这个制度的崩溃亦就为期不远;作者虽不写农民力量,读者也可以从事件中看出他们将来的命运。恩格斯说:“作家不必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这话对我们理解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有巨大意义。

然而,仅仅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而不从典型形象的塑造和艺术情节的提炼上观察作品,也还是不能作为衡量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尺度,同时也就不能肯定它的社会作用。

《金瓶梅》的人物多至百人以上,有主子和奴才,有上司和下属,有光棍的恶相,也有帮闲者的嘴脸,其中除皇帝、宰相、巡按、御史这些人物外,作者主要刻画的是市井社会的一些人物,而这些人物又根据其各人的社会基础,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特点,因此能够绘声绘色,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作为豪绅恶霸的西门庆,一面具有一般封建地主所具有的尖刻和贪婪;一面又由于出身富商、自幼胡嫖浪荡,养成挥金如土的恶习。就是从这种性格中作者把封建豪绅和新兴的商业资本家所具有的不同特征统一在他身上,使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贪财好色的暴发者的面目。西门庆暴戾奸诈并不是他一人所有,而是豪门得势下一般权贵都有的共同特点,但他和权贵后裔的花子虚不同,因为后者是一个只会花钱而软弱无能的人。

鲁迅先生说:“奴才做了主人,比原来的主人更可

怕。’这话用来说明潘金莲、春梅这一类人是最恰当的话。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那些堕落成性然而又是凶狠的妇女的典型，她们虽是被玩弄的人，但完全离开了人民。她们的命运只有两条，一条是爬上去，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一条是掉下来，成为被摧残和被侮辱者。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残忍，刻薄，嫉妒，说谎，毒辣。……

潘金莲这类人是妇女中的魔鬼，在她们身上反映了属于原始性的人性毁灭。至于李瓶儿虽也属于堕落妇女这一型，但她是另外一类，她们是具有温顺性格的“房内任教夫九死，黄金私把赠情人”的贵族妇女典型。她身上表现的是阶级的没落情调，就因为这种原因她们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此外，羡慕豪华生活一时失足但毕竟是天性良善的妇女，这是西门庆家那些丫头媳妇，她们代表的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妇女命运。

《金瓶梅》中把帮闲抹嘴的那些人刻画得非常尽致，有时仅是轻轻的几笔，就将他们的嘴脸勾绘出来：

西门庆问道：“你吃了饭不曾？”伯爵不好说不曾吃，因说道：“哥你试猜！”西门庆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这等猜不着！”

又见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见李瓶儿出来上拜，恨不得生出几个口来夸奖奉承，说道：“我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盖世无双，休说德性温良，举止沉重，自这一表人物，普天下也寻不出来，那里有哥这样大福，俺们今日得见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个好处。”

这些人虽是插科打诨的人,但是同时又有奴才的骨头,他们一方面和下层人民有某种联系,一方面也为统治阶级效劳,有时也帮闲,是人类的渣滓,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既不重视又不离不了的人物。此外,也还有一种实质是帮凶,但却披着“慈善”的外衣的僧尼道姑,他们在明代晚期的社会,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常常来往于豪门巨室,专做些不见阳光的事。他们的特点是口是心非,面善心狠。《金瓶梅》的作者就撕下了他们的假面皮:

正在笑着,只见王姑子和薛姑子提了一个盒儿直闯进来,朝月娘打问讯,又向西门庆拜了拜……看官听说,原来这薛姑子不是自幼出家,少年曾嫁丈夫,在广成寺前卖蒸饼儿……与寺里的和尚行僧调嘴弄舌,眉来眼去,刮上了四五个……以后丈夫病死了,他因佛门情热,就做了姑子,专一在士大夫家来往,包揽经讖。

《金瓶梅》作者没有着重的塑造正面人物,但用“好男儿”的赞词歌颂了武松这一反封建的正义形象;同时对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给以同情,这我们只要看武大、迎儿以及秋菊的描写就可知道。

塑造在《金瓶梅》里的各色各样人物,形象是鲜明生动的,特别是几个主要人物,如潘金莲、李瓶儿、西门庆、庆伯爵等,不但是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同时为这些人物生活所安排的事件情节也是典型的事件情节,从“常时节得钞傲妻儿”这一事件看,西门庆表现的是对十二两银子的不以为意,而常时节妻子却表现了见钱眼开的那种庸

俗相，这就使事件的典型完全围绕了人物的地位、身分的典型性而有所不同。如果说重要的事件和情节是提供、揭示社会矛盾和人物关系的唯一前提，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意味着人物和环境的完全一致，那么《金瓶梅》里的环境描写也是典型的。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主要人物不是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也几乎找不到一个主要事件和情节不是为了人物的活动而产生，而所有这些又是那样的真实，即使是细节描写也都有着生活的必然逻辑，作者从洞察世情上写出了它们的真实。西门庆虽为豪门新贵，但只是一个市井无赖，因此在初到招宣府时，使我们感觉那个环境对他的陌生，因为招宣府虽然是没落的贵族，但毕竟还是“世代簪缨”，这就和西门庆那样的家庭有所不同。重视事物的差别，正等于重视人的性格一样，只有作者把社会中的诸关系和它们的交互作用放在一起考察时才能看出，而这又要凭着作者深刻的生活体验。

《金瓶梅》的全部艺术情节，是由西门庆的家庭的描写展开的，但它没有局限在一般生活的铺叙上，而是通过深刻细腻的人情洞察，复杂而又清晰的线条，描述了一个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整个社会的生活。从人物讲，上自皇帝、宰相，下达流氓、光棍，各色各样的人，出现在各色各样的事件中，而事件又互相交织着，影响着，事件扣紧人物而发展，人物又随着事件而变化，脉络清晰，形象突出，从一人引出一事，从一事引出另外的人；整个作品的结构是那么严密，情节演进又是那么自然，如果没有这些，更主要的人物刻画上的成功，就不会达到如此高度。

〔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希凡

《金瓶梅》在反映现实生活的逼真描写和情节的细腻上,确实是我国当时长篇小说的一种独创性的发展,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整个意图里,也包含着暴露和否定腐烂的封建社会的趋向。但是,从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与其说它是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整体,不如说,它的艺术形象的表现,却反映出作者是有意无意地在欣赏那些腐化、堕落和丑恶的事物。对于西门庆,没有疑问,在作者的主观上,是持着否定的看法。然而,在具体描写里,作者又被他的腐烂生活吸引住了,有时竟至忘了这个恶霸的狰狞面目,而站到他那里去了。作者在前半部书本来是袭用了《水浒》的章节,把他作为一个专门陷害别人的慳吝、狠毒的人物来刻画的。后来又“赞叹”起他的“仗义疏财,救人贫难”,而西门庆本人也忽然对于金银财宝产生了这样的观念:“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

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性格发展上的充分根据,实际上只是为了说明作家本人的一种人生观念,所谓“人生在世,荣华富贵,不能常守,有朝无常到来,恁地堆金积玉,出落空手福荫。”这种对于人物前后矛盾的态度,使作者经常陷入不断的混乱里。所谓“供恶霸蹂躏的妇女群像”,在作家的艺术的笔触里,也看不出同情和愤怒的火焰,他是那么津津有味地爱抚地描写她们的堕落的性生活。他没有“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有的只是由琐屑、重叠的生活细节连锁起来的庸俗和丑恶的现象。如果说,它的艺术形象的沉闷和道德的压力,也能在一部分读者中燃烧起愤怒的激情,那么,那不仅是它所反映的庸俗、丑恶和腐烂的生活,而且连这部作品一起,有时都令人憎恶。因为作家自己暴露这种丑恶的思想感情,也淹没在污秽的泥坑里,对于丑恶的腐烂生活,既缺乏明确的批判的态度,又在有意无意地美化它。所有这一切,都给《金瓶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缺陷,抵消了它在反映生活逼真描写上的意义。

〔标题为编者所加〕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郑振铎

《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为尤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她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浒》、《封神》诸作。她写的乃是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过的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宋、元话本

像《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等尚带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内。《金瓶梅》则将这些“传奇”成分完全驱出于书本之外。她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惟《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不夸张，也不过度的形容。像她这样的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在常生活（也许有点黑暗的，偏于性生活的）的，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俗语有云：“画鬼容易画人难。”以人为常见之物，不易得真，却最易为人找到错处；鬼则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任你如何写法，皆无人来质证，来找错儿。《西游》《封神》，画鬼的作品也，故易于见长。《金瓶梅》则画人之作也，入手既难，下手却又写得如此逼真，此其所以不仅独绝于这一个时代的小说界也！可惜作者也颇囿于当时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然即除净了那些性交的描写，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

《金瓶梅》的作者，不知其为谁。世因沈德符有“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语，遂定为王世贞所作。张竹坡作《第一奇书》批评，曾冠以《苦孝说》。顾公燮的《消夏闲记摘抄》也详记世贞撰作此书以毒害严世蕃，为父复仇事。然其实这些传说却未必是可信的。《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云：“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为今山东峄县，和书中之使用山东土白一点正相合。惜这个伟大作家笑笑生今已不知其为何许人。欣欣子和笑笑生为友辈，序上曾称引到丘濬、周静轩等而称他为“前代骚人”，又就其所引歌曲看来，皆可信其为万历

间,而非嘉靖间之所作。《金瓶梅》一出,便为文士们所赞赏。沈氏《野获编》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是此书在万历中方盛行于世。《金瓶梅》全书凡一百回。据沈德符言,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金瓶梅》的内容,只是取了《水浒传》的关于武松杀嫂故事为骨子而加以烘染与放大。当时,此故事也曾见之于剧场,像沈璟的《义侠记》所演的便是,可见其流传的范围甚广。作者虽取了这个人人都熟知的故事,然其描写的伎俩却高人不止一等。其结局也和《水浒传》不同。其中心人物为西门庆。像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必是一个实型。却说西门庆,清河人,本是一个破落户,后渐渐的发达,也挣得一官半职,以财势横行于乡里间。娶有一妻三妾,尚在外招花引柳。遇武大妻潘金莲,悦之。鸩其夫武大,纳她为妾。武大弟武松,为兄报仇,误杀李外传,刺配孟州。西门庆益横恣。又私李瓶儿,亦纳她为妾,得了她不少家财。瓶儿生一子,夭死。她自己不久亦亡。而庆因淫纵过度,也死。于是家人零落。金莲被逐居在外。恰遇武松赦归,为他所杀。庆妻吴月娘有遗腹子孝哥。金兵南侵,举家逃难。月娘在一佛寺中,梦到关于她家的因果报应,遂大悟。孝哥也出家为和尚。《金瓶梅》的特长,尤在描写市井人情及平常人的心理,费语不多,而活泼如见。其行文措语,可谓雄悍横恣之至。像第三十三回:

敬济喝毕 ,金莲才待叫春梅斟酒与他 ,忽有吴月娘从后边来。见奶子如意儿抱着官哥儿 ,在房门首石台基上坐。便说道 :“孩子才好些 ,你这狗肉又抱他在风里。还不抱进去 !”金莲问 :“是谁说话 ?”绣春回道 :“大娘来了。”敬济慌的拿钥匙往外走不迭。众人都下来迎接月娘。月娘便问 :“陈姐夫在这里做什么来 ?”金莲道 :“李大姐整治些菜 ,请俺娘坐坐。陈姐夫寻衣服 ,叫他进来喝一杯。姐姐 ,你请坐。好甜酒儿 ,你喝一杯。”月娘道 :“我不吃。后边他大妗子和杨姑娘要家去。我又记挂着孩子 ,径来看看。李大姐 ,你也不管 ,又教奶子抱他在风里坐着。前日刘婆子说他是惊寒 ,你还不好生看他 !”李瓶儿道 :“俺陪着姥姥吃酒 ,谁知贼臭肉三不知 ,抱他出去了。”

其他像第七回的写《杨姑娘气骂张四舅》,以及潘金莲、王婆的泼辣的口吻 ,应花子的帮闲随和的神情 ,都是化工之笔 ,至今尤活泼泼的浮现于我们的眼前的。

《金瓶梅》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一本 ,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词话》,沈德符所谓“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当冠有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题作甘公)之跋的《金瓶梅词话》,当最近于原本的面目。起于《景阳冈武松打虎》,并有吴月娘被掳于清风寨 ,矮脚虎王英强迫成亲 ,却幸遇宋江 ,说情得释的一段事。那都是后来诸本所无的。山东土白 ,也较他本为独多。崇祯版而附有黄子立、刘启先、洪国良诸人所刻插图的一本《金瓶梅》,大约是在武林所刻的 ,却面目大

异于《金瓶梅词话》。第一,每回的回目都对仗得很工整,不像《词话》之不仅不对仗,字数也有参差,像第二回的回目: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贪贿说风情

一为八字,一为七字。崇祯版则整齐得多了。第二,崇祯版为适合于南人的阅读计,除去了不少的山东土白,以此,减少不少的原作的神态。第三,崇祯版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始。武松打虎事,只是淡淡的说过。今所见的各本,像张竹坡评的《第一奇书》和其他坊本皆从崇祯本出。又有《真本金瓶梅》,删去秽褻,大加增改,更失原本的真相。

〔标题为编者所加〕

《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暴露小说

刘大杰

明代的长篇小说，故事内容，大都有本前人著作而加以改作的，如《三国》、《水浒》、《西游》、《封神》都是如此，《金瓶梅》亦然。所不同者，《金瓶梅》是借《水浒》中一段家庭故事，写成长篇巨著，反映出明代的市民生活和官商的荒淫，通过西门庆一家的丑恶生活，表现现实社会黑暗的面貌，是一部具有强烈暴露性的作品。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生平不可考，兰陵今属山东峄县，书中亦多山东方言，故作者之为山东人自无可疑。前人多传为王世贞作，此说起于沈德符之暗示，《野获编》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

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词置对？吾岂以刀椎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贗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劬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云。”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者：一、本书作者，是嘉靖时代大名士，至少是一位文人。书中偶有说话人的口气，那只是创作小说时摹拟话本形式的遗留。这种情形，明代的长短篇小说，大都如此。真能摆脱这种束缚，要到清代的《儒林外史》。二、补作吴语，斥其不当，可知作者必为北方人。三、袁宏道的《觴政》成于万历三十四年以前，则《金瓶梅》之成，是在嘉靖末年到万历中期。四、现在的《金瓶梅词话》本，上有万历丁巳（一六一七）年东吴弄珠客的序，可以说是现存的《金瓶梅》的最早的刊本，最近于原作的面目。因为《野获编》有成于嘉靖大名士手笔一句话，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谢颐序《金瓶梅》时，口吻就显得肯定多了：“《金瓶梅》一书传为凤洲（王世贞）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出凤洲手。然洋洋洒洒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另外一些记载中，还有种种离奇传说，也有说世贞父王忬之死，实出唐顺之的陷害，世贞决心报仇，乃以毒水印刷《金瓶梅》，欲毒死唐顺之、严世蕃。于是有什么苦孝说，什么《清明上河图》，都说得若有其事，这完全是一些牵强附会。鲁迅说：“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

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用鲁迅的话,来说明苦孝说之类产生的社会原因,是很恰当的。总之《金瓶梅》有它本身的价值,作者是否大名士,本已无关。创作的动机,是不是因为苦孝,更不重要。我们在没有考出作者真姓名之前,知道作者是山东峰县的笑笑生,其成书在万历年间,也就够了。

《金瓶梅》是一本含有毒素的书,对于青年尤为有害。但作为小说来说,它又具有暴露性的特点。作者以善于描写的文笔,将明末那种荒淫放纵、腐败黑暗的社会面貌,将有钱有势的糜烂腐朽的官绅阶级和那卖儿鬻女的贫苦阶级的生活形态作了深刻的揭露;同时将明代商业经济发达和市民的意识形态,也作了一定的反映。他所写的,虽只是一个暴发户的家庭,几个妻妾的生活,但围绕这个家庭和妻妾的四周,当时社会上的各种肮脏和罪恶,生动地展开在读者的眼前,范围是很广泛的。书中从《水浒》中取出西门庆、潘金莲的关系以及武松杀嫂一段故事,演成一百回的长篇。作者的目的是用全力来写一个暴发户的历史,写他的成长、发迹、腐烂与灭亡。这个暴发户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第二回)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破落户变成了暴发户,暴发户变成了西门大官人,他一面交结地方官吏,榨取民间的血汗,一面奴颜婢膝地结纳京官,步步爬升,果然由理刑副

千户做到正千户提刑官。在这过程中,不知隐藏着多少人的生命、财产、眼泪与贞操。他乘着自己的财势,专干那些拐骗奸淫的勾当,抢夺寡妇的财产,诱骗朋友的妻子,霸占民间的少女,谋害人家的丈夫,总而言之,社会最黑暗最可怕的犯罪行为,他都做到,因为他与上下官府交结得好,无论做了什么坏事,反而升官发财,行所无事。他既是有钱有势,自然有一些朋友一些爪牙替他帮闲跑腿。他有九个好朋友:头一个唤应伯爵,是个泼落户出身,一份儿家财都败没了,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闲贴食,在院中顽耍,诨名叫应花子。第二个姓谢名希大,乃清河卫千户官儿,自幼儿没了父母,游手好闲,善能踢的好气毬,又且赌博,把前程丢了,如今做帮闲的。第三名唤吴典恩,乃本县阴阳生,因事革退,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以此与西门庆来往。第四名孙天化,绰号孙寡嘴,年纪五十余岁,专在院中闯寡门,与小娘传书寄柬,勾引子弟,讨风流钱过日子。……连西门庆共十个,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他做了大哥,每月轮流会茶摆酒。(十一回)这全是一群恶霸流氓的大结合。一天到晚,捧着他到妓院去饮酒作乐,帮他去糟蹋妇女。有许多女人,开始为他的甜言蜜语、财富外貌所惑,谁知一进门,他便换了魔王一样的恶毒面孔。高兴时,什么淫邪下流的话都说得出,发起脾气来,什么残忍毒辣的手段都会使出来,孙雪娥、潘金莲都挨过他的皮鞭。蒋竹山说他是“把揽说事,举放私债,家中挑贩人口,家中不算丫头,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趟棍儿,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领出卖了,真是打老婆的班头,炕妇女的领袖。(十七回)但他最后因纵欲过甚,结果也因此而送了性命。这个恶棍的一生就此告一结束。

那些妾婢,死的死,走的走,改嫁的改嫁,所谓树倒猢猻散,真是不过几日,又成了一世界。那些帮闲的朋友们,看摇钱树倒了,自然不免伤心一番,共凑了七钱银子,买了果品香烛,致祭于西门庆之灵前:“……受恩小子,尝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以一疾不起之殃,见今你便长伸着脚子去了,丢下小子如班鸠跌弹,倚靠何方?难上他烟花之寨,难靠他八字红墙。再不得同席而偎软玉,再不得并马而傍温香。撇的人垂头跌脚,闪得人囊温郎当……”这不能不说是一篇绝妙的祭文。在满纸胡扯中,画出了这一批狐群狗党的无耻面目。西门庆在《金瓶梅》这部书里是死了,但在旧社会中并没有死;不仅他,凡围绕着他的那些人物,都没有死。尤其在旧时代的一些大都市里,不知有多少个西门庆,有多少个王婆、薛嫂儿、杨姑娘、张四舅和那些应花子、孙寡嘴一类的帮闲朋友。《金瓶梅》的价值,便在于它能够把那一个黑暗社会的真实内形描绘出来给我们看。它写出了流氓市侩的本质和典型,写出了各种妇女在受侮弄受折磨中不同的心理状态,写出了在官僚商人互相勾结的残酷剥削下,许多人家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的社会现实。我们千万不要想到这只写西门庆一人,这只写西门庆一家,其实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东吴弄珠客序云:“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这些类型的人物,无论他们的性情、语言、态度,作者都能刻划入微,语言艺术的圆熟流利,精巧细致,超过了他的前辈,使《金瓶梅》在写人技巧上,得到高度的成就。鲁迅云:“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

或刻露而尽相 ,或幽伏而含讥 ,或一时并写两面 ,使之相形 ,变幻之情 ,随在显见 ,同时说部 ,无以上之 ,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 ,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 ,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 ,为 搢 绅 ,不惟交通权贵 ,即士类亦与周旋 ,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 ,加以笔伐而已。(《中国小说史略》)对《金瓶梅》的批评 ,是很全面的。

但必须指出《金瓶梅》虽是暴露了社会的黑暗现实 ,刻划了人物的生动形象 ,在描写技巧上是具有特点的 ,但从总的精神来说 ,它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

一、凡是现实主义或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 ,不管它如何批判现实 ,作品中总包含着理想和希望。《金瓶梅》并非如此 ,它缺少这个重要的因素。在全书中充满了冷酷和绝望 ,人没有理想 ,社会也没有前途 ,而最后指出来的只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 ,因而使全书呈现出绝望的情调。

二、在取材方面 精芜不分。有许多并不重要的并非本质的材料 ,都放在作品里 ;不必要的描写 ,却费了大量的笔墨。尤其是露骨的描绘性生活 ,使这部作品 ,失去了艺术应有的美质和高尚的情操。

三、由于《金瓶梅》在性欲上作了过于夸张的不真实的秽褻的描写 ,使读者容易忽略书中的暴露意义 ,而容易使读者受到它不健康一面的影响 ,形成《金瓶梅》艺术性与道德性的不能调和的矛盾 ,不仅失去了它的社会教育的作用 ,并且带来了毒害读者心灵的作用。《金瓶梅》虽有它的艺术价值 ,但只是一本自然主义的作品。《金瓶梅》所以如此 ,也是时代的影响。因为淫风之盛 ,明代为

最。成化时，方士们如李孜、僧继晓之徒，俱以献方药致贵，嘉靖时道士陶仲文献红丸得宠，官至礼部尚书；其他如方士邵元节、王金之流，俱以献此得幸。此风散播，流传日盛，进士儒生，亦步释道后尘，如盛端明辈，因献秘药大贵。因此官场中遂竭智尽力，锻炼寻求，到了晚明，此风日炽。于是士子不以谈淫词为羞，作者不以写性欲为耻。戏曲、歌谣，争鸣淫艳，丹青画笔，竞写春情。《金瓶梅》正产生于此时，自亦难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明中叶方士文臣以献方药得幸之影响于小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再如《绣榻野史》、《闲情别传》、《浪史》、《宜春香质》一类的淫书，那就更要淫秽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说：“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就是指的这类书。

〔标题为编者所加〕

《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都无可查考。不过,从《金瓶梅》里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有是山东人的极大可能,兰陵正是山东峄县的古称;作者异常熟悉北京的风物人情,许多描叙很像是以北京做为背景;作者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才能,而且详知当时流行在城市中的各种文学形式和作品,如戏剧、小说、宝卷和民间歌曲之类。这就是我们所能推测的有关作者的一些情况。

《金瓶梅》的现存的版本可以归为两个系统:一是卷首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系统,一是明天启间(1621—1627)的《原本金瓶梅》系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1522—1566)的“大名士”,这种对于作者和写作时期的说法一定有所根据,因为时间距离很近。《金瓶梅》大约是在隆

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年(1568—1602)之间写成的。

《金瓶梅》主要写西门庆的罪恶生活历史和他的污秽家庭情况。西门庆本来只是一座生药铺的东家,但是由于他的恶霸行径、剥削方式,结纳党羽,串通官吏,一跃而为财富势强的土豪劣绅。从这个起点,他便进一步和当时朝廷显要蔡京扳上义父子的关系,做了本县提刑千户,得以贪赃枉法,溺案徇情,鱼肉乡里,欺压善良,并且过着极度荒淫无耻的纵欲生活。

在《金瓶梅》整个作品里充溢着相当强烈的现实气息,这主要是它对于当时社会作了暴露。作者通过西门庆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在社会上活动的脉络,描写了上自宫廷间皇帝身边的为非作歹的宦官和朝廷上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在市井间招摇撞骗、蛮横狡诈的帮闲篾片和地痞流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些人物的卑鄙行为和罪恶活动,作者细致地勾勒出来一幅阴森残酷的鬼域世界的轮廓。这样的鬼域世界正是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特点,亦即正德以后至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况。

作者能够成功地通过对于一个综合几种身分的人物和行动的刻画,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人民的罪行,通过对于一个巧取豪夺以发家致富,因而肆求声色犬马之娱的典型人物的家庭丑史的暴露,揭穿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而龌龊的面貌。这就使得读者对于当时的社会构成这样的印象:它必将走向覆灭的道路。作者同时也能够相当大胆地对于那个社会的疮疤进行毫无保留的揭露,把只是建筑在金钱和势力上的人与人的不正常的关系血淋淋地刻画出来,把放纵情欲、追逐淫乐、在道德品质上面极端败坏堕落的现象赤裸裸

地描绘出来；一方面从日常的生活细节里记录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从人物的利害关系中也记录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而这样的无所顾虑和毫不隐晦的记录又都集中于暴露那个特定时代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多少接触到一些本质问题。这种暴露和揭发对于读者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启发作用。

由于题材的关系，《金瓶梅》作者描写了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和市井无赖。帮闲篾片如应伯爵和谢希大，泼皮无赖如张胜和刘二，男奴女婢如来旺和秋菊，倡妓优伶如李桂姐和王经，以至于太监、门官、僧侣、尼姑、道士、媒婆，形形色色的在城市里寄生和活动的这一类人物都生动活泼地走进作品里来。把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在作品里写得如此详赡辽阔，是作者的突出的贡献。

作者在塑造具体的人物形象上，也成功地创造出来一些有血有肉的典型性格。以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和应伯爵来说，他们的形象都很鲜明，有个性。西门庆的手眼通天，横行乡里，不择手段的聚敛，不顾死活的放纵，是和他的亦官亦商的恶霸土豪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分不开的，作者给他画出一个总的轮廓，同时许多细碎的关目上又加以渲染烘托，因而写得相当丰满。潘金莲的性格刻画远远超过了《水浒传》的描写，这个忘掉自己阶级出身而安于奴才生活的妇女的性格极为错综复杂，强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在支配着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她狠毒凶残，但又谄媚恭顺；她嫉妒刻薄，但又心直口快，作者写了她的乖巧狡猾，可是也告诉读者她是愚蠢的，使读者感觉到这个人的成长和毁灭是当时

黑暗罪恶的社会所造成的悲惨结果,因而她的形象就不仅局限于一个妇女,而是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其余如陈经济的封建官僚纨绔子弟形象和应伯爵的市井无赖和帮闲者形象,都很真实,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也是《金瓶梅》在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的成绩之一,而且对于在它之后产生的章回小说起着很大的影响。作者致意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并且能够尽量利用这种手法来把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塑造得生动而真实,来把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刻画得细腻而具体。《金瓶梅》的作者所以能够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上得到如此的成就,这固然是由于他的观察能力较强、写作技巧较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熟悉那个社会环境,对于那种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了解。

就语言来讲,作者很有通过语言以表现人物性格的才能,使得人物性格的区别程度非常显著。作者的语言风格爽朗而泼辣,证明他对于当时人民的生活语言极为熟悉,并且善于提炼和加工。

《金瓶梅》这部书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着严重的缺点。尽管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做了无情而大胆的暴露,但是他并不完全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去向荒淫无耻的黑暗氛围进行冲击。不可否认地,作者在某些片段中,如蕙莲的惨死,秋菊的受难,孙雪娥的冤狱以及陈经济的下场,还是表现出来一定程度的爱憎的,然而在整个作品里很少找到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健康的面影和积极的、向上的思想。作者对于糜烂而腐朽的生活和丑恶而肮脏的人物显然是采取了欣赏的态度,甚至使人嗅到作者对于这些有着相当浓厚感情的气味。作者的笔力是健旺而强悍的,

然而他所做的汪洋放肆无所遮拦的叙述和描写则不少是引导读者走向邪恶道路去的东西。从《金瓶梅》的作者所暴露的思想意识看来，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的，他对于被剥削被侮辱的人很少表示同情，他对于压迫者和凌辱者也很少表示憎恨。作者对于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横被作践的妇女，时常加以嘲弄，这都足以说明他所向往和歆羡的东西如果不是他所追求而还没有得到满足的目标，那么就是在他历尽沧桑之后，认为都不过是些虚无空幻的作态。因此，作者很可能是一个失意的封建士大夫。

在人物的塑造上，正如前面所说，作者有他的成功之处，但是作者笔下的人物的概括性大部分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而且有的人物性格还前后矛盾。李瓶儿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是凶悍而狠毒的，但是在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之后却变得善良和懦弱起来，性格前后判若两人，而又丝毫看不出她的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庞春梅在西门庆家里和潘金莲是狼狈为奸的，她刁钻精灵，媚上而娇下，是一个奴才气十足的形象；然而在她被卖给守备周秀为第三妾、又因生子金哥扶正为夫人之后，她在气质上的改变竟恂恂若当时封建贵族妇女，也是很真实，缺乏生活逻辑和必然过程的。

必须指出，在关于性的描写上，以大量的篇幅，几乎是在可以有机会安排这类描写的地方，就不惜尽情发泄，极力渲染，作者是始作俑者；这正好说明作者的思想庸俗，趣味低级。这是由他的阶级出身所决定的，同时又受到当时恶劣的社会风气的影响。

〔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二辑

李开先有一个失传的院本《乔坐衙》，当也是根据《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敷衍而成。乙、《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及其悲惨结局，《金瓶梅》、《宝剑记》则把视线转移到另一面。

徐朔方

我在六十年代初发现《金瓶梅》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采用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第五十出,当时曾写了一篇短文,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发表。后来,因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看到朱星的《金瓶梅考证》连载,才把旧作修改成《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今年秋,应邀来普林斯顿访问,有机会读到韩南教授(李朝)的旧作《金瓶梅探源》。现在我乐于利用韩南教授和柯丽德(李朝)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我的论据之一。韩南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声明,他不认为小说多次引用《宝剑记》和小说作者问题有任何联系。如果由此造成错误,那当然和他无关,只能由本文负责。下面是《金瓶梅》引用《宝剑记》的主要段落。

(一)第六十一回“我做太医姓赵”起十八句七言,见《宝剑记》第二十八出;

(二)第六十七回《驻马听》“寒夜无

茶”、“四野彤霞”二曲，见第三十三出；

(三)第六十八回“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哄了些小门闺怨女，念了些大户动情妻……姻缘成好事，到此会佳期”，见第五十一出；

(四)第六十八回“佛会僧尼是一家，法轮常转度龙华。此物只好图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宝剑记》第五十一出作“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

(五)第七十回“官居一品”起大段描写，见第三出韵白；

(六)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见第五十出；

(七)第七十四回“盖闻法初不灭”至“空手荒田望有秋”一大段原是第四十一出的韵白；同一回“百岁光阴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飞灰。谁人肯向生前悟，悟却无生归去来”；“人命无常呼吸间，眼观红日坠西山。宝山历尽空回首，一失人身万劫难”，见同一出《诵子》，但前后四句顺序颠倒；同一回《一封书》曲(“生和死两下”)见同一出；

(八)第七十九回“命犯灾星必主低，身轻煞重有灾危。时日若逢真太岁，就是神仙也皱眉”以及“我梦见大厦将倾”至“造物已定，神鬼莫移”一段及“卦里阴阳仔细寻，无端闲事莫闲(萦)心。平生作善天加庆，心不欺贫祸不侵”，见第十出，两者都是作品中的人物求人算命圆梦，情节相似；

(九)第九十二回陈经济妻自缢身死被发现的一小段描写和《宝剑记》第四十五出林冲妻的情况相似。

《金瓶梅》引用《宝剑记》次数之多、文字之长，而又避而不提它的剧名和作者姓名。《宝剑记》不是古代名家作品，这几个片段也不是剧中的精彩折子。这同一般的摹

拟引用显然不同。

李开先《词谑》评论各家套曲，全折引录，不加贬语的元人杂剧只有十余套，其中就有小说第四十一、七十一回分别全文引录的《两世姻缘》和《龙虎风云会》的第三折，而这两套通常并不认为是元曲的最佳作品。

前文指出《金瓶梅》洋洋七八十万字，论及戏曲演唱的片段约占全部回目的三分之一，第三十六回甚至提及“苏州戏子”而没有一次提及昆曲，令人惊异的是李开先在《词谑·词乐》中记载昆曲唱腔的著名改革家魏良辅以及他的简况：“太仓魏上泉(良辅)”等“皆长于歌而劣于弹”；“魏良辅兼能医”，同样没有一个字提及昆曲。

上述情况和本文从小说的其它内证所推论的小说写定者的时代和籍贯不谋而合。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金瓶梅》的写定者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只有他本人或他在戏曲评论和实践上的志同道合的追随者，他们可能是友人，或一方是后辈或私淑弟子，才能符合上述情况。

李开先，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曾先后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勋司员外、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嘉靖二十年(1541)四十岁时罢官回家。长期阅历使他对官场内幕有深刻了解。他是传奇《宝剑记》、《断发记》(今存)和《登坛记》(未见)的作者，又是《市井艳词》(仅存个别几首)及带有市井趣味的《打哑禅》、《园林午梦》(以上两种今存)、《搅道场》、《乔坐衙》、《昏厮迷》、《三枝花大闹土地堂》(以上四种今佚)等六种院本的作者和改编整理者。路工辑校的《李开先集》中收有散曲很多，包括哀悼亡妻和殇子的作品在内。他的《诗禅》、《词谑》都流露了作者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

极深的爱好和修养。李开先被称为“嘉靖八子”之一。同沈德符《野获编》记载的小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的说法不谋而合。

以《金瓶梅》同《宝剑记》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的相同之处。甲、它们都是水浒故事的改编。李开先有一个失传的院本《乔坐衙》,当也是根据《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敷衍而成。乙、《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及其悲惨结局,《金瓶梅》、《宝剑记》则把视线转移到另一面。《宝剑记》写的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林冲变成宋代隐逸诗人林和靖的玄孙,成都太守的儿子,下凡的武曲星。他投军征讨方腊,官拜征西统制。因谏阻童贯封王,谪为巡边总旗。后来经张叔夜举荐,做上禁军教师,提辖军务。以上是戏曲开场前林冲身世的补叙。在第六出,林冲又上章弹劾童贯、高俅欺君误国,受到进一步迫害。戏曲提到的其他水浒英雄也都做官了。鲁智深也是官场失意才出家做和尚。公孙胜以参军做钦差,不愿带兵追捕林冲,逃往中条山出家。总之,林冲等人同农民起义有关的故事情节在戏曲中尽量删削、压缩,另外却以许多新编的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的故事情节作为替代。《金瓶梅》则在水浒故事中选取同农民起义最少有关系的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为题材。同时,又把西门庆处理为奸相蔡京的义子,对上层统治集团作了相当的揭露。《宝剑记》同《金瓶梅》的改编都添加了对因果报应及封建道德的说教,而这些是原来水浒故事所没有的。《宝剑记》中林冲和他的妻子由于天神托梦而被救,林冲的忠君同他妻子的贞节被大事渲染,以致他的身上很少还有水浒英雄的气味。如上所述,《宝剑记》、《金瓶梅》对水浒故事的改编在思想倾向上颇有近似之处。丙、《金瓶梅》欣欣

子序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能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李开先的同乡姜大成《宝剑记后序》说：“予曰：此乃所以为中麓（李开先）也。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奚不可也。如不我然，当会中麓而问之。问之不答，遂书之以俟知其心者。”这两篇都是作者友人的代言。用意何其相似。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笑笑生”究竟是谁呢？我认为是屠隆。

首先是因为屠隆确实用过“笑笑先生”（生即先生）的化名。明末有一部笑话及其游戏文字集，叫做《开卷一笑》，亦称《山中一夕话》。此书卷一题“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后面又改题为“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这种在同一部书的不同卷下更易署名的做法在明清两代是经常看到的，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化名。据此，可以推定一衲道人屠隆与笑笑先生是一个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中有四篇文字署一衲道人所作：卷四的《醒迷论》、卷五的《别头巾文》、《励世篇》及卷六的《秋蝉吟》。其中《别头巾文》包括《哀头巾》一诗和《祭头巾》一文，同时出现于《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其余三篇，既和屠隆的思想特点一致，又与《金瓶梅词话》所反映的思想合拍，甚至语句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使我们

在屠隆与笑笑生之间找到了直接的联系。沿此方向再进一步考察屠隆的生平,就更会深深地感到屠隆比谁都更像《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了。

屠隆,明末颇有声名的文学家。他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创作小说之时,正值五十鼎盛之年,在时间上正相合拍。

屠隆是浙江鄞县人,祖上曾居常州武进,而武进古亦称兰陵。他于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在安徽颖上任县令,晋礼部主事,万历十二年(1584)罢官归里,领略过北方的风土人情,但主要生活在家乡,活动在江浙一带。这样,以山东为背景的《金瓶梅词话》尽管采用了大量的北方方言和力求描绘山东的习俗,但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南方的方言和习尚来,也就毫不奇怪了。

屠隆罢官的原因,表面是被讪与西宁侯淫纵,以及诗酒放浪,但实际上也与当时“争国本”的政治漩涡有关(参见《明神宗与金瓶梅》)。万历十年,他曾写了一篇《贺皇子诞生》,鼓吹“英哲诞生”就使“国本系苞桑之固”;“宗祧奠盘石之安”,还规谏皇上今后要“圣谟益慎,立教以淑”。殊不知皇上对这个皇子压根儿不喜欢,并不把他视作“国本”,一心想废长立幼。屠隆的祝贺只能给皇帝带来隐恨。他后来也自知祸之由来,所以对长期纷争的建储问题一直很关心,这也就给《金瓶梅词话》带来了政治讽谕的意味。

屠隆被罢官,使他的生命航船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从此,他又穷困潦倒,饱尝了人世的炎凉;他看透了人生,对整个社会感到了失望;他寻求解脱,企图在佛道中找到出路;他心情苦闷,却更加纵情于诗酒声色。他说:

当不谷盛时 ,荣名被身 ,进贤加首 ,人望须眉 ,家拾咳唾 ,扫门而怀刺者争号登龙 ,把臂而论交者动引管鲍。一旦遭谗去国 ,身名两摧 ,生平心知 ,平怀观望 ,……炎凉聚散 ,朝暮迥若两人 ,何论齷齪者夫 !即号称当世之有道石交 ,顿改面孔。(《答李玄白》)

一部《金瓶梅》不是大讲“炎凉聚散”吗？势利小人应伯爵、吴典恩等又写得何等栩栩如生！这不是与屠隆的切身感受大有关系吗？

贫困不但使屠隆“势力炎凉太分明”，而且进一步使他对整个士大夫和社会政治感到了失望和产生了不满。他说：“今之士大夫，不通贫贱而好接贵人，不尚清言而好涉尘务，……外简将□，而内多嗜欲。”（《与王百谷》）世道自江陵以鸷猛束湿之政，酿为厉阶刻削之气，急弦绞绳，有识忧之。至今日，水旱沓仍，疫疠继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岁益甚，吴越之间，赤地千里，丧事四出，苍哭不绝。（《奉杨太宰书》）在这思想基础上，他专门写了《荒政考》，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统治集团，对苦难的人民深表同情：

夫岁胡以灾也？非王事不修，时有阙政，皇天示谴，降此大眚！……若水旱为灾，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姓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_副草根，剥树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百姓之灾伤困厄至此，为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视而不为之所哉！

《金瓶梅词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形象的《荒政考》。只有对当时的社会不满和批判的作家，才能写出那样一部“骂尽诸色”的长篇暴露小说来。

个人的不幸，社会的黑暗，很自然地使屠隆潜心佛道。他说自己于罢官后“万念俱空，一丝不挂，闲中无以自娱，稍三教理参订和合。”（《与王敬美太常》）当然，屠隆作为一个文人才士，在不得已的处境中学道学佛，只是寻求一种“清虚恬淡”的解脱，而不可能真正“信奉仙释，持戒守律”的。然而，学仙学释毕竟对他带来了影响，使他能比较熟悉佛道的一套，包括其弊端，以致能在小说《金瓶梅词话》、戏曲《修文记》、《昙花记》，及其他文字中得到尽情的描写。同时，那种因果轮回、祸福循环、盛衰消长、独善养拙等思想也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左右了《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主旨。

《金瓶梅词话》的“写淫”非常突出，这与屠隆的特殊的情欲观也大有联系。屠隆为人“佻荡不检”；“放诞风流”，人们告发他时曾“指屠淫纵，并及屠帷薄，至云日中为市，交易而还。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诸语”。（《野获编》）罢官后“此情也复不减”。他承认自己的男女之欲是难以克服的：“（某）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乃知其根固在也。……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与李观察》）这篇文章就反复详细地论述了他既想“治欲”而又觉得欲根难除的矛盾。这也正如《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的“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的矛盾。这种观点也就使小说尽管一方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但往往对此还是不自觉地流露了赞赏的口吻。屠隆不但有如此特殊的情欲

观,而且对文学作品要不要写淫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其《鸿苞·诗选》中指出,文学作品为了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是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陈”,而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的。这些认识也应该说是产生《金瓶梅》的一个特殊的思想基础。

此外,如屠隆熟悉戏曲、小说,乃至如《开卷一笑》之类民间游戏文字,具有“落笔数千言立就”的杰出的文学才能,他出身寒微,而又官至礼部仪制司主事的特殊经历和胸罗广博的社会知识,以及与最初家藏《金瓶梅》的刘承禧的关系非同一般等情况看来,完全和《金瓶梅词话》作者的身分相符节。因此,我认为屠隆即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笑笑生。

当然,此说能否成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编集《开卷一笑》的“笑笑先生”是否为屠隆?是否有后人伪托的可能?屠隆的《别头巾文》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这一回是否是“贗作”?屠隆的亲朋好友如屠本峻等在谈到《金瓶梅》时为何都没有提及?如此等等,我想,通过大家的讨论切磋,总有一天能将《金瓶梅》作者的谜底解开。

张远芬

创作于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的《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百回长篇世情小说，人称“天下第一奇书”。

古今中外的每一部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暗暗纳入的“密码”，诸如人物影射、哲学意念、爱憎隐衷，谐音别义等等。这往往就成了后世考证家和评论家殚精竭虑加以破解的谜团。大概是《金瓶梅》中这种密码式的谜团最多的缘故；“第一奇书”的桂冠才落到了它的头上。

初看起来《金瓶梅》的命名，是从书中重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人的姓名里各取一字，撮合而成。但若再深一步索解，便会发现，金即财，瓶喻酒，梅指色。这与《金瓶梅》全书开头谈酒、色、财、气的四首词的含义恰恰相合。那么，金、瓶、梅三字是否仅有这两个密码呢？不是。其中的谜团还多。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

陵是山东峄县的古称。我在拙著《金瓶梅新证》中,论证了兰陵笑笑生就是山东峄县的文学家贾三近。不料,这竟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争论。其实,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是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整整四百年了。四百年间,除去我的“贾三近说”之外,还有:绍兴老儒说(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金吾戚里门客说(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嘉靖大名士说(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王世贞说(宋起凤《稗说》卷三)、李笠翁说(《第一奇书》在兹堂刊本)、李贽说(王晁《金瓶梅考证》)等等,多达二十几说,并且新说还在出现。一部小说的作者之谜,使四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兴趣求索不已,这正间接地显现了《金瓶梅》本身的诱人魅力和不朽价值。一本书的作者竟有二十几种歧见,这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最令人心惊目眩的奇观。我想,兰陵笑笑生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金瓶梅》的故事,假托宋代,反映的却是明代生活。全书的内容,是在《水浒传》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的框架里,增加了许多人物,铺排了大量情节,充实演化而来的。

《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的罪恶生活历史和他的污秽家庭情况。同时,作者还通过西门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社会上活动的脉络,广阔地展示了上自宫廷间皇帝身边的为非作歹的宦官和擅权专政的太监,下至在市井上招摇撞骗、蛮横狡诈的帮闲篋片和地痞流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原始的肉欲和物欲的支配下,疯狂地戕人害己的非理性的精神状态,从而无情地撕去了蒙在那个社会表面的伪善的面纱,深刻而全面地暴露了那个社会的罪恶与黑暗。《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巨著。

然而《金瓶梅》的命运却悲惨至极。明清时代屡遭禁毁,民国肇元亦复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彻底扼杀。在中国被视为十恶不赦,在法国也被禁止了将近十年。这种古今同骂、中外共愤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绝少见的。

有人认为,《金瓶梅》是秽书之祖,淫书之尤,倘谁读之,便足以毁掉父兄师长的累年教育,诚为民族的大劫(叶小凤语)。又有人认为,作者唯恐世人不淫乱,因而想用这部书诱使一切人皆变为野兽(冥飞语)。但也有人谓为奇书,视若珍宝,曰:读者若能高一层着眼,深一层有心,远一层设想,则能认识到《金瓶梅》非但不是诲淫导淫之书,而且是戒淫惩淫之书,且是一最佳最美之小说(梦生语)。论曰: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正所谓淫者见之谓之淫,文者见之谓之文。亦即书不淫,人自淫也(文龙语)。我们认为,血气未定的青年,无知无识的男女,自不必让他们去读《金瓶梅》。而学识阅历臻至成熟的人,若能心平气和细玩其通篇文理,索解其言外命意,定能在许多问题上大彻大悟,从而对社会、人生、哲学、历史等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所以《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而是抒发作者同情和哀叹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不幸命运的书,是表达作者痛恨和仇视富人淫恶,友道衰微、谗佞为祸、仕途黑暗等社会罪恶的书。

关于《金瓶梅》的艺术价值,人们的认识也是天地悬隔的。少数人认为,布局支离破碎,又无章法可言,殊无价值。但多数论者评曰《金瓶梅》的作者心细才大,能独出机杼,独创一格,触类抒写,淋漓尽致,摹绘人物,口吻逼真,是旷世不一见的异样妙文。所以,邓狂言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胸中抹杀一切才子佳人,而仍有一《水

水浒传》、《金瓶梅》为其所不敢轻视。以至“深得《金瓶梅》壶奥”，使《红楼梦》无一不自《金瓶梅》一书脱胎换骨而来。亦即是说，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由此可见《金瓶梅》的文学成就以及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么惊人了。

清代人张竹坡，评论《金瓶梅》，自成一家，所论虽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但烛幽照微，透视肌理，往往有独到之见。他认为《金瓶梅》中无论是人是事皆有寓意，也就是我在上文所说的《金瓶梅》中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密码”。以人物姓名而论，胡僧，道坚寓男性生殖器，一望便知，聂（捏）两湖（壶）尚（上）小塘，又进而喻指男女交合，也属可解。可是，蔡一泉、尚两泉、王三泉、西门四泉，加在一起变为侯石（十）泉，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需要读者费些脑筋了。以地名而论，《水浒》中武松打虎，武大毁命，皆在阳谷县，到了《金瓶梅》中，却改成了清河县。对此《金》学研究者们均感到大惑不解。我认为，清河是“海清河晏”的略语，因而清河既不是阳谷县，也不是清河县，而指作者所处的整个明代晚期社会。而且，明明是豺狼当道，书中却偏偏隐说海清河晏，作者的揶揄愤激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了。以情节而论，古诗有“玉楼人醉杏花天”的句子，所以孟玉楼寓杏，亦即幸也。先嫁在杨家，杏花自然不能开在杨树上，丈夫死了，这是不幸。继之遇到薛（雪）嫂说合，转嫁西门，则更加不幸。西门庆死后，遇到陶（桃）妈妈，又嫁给李衙内，且李贵随之，李安依之。这样才桃李杏亲切为伍，既贵且安，终至于幸也。读者在阅读《金瓶梅》时，切不可只从表面字句上去理解。细微深刻地去体味作者的言外之意，方能真解其意。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

张 兵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聚讼纷纭近四百年之久，迄今仍无定论。

《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因此书丰富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日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因此学者们对于探索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着很大的兴趣。

从现有的各种材料记载来看，晚明时期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由于这些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乃“出于嘉靖间大名士之手”的话，而研究者们一时又找不出更为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种推测性论断的不可靠性，因此，尚能迷惑一些人。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

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贗品，为唐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蕃投其所好。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蕃即中毒而亡。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一九三二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由于这一新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率先对上述旧说提出质疑。该文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翔实的史料作依据，剖析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根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庭的关系，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非献假图受害，严世蕃亦非中毒身亡的结论，这就有力地否定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和“苦孝说”，也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是“山东方言”这一点来看，认为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要像当地土著一样使用方言写出如此巨著是不可能的。他明确提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卅年的作品，作者绝不可能是所谓的“嘉靖间大名士”。时隔不久，有不少研究者撰文支持吴晗的观点。例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发表《王世贞未作金瓶梅之确证》，说：“《金瓶梅》叙宋代之事俱不得

要领，与王世贞‘博雅’的史学修养存在矛盾。”赵景深也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峰县人。这样王世贞非《金瓶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已成为定论。然而，“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六说：

王世贞说。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李开先说。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身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就会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这个写定者是李开先。

贾三近说。有的研究者从新发现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中，纠正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两处错误，从而也否定了王世贞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以前有关《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即山东峄县）。《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笑笑生”，是峄县人无疑，而此“笑笑生”是贾三近。因为在嘉、万年间贾三

近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笔名和《金瓶梅》全书所反映的内容较为相符。贾三近所作《左掖漫录》当是《金瓶梅》的原稿。

“吴侬”说。所谓“吴侬”，是“生长在吴语地区，或是受吴语影响较深的人”的昵称。有的研究者从《金瓶梅》书中多次运用吴语词汇这一点来证明“改定此书的作者当为一吴侬”，并不一定是山东人。还有人曾将《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两书进行对照，从作者所用的方言中发现了许多疑问。特别是作者对山东的地理知识，“似乎十分模糊”，说是“山东人”的可能性不大。

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有的研究者从明人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源流及书中保留的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认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民间艺人参加的、经过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词话》以前，应该有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写为《金瓶梅词话》，虽保留了词话的名称，实际上是普通小说。

屠隆说。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定非“嘉靖间大名士”。从《金瓶梅》的内容来看，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京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游戏文字”的人。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在《开卷一笑》中曾用过“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当为“笑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的书斋是“婆罗馆”，正是取名于武进的古巷。从屠隆的籍贯和生活习尚看，符合著《金瓶梅》的作者条件，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

风发之时 ,被讪与西宁侯纵淫而罢官 ,使他看到世态的艰险 ,同时更纵情于诗酒声色。这种遭遇和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 ,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屠隆对人欲的看法是“ 既想治欲 ,又觉得欲根难除 ” ,这与《金瓶梅》既“ 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 ” ,又“ 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 ”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可以“ 善恶并采 ,淫雅杂存 ” ,不必对“ 淫 ”的描写躲躲闪闪。这些都是产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础。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 四大奇书 ”之一。对其著作权问题的各种研究 ,都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这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欧阳健

《金瓶梅》的主要人物是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加上一些其他次要的陪衬人物，一般的读者，决不会去留意那偶尔露面、甚至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角色的。而研究者为了判明《金瓶梅》的年代特征，就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全面的考查，其研究的成果，不仅对于作者的考证是有价值的，对于小说的主题思想的探究也是有价值的。

刘中光的《金瓶梅 人物考论》，从文史关系的角度，考察《金瓶梅》全书八百个人物，指出“少部分是史籍有载的历史真实人物，多数则属史籍无名的小说虚构人物”，而直接间接涉及的历史人物中，宋代人物五十二人；“这些人物之中除史载不详者外，其为人行事、基本品格几乎全都与历史上的该人物合一一致”；“说明了《金瓶梅》作者对于宋史精熟透彻的了解，他不但研究过正史，而且还研究了野史”。此外，《金瓶梅》还写了十六个明代人物，让他们与宋

代人物纠结在一起,其生活年代,上起天顺景泰,下至万历,其籍贯北方的七人,东南的六人,四川的二人,其身分高者为尚书、太子少保,低者为县令、佐杂,所写人物行事,也与历史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吻合;从上述明代人物的身上,联系作品实际,又能朦胧地看到作者的身影”。这些,自然都是出于考证作者的需要。

但是,通过小说中历史人物的全面而周详的考证,又同时对作品的主题探讨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材料。研究者发现《金瓶梅》所写宋代人物中,按照传统的忠奸观念归纳,属于“忠正”的只有杨时、宇文虚中、曾孝序、方轸、龚夫、陈正汇、陈了翁、陈东八人;“忠奸数量上的悬殊,体现了鱼龙混杂之中正不压邪的主导倾向”,而明代人物的品格、心性;“大都刚直方正、廉洁奉公、忠勤于国事、比较体察百姓疾苦,而且多有才干,然而又大多数因现实黑暗、公道不彰而命运坎坷、抱负难竟”。由此,研究者作出了关于作品本身的结论:

《金瓶梅》的主题(或曰主旨、大旨、立意、主要议题等)有两个,一是生活道德的教化主题,一是刺时骂世的政治性主题(即忠奸主题)。这两个主题分别以开篇的四隐词、四贪词为起始(四隐词针对国家政治的黑暗腐败,四贪词针对西门及其家庭生活的污秽腐臭),延伸而形成两条并行的大纲,而围绕西门所展开的社会人事百端,即是联结两条大纲的脉络细目。两个主题名为二途,实为一意,国为家之放大,家为国之缩影,国既破亡,家亦败落,互相映托,意义寓焉。

这种对于《金瓶梅》借宋影明、刺世骂时主题的揭示，由于是建立在对小说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的考证基础上的，所以较有服人的逻辑力量。这不正是考证小说作者带来的副产品吗？

《金瓶梅》成于何时？长期流传的是嘉靖（1522—1566）说。最早明确提出此说的，是屠本峻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段话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以后谢肇淛的《金瓶梅跋》、甘公跋、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都大致因袭此说。由于这些传闻之词产生的时代较早，后人信以为真也在情理之中了。

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成书于嘉靖间还是万历间的疑问。他认为，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因为那个淫纵的时代，正需要这类小说。而且，小说中引到《韩湘子升仙记》及许多南北散曲，更可窥出非嘉靖时作的消息来。再从欣欣子序称丘琼山、周静轩辈为“前代骚人”，也不合嘉靖间人口气。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

的。”接着，吴晗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金瓶梅词话》中提到的“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的盛衰和小令”、“太监、皇庄、皇木”及“番子”等与明代史实相印证，进一步证明：“《金瓶梅》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1582—1602）中。”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稍嫌不足的是，说得还比较宽泛了些。从目前情况看来，我们是有可能将范围再缩小的。

首先，下限可以从万历三十年提前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这在《袁中郎初透春消息》中已交代得很清楚。袁中郎《董思白》一信透露了他于万历二十四年秋，已经借读了抄本《金瓶梅》，因此《金瓶梅》的编写决不会迟于这一年。

至于上限呢？也可往下推。小说第六十五回出现过“凌云翼”其人。此系真名。此人是嘉靖、万历年间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也关心小说，曾刊刻过《丹铅总录》、《艺林伐山》等。他作为一个兵部尚书，即使致仕后也不会容忍别人把他写入《金瓶梅》这类小说中的。他于万历十五年“夺官后卒”，究竟卒于何年不甚清楚，但从语气来看不会太久。因此，这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个界限。此其一。

再看同一回小说中出现“陈四箴”这个名字，显然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进陈四箴的事件有联系。当时的万历帝，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王恭妃子）立幼（郑贵妃子）之意，引起了朝廷内外不安。于是从万历十四年起，围绕着这一“国本”问题，大臣们纷纷谏诤，连年不断。至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雒于仁上疏规劝皇上力戒

酒色财气，并附陈四箴，言词尖锐。关于酒色财气之戒，自古以来，特别在元明通俗文学中多有提及，但都与“陈四箴”的概念没有联系。在考察明代《金瓶梅》成书的范围内，“陈四箴”事件看来就只有一次。因此《金瓶梅》的年代只能在此之后。此其二。

另从《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来看，《金瓶梅》在很多地方照搬了《水浒传》。众所周知，《水浒传》的版本十分复杂，《金瓶梅》创作时究竟搬用了哪一本《水浒传》呢？今将它与现存各本《水浒传》相对照，结果不难发现是与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最为接近。天都外臣序本序刊于万历十七年。可见《金瓶梅》必作于它的后面。此其三。

这样，我们可以将吴晗的说法稍作修正，范围再缩小一些，即《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然而，当我进一步考索时，更觉得作者可能就在万历二十年动手创作的。这是因为我发现有四个问题是那么巧地与万历二十这一“壬辰”年有关。

一、作者选择小说开场的一年是“壬辰”年——政和二年。据何心先生《水浒传编年》，潘金莲私通西门庆的故事发生在政和五六年间，可是《金瓶梅》改写时特意提早了几年。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孝哥能长满十五岁，赶上“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汴梁”的时辰吗？似乎也不对。因孝哥实生于丙申年（第三十回），到北宋亡国时仍只活了十岁，应将故事再提早五年才合理。可是作者不早不晚偏偏选择了政和二年壬辰作为小说开端，显然有自己的用意。

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多参差错乱，而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来推算却往往不误。

例如西门庆,第四回说他是“属虎的,二十七岁”。这一年,若按故事编年,日本的鸟居久晴和台湾的魏子云都编为癸巳,朱一玄编为甲午。若以这两年推算,都不合拍。而只有从壬辰年倒推上去,才知他生于丙寅虎年。而于二十九回写吴神仙为西门庆一家算命和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时都表明西门庆生于“丙寅”,丝毫不差。再看潘金莲,她与西门庆交谈时说:“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西门庆道:“与家下贱内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这里的“庚辰”是明显搞错或抄错的地方,若以壬辰推算,二十五岁当为戊辰年生,故在三十九回将“同庚”的吴月娘的生年改成了戊辰,可见作者最后也没有搞错。再如第十回写冯妈妈说“他今年五十六岁,属狗儿的”,二十四回写冯妈妈家的丫头时说“他今年属年,十七岁了”。这一年都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后的第二年,因此,若以壬辰年次年倒算的话,冯妈妈当为戊戌年生,确属狗;其丫头是为丁丑年生,确属牛。又如第六十七回如意儿道:“我今年属兔的,三十一岁了。”这是第六年故事,以壬辰为第一年倒推的话,正是丁卯兔年生的。所有这些,不可能都是巧合。它们说明了作者很可能就在壬辰年着手开始创作的。这是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特别是写到人物生肖时,作者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周围人物的情况来移花接木,这也就无意中为今天留下了他从壬辰年来考虑问题的痕迹。

三、《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反复写吴月娘吃薛姑子药的日子是壬子日,又说这天壬子日是四月二十三日。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词话注释》中注意了这一点,并指出万历二十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正是壬子日。事情这么

巧,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正是作者写于此年的一个佐证。

四、小说第八十七回、八十八回两次提到了“听见太子立东宫”和“朝廷册立东宫”。这里写“册立东宫”,显然与宋史的时间不合。宋代徽宗册立太子在政和五年,而《金瓶梅词话》中的这两段故事是编在徽宗重和元年,可见《金瓶梅词话》中的“册立东宫”一事不是由宋代故事搬演而来,而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皇帝传旨要册立太子的时代浪潮的冲击后(从万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的所谓“争国本”政治漩涡中,就是万历二十、二十一年皇帝曾有明确册立之旨,参见《明神宗与金瓶梅》),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这也是小说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的明证。

总之,我认为,《金瓶梅词话》当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作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在“镶嵌”前人作品的基础上,一气呵成了这部名著。

《金瓶梅》是由个人创作的呢，还是集体编写而成的？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我国最早由个人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五四年，潘开沛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中，才提出了一个“集体创作”说。他认为此书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期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之后，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大致还是倾向于个人创作。近年来陆续有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强调元明两代的长篇小说大都是在说唱艺人长期流传基础上由某一作者加以写定的，《金瓶梅》也不例外，所以它是一部“累积型”的小说，从而又否定了个人创作说。这样，人们又有了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的兴趣。

其实，“集体创作”论者之所以有那样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类比了《三国》、《水浒》、《西游》的成书过程。不错，《三国》等书是经过民间艺人的长期加

工。在它们最后成书之前存在着若干雏型作品，作为最后写定者的主要依据，例如《三国志演义》之与《全相三国志平话》、《忠义水浒传》之与吴从先读本《水浒传》、《西游记》之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是如此。而《金瓶梅词话》成书比它们晚，如果在它之前也有雏型作品或有关民间作品流传的话，怎么至今尚无一点踪影呢？事实上，不要说我们现在无法找到它先前的影子，就是在袁中郎时代恐怕也找不到。

然而，“集体创作”论者强调《金瓶梅》取名“词话”不容忽视。认为词话是元明以来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品种，明代刊行的其他几部著名长篇小说都是经过词话阶段发展而来的，更何况《金瓶梅词话》中还保留着不少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如小说中出现以曲代言，外加“看官听说”及成套引用戏文、乐曲等。这些可以说是“集体创作”说的核心理论。然而，问题是明代冠以“词话”之名的作品并非都是“集体创作”的讲唱文学。例如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就是文人个人创作。万历前后，袭用词话名称，而实质为散文小说的也并非《金瓶梅词话》一种。《古今小说》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头说：“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而全篇可称为唱词的只有《西江月》二首和韵语两段。小说中出现“看官听说”和以曲代言等，也可出于作者的模仿。就“看官听说”来看，“两拍”及《醒世姻缘》等明代文人个人创作中就有不少例子。更有意思的是《金瓶梅》词话本第五十七回写到“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云云时，前面并无“看官听说”四字，而在后出的经过文人再加工过的崇祯评改本中反而在前面添加了这四个字。于此可见，这类形式完全可以模仿的。另外，有些“说唱艺术的痕迹”，

也可能是在“镶嵌”前人作品时所遗留下来的。这都不能成为《金瓶梅》由词话加工而成的理由。叶德均在专论《宋元明讲唱文学》中说得好：“《金瓶梅词话》虽有许多词曲，又用曲和韵语代言，但全书仍以散文为主，和诗赞系词话迥不相类。”至于《野获编》把《金瓶梅》列于“词曲”门下，也不能说明《金瓶梅》原为“词曲”，因为这个归类并非出于当时沈德符之手，而是由清代康熙年间钱枋所搞。还有人把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说《金瓶梅》“大抵市诨之极秽者”之“市诨”牵扯到“词话”上去，更属勉强。所谓“市诨”者，犹言“市井间流行的戏弄之语”也；前云“大抵”也者，意谓此小说大致属于这一类东西也。总之，《金瓶梅》并非是一种真正的“词话”，或者是一种在“词话”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品，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文人“拟词话”而已。

此外《金瓶梅词话》存在的不少情节错乱和抄用大量前人作品，也是“集体创作”说者常述的理由。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能作为判断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的原则。集体编写固然容易造成错乱，但个人之作，如《红楼梦》那样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心结撰，也难免有矛盾抵牾之处。“累积型”的作品固然不断吸取各种故事而成，但作家的个人创作也可在独立构思的基础上“镶嵌”前人的作品。《金瓶梅词话》确是抄用了如《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等不少作品中的个别片段，但这些片段原来只是在《刎颈鸳鸯会》等作品中存在着，而不是在一部名曰《金瓶梅》的或者基本具备《金瓶梅》故事的作品中存在着。《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把那些片段汲取过来，作了某些改动，溶化到自己的作品中，这完全是一种个人创作的过程，怎么能说是“累积”而成的呢？

事实上,只要抛开成见,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部小说中看到不少个人创作的特点。它比之《三国》、《水浒》、《西游》,对人物和环境的细节描写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其语言和风格也比较统一。再从情节结构来看,也能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并无若干大小段落联缀的痕迹。潘开沛为了说明“集体创作”,曾把全书分为三截,说:

原编撰人的目的,只是打算把《水浒》里的武松杀嫂的故事,加以扩大而已;全本书,原来至多编撰到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就完了。……从全书写作技巧或编撰技巧来看,以前五十回为最好,虽然尚存在若干小问题。可能最初只有这五十回,以后才由别人续作。五十一回至八十七回问题最多,也许就是参加编辑的人较多的表现。八十八回以后的十三回,便差得多了。

这一论断并不合乎实际。徐梦湘等曾举第二十回吴神仙相面时,对每个人都说了四句诗,这四句诗就包含了每人的结局。孟玉楼、孙雪娥、春梅、西门大姐等人的结局都在八十七回之后,而吴神仙的诗都有了暗示。第四十六回卜龟儿卦,再一次交待了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各自的命运和结局。吴月娘是书中主角之一,她的结局也在八十七回之后,而且她在八十七回以后显得更加重要,故事比重也有较大的增加。这两例,的确可证作者本有计划,决非是什么艺人因听众不满足而逐步续成。在这里,我们想起了《水浒传》智真长老给鲁智深的两次偈语和《红楼梦》中宝玉在太虚幻境看《薄命司》的卷册、听演“红楼梦曲”的故事情节来。前者是“累积”而成,故前后不

一 ;后者为个人创作 ,故首尾相应。《金瓶梅词话》显然也属于后面一类 ,故除上述两例外 ,再有如第十九回中的张胜被推荐给守备府 ,后来也再度登场 ,并在第九十九回中杀死了陈经济。第八十二回中潘金莲还给陈经济的簪子 ,后于第九十二回中陈经济又将此送给孟玉楼。第八十四回中说到孝哥以后要出家到永福寺 ,后于第一百回中果然走上了这条路。如此等等 ,正说明了作者在构思创作时 ,对故事发展的全过程是胸有成竹的。这不也正是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具有个人创作的特点吗 ?

陈 诏

《金瓶梅词话》第十回写了一个花太监。他先在内廷惜薪司掌厂，继由御前班直升为广南镇守。在广南住了半年有余，后因病告老回归原籍清河县，与西门庆结为邻居。花太监在广南捞了一大笔财产，后来死了，遗产被他的侄子花子虚所侵吞。花子虚与西门庆结为“兄弟”，谁知西门庆暗中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成奸。待花子虚一死，西门庆纳李瓶儿为妾，李瓶儿就把花太监的全部遗产带了过来，其中有40斤沉香，200斤白蜡，两罐子水银，80斤胡椒，还有无数金银财宝。西门庆人财两得，遂成为清河县的一个赫赫有名的暴发户。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花太监所任的广南镇守，这是明代宦官的一个职名。“广南”就是今广东、广西地区，是一个富庶的地方。“镇守”，是皇帝派到各地的亲信和耳目。他们只对皇帝负责，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事实上是凌驾于地方行政长官之上的太上皇。据史籍记载，很多镇守

太监都打着“皇办”招牌，开店经商，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此所以花太监在广南仅仅半年多时间得以腰缠万贯，中饱私囊，满载而归。

在宦官中设“镇守”，是明代的一大弊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永乐，盖明成祖夺取建文帝的帝位，深恐各地臣僚不服统治，于是“寄心腹于宦寺”，宦官之权渐重。但镇守太监的正式设立，则在洪熙。《明史·职官志》所载宦官中，有“镇守”名目，注云：“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镇守内臣革复》又说：“镇守内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间，……至十七年，而太师武定侯郭勋奏请复之，上许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边，各仍设一人。……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变，将新复镇守内臣尽皆取回，遂不再设。”由此可见，设镇守太监这一不得人心的措施，到嘉靖九年十年间就已基本刹住。十七年，又一度恢复。到嘉靖十八年以后，完全废止，不再设。

《金瓶梅词话》写花太监任广南镇守，那只能是嘉靖十年，或者是嘉靖十八年以前的事情。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此书写成于嘉靖年间，至少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嘉靖时期，而不是万历时期。

刘 辉

《金瓶梅词话》今知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五年本，其刊刻年代晚于《如意君传》几近百年。如果承认《金瓶梅词话》与《如意君传》在内容上有因袭关系的话，不言而喻，只能是刊刻在前的《如意君传》影响了《金瓶梅词话》，历史绝不能倒转，刊刻其后的《金瓶梅词话》反而影响了《如意君传》。因此，那种认为《如意君传》抄袭了《金瓶梅词话》，把词话本的具体描写，简括浓缩到《如意君传》中来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金瓶梅》向有“淫书”之恶谥。原因是人所共知的，它杂有性生活的描写。这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风尚使然，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不了解这一点，无疑是隔了一层帷幕，根本无法探求其底蕴。《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上全面崩溃的时代，整个社会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到处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糜烂臭气。《金瓶梅》敢于面对现实，直言

不讳 给予了赤裸裸的揭露。当是时 ,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肯定人的生存价值 ,以情与性作为两把锋利的匕首 ,投向鼓吹“存天理 ,去人欲”的虚伪道学 ,而且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这一思潮首先反映在小说和戏曲的创作领域内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金瓶梅》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不理解这个社会 and 文学现象 ,不掌握这一历史尺度 ,难以对它们作出科学的公允的评价。

另一方面 ,在《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中 ,《如意君传》对它的影响是明显的 ,尤其在性生活描写方面 ,最为直接。我们现在可以说 ,在一部小说中对性生活作集中而又具体描绘的 ,并非首创于《金瓶梅》 ,而是《如意君传》发其端 ,只不过《金瓶梅》在某些段落上又肆意铺张一番 ,读来令人生厌罢了。但《金瓶梅》毕竟不是《如意君传》的翻版。单就性描写而言 ,不仅与塑造人物形象密不可分 ,而且在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可以说《如意君传》充塞满纸 ,篇幅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而《金瓶梅》充其量不过百分之二三而已。长时间以来 ,在一些人的言谈或印象中 ,把《金瓶梅》视为中国“淫书之首”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细检《金瓶梅词话》 ,就会发现第三十七回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莺声呖呖 ,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 :在《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中 ,是有意识地吸收了《如意君传》的故事细节描写。具体说来 《金瓶梅词话》的第十八、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一、七十三、七十八、七十九等回的一些性描写 ,大部由《如意君传》化出。或动作一样 ,同出一辙 ;或行为相似 ,共一模式 ;或具体描绘 ,一字不差 ;或大同小异 ,模仿痕迹甚浓。特别有几段文字 ,更是公开地抄袭 ,如第二十七回“忽然仰身望前直一送”以下一段文字 ,

则直接从《如意君传》移来，照录不误。类此者，在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八、七十九回中还可看到，毋需一一例举。

还有一点应当提及，即《金瓶梅词话》中的个别性描写，现已有不可解者，而在小说《如意君传》中，却作了具体说明。譬如，词话本第六十一回和七十八回所描写的“烧香”一事，清末之文龙已是不知其所云为何：“《金瓶梅》中有烧香一事，不解是何心思，有何思味，岂亦割臂之类欤？殆亦淫之极而作此举耳。”今人亦有推测为性虐待者，实则不然。《如意君传》是这样描写的：“后谓敖曹曰：‘我闻民间私情，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谭，我与汝岂可不为之？’因命取龙涎香饼，对天再拜，设誓讫，于敖曹座柄头烧讫一圆，后于牝颅上烧一圆，且曰：‘我为奴以痛始，岂不以痛终乎？既就寝。’说得明明白白，无需再作任何诠释。于此，《如意君传》又有其他小说所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为本文作结了：《如意君传》对《金瓶梅》的成书，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容忽视，《如意君传》成书刊刻在前，在一些性生活描写上，是《金瓶梅》借用抄录了《如意君传》，而不是相反。

《金瓶梅》是假托宋朝实写明事

刘 辉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第一部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尽管有人还为它编年,而实则写明事。无论典章制度,事件史实,还是人物形象、习俗方言,无一不打上鲜明的明代印记。

众所周知《金瓶梅词话》之为书,尤其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是以《水浒传》为蓝本,敷衍铺张而蔚为大国;而《水浒传》所用的宋元方言,至明,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复使用,故《金瓶梅词话》在引用时,必须以当时的语言加以解说或串讲,否则,读者和听众会不知其所云为何。譬如《水浒传》之第二十四回:王婆道:“大官人,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要五件事具全。”到了《金瓶梅词话》第三回,就这样写道:“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又如:“捣子”一词《水浒传》凡三见:第二十五回:“如今这捣子病得重。”第二十九回:“这几个火家捣子,打得屁滚尿流。”第三十二回:“余者皆

是村中捣子。”到了《金瓶梅词话》第十九回：“那时，宋时谓之捣子，今时俗呼为光棍是也。”这里的“如今”、“今时”指的就是明代，则是确凿无疑的了。

谈到写的是明代的事件史实，例证更是俯拾皆是。吴晗在其著名论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曾经列举“马价银”、“皇庄”、“番子”，旁征博引，详加考核，确是明代之事。只不过，他由此得出的结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却有所失误。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孟玉楼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时，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据《明史》记载，太仆寺之有马价银，始于成化年间，但朝廷爷借支马价款银，并非万历十年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查《明实录》，早在嘉靖十六年（1537），就挪借太仆寺马价银，为度过财政困难的应急办法之一。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一动支马价款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给济太享殿、慈庆宫等大工之用，仍借支贮库及马价银四十万有奇。”都是明证。

采“皇木”，建“皇庄”。据《明史·食货志》，采皇木始于成祖，历洪熙、宣德、正德各代有之，至嘉靖、万历而极。“皇庄”亦非吴晗所言：“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止称官地。”不仅《明实录》嘉靖十九年（1540）六月已有“皇庄”一词记录在案，而且其源可溯至洪熙时仁宗的“仁寿宫庄”、“未央宫庄”，至成化时因没收太监曹吉祥的地亩，作为宫中庄田，遂正式定名“皇庄”。所谓“番子”，那是自明朝设立东厂以后就有的，说嘉靖时番子不敢放肆，纯系想当然之词，不足为凭。

《金瓶梅词话》卷首有酒色财气《四贪词》，研究者咸谓，来自万历十七年（1590）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奏酒色财气四箴，批评、劝谏皇帝朱翊钧之史实。由于本书后面有专题，此处一笔带过。

临清，在明代是个重要的商埠，扼运河通道，商贾云集。对此《金瓶梅词话》作了如实描写，请看第九十八回这段赞词，写得何等气派：“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这里所写仅是一座酒楼四望景观，其整个城市的繁华景象，可想而知。临清在明代又是一个重要钞关。《明史》卷八十一云：

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肆居商货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

后文列举各地钞关十一处，临清在其内。以此与《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提到的“临清钞关”和其他回内对纳税细节的描写相较，两者完全相符。临清地名未变，但绝不是宋时之临清，而是明代的了。顺便说一下，临清，今属山东省。而山东在宋代叫京东路，元代称腹里，小说第六十五回说的“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山东一首”这个称谓，也只有明代以后才能出现。

最令人注目的是：《金瓶梅词话》里竟出现了一些真名实姓的明代人。在小说中，他们既不同于《水浒传》或

《宋史》里已有之人,也不同于作者凭空虚构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的明朝人。更叫人惊异的是,小说对他们的描写和他们本人的生平行实,也大体相符。如出现在第四十八回、六十五回的阳谷县丞狄斯彬,小说写他“本贯河南舞阳人氏,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问事糊突,人都号他做‘狄混’”。狄斯彬传在《明史》里,附《杨允绳传》后,溧阳人。《溧阳县志》亦有传。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御史时,因弹劾提督中官杜泰,贬为宣武典史。溧阳县有二:一在江苏;一在河南。县丞,在明代是县的佐贰官,实际上就是典史。不难看出,小说对狄斯彬的描写,是确有所本的。

又如第六十五回、七十七回提到的韩邦奇,他是明代一位有名望的人物。钱谦益就说过:“汝节(按:韩邦奇,字汝节)奇伟倜傥,谈理学,负经济,海内称苑洛先生。”这位曾任山东副使的韩邦奇,在小说里以徐州知府的面目出现,虽仕历稍有异,但写他“志多清修,才堪廊庙”,却又是相合的。

类此者,或是一笔带过的明代官吏还有,不必一一例举。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词话》中个别重要人物,在明代也确有同名而经历近似的人,如西门庆的亲家陈洪,与隆庆年间司礼掌印太监陈洪的名字一模一样。陈洪的儿子、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在明代还真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这位陈经济,字鸿宇,河南禹州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任湖州知府。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士绅怪癖》中曾记载:“近日陈经济为湖州太守,酷恶鸦声。偶闻之,必痛笞其家人,遂目为‘陈老鸦’。”这位外号“陈老鸦”的陈经济,与《金瓶梅词话》里的陈经济,究竟有没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倒真是一向未引起人们注意而又

未解之谜呢！

至于小说中写宋时人，穿戴却是明代服饰，吃的是明代独有的菜肴，喝的是明代才出产的酒，等等，本书将有专章，一一道来。请读者耐心看下去，自会一目了然。

《金瓶梅》假托宋朝，实写明事，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现实社会生活进入了长篇小说，就为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纪元。原来在中国长篇小说中（包括宋、元讲史评话），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就是超人的传奇英雄，或者是怪诞虚幻的神魔鬼怪。我们只要读一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明代大量出现的讲史、神魔篇什，就可知晓。《金瓶梅》出，为之突然一变，它笔下的人物，都是现实社会中常见的市井细民、官吏、商人、地痞、无赖、娼妓、医生、牙婆、道士、和尚……可以这样说，明代城市中的三百六十行各色人物一一揽入其内。当然，它也写了皇帝老儿、权臣大吏，但仅仅是陪衬，不是主要人物。因此，说《金瓶梅》是一幅丰富的明代社会风俗画卷，一点也不过分；说它是有明一代百科全书，丝毫也不夸张。

章培恒

作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首先《金瓶梅词话》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

读者从《金瓶梅词话》中可以看到: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已经达到了极点。作品的男主人公西门庆的经历,就是在这种特定环境里的典型事件。

西门庆是个开生药铺的浮浪子弟,凭借钱财,勾结官府,用毒药害死武大,娶了他的妻子潘金莲为妾。官府明知西门庆的罪行,不但不予惩办,反而将那个想为武大报仇的武松刺配远恶军州。后来,他的靠山杨提督倒台了,他本应拿问,却因送了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攸五百石白米、右相李邦彦‘五百两金银’就安然无事,继续作恶:先是为娶李瓶儿,陷害了医生蒋竹山;又为霸占宋蕙莲,陷害来旺,迫使蕙莲自缢而死;蕙莲的父亲宋仁想为女儿报仇,又被西门庆勾结官府害死。接着,因送了蔡京一份重礼,这个素无一官半职的白身人突然被

任为“金吾卫左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成为“本处提刑所理刑（三十回）。于是，他一面加紧与蔡京的管家翟谦勾结，认为亲家；一面利用其提刑官的职务，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仅卖放杀人凶犯苗青一事，就得赃银五百两。他的这种行为虽遭到巡按御史曾孝序的弹劾，但由于翟谦、蔡京的包庇，结果是曾孝序倒霉，最后被“窜于岭表（四十九回），西门庆却丝毫无损。不久，他又送重礼与蔡京，成了蔡京的干儿子，在地方上更其炙手可热。在这过程中，他通过送礼行贿等手段，跟蔡状元、安主事、宋巡按等来往甚密，倚仗他们的势力，兼为盐商，还偷漏税金，大肆贩运，开起了绸缎铺等，生意越做越兴旺。蔡京又为他冒功，升了正千户。由于他跟蔡京的关系和雄厚的财力，地方官僚诸如知府、都监等都要仰承他的鼻息，依靠他的门路来升官。正在他十分兴头的时候，因纵欲过度，得病身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西门庆如此作恶多端，何以却能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在于：当时的统治集团从上到下都烂透了。国家本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的法律以及其他各项制度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其政权机关的各级人员也都应该为此而努力。然而，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统治集团的成员已经把满足个人的私欲放在首位；他们可以为此而践踏原来用来保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和别的制度，打击本阶级中坚持这些东西的成员，即使因此而危害本阶级的统治也在所不计。所以，不但对人民的榨取和迫害更加残酷，连统治阶级内部也已无是非曲直可言。从《金瓶梅词话》的具体描写来看，西门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皇帝只求满足私欲，根本不顾天下安危。他建造良

狱,运花石纲,弄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公私困极,莫此为甚”(六十五回),但他却因自己的这一欲望得到满足而“朕心加悦”,对于顺应其私欲的官僚大加封赠(七十回)。太师蔡京是个见钱眼开、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第三十回写西门庆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礼,就很深刻地表现出这一点:

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与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_馘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_造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_榼。如何不喜?……太师因问来保道:“礼物我固收了,屡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_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又)问来保道:“你二人替我进献生辰礼物,多有辛苦。”……唤堂候官取过一张_劄付(对吴主管说):“我安你在本处清河县做个驿丞,倒也去的。”……又取过一张_劄付来,把来保名字填写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

作为对西门庆屡次赠送厚礼的答谢,蔡京不但把“一介乡民”西门庆一下子封为执掌一省刑狱的理刑官,而且把送礼来的西门庆奴才也封了官。什么纲常法纪,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他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西门庆的礼越送越重。至五十五回蔡京做寿,西门庆送的礼物,就有黄金二

百两、明珠十颗、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以及其他的许多贵重东西。至于别的官僚，跟蔡京也是一丘之貉。他们对于广有财产、又跟蔡京关系密切的西门庆，勾结、奉承还来不及，哪里会跟他作对？曾孝序为了维护封建纲纪而毅然弹劾西门庆，结果自找倒霉。既然如此，心狠手辣又慷慨地向官僚们馈送财物的西门庆，又怎会不无往而不利呢？

所以《金瓶梅词话》是把西门庆的经历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来描写的，它深刻地显示出：西门庆的飞黄腾达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尤其有意思的是：据七十八、八十七回所写，当地的一个想跟西门庆合作的富户张二官，在西门庆死后，立即采取跟西门庆同样的行贿手法，顶了西门庆的缺，做了提刑官；西门庆原拟利用其跟官府的关系包揽为朝廷购古器的买卖，已被张二官包揽去了；围绕在西门庆身边的帮闲已追随在张二官身后；连西门庆的小老婆李娇儿都成了张二官的妾。换言之，一个跟西门庆类似的人物已经继承了他的事业。在那个时代里，西门庆是死不绝的，西门庆式的罪行既不会停止，也不会间断。

应该说，在《金瓶梅词话》以前或同时的我国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够像它那样深切地揭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就元明两代的著名小说来看，《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有若干处涉及人民的苦难，但那是在动乱时期发生的，并不能代表封建社会的一般情况；《封神演义》虽也揭露了纣王的残暴和昏乱，但同时又歌颂了周文王、武王的仁德，而且最后是周取代了殷，所以它并不是对于社会的批判；《西游记》是神魔小说，更属于别一范畴；在这方面唯一可资比较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里被害死而又

毫无抵偿的，其实仅林冲娘子一人。宋江、卢俊义虽被害死，但死后成了神，皇帝又为他们建庙，四时享受祭祀，实在不能算是怎么不幸（今天看来，死后成神云云当然只是鬼话，但在那个迷信盛行的时代，这却是颇可安慰的结局）。除此以外，如解珍、解宝之被毛太公陷害，宋江、花荣之被刘高陷害，柴进之被高廉陷害等等，其结局全都是被害者安然无恙，害人者遭受恶报，正义伸张，人心大快。自然，这是歌颂反抗，应该肯定。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不有点怀疑：在那样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统治下，正义能这样频繁地得到伸张，社会的蠹贼能如此经常地被歼除，善良的人们多数都能得到若是美满之反抗结果吗？王国维氏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水浒传》虽没有完全体现这种“乐天的精神”，但却不可否认地受有它的影响，给那个暗黑的现实涂上了若干理想的色彩。说得明白一些，在对现实的揭露上，《水浒传》并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

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了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武大被毒死了，首犯西门庆却逍遥法外，虽英雄如武松，也只不过杀死了两个从犯——王婆与潘金莲，宋蕙莲被害死了，她的父亲想给她报仇，于是也被迫害而死，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冯淮被孙文相等打成重伤身死，但凶犯只出了十两烧埋银完事（六十七回）；来旺被西门庆霸占了妻子，自己还遭受酷刑，押回原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深深感到那个社会的暗无天日。尤其令人感到压抑的是：这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在荣华富贵中度过了一生，享尽了福，没

有受到任何惩罚。虽然死时只有三十三岁,但那是因他纵欲过度,也即享受了过多的兽性的快乐,而并非“恶有恶报”的惨死。而且,他连在阴间也没有受到什么报应。在作品的最后一回,写他的鬼魂跟武大等人的鬼魂一起去投胎,同时说明他来世依旧做富户,被他害死的那些人也不会再对他报复,——因为普静禅师已经告诫过这些鬼魂:“汝当各托生,再勿将冤结”;“改头换面轮回去,来世机缘莫再攀。”(一百回)王国维氏所谓“诗歌的正义”,在这里连影子都找不到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封建社会里常见的、能够反映本质的现象:凶狠残忍的剥削者、压迫者终身受用不尽,善良的人们一辈子在苦难中煎熬、悲惨地死亡。从这点来说,《金瓶梅词话》所显示的,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并未涂上理想色彩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真实。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小说领域中,现实主义向前跨进了一步。

还必须指出,这种真实是打着作者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鲜明烙印的。此书的写成,距离明末的农民大起义至多五六十年。而且自嘉靖、隆庆时期以来,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金瓶梅词话》虽以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为主,但也写了宋江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并明白交代了武松在杀死潘金莲、王婆后的去向:参加农民军。读者从中可以看出:遭受种种宰割的人民,同时也在反抗。至于反抗的规模不大,效果不突出,那是由于在作者所处的时代里人民的反抗原只达到这样的水平。另一方面,万历时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是说:市民的实力在增长。而《金瓶梅词话》里的西门庆,就其出身来说,正属于市民(当然是市民的上层)。第三回介绍西门庆说:“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

药铺。”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理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可见其把揽衙门公事，乃在“发迹有钱”之后。换言之，他并不是依靠把持官府而发迹有钱的。第七回又说他“在县前开着个大生药铺，又放官吏债”，更可见其所以能把揽公事、交通官吏，乃是“放官吏债”之故。而其所以能有钱“放官吏债”，当是依靠其所开的生药铺。而且，在他做官以后，虽也贪赃枉法，其生活的主要来源还是商业收入。第三十回他对应伯爵说：“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过了日，那里希罕他这样钱（指行贿的钱——引者）？”这虽近于自夸，但他主要不是靠赃款过日，也是事实。总之，他是以市民的身分，靠经商致富，再以此为凭借，在政治上取得显赫地位的。他之与封建统治集团狼狈为奸，说明当时的市民阶层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他之得以爬上这样的政治地位，又反映出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已不得不降尊纡贵，寻求市民中上层人物的助力，也就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力量的削弱和市民阶层的逐步壮大。由此看来《金瓶梅词话》虽然显示了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人民的深重苦难，但绝不意味着这种现实是不可改变的，因为，那将要导致变革的因素——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同时出现于作品之中。自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和当时的读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二者的重要性，从而作者未曾对此加以阐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说作者夸大了黑暗势力和抹煞了变革现实的力量。倒是应该说《金瓶梅词话》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揭露和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

〔标题为编者所加〕

关于《金瓶梅》,过去的时代如何看法,我们暂且撂在一边不去管它。在今天,我还是看到了《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乃至研究者中间,它似乎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我虽然曾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原来我竟也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翻看自己的旧稿时,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批评界和研究界的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已感觉到了,中国的批评界和读者看问题的差异。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容易模式化——把话说成套话,套话就不真实;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

的某些东西。在这方面,普通读者就没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比如对《金瓶梅》,其实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他们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了。尽管我们分明地感到一些评论文字在作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而辞严,可是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金瓶梅》竟然成了一块真假心态的试金石,这也够可笑的了。就拿《金瓶梅》最惹眼的性行为的描写来说,我必须承认,在我过去的研究文章中就有伪饰。现在再读《金瓶梅》时,似经过了一次轮回,才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我既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佐料,也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粹,当然我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持有许多保留意见。现在,也许经过一番现代化开导,我真的认识到,性活动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性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我认为《金瓶梅》可以、应该、必须写性(题材、内容这样要求),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于直露,缺乏艺术分寸感,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但是,我更喜欢伟大喜剧演员 . . 菲尔兹的一句有意味的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完全相似的。”(这是看电视《环球银幕》时听到并速记下来的。)

至于对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来说,我是同意阿米斯在他的《小说美学》中所说的意见:

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

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

基于此，再回到过去的时代，我非常欣赏清人张竹坡所写《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的大实话：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在我看来，这位张竹坡先生的意见比国粹派、谈性色变者以及伪善者更懂得如何读《金瓶梅》，包括如何看待此书的性描写。

以上所言，实际上涉及到《金瓶梅》的整个“阅读行为”，即读者群和评论者如何首先拓宽阅读空间和调整阅读心态这样一个极普遍又亟需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面对小说《金瓶梅》，评论者是否高级读者可以不论，但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他的评论始于阅读，甚至与阅读同步，因此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我想，在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有多种并行的或者相悖的阅读方式和评论方式，读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而分别取用。但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阅读的失败。对于《金瓶梅》这样惊世骇俗的奇书，

面对这早熟而又逸出常轨的小说巨构,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的阅读,从而才有可能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的、创造的研究与批评。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读者来说,面对一部小说,首先要尊重、承认它的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小说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金瓶梅》的作者构筑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误读),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越来越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根本没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就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和叙事方式。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了人类的罪恶中去,到那盛开着“恶之花”的地方去探险。那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人的灵魂深处。他远离了美与善,而对丑与罪恶发生兴趣,他以有力而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一具身首异处的“女尸”,创造出一种充满变态心理的触目惊心的氛围。笑笑生在罪恶之国漫游,得到的是绝望、死亡,其中也包括他对沉沦的厌恶。总之,笑笑生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他的恶之花园是一个惨淡的花园,一个豺狼虎豹出没其间的花园。小说家面对理想中的美却无力达到,那是因为他身在地狱,心向天堂,悲愤忧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唤。然而在那残酷的社会里,诗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愚以为这一切才是《金瓶梅》独特的小说美学色素,它无

法被人代替,它也无法与人混淆。

我读《金瓶梅》,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有许多窗口的房间。从不同窗口望去,看到的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在其中活动。这些小天地有道路相通,而这道路是由金钱和肉体铺就的,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封建晚期的明代社会。

从一个窗口望去,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落户出身的西门庆发迹变泰的历史,看到了他占有女人、占有金钱、占有权势的全过程,看到了一个市井恶棍怎样从暴发到纵欲身亡的全过程。

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西门庆家族日常生活,妻妾的争风吃醋,帮闲的吃喝玩乐,看到了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当朝太师蔡京等市侩化了的官僚群的种种丑态。

再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在所有的窗户外面,我们几乎都看到了潘金莲的身影。她是《金瓶梅》的特殊人物:一方面,她完全充当了作者的“眼睛”,迈动一双三寸金莲奔波于几个小天地之间,用她的观察、分析、体验,将其连结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她又是一个发展中的人物,开头她被西门庆占有,而后西门庆的生命终点又是她制造的。因此,潘金莲这个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又比西门庆更显得突出。

总之,《金瓶梅》的许多窗口是朝着这些“丑恶”敞开着,读者置身其中,各种污秽、卑鄙、残忍、悲剧、惨剧、闹剧,无不历历在目,尽收眼底。

于是我从整体上把握了这样一部小说的内涵,《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

底春秋 ,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 ,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表现对象 ,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 ,借宋之名写明之实 ,直斥时事 ,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笑笑生勇于把生活中的否定性人物作为主人公 ,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 ,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力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 ,从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兆。

笑笑生发展了传统的小说学。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 ,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又一次变革。

直到现在 ,我还是这样认识《金瓶梅》。

缘起：承蒙电台热情召唤，我被安排在星期日“成人特别节目”里充当嘉宾。至于为什么选中《金瓶梅》去“细说”，我以为《金瓶梅》虽与《三国》、《水浒》、《西游》列为“明代四大奇书”，但唯独《金瓶梅》命运多舛，尽管鲁迅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它至今仍是一部被人误解的长篇小说，不妨借“成人特别节目”与读过或没读过此书的成人交流一下看法。另一方面，由于《金瓶梅》在部分人中，仍具有神秘感，从而派生了某些诱惑力。

备忘一：“细说《金瓶梅》”的小小锣鼓刚刚敲起，南开友人某君郑重地对我说：“以《金瓶梅》为素材改编的电视剧和广播剧乃至评书，都已明令停拍停播，现在‘细说’它，是否莽撞？”我则态度明确：“这是两码子事。”就如同我们反对各色各样反动会道门的复活，但我们完全赞成像天津学者濮先生那样致力于秘密宗教及其历史渊源等问题的研究，更何况，《金瓶梅》不是垃

圾,而是禁不止、打不倒的名著!

在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几次政治局和省委书记会议上都建议同志们看看《金瓶梅》。1956年2月20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指出:“《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当然,他也指出《金瓶梅》作者不尊重女性(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23页)。我们无意用毛泽东的话作挡箭牌,只是觉得我们的“细说”决不会出圈儿。更自信在直播时面对敬爱的听众决不会宣扬什么不健康的东西。事实证明,无论是我一个人和主持人对话,抑或我和其他同志交流,大体上可以说是把《金瓶梅》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说清了。

备忘二:令我至今有着丝丝痛苦、而又是意料到的是,一位听众写信来,直接提出:宁宗一为什么不在电台细说《红楼梦》,而偏偏要细说《金瓶梅》?对此,我并非无言以对,只是认真进行了一次“反思”:看来我们的“细说”并未能征服听众,我们有的听众至今还带着严重的偏见,把《金瓶梅》视为低一层次的古典小说!当然我也想到封建时代封建统治集团禁书的厉害,随之而来的是,我也想到,像一个人一样,一旦“名声”不好,要想翻个身又何其难哉!

体悟一:我在病中回顾了这个小节目播出的全过

程,我怅然有所失。我又拿起了那本我看过两遍而觉得水平并不高的美国人万·梅特尔·阿米斯著的《小说美学》一书,然而我欣赏他那一段朴实无华的话:

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

经他的点拨,我似乎又有所悟: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素养的整体提高是当务之急。而“学会阅读”可能属于它的一个起码的训练和修养。

体悟二:对我这个当了四十多年教书匠的人来说,我过去从未有过这样不拿讲稿、张口就讲的习惯。可是这次为了达到直播的效果,播前只定一个小题目,谁也不给谁定框框,全凭临场发挥。对这种形式,我始而发怵,继而觉得无比轻松。我第一次享受到面对麦克风无拘无束、平等自由与听众聊天的乐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远东文学教授夏志清先生认为《金瓶梅》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已经跳出历史和传奇的圈子，处理一个属于自己的创造世界，人物无论男女都生活在真的中产阶级环境，它那种耐心描写中国家庭中日常琐事，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金瓶梅》是否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这里姑且不论，但将它视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不妨将中国小说的发展作一个简单的分期。从远古的神话、传说，经由先秦、两汉的寓言、史传文学，中国古代小说一直处于胚胎之中，犹如尚未出土的种子，这可以称之为孕育期或酝酿期。其时既无小说，自然也谈不到人物，而且，人们的小说观正处在萌发与形成中，并无明确的理解。汉末至魏晋，经过长期孕育之后，中国古代小说终于诞生了，以《搜神记》和《世说

新语》为代表的志怪与志人小说,为古代文学及文化园苑增添了新卉奇葩,虽然稚嫩,很不起眼,不登大雅之堂,但是,这毕竟是一件新生事物,令人欣喜,这可以称之为萌芽期。鲁迅先生认为,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其实,干宝著《搜神记》,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可见时人亦有故意为小说者,没有这种小说观上的变化与革新,恐怕不会在此时出现与今人小说概念含义近似的作品,更不会有如此动人的故事情节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自隋唐至元末,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发展期(或称为成长期)。这一时期中,无论文言白话,抑或短制长篇,均先后产生、发展起来,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则表明中国古代小说已成长为文坛上不容忽视的一大样式,已经在文人以及普通百姓中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唐人对于传奇小说的热情之高,宋元时“说话”艺术之兴盛,说明文人与平民、作家与读者(听众)的小说观已充分活跃起来,不仅文言小说受人重视,尤其是话本的风行,意味着通俗文学的勃起。没有这样进步的小说观,很难设想会有《太平广记》的问世,《全相平话五种》等书的流布,也不会有崔莺莺、柳毅、李娃、霍小玉和李翠莲、璩秀秀以及刘、关、张、宋江等为后世传扬或据以加工再创造的艺术形象。元末以降,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了成熟期,其标志即是“四大奇书”的相继诞生。自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问世,中国古代小说开始有了真正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的产生,又表明作家的取材范围更为广阔了。到了明季,《金瓶梅》和“三言”、“两拍”宣告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后成熟。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小说观逐步演进以至成熟、革新的过程。小说家与读者对小说的看法、要求等日益深化与丰富,无疑会促使各个种类的作品大量问世,从而构

成一个三教九流、纷纭复杂的人物世界,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自此,中国古代小说开始向鼎盛期迈进。《儒林外史》、《红楼梦》则是这一鼎盛期的巅峰之作。此后,至清后期《荡寇志》、《儿女英雄传》、《青楼梦》这些作品产生,中国小说逐步走向下坡路,无论从题材选择还是到人物塑造等,均已无以与前期相比拟,这一时期可称之为衰微期。《镜花缘》则代表了这一时期小说的最高水平。这表明清人对小说的热情日渐减弱,中国小说已到了必须寻求新的出路的时候了。清季的小说观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海上花列传》已反映出近代社会的某些侧面,而所谓四大“谴责小说”则标志着中国小说正在向现代过渡,这一时期可称之为蜕化期或过渡期。

笔者对中国小说史的分期或许并不很准确,但是,《金瓶梅》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最后成熟的标志,这一点笔者还是愿意坚持的。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的诞生,弥补了古代长篇小说人物世界中历史人物、英雄豪侠、神魔鬼怪充斥,芸芸众生罕有一席之地之缺陷,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天地。而且,由于《金瓶梅》的诞生,说明小说家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日益浓厚,经由《醒世姻缘传》以及一大批所谓才子佳人小说这一发展阶段,将中国古代小说推向了鼎盛期。这一切,离开了小说的人物世界,都无从谈起。《金瓶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人物世界,使之无愧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之作。因此,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金瓶梅》确实确实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伟大巨著,其人物世界也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的一座丰碑。

周汝昌先生说:“《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写了

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景”。《红楼梦》中包孕的文化内涵自然是丰富深厚的，从文化学的角度加以探究，自会有无穷无尽的收获。但比之早一个多世纪问世的《金瓶梅》又何尝不如此。只是《红楼梦》更多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妙、美好、宏伟，而《金瓶梅》却主要反映了这一文化中丑陋、渺小、污秽的一面。二者的审美情趣不同，描写对象各异，但在认识价值与审美意义上，都是自己时代的佼佼者。《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结合，才能更完整地揭示中华文化的丰厚内涵。因此，从文化学的意义上，《金瓶梅》及其人物世界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里程碑。

张 兵

我认为，《金瓶梅词话》不是一部写“淫”的书，也不是一部言“情”的书，而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我提出这一观点，可能会使持“封建说”者大吃一惊，但我在反复阅读了作品后，始终作如是观。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第八十五回了。作者写庞春梅“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起，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她见潘金莲闷闷不乐，劝说道：“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这类描写，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我国传统思想认为，人与禽兽是有区别的，原因就在于人有“理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那套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禽兽则无“理智”，它可以不顾一切地获得欲望的满足。很明显，兰陵笑笑生借春梅之口所要表达的潜台词是：作为一个物质的“人”，应该很好地享受人生的一切欲望，他应该比禽兽能更好地满足和享受自己的欲望。当然，它还蕴含着对统治者扼杀人生

欲望的享受权利和不满的控诉。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这是评论《金瓶梅词话》的最早的少数文字之一,殊为珍贵。在这篇《序》文中,作者肯定了人对人生欲望的追求,指出“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引者按:意指过分的贪求)者”。“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动摇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缩复缩,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等等,都说明安享现世的幸福,乃人生的理想。可以说,“欣欣子”这篇“序”,是表现人生欲望的宣言书,也是我们理解《金瓶梅词话》的一把“金钥匙”。

英国现代著名的小说理论家爱·摩·福斯特说过:“人生的大事有五:出生、饮食、睡眠、爱情和死亡。”这当然是较多地从人的生理欲望来说的,除此之外,人类还有追求金钱、爱惜生命等这些人的物质上的欲望。周先生提出的“淫与情”、“酒色财气”等问题,都是人生的欲望,主要是物质欲望的表现。限于篇幅,这里只想稍谈一下书中有关“色”和“财”的欲望描写问题。

《金瓶梅词话》十五回开场诗说:“日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似飘蓬。点头才慕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发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这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崇尚现世享乐的思想,尤其是那种“依翠偎红”的生活,更是时人追求的理

想。然而“封建说”对此却往往和“淫”混为一谈，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周先生对“性爱”的“对象”、“标准”、“方式”、“目的”四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证后认为：“《金瓶梅》所宣扬的‘淫’，反映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腐朽性，对于人们是确有腐蚀和毒害作用的。”其实，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文艺作品只要一涉及到“依翠偎红”等“色欲”的描写，似乎就是罪恶之源，而且总是要沾上“淫书”的恶名，被斥为“下流”，甚至株连作者。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说明这种正常的、自然的人的欲望，是无法压抑的。文学作为社会现实和人的主观心灵的映现品，很难逃避对“色欲”的描写。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极赞赏黄霖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他说：“性欲问题被文艺作品正确地表现，正像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得到的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标志”；“人们假如把这种关系描写一古脑儿地当作瘟疫一样看待，实在是一种被假道学扭曲了人性的变态，是人类不能科学地把握自己，乃至否定自己的一种愚昧落后的表现”；“我们对于‘表现肉感和肉欲的作品，不能笼统地斥为诲淫。文艺作品正确地表现男女之欲，是与淫书有原则区别的’。兰陵笑笑生创作的《金瓶梅词话》并非为了宣泄‘奸夫淫妇’的乱淫，而是意在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这在‘封建说’者也是认识到了的，认为小说‘写淫人妻子、妻子淫人’，是着眼于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腐朽、黑暗，道德的沦丧、堕落，世情的势利、险恶，贪淫、好色的可恶和危害，对于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和世道人心的丑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既然如此，我们怎能用“淫”字来概括《金瓶梅词话》的文化特质呢？

在小说对李瓶儿的艺术描写中,这种对其“肉欲”的追求,表现得非常强烈。她生性“好风月”,先嫁给梁中书为妾,后和花子虚成婚,同时被花太监奸占。这都未能使她的生理欲望得到满足。后来见了西门庆,“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与其“私通”,经过一番“狂风骤雨”,才真正体验到幸福,所以不惜罄其全部家财,狂热追求西门庆,乃至迫害丈夫。当西门庆因朝中事未能及时完婚,她“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转踌蹰,忽听外面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话,绸缪缱绻,彻夜欢娱。鸡鸣天晓,顿抽身回去。妇人恍然惊觉,大呼一声,精魂已失”,“耐受不起寂寞,又嫁给了“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的蒋竹山。为此遭到西门庆鞭打的“下马威”,她竟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其描写欲望之强烈,为古今文学作品所罕见。从这些具体的描写来看,作者塑造李瓶儿这一艺术形象,乃在告诉人们:人有追求“肉欲”的天性,而且这种追求“肉欲”的渴望十分强烈。只有当它得到满足时,人才感到畅快和幸福。否则,心灵甚为压抑和痛苦。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与即将衰亡的那个腐朽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本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是自我的主宰者和幸福的崇拜者。但现实的社会环境给其带来的却是深深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所以,小说在客观上又暴露了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一个侧面——对人的天性的摧残。而以往的评论中,这一点又常常被人所忽略。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揭示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摧残时,又十分强调“上行下效”,把矛头指向上层的统治者。

如第七十八回中谈到“行苟且之事”时说：“自古上梁不正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这一动机。杰出的“金”学研究者张竹坡悟得此种真谛，在《读法》中评论说：“西门只知贪婪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山东齐鲁出版社，以下凡引张竹坡评语，均见该书）这里说的虽然只是“为人家主”的事，但信如评论者所说，在西门庆身上，有着皇帝的影子。“浸淫于欺主之风”的“主”，并非仅指西门庆本人，而是包括封建社会的最高主子——皇帝在内的整个统治集团。这或许就是沈德符、甘公、欣欣子所说的作品“指斥时事”、“盖有所刺也”和“寄意于时俗”等评语的缘由吧。倘以“封建说”而论，上述一切就很难解释得通。

对于“财”欲的描写，《金瓶梅词话》真是淋漓尽致。“但凡世人，钱财能动人意（第四回）；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正是作者反复表现的主题之一。

在兰陵笑笑生描绘的《金瓶梅》世界中，有了钱财，一切都能通行无阻。例如，苗青一案，只因西门庆受财一千一百两银子，就“贪赃卖官”，私放了苗青（四十七回）。关在安抚监狱中的扬州私商王四峰，也因许了二千两银子，才打动西门庆“对蔡太师人情释放”（二十五回）。西门庆的那顶“山东省理刑副千户”的乌纱帽，也是他用钱财从蔡京手里买来的。三十四回在描写蔡京收受贿赂时，有一段精彩的描写：“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_鞞仙人，良工制造费功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_紵缎，金碧辉煌；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_楮，如何不喜？”生动地表现了这位权贵对钱财的贪欲。

达官贵人爱钱贪财,平民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小说对“非钱而不行”的王婆这一艺术形象刻划得十分鲜明。“贪贿说风情”一节写西门庆在央求王婆设局骗奸潘金莲时,以“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相许。王婆就为贪此蝇头小利而帮衬西门庆成其“美事”。作品有多次强调王婆的这一思想动机的描写。第三回叙王婆定“挨光计”时对西门庆说:“却不要忘了许我那十两银子。”西门庆只得“就去街上买了细绢三匹,并十两清水好锦”,叫人立即送去。骗局成功后,王婆又向西门庆索讨:“你许老身东西,休要忘了。”不要交(教)老身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如愿后,她“一面欢天喜地收了,一连道了两个万福”。说明市井细民的财欲是何等的强烈!

尤可注意的是第五十六回,叙写常时节家中,因一时拮据,闹得夫妻反目,吵吵嚷嚷。谁知,常时节已从西门庆处借到十二两零碎纹银,小说这样描写:

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好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死要骂汉子,见了银子就来亲近哩!……”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市井生活图,形象地表现了人们对钱财的心态。难怪张竹坡要说:“此又写财的厉害。”

我们再来看西门庆。作为一个世俗的小商人,是颇懂得“财的厉害”的,故不择手段,拼命敛财,迅速“发迹”,

成为独霸一方，腰缠万贯的富商。在他的暴发户生涯中，亦集中体现出财欲的强大力量。如果说，西门庆看中潘金莲的是“色”，那么，他霸占孟玉楼、李瓶儿的动机则主要是为了“谋财”。第七回写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是一位颇有钱财的富孀时，他“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和薛嫂于第二天“就买礼往北边他姑娘家去探亲”，其贪财之状跃然纸上。张竹坡评曰：“西门庆既贪不义之色，且贪无耻之财”，可“见得财的厉害比色更厉害些，是此书本意也”，说得非常正确。李瓶儿固然生得美貌：“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细弯弯两道眉儿。”然西门庆更为看重的是她那一笔价值连城的珠宝和其它相当可贵的财产。他“安心设计，图谋这妇人”，设法害死花子虚和蒋竹山，连财带人，一古脑儿地夺占了，活现出一副贪婪凶残的面孔。吴月娘，本是小说精心塑造的一个贤德之妇的形象，和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李娇儿诸人不同，似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描写的。但她在夺占李瓶儿财产的过程中，始终是西门庆的得力助手。十四回写西门庆欲保管李瓶儿的装满“值钱珠宝好玩之物”的四口描金箱柜时，曾与月娘商量。吴月娘说：“银子便用食盒叫小厮抬来。那箱笼东西，若从大门里来，教两边街房看着不惹眼？必须如此如此，夜晚打墙上过来才隐密些。”可见这出“夺财”活剧的主谋人物也包括吴月娘。这一点，张竹坡看得很清楚：“乃食盒装银，墙头过物，主谋尽是月娘，传递又是月娘，又明言都送到月娘房里去了，则月娘为人，乃《金瓶梅》中第一绵里裹针系奸之人。”其“乘机利其财”的真面目表露无遗。第十七回描写西门庆吞没陈经济因避难而带来的“许多箱笼”，说明在他的眼里，追求财欲比亲情更为重要。“若要富，险上做”，为了敛财，真

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诚如欣欣子的《序》所说《金瓶梅词话》在强调表现人生的欲望时,也含有某种劝戒的说教,作者不主张“纵欲”,并用种种因果报应的“循环之机”来束缚之。兰陵笑笑生在书前所引的《四贪词》似乎强调的是对酒色财气的“劝戒”。后世评论者也大多引之为据,认为小说的主旨乃是否定和批判这些人生的欲望。“封建说”者则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说:“《金瓶梅》首先写了《四贪词》,把‘疏亲慢友’;‘背义忘恩’;‘损身害命’;‘强梁逞能’等种种社会人生弊病,统统归咎于人的自然情欲——嗜酒、好色、贪财、逞气”;“这是封建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表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性”;而“反对酒色财气,则符合封建禁欲主义的要求”;“反映了封建文化的专制性”;“两者同属封建文化”,这是我们很难同意的。纵观《金瓶梅词话》;“劝戒”的议论确实不少,但在具体的描写中,却又对人生的欲望的描写展现得栩栩如生。这说明处于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兰陵笑笑生,一方面在努力追求表现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却又在旧的传统文化发展的轨道上前行,难免会留下传统的烙印。表现在小说中的这种“两重性”,正是他主观世界的这种矛盾的反映。若我们再进一步探索,就会发现作者在全书没有反对表现人生欲望的艺术描写,其议论充其量也只是限制在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过分地放纵对人生欲望的描写这一思想框架内,这也就证明了他的种种软弱无力的说教,作者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避免统治阶级的迫害和争取读者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保护色”。我常常在想:如果作者真的如议论中所表达的思想那样,劝谕人们跳出酒色财气等人生欲望的“诱惑”,那又何必在小说中要如此具体

而细腻地去描写种种欲望得到满足后的愉快呢？所以，我认为《金瓶梅词话》是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一部小说，它所展现的那个世界，是“人欲”横流的世界。这是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文化特色之一。

魏崇新

在《金瓶梅》的世界中，人们遵奉的人生价值观与我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重利轻义，重物欲轻精神，贪私谋利成为人人追求的目标，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砝码，“义”则被人们踏在脚下，扫地出门。所谓“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西门庆就是因为手中有钱，才能够置道德礼法于不顾，肆意横行，无往不胜。他花钱买通资政殿大学士李邦彦，开脱了罪责，转危为安；他花钱孝敬朝中蔡太师，平步青云，由一个商人摇身一变而为山东理刑副千户，不久又转副为正；他花钱笼络巡盐御史蔡蕴，盗卖私盐，获取巨利；他花钱行贿临清钞关钱老爹，明目张胆地偷税漏税；他花钱勾引仆妇，包占妓女，以满足自己无尽的性欲……吴月娘劝他积善改恶，他却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

奸了织女 ,拐了许飞琼 ,盗了西王母的女儿 ,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五十七回)这是西门庆的人生宣言 ,也是他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在《金瓶梅》中 ,钱是人生的轴心 ,为了钱官员们可以卖官鬻爵 ,贪赃枉法 ;商人们唯利是图 ,不讲信义 ,帮闲篾片们不要人格 ,丧尽天良 ;妇女们不顾名节 ,出卖肉体 ,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铜臭味。文龙说《金瓶梅》所写的是“ 一群狠毒人物 ,一片奸险心肠 ,一个淫乱人家 ,致使朗朗乾坤变为昏昏世界 ,所恃者多有几个铜钱耳。”物欲横流 ,价值颠倒 ;“ 义 ”成为“ 利 ”的奴隶。面对此种状况 ,作者不由感慨道 :“ 家富自然身贵 ,逢人必让居先。贫寒敢仰上官怜 ,彼此都看钱面。”(三十一回)对金钱万能 ,忘义逐利的现象表现出忧虑和不满。

《金瓶梅》中的女性大多不是温柔敦厚的传统型的女性 ,她们压根儿就不知三从四德之类的妇德为何物 ,也不愿做道德鞭子下驱赶的羔羊 ,以个体私欲为中心 ,追求金钱与享乐 ,是她们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如王六儿、如意儿等为了贪图钱财 ,主动献身于西门庆 ,以肉体换取金钱和享受。潘金莲、李瓶儿出于个人的情欲要求 ,残忍地将丈夫置于死地 ,投向西门庆的怀抱。以传统道德衡量 ,她们都是不为人齿的“ 淫妇 ”。

《金瓶梅》以商人市民为主角 ,描绘了世俗社会的芸芸众生争名夺利、贪图享乐、尔虞我诈的生活场景 ,反映的是与传统价值观相背离的人生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念有似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所说的“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价值观 ,相对于“ 以人的依赖关系 ”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是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 ,它真实地反映出晚明社会的价值趋向。晚明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

新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同步进行,促进了思想与人性的解放,形成了一个反儒的文化断层,传统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被禁锢已久的人性如决堤的洪水汹涌奔流,好货好色、奢侈享乐蔚然成风,尽情地享用现实人生,满足个体的需求成为人生价值的中心,堕落与新生,传统道德与市民观念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兰陵笑笑生呼吸着时代的空气,体验着新的人生况味,观察着社会上纷繁奇异的景观,他欣喜、惊惧,也感到迷惑不解,他把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体验与感受都融进了一部《金瓶梅》,使《金瓶梅》不仅成为晚明社会的风俗史,也成为晚明社会的心态史。

《金瓶梅》真实地反映出时代价值的异动,作者在对这种价值的关怀中带有隐忧,他看到由于人生价值观的改变而激发起的人们追名逐利的巨大热情及内在生命力,也看到随之而来的由私欲膨胀而造成的人性堕落,他试图从传统道德中寻找医世治人的良方。在开篇的《四贪词》中,他揭示了酒、色、财、气四种人生欲望给人造成的危害,表明了自己的创作题旨,在《财》诗中说:“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他感到贪财图利会造成传统道德的沦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基于此,他一方面在作品中真切生动地描绘出人们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一方面又站在传统价值立场上对其加以否定,这种思想在西门庆形象的塑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对西门庆在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并给他安排了一个毁灭的结局,但在描写中间他又对西门庆有不同程度的肯定。如写西门庆仗义疏财、慷慨地救助常时节与应伯爵,捐钱修庙等。在书中作者以叙述者的口气称“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

都是赞叹他的（五十六回）。在西门庆救助常时节时，作者还大发感叹：“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一切万般皆下品，谁知阴德是良图。”称西门庆的举动是积善积德。作者还通过吴神仙之口赞西门庆：“这人一生耿直，干事无二，喜则和气春风，怒则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财，不少纱帽戴。”当然作者对西门庆的肯定仍是从传统的仁义观出发的，这正显示了他要以传统之“义”而补救现实之“利”带来的弊端的思想。对西门庆形象的矛盾展示，揭示出作者思想的矛盾，他既依恋于传统的“义”的道德价值，又欣赏着现实之“利”的人生价值，并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结果是力不从心，适得其反。由于作者的思想徘徊于“义”“利”之间，所以他对《金瓶梅》中以个体利欲为主调的人生价值就持有双重的态度，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游移不定。当他站在传统卫道的立场上时，他对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行为价值给以谴责批判，而当他从市民意识出发时，他则对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价值追求给以宽容与同情，传统道德与市民意识在他的头脑中不断交战，造成了他心态的失衡与创作的矛盾。

《金瓶梅》：一个关于“善”的寓言

曾庆雨

廿公在《金瓶梅词话》“跋”中就曾指出，该书是“寓言”。

这部长篇巨制的百回“寓言”，所寄寓着的究竟是什么？它宣泄着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情感呢？

任何一部面世的文学作品，实在是作者的一种社会体认、人生观、价值观等的表述。作品既是创作主体的思维话语，又是客观世界反映于主观感受的社会信息代码。明代嘉靖以后，由宋代以来形成的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西门庆便是一个居住在城镇里，以经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城里的商人。作者通过写这个不学无术的暴发户的家族兴衰，来辐射人世诸性，网络社会各方。因此，《金瓶梅》所反映的正是晚明社会经济增长的新因素对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冲决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金瓶梅》多层次（从九五之尊的皇帝到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多侧面（有政治、经济、官场、商场等）、多角度（官文

化、商文化、儒、道、释文化等)地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立体的反映和揭示,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实属空前。由此,作品给今天的人们以启示和思考的问题也就不会是单一的。作品写了男女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贪得无厌的物欲追求,以及超乎人之常性的性欲满足,旨在强调“色”对人的危害,劝诫世人要警惕“酒、色、财、气”人之“四病”的侵害。然而,透过这种古代艳情小说常用的套路模式,仍不难找到其中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社会心理对人们行为的严重影响。

小说中的西门府,性关系几乎成了人际关系的一种必然纽带。欲,是西门庆潘金莲们之所求。怎样看待,又如何对待作者这种写作态度?学术与非学术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有必要指出的是,性问题是文学最易对这个社会的人的心态进行本质把握,也是对这个社会所引导出来的人性最直接最本质的暴露。因为,一个社会普遍的性心理和性观念,正是这个社会道德教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民众文化素质高低的指数。透过西门府及其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中一些人能对另一些人进行“性”索取、“性”买卖和“性”压榨的描写,人们看到的晚明是一个政治黑暗、文明失落,道德沦丧的末世社会。在城市商业经济的“催化”下,人类本能的欲念急剧膨胀,用西门庆的话讲:“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以他们的行为心理看,指导其行为的原则是“我想要”的个人欲望、自我满足心态的极度扩张,造成他们强烈占有欲和感官满足的需求。占有才有愉悦,满足带来快感。“我”即是一切,全不管他人怎样。他们痛苦的是“我”之不能实现,他们惆怅的是“我”之不能满足,他们

信奉的是由金钱换取的权势与金钱构成的财势相结合后的“霸道”。小说所指斥的“酒、色、财、气”四病，正反映了那个极度变形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状况。

其实，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提供了人有追求生活享乐的物质资本，也成就了人唯利是图的目光和胸襟，这本就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共同特点。不仅暴发户商人要追求享乐，达官显贵，文士墨客也同样被财富激活了享乐的欲望。财富为政治的腐败提供了可行性，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腐败形成恶性循环。《金瓶梅》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悲情的世界：人们为金钱和利益不择手段，小民不惜为盗为娼出卖人格；权贵政要不惜枉法贪赃，受贿鬻爵；状元郎廉耻丧尽没有了灵魂；地方官鱼肉百姓失尽天良……“整个社会除了算计和获取之外，再无任何精神价值标准”。（伍立杨《雨中黄叶树》）

是拥有财富的错吗？当然不是。是人有欲望的不该吗？回答仍是否定的。因为，财富并非万恶之首，欲望也具有人的本性的合理内涵。问题的关键是财富如何运用，欲望该怎样实现。对此，小说的作者是有所思考的。尤其是晚明以人的觉醒为主旨的哲学思潮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介入，也势必对作家产生影响。

晚明大学者李贽，祖上曾是富商。他就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他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提出“人欲即天理”，具有了一种要求以个体需求替代以往整体利益牺牲个体的思想萌芽。而以文人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更以自己的言行与李贽的学说互为声气。注重人的个性和价值的哲学思想与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文学创作相结合，形成晚明社会颇有影响的一种文化势力。另外，新兴的市民阶层

以其充满勃勃生机的创造力,向社会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活方式。以享乐为主的生活追求,改变着长期以来社会对个人利益的漠视和否定。在对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进行修正与背离、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产生严重冲击的同时,也产生出对传统文化建构,精神信念,价值评判,伦理道德观等意识形态多个领域变革的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由于专制所需,统治者总是强调个人应以自我牺牲精神向社会尽义务,并常常是以多数人的牺牲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这些被满足的少数人却是应更多向社会尽义务的权贵政要、豪门富绅阶层。尤其是社会在要求个体自我牺牲的同时,却没有给予个人以实现自我的足够权利。程朱理学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论调,就是对个体生命价值极端轻视的明证。

晚明时期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生存意识。生活节奏的加快,商业贸易的频繁等,都要求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个人对机遇单刀直入的把握。这一切对个性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好处,也带来了人们对在精神上背负千年的“道统”积淀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反拨。所以,这场以思想文化界为首起,以世俗大众为落实的变革,给晚明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新意。就连西门庆也能说出“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这样富有理性意味的话,可见出晚明人对“本性”合理性认识的普遍。可惜的是,以李贽为首的张扬个性、重视“本心”的“人的觉醒”的思潮,随着李贽被迫害致死而没有了结果。思想的“夹生”,必然导致行为的失衡。对人的自然本性长期受到压抑的“矫枉”已然过正,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本伦理道德准则和秩序大受打击,对人行为的规约力也大为减

弱。《金瓶梅》中的人们陷入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诚如马克思所言：“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都是动物的机能。”西门庆潘金莲们、蔡太师宋御史们对现世功利如此执着，完全放弃了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了社会责任感，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有自我感官满足和欲望实现，呈现出来的便是非人性超过人性的丑陋与无耻。

试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当权者和富人都放弃了他们应负的社会责任，抛弃维系社会之根本的行为道德准则，只以向社会索取财富为己任，向社会索取利益为价值选择，那么，又凭什么要求“衣食常不周”的平民百姓规规矩矩，而不去做男盗女娼的事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瓶梅》让人提出了进步的追问：

为什么社会经济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带来的不是进一步的文明与进步，而是物质与精神的背离？是否人在获取物质财富的同时定要丧失对精神财富的拥有？

为什么每一次社会转型之际，人总要付出现世道德价值取向的畸变，人性遭受摧残，灵魂无所归依的沉重代价之后，才在遭受重创的情感世界里步履蹒跚地寻找着精神家园？

是不是要到社会彻底失去了对人的行为道德价值的评判力之后，才懊恼地呼喊“道德重建”？

确实《金瓶梅》的世界让人悲哀。它让人看到进入末世晚明的社会，有着太多无法清除的积弊，有着太多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和内忧外患。其时的人们，既受到“紫陌春光好，红楼醉管弦，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这种

生命有限 ,人生苦短 ,要即时行乐的现世享乐生活观的浸染 ,但又不能从中找到生命意义体现的希望。作者在情感上对富于激情活力的新生活着迷欣赏 ,理智上又不能完全接受新生活方式对道德伦理中合理内涵的彻底打破。这种情与理的矛盾使其创作出现失衡 ,使其人物也既承受着道德伦理制约的重压 ,又难以从充满诱惑的现世利益中退步抽身。

浮生世事中 ,既求得自我精神的完善又享有充足的物质生活 ,这是理想的人生境界 ,可怎样才能鱼与熊掌兼而得之呢 ?

笑笑生把他的思考形象地展示于小说 ,化成他笔下一个个人物鲜活的生存态势与命运走向 ,在人与社会诸多问题的全景式描写中 ,暴露与呈现相结合 ,指出人性善与恶仅是一念相隔的微妙之道。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思考一直延续到今天。

笑笑生面对在个性觉醒后的狂放不羁与功名利禄的现世追求 ,对在“财、色”中显身手 ,在“酒、气”里找慰藉的人们进行严肃的道德评判时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而无可奈何。

《金瓶梅》是一个讲述人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 ,曾经迷失过路径、经历过大悲大痛的寓言故事。寄寓其中的人性本质追问 ,穿越几百年时空隧道 ,仍叩响着心灵的大门 ,不是吗 ?

孔繁华

明代嘉靖皇帝好道教，好神仙之术，乞长生不老之药，排斥佛教，以致毁佛灭寺。在道士的蛊惑下，皇帝沉醉于炼丹、服药、斋醮之中，朝政俱废，效庙、朝讲、召对、面议亦有名无实。在这种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便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表现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在神魔小说家的作品中出现了扬佛贬道的描写内容。约产生于万历时代或稍后的《金瓶梅》，虽然看不出贬道的迹象，但似乎也有一点扬佛的倾向。这从主要以佛家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的教义构架全书，制约人物的性格、命运和最后的归宿中，似可看出作者对佛教的教化作用比较重视，虽然主要人物西门庆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道教，但是他的罪孽在阴间所以能得到削减，并能转生为人还投胎于京中的富户人家，全赖行善积德的佛徒吴月娘的功德。作者把“普静师荐拔群冤”作为一百回大书的结尾，以了结书中诸人的恩怨、因果。月娘“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此皆

平日好善看经之报也”。相比起来,道士与道教的法事活动,却没有显示出多大法力,吴道官的斋醮、钱疼火的斋醮均没有保住官哥的生命,道士们的祈禳活动,也没有祛除瓶儿身上的邪祟,连善驱邪的五岳观的潘道士面对身染沉疴的李瓶儿,也只好说她因“获罪于天”而束手无策了。即使能掐会算的吴神仙,面对昏迷不醒的西门庆也只有说“造物已定,神鬼莫移”而无可奈何了。我们虽然不宜就此作出作者贬道的结论,但其扬佛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

顾先觉

《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这似乎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并非如此。笑笑生（姑且以笑笑生作为《金瓶梅》作者的代称吧）创作一部《金瓶梅》，不另立门户另起炉灶，却以《水浒》故事引起全书，是不是想借用当时《水浒》就已经有了的巨大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迄今为止，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当然谈不上了解作者，也就无法肯定笑笑生是不是出于这种目的。但是，如果推情详理地想一想，也许作一否定结论并不会完全是错。因为，如果是一个文才不高的人，自己写不出惊世骇俗之作，借用别人作品的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是可能的。但《金瓶梅》并非泛泛之品，谓之为艺术技巧高超、思想内容博大的不朽之作，是不过分的。能作此书者，其自信与自尊是不待言的，决不耻于借用别人影响荫庇自己。

那么，是不是笑笑生想以相同题材而用完全不同的创作构思来“反对”《水浒》所

体现出来的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也同前一问题一样，我们不能妄作结论。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金瓶梅》与《水浒》并非同一题材。《水浒》是演史，《金瓶梅》却是描写市民生活（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但与《水浒》所演之史是有区别的），《水浒》描写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金瓶梅》却是描写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其着眼点与题材范围均迥然相异，怎么也谈不上是同一题材。如果说创作构思，《金瓶梅》确实与《水浒》大相径庭。《水浒》写好人经过多灾多难的折磨以后能取得胜利，都能痛痛快快地报仇雪恨，《金瓶梅》却是坏人得呈，好人沉冤无告，《水浒》写朝廷还能赦宥梁山英雄，并招安封官，认真当作一种力量去使用，《金瓶梅》却写始终是奸臣当道，昏庸政治无可救药，《水浒》既写黑暗又写光明，既写坏人又写好人，正义拥有相当市场，《金瓶梅》写权势金钱万能，乱伦败俗成风，无正气可言，一片黑暗世界，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好人，也是没有好下场（如御史曾孝序）……等等。总之一句话，《水浒》是带有浓厚的作者理想和人民愿望的作品，《金瓶梅》却是一幅封建末世现实生活的画卷。二者创作构思确实截然不同，就此而言，《金瓶梅》确实是对《水浒》的一种“反对”。但是，这何止是对《水浒》的“反对”！这是对《金瓶梅》之前所有小说创作构思的“反对”。全面“反对”，就不再是“反对”，而是创新！事实上，《金瓶梅》从题材范围到创作构思，都是一种划时代的首创。既如此，又何必要借呢？

同时，创作构思不同，并不等于笑笑生与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们二人对生活的理解都差不多，而只是创作意图各异，一个旨在倡导正义歌颂英

雄讴歌理想倾诉愿望,一个旨在如实反映现实暴露批判黑暗,也未尝不可。

因此,借取《水浒》是为“反对”《水浒》创作构思的设想也是不能成立的。

是不是笑笑生在阅读《水浒》读到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时,突然联想到现实的市井生活,顿时萌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借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作为引子,演绎出洋洋百万言的《金瓶梅》巨著?不能排除偶然产生灵感的可能性。但,偶然灵感的产生,创作一篇短文或作一首诗一阕词是没问题的,而要作出如此一部长篇巨制,没有事先的思想基础单靠灵感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从《金瓶梅》的丰富思想容量和多方面、多层次的描写看,也不是偶然灵感的产物。故,这一设想照样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金瓶梅》到底为什么要借取《水浒》?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是演史,或是歌颂英雄,或是倡导正义,或是讴歌理想倾诉愿望,或是反映现实,或是暴露黑暗批判谬误,或是抒发感情,或是吟景咏物,或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品,总是有着某种创作意图的。要弄清《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必须首先弄清《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一个在不了解作者之前很难结论的问题。但就《金瓶梅》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其创作主旨还是可以窥见的:反映现实,暴露批判现实政治的昏庸、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世风颓败,发泄自己的不满;记载保留当时人们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史料;开创创作长篇小说的新领域、新途径,树一代创作之新风;借作品倾诉作者自己在极不得志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变态心理。如果这样推断

《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无大错的话，则《金瓶梅》完全可以不作任何借取，直截了当地开篇即可。不过，怎样开篇为好，笑笑生却面临着两条道路：要么直截了当抨击时政，代价是坐牢，甚至杀头，更甚至是九族遭诛；要么借古讽今，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致招祸。当然地，凡不是傻瓜者均会选择后者。

借何时之古讽今？借什么样的古讽今？借来之古与今毫无相似之处则不能讽今；借古而无半点古之史实则令人一见即疑，全用古史而不掺入今事，亦不能讽今。这一系列问题，笑笑生早已见到。

第一个问题便是借何时之古，借什么样的古？明嘉靖、万历年间，人们最痛恨的事莫过于严嵩一党奸贼弄权，弄得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不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排挤打击，因而他们更是痛恨刻骨。要抨击时政，要讽今，当然地首当其冲的目标是严嵩一党奸贼及其遍布全国各地的爪牙——贪官污吏与地痞流氓。那么，何时之古与此相似？通观明以前的中国历史不难看出，北宋末年蔡京一党专权误国最相似不过。于是笑笑生便选取了蔡京奸党误国的历史作为“古”而借来讽今。

借古而一点不叙古事，一是情理逻辑不合，二是讽今之实便昭然若揭，叙古事太真太多又易把读者引入歧途，达不到讽今的目的。《水浒》所写故事，既据历史，又有虚构，真真假假，且当时已有很大影响。借取《水浒》某一情节引起全书，并在书中不时穿插一些《水浒》人物，赋予他们一些行为情节（《水浒》上未曾描写的行为情节），既像是确确实实在写宋事，而又不会让人看不出讽今的主题，这是再妙不过的。《金瓶梅》看似写宋代事，却描绘出一幅明代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思想观念、道德观

念等丰富多彩的画卷 ;书中既有宋代职官名又有明代职官名 ,既有宋代史实又有明代史实 ,或是与明朝历史相似的宋朝史实等等 ,都是笑笑生借古讽今原则的体现。

《金瓶梅》不愧为借古讽今的优秀之作。

借古讽今就是《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理由。

其次《金瓶梅》通篇的山东方言与山东生活习俗 ,说明笑笑生可能就是山东人。山东人写山东事当然便利得多。而《水浒》故事也是发生在山东 ,借取《水浒》便显得更加自然 ,更加得心应手。这是《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的次要理由。虽然《金瓶梅》中也有北京和吴地的生活习俗与方言 ,但却不是主要的。这说明笑笑生可能还在北京和吴地生活过 ,写作时自觉不自觉地用上了 ,或是有意用上 ,以给后人考证作者留下一些线索。

至于《金瓶梅》为何不借取《水浒》的其他故事而独独借取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 ,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是《金瓶梅》的题材内容决定的。

潘承玉

《金瓶梅》和《红楼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艺术描写，在相近中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金瓶梅》是淫描写，《红楼梦》是带有近代性爱色彩的“意淫”亦即准性描写，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则是典型的现代性爱描写。这种不同固然在于三部作品采用了不同的审美创造形式，还在于三部作品所由诞生的时代的不同，作者暴露和歌颂的主题的不同。

就时代而言，《红楼梦》置身于“康乾盛世”，初步民主主义思潮经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发动和宣传，正日益在青年男女中扩大着影响，酝酿着社会生活的新变。贾宝玉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时代的思想，三者可以说是合拍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处在包括性爱在内的广泛人性，在经受大工业社会的异化之后，又发出重归自然的呼声，纯粹自然吸引的亚当和夏娃式的性爱神话又重新复活的时代。知识女性康司丹斯从虚伪的上流府邸走出，和园工梅洛斯

的彻底结合,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而《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社会正是一个淫风浓炽、百病俱生、垂垂待毙的时代,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正在进行,而积累了的原始资本又找不到出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了却由于主客观原因无法壮大的时代。何满子先生曾经深刻指出,西门庆“多财货而恣欲”,实际上象征了中国历史上“当钱不能获得正当运用,既然会产生罪恶的效应,那么表现在人生现象中也必然是丑恶。因此《金瓶梅》的性生活的秽褻描写便是对历史的忠实,倘若把西门庆、潘金莲等人写得十分高雅,十分含蓄,就不但有背于人物性格的真实,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就没有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了”。

就主题而言,《红楼梦》选取上流贵族闺阁女子的娴逸风情,歌颂她们未染尘滓的美好心灵,悲叹她们“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不幸结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将梅洛斯的园林置于查泰莱男爵的社会圈子之上,侧重表现抛弃虚伪豪门礼教,从肉体结合到灵魂交融、灵肉一体的性爱的合理和正当。《金瓶梅》则选取市井棍徒的生活图景,侧重暴露和批判封建末世的丑恶本质。正是这一主题决定了兰陵笑笑生采用了通过审丑来审美的审美创造形式,并在审丑的视角上展开了审淫的画面,也就是说,正是这一主题决定了《金瓶梅》的有关房事描写只能是淫描写,而且是斥淫描写。

有人承认一个作家有“写什么”的充分自由,但对于“怎么写”,又不免颇多拘执。其实,“写什么”与“怎么写”在创作过程中是很难分开的,承认一个作家具具有“写什么”的自由,也就承认了他具有“怎么写”的权利。归根到底,“怎么写”的问题仍然是“写什么”的问题。《金瓶梅》既选定以西门府为中心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不正当性

关系为其全面否定现实的突破口,很难想象,它不在这些突破口上多做些文章。有人摆脱不了传统“诲淫”的思想阴影,指责《金瓶梅》的淫描写连篇累牍,津津乐道,似在有意无意地美化它,仿佛兰陵笑笑生也和西门庆一同堕落了。其实,如果我们也像金圣叹“放开巨眼激射”《水浒》一样观照《金瓶梅》,不难发现,兰陵笑笑生的大量淫描写文字,既是“写什么”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怎么写”上也基本没有不健康的情趣流露,相反,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淫活动的深恶痛绝。

别林斯基在谈到果戈理作品的成功奥秘时说:“不证明,也不推翻什么,就靠了十分忠实的揭示事物的特征,或用确切的比较,或用确切的推断,或干脆用如实的描写,十分鲜明地把事物的丑恶表现出来了,这样地来扑灭它。”这最后几句话用在《金瓶梅》身上,不是最恰当不过吗?张竹坡深谙此理,在其评点过程中盛赞《金瓶梅》“写其十二淫,一百二十分轻贱”;“递映丑绝……以丑其人”,“其正之之处,其胜于杀之割之也”。我们看到《金瓶梅》写淫有两种文字,一是直接的白描文字,是具体实写,无情地借写淫活动中的污秽之物、不堪之行、扭曲之心来批判淫活动的丑,如“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一段。二是间接的骈俪文字,往往借博喻来虚写,更能达到唐突人物、丑化淫行的目的。如第八十三回写陈经济、庞春梅、潘金莲三人共淫的一段:“一个不顾夫主名分,一个哪管上下尊卑。一个椅上逞雨意云情,一个耳畔说山盟海誓。一个寡妇房内翻为快活道场,一个丈母跟前变作污淫世界。一个将西门庆枕边风月尽付于娇媚,一个将韩寿偷香手段悉送于情娘。”这些文字不是明显地流露出强烈的嘲讽、挖苦、唐突、否定的倾向吗?

作者对淫的贬斥还体现在为这个淫欲世界的主人公所安排的‘死’的结局及其方式上。死，一了百了，是对其生存权和合理性的最后、最直截了当的否定。西门庆死在潘金莲身上，庞春梅死在家奴身上，是直接死于淫。李瓶儿为淫酿成血崩之病，并事实上因淫而害死丈夫花子虚而从此永怀负罪之心，两相结合，郁郁而亡；潘金莲为淫而被吴月娘逐卖，又将淫的希望再度寄托武松身上终被武松诓去刀割而死；宋蕙莲因淫而致祸丈夫来旺，良心复萌羞耻自尽；陈经济因淫而害人又被人所害。张竹坡以为“《金瓶梅》是部惩人的书，故谓之戒律亦可”。不妨可以更直接点说《金瓶梅》是部惩淫的书，戒淫的书。这既非宣扬“女人祸水论”，更与宣扬“性恐怖论”无涉，因为淫——邪恶、不合礼教、勉强、过度、非时非地的肉体关系，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是有损人格、为人鄙弃、也应该鄙弃的丑恶！

一句话，西门府是污秽的，《金瓶梅》是纯洁的。它就像罗丹的雕塑“老妓女”，丑固丑陋不堪，美亦美玉无瑕。

朱一玄

(1) 沈姨夫、韩姨夫——书中有吴月娘之大姐吴大姨和孟玉楼之大姐孟大姨，并有沈姨夫和韩姨夫两位姨夫。但他们彼此的夫妻关系书中却并未写明。现在根据下面两方面的描写，认为韩姨夫是孟大姨之夫。一是第六十五回写李瓶儿之丧，孟玉楼之弟孟锐从外边经商回来，跟随大姐夫（书中写作韩姨夫）一道去上祭，又在第六十七回写明孟锐住在大姐夫那里，不久就要从那里离开。二是第七十二回写孟玉楼生日，西门庆家发帖请孟大姨和孟二妗子，又第七十四回写她们两人都到了（七十四回写来的两人是韩大姨和孟大妗子，走的时候又写成孟大姨和孟二妗子，可知韩大姨和孟大姨是指同一个人，但来的两人中的孟大妗子，却应是孟二妗子之误，因为从上下文看，请的是孟二妗子，走的是孟二妗子，来的就也该是孟二妗子），请的和来的人中，都把“孟大姨”写成“韩大姨”，也就是表示她嫁给了韩家。这里我们就有理由把

韩姨夫列为孟大姨之夫,也可以把沈姨夫列为吴大姨之夫。

(2)孟锐——孟锐是孟玉楼之二哥还是兄弟,书中前后写的不一样。第六十五回写李瓶儿之丧;“第二日,先是门外韩姨夫来上祭,那时孟玉楼兄弟,外面做买卖去了,五六年没来家,昨至是来家,见他姐姐嫂子这边有丧事,跟随韩姨夫那边来上祭”。又第六十七回写孟锐到西门庆家来辞行;“只见孟玉楼走入房来,说他兄弟孟锐,在韩姨夫那里,如今不久又起身,往川广贩杂货去,今来辞辞他爹,在我屋里坐着哩”。这两处都说孟锐是孟玉楼的兄弟,可是到第九十二回写孟玉楼三嫁李拱璧后,陈经济假冒孟二舅之名去见孟玉楼;“孟玉楼正在房中坐的,只听小门子进来,报说:‘孟二舅来了。’玉楼道:‘一二年不曾回家,再有那个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锐来家了,千山万水来看我?’”在这里,孟锐又成了“二哥”了,显然是写错了。因为接着写下去,孟锐又成了“兄弟”。“只见衙内让进来,玉楼在帘内观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陈姐夫”。所以,本人物表,把孟锐列为孟玉楼之弟。

(3)张关——张关在全书中均写作张团练,只在第六十四回写众官员祭西门庆的祭文中,把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夏提刑四人的名字,写作“周秀、荆忠、夏延龄、张关”。本人物表认为祭文中一般是用正名的,即据以订为张关。第三十四回写周秀派人送信给西门庆,说“明日与新平寨坐营须老爹送行,明日在永福寺摆酒,也有荆都监老爹、掌刑夏老爹、营里张老爹,每位分资一两”。这“营里张老爹”,应即指张关。理由有二:一是从官职看,荆都监、夏提刑、西门庆、张团练等,是应该并列的;二是“营里”张老爹,官职与姓氏也正好与张关相合。又第四十

一回写西门庆说“前日荆南冈，夹及营里张亲家，再三赶着和我做亲”。这“营里张亲家”，也应是张关。职位与姓氏，均与张关相合。为什么称“亲家”呢？这是因为张关是西门庆的亲家陈洪的内弟，是亲家陈洪的同辈亲戚，西门庆也顺口把张关称为亲家。还有第六十三回写李瓶儿之丧，西门庆家曾使王经“往张亲家爹那里借云板”，这“张亲家爹”没有特别指明是另一个人，自然也应与张关是一个人。

(4)张关之妻——张关在第四十一、第六十三回已被西门庆这边称为“张亲家”，张关之妻也就随着被称为“张亲家母”。第四十回写西门庆家“发柬，十四日也请他（乔洪）娘子，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娘子、夏大人娘子、张亲家母”。以书中经常把周秀、荆忠、夏延龄、张关四人并提的情况看，这“张亲家母”，便正好是张关之妻的地位。第七十八回中，一处提到“张亲家母”，一处提到“张亲家夫人”，情况也和第四十回相同。至于第四十八回写西门庆家清明节上坟，“堂客请了张团练娘子张亲家母、乔大户娘子、朱台官娘子、尚举人娘子、吴大妗子、二妗子、杨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吴大姨、孟大姨、吴舜臣媳妇郑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其中的“张团练娘子张亲家母”也仍是指张关之妻一个人，意思是说，从张关方面说是妻，从西门庆方面说是亲家母。这还可以从书的行文体例得到证明。就在同一段引文的末尾，“吴舜臣媳妇郑三姐、崔本妻段大姐”，都是一个人从不同的两个方面有两种称呼。

(5)冯金宝——本是临清冯家妓院妓女，陈经济娶为妾，后又卖在郑五妈妓院，改名郑金宝儿。

(6)乔皇亲——书中的乔皇亲，有职位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乔五,曾做世袭指挥使;一个是乔五的侄子,袭了乔五的官职。这在第四十三回已经说清楚:“乔五太太道:娘子是甚么说话,想朝廷不与庶民做亲哩。老身说起来话长,如今当今东宫贵妃娘娘,系老身亲侄女儿。他父母都没了,止有老身老头儿在时,曾做世袭指挥使。不幸五十岁故了,身边又无儿孙轮着,轮着别门侄另替了,手里没钱,如今倒是做了大户。我这个侄儿,虽是差役出身,颇得过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门户。”本人物表,除列乔五、乔五太太两人外,所列乔皇亲,就是指的袭官的侄子。

(7)苏氏——云离守之妻,第七十八回写为苏氏,但到第八十七回又写为范氏。本人物表列为苏氏,认为范氏可能是苏氏之误。

(8)来安——第十五回写正月十五日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到狮子街李瓶儿处看灯,已有来兴、来安、玳安、画童四人跟随,到第二十回写西门庆娶李瓶儿过门后,又写“又买了两个小厮,一名来安儿,一名棋童儿”。同是一个来安儿,在娶李瓶儿之前已经在西门庆家,到娶李瓶儿之后再写“又买”,这不是前后重复了吗?又第六十八回写黄四之男仆也叫来安,和这里的来安姓名相同,也是书中的疏漏。像这种两个人物,甚至三个人物同姓名的情况,书中时有发现,将在后边各该人物名下指出。

(9)崔亲家母——这个崔亲家母,曾于第四十一回被请至乔洪家,又曾于第四十二回、第六十三回、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四次至西门庆家,但均未写明她和其他人物之间关系。这里把她列为崔本之母,只是因为乔洪和西门庆的亲戚中,只有乔洪的外甥崔本姓崔,不过其中也有问题,乔洪外甥的母亲应该称呼姐姐,不能称呼亲家

母。那么，这亲家母的称呼，就只能从乔洪、西门庆还有吴铠等人和她都是亲戚又辈分相同的一般意义上去理解了。

(10)段亲家——第六十三回写李瓶儿之丧：“那日乔大户邀了尚举人、朱堂官、吴大舅、刘学官、花千户、段亲家七八位亲朋，各在灵前上香”。这个段亲家只在此出现一次，又未说明他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人物表中很难有确切位置。这里作为段大姐之父处理，只是因为乔洪、西门庆等几家中，只有段大姐这一家姓段的亲戚，而且辈分又相合。

(11)王二老爹——书中写王皇亲，都没有名字，只有第五十八回写西门庆过生日，叫妓女郑爱月儿不到，说是被王皇亲家叫去了，西门庆生气，便叫玳安吩咐说：“你多带两个排军，就拿我个侍生帖儿，到王皇亲家宅内，见你王二老爹，就说是我这里请几位客人吃酒，这郑月儿答应下两三日了，好歹放了他来。”于此可知王皇亲主人是王二老爹。

(12)蔡京之子女——《金瓶梅词话》对于蔡京之子女，说得不清楚。本人物表，是参考《宋史·蔡京传》和《水浒传》编制的。《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说：“蔡京……子攸、恁、恁，攸子行，皆至大学士，视执政。恁尚茂德帝姬。季子绦。……子八人，恁先死，攸、恁伏诛，绦流白州死，恁尚帝姬免窜，余子及诸孙皆分徙远恶郡。……攸字居安，京长子也。”这里写蔡京有八子，长曰攸，以下是恁、恁、恁，季曰绦。其中恁尚帝姬。《水浒传》第十五回、第六十四回写到蔡京的女婿梁中书和他的女儿。又第三十九回写到蔡京之第九子蔡九知府。本人物表，列蔡大爷、蔡攸为一人，是蔡京之长子；列蔡四老爷、蔡京之四子为一人；

列蔡五老爹为蔡京之五子，列蔡修、蔡京之九子为一人，即蔡九知府；列梁中书为蔡京之婿；列蔡氏为蔡京之女，梁中书之妻。

(13) 巡察使——这是这个人物官衔的简称，全称是提督京城十三门巡察使。按这里的行文体例，这个人物应该是有姓名的，因为这里写的朱太尉“本衙堂上六员太尉”都是有姓名的。原文是：“本衙堂上六员太尉到了，呵殿宣仪，行仗罗列，头一位是提督管两厢捉察使孙荣，第二位管机察梁应龙，第三管内外观察，典牧皇畿，童太尉侄儿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门巡察使，第五管京营卫缉察皇城使窦监，第六督管京城内外巡捕使陈宗善。”既然其中五个人的官衔后边都有姓名，这第四个人也同样应该有姓名。这里漏掉姓名，不应是作者的疏忽，很可能是刻印者的错误。

(14) 刘太监——第十七回、第二十一回和第三十一回以后都出现刘太监，本人物表因他们的住所不同（第十七回的刘太监在东街上住，第二十一回的刘太监在北边酒醋门住，第三十一回以后的刘太监在南门外庄上住），列为三人，还有在南门外庄上住的刘太监，是管砖厂的，时常和皇庄的薛太监和西门庆往来，是太监中比较重要的人物。

(15) 姚二郎——第十回、第四十一回、第八十七回已有武植之邻居姚二郎，第八十八回写杨光彦之姑父也称姚二郎：两人的称呼相同。

(16) 张胜——第十九回写受西门庆支使打蒋文蕙的有“过街鼠”张胜，即第八十七回以后出现的周秀之亲随张胜。

(17) 王四峰——第二十五回：“西门庆前边陪着乔大

户说话 , 央及扬州盐商王四峰 , 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 , 许银二千两 , 央西门庆对蔡太师人情释放。”第二十七、第三十回接着写西门庆派来保向蔡京行贿 , 蔡京差人下书与山东巡抚侯爷 , 果然就把王四峰释放了。这件事情的前后脉络是很清楚的 , 说的只是释放王四峰一个人。只是在地名和人名上出现了纷歧 , 以致使人迷惑不解了。以地名来说 , 前边说是“扬州” , 后边又说是“沧州” ; 以人名来说 , 前边说是“王四峰” , 后边又说是“王霁云”、“王四” , 岂不是自己在制造混乱吗 ? 本人物表只列王四峰一人 , 把“王霁云”、“王四”作为别名处理。

(18) 黄宁儿——列黄宁儿为黄四之子 , 是因为在第五十二回中把李锦和黄宁儿并举 , 又在第四十五回中已写明李锦是李智之子 , 所以可知黄宁儿是黄四之子。又在第六十七、第九十七回中只提黄四之子 , 未写出名字 , 也看作同一个人。

(19) 安童——第七、第七十七回已写杨姑娘之男仆名安童 , 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回又写苗天秀之男仆名安童 , 到第九十三回再写王宣之男仆名安童 : 三个人的男仆都使用安童这个名字 , 未免太缺乏变化了。

(20) 来定——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回有吴镗家之男仆叫来定 , 第六十八回又有黄四之男仆叫来定 , 第七十九回还有花子由之男仆也叫来定 : 三人用相同的名字 , 显然作者在给人物命名方面未能密切注意。

(21) 周义——第九十七回以后已有周秀之男仆名周义 , 到第一百回写抗金将领中又有领青兗之兵的周义 : 两人用了相同的名字。

(22) 兰花——第八十九回已写吴大妗子之女仆名兰花 , 到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九回又写庞春梅嫁周

秀后所用的丫头中也有兰花 :两人的名字重复了。

(23)王婆——第一回起写王婆给西门庆、潘金莲说媒 ,第一百回吴月娘梦中所见给她和云离守说媒的也叫王婆 :两人名字相同。

(24)金儿——第五十回写鲁长腿妓院妓女名金儿 ,第九十四回写临清潘家妓院妓女又名金儿 :两人用了相同的名字。

李时人

《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一部惊世之作，它不仅具有超乎一般作品的小说史意义，同时也是一部有着非常历史文化意蕴的小说。

尽管在这部中国 16 世纪的文学巨著中，创造和因袭、弘大和卑琐、深刻和浅薄、质朴和庸俗奇怪地混杂在一起，经常迷乱读者的阅读和思考，使一般读者甚至批评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于顾此失彼的误读，尽管其形式和技巧上有许多原始和拙笨的地方，甚至有不少恣肆的性行为乃至色情描写，但就总的说来，其与生活同步的恢宏气势以及逼视现实人生的力量，却近似于欧洲的那种写实的、生活型的“近代”小说。假若借用 19 世纪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一个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说《金瓶梅》是中国 16 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这意思就是说，《金瓶梅》不仅展现了晚明时代丰赡繁富、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而且创造了若干具有准确历史内涵和丰富性格

特征的人物形象。尤其对书中主角西门庆更可以作如是观。

通行的《中国文学史》和若干批评家们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这一说法似乎很全面,却说不上准确,因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虽然有多重社会身分,但他真正的人生角色却只能说是商人。而不搞清这一点,几乎就无法说明白《金瓶梅》。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主要人生事业是商业活动,他的全部人生遭际也无不与经商买卖有关。即使靠纳贿当上理刑副千户、千户后,他也没有放弃经商,而是愈发大干起来:在原有的中药铺外,增开了当铺,又与人合资,从南方贩来丝绸绒线开起了缎子铺、绒线铺,还贩官盐、充买办,不放过任何经商发财的机会。欺诈和贪赃枉法的事西门庆当然干过——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崛起,即原始积累时期,免不了巧取豪夺——但使他成为巨富的主要途径还是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业活动。长途贩运,经营绸缎布匹更使他最后大发其财。小说对西门庆致富的过程,以及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有详尽的描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中国16世纪商人西门庆的兴衰史也未尝不可。

无论是小说所描写的西门庆的人生行为、生活方式,还是所揭示的西门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说明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商人,一个当时的商业暴发户——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一典型的剖析,了解晚明商业活动之一般,乃至认识商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命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除了其他原因

之外,16世纪中叶以贵金属(白银)为主、铜币为辅的“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确立,国家赋税从实物形态演变为货币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成为异于往古的现象。由于商业、特别是贩运性商业的空前发展,使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据当时人宋应星估计,万历时“徽商”的资本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年获利900万两,比国库的税收多一倍。各地经商致富之人骤增,如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从不大的中药铺起家,短短的七八年时间里,就积累了商业资本白银数万两,全部家产达到10万两之巨,可以说是对当时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西门庆不就是《金瓶梅》所描摹的这幅时代画卷中“活”的富商大贾吗?

确实,西门庆身上带有中国16世纪商业暴发户的鲜明特征。对于金钱、权势、异性的占有欲如此强烈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内驱力和性格的支点。当他崛起之时,曾经表现出非凡的野性力量和进攻的姿态。他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传统的社会规范、道德原则,在他的金钱面前,圣贤偶像、法律尊严、女性节操,都失去了圣洁的光辉。西门庆以他的行为表现了对封建社会全部秩序的侵扰和破坏,甚至凭借金钱顺利地挤进了以维护封建秩序为职能的官僚行列,有能量令制度和法令的作用颠倒。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色胆包天地到“世代簪缨”的招宣府去奸占林太太的时候,不是大有手提钱袋强闯封建贵族妇女密室的欧洲“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气概吗?

不过,历史是不能简单比附的。虽然对于当时的社

会制度和秩序来说，西门庆表现为一种破坏力量，说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未免不符合实际——在商品经济中，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际是互为表里，这个叫西门庆，又叫西门大官人、西门大老爷的人物，究其底里，不过是商业资本的“肉身代表”。只是在16世纪的中国，要成为商业资本的“肉身代表”，没有经商以外的社会身分，没有官僚恶霸的身分，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典型的。但是，如果因此强调西门庆是“新兴商人”，应该说也是失当的。因为西门庆之类的商业暴发户，只是中国“前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的“肉身代表”，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代表新的历史起点的“新兴”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给予欧洲“前资本主义”商人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是“中世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在西方，商业资本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主要因素，其中的关键在于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但是中国16世纪的历史没有为这种转化提供必要条件。一方面，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特殊的社会结构和调整机制，决定了商人们只能在一定限度内生存和发展，只能将积累的财富和力量投入有限的畛域；另一方面，商人自身也带有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的种种恶性基因，自觉不自觉地要走上迷失自我或自我毁灭的道路——曾几何时，西门庆和他的事业就“灯吹火灭”，其“依附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败亡”——中国16世纪的西门庆们不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失去了历史长子权，而是必然耗损于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的惯有引力之中。

因此，正如何满子先生为拙著《金瓶梅新论》所写的

序言中所谈到的 ,西门庆的“多财货则恣欲”的人生行为 ,实质上就是一个历史角色的自暴自弃 ,即找不到正当出路的商业资本及其“肉身代表”的自暴自弃。他的“纵欲丧身”不仅仅是一种“性格悲剧” ,也是一种“历史悲剧”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似乎可以说西门庆实际上是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创作《金瓶梅》的这位中国 16 世纪不知姓名的小说家 ,也许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 ,当他为中国 16 世纪后期那种带有新色素的生活所振奋 ,为晚明社会新思潮所激荡 ,因而大胆改造了一个歌颂传奇英雄的故事 ,着意去描摹自己就生活于其中的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世界时 ,这样一种“历史认识意义”实际就已经深蕴于他的描写之中了。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个酒色财气路路皆通的幸运儿,应该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其实不然,他耿耿于怀的是没有当上文官,仅仅做了个提刑武职官员。他认为武职没有文职尊贵,于是产生了一种压抑感。

叔本华说:“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当欲望没有实现时,他要不惜一切努力去争取,当欲望实现后,回过头去看又觉得很平庸,或者觉得并不如当初所设想的那么美好,从而产生一种失落感或者产生更大欲望。西门庆对于做大官发大财产生了更大的欲望,他继续给蔡京送厚礼,认他做干爹,乞求蔡京给他更大的官。他又给蔡京的管家翟谦送了个美妾,请他在蔡京等大员们中间为他周旋。西门庆认定“往后他在老爷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果然,不久又提拔他升了提刑所正千户。在他一次次升官后,却又逐渐

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压抑感，请看他的几次表白。

第一次是在他上任不久，应伯爵问他处理案件的情况，他回答说：“大小也问了几件公事。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了他（指同僚夏提刑）贪滥婪的，有事不问青红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第三十四回）

第二次是西门庆做了蔡京的假子后，请应伯爵帮助他物色个秀才一类的先生，以协助他处理往来的公文。他对应伯爵说：“我虽是个武职，恁的一个门面，京城内外也交结许多官员，近日又拜在太师门下，那些通问的书柬，流水也似往来，我又不得细工夫，多不得料理。我一心要寻个先生在屋里，好教他写写，省些力气也好。”（第五十六回）

第三次表白也是在他拜了蔡京做干爹，从东京回到家中，月娘、李瓶儿把官哥抱到他面前，一起逗乐的时候说的。先是月娘夸赞官哥儿聪明伶俐，长大了一定会奉养娘亲。瓶儿接着话茬说：“娘说那里话，假饶儿子长成，讨的一官半职，也先向上头封赠起。娘，那凤冠霞帔，稳稳儿先到娘哩。好生奉养老人家！”说到让儿子做官，引起了西门庆的话题，说了一番带有感慨的话：“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他的这番话，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压抑感。（第五十七回）

西门庆的这种心态不是偶然产生的，既有社会心态的影响，也为选官政策所致。

就社会心态而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人的传统心态，知识和读书人在社会舆论上是受尊重

的。而明代又是重视科举和学校的，庶民把科举和学校视为进入仕宦阶级的梯子和主要途径。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发展得最为完备，组织也最为严密，它成为明清两代王朝网罗人才的根本制度之一，在当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明代规定，入内阁办事者必须为翰林，而入翰林者必须为进士，宣德以前政府用人尚参用他途（如税户，人才，吏员，征辟等），以后则专用科举。科举和铨选合而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国读书人都以科举为唯一出路。西门庆与科举无缘，虽然用钱买了个五品提刑官职，但要想再往上爬，因他的资格、资历成了晋升朝廷要员的障碍，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尽管他善于钻营，认了蔡京做干爹，朝廷虽然偏袒奸佞蔡京，但朝中仍然有一批忠于国家的大臣敢于和佞臣们斗争，他们一再冒死奏本弹劾蔡京、西门庆等坏官，斥骂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乞赐罢黜，以正法纪”。西门庆虽然通过行贿，免遭处罚，但那张弹劾他的邸报给西门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巨大的。那“市井棍徒”的出身，“一丁不识”的学历，要想入阁做大官，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对他那种和奸织女、嫦娥也不减泼天富贵为暴发户的强烈欲求心态，无疑是一种较重的打击，因而不时流露出一种压抑感。

作为恶棍、富商的西门庆，在他夤缘钻刺作了个武职官员后，其升官发财的欲望暂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又因为武职不如文职尊贵而产生一种压抑感，实际上是自己没有文化而产生的一种苦闷。

张振华

前不久“夜光杯”所载《大款西门庆》一篇随笔，读后良多感触。兹就此人发迹的原因或曰谋略聊作析说，也算续貂之文。

尽人皆知，西门庆是个心狠手辣、到处施淫作孽的流氓。但撇开他种种秽行劣迹，单从其商业经营手段细加考察，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年轻的清河县“大款”，确实堪称一位精明干练的商业活动家；他那套行之有效的生意经，足以给今天的企业家们某些有益的启迪——

首先，西门庆不像封建社会一般官绅，有了钱只知道购田地，置宅园，他懂得财富的价值和“钱能生钱”的道理，所以不断投资商业经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有一种加速资金流转，扩大再生产的明智的货殖观。

其次，他深谙“多种经营”之要旨，能根据市场要求，自组产业结构和销售网络。西门庆是靠一家生药铺发家的，但眼光却决不止于这一行业；家中开四五处铺子：

缎子铺 ,生药铺 ,细绢铺 ,绒线铺 ;外边江湖又走标船 ,扬州兴贩盐引 ,东平府上纳香蜡 ”,还设有典当行——几乎衣食住行 ,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百货他都经营。由于多方出击 ,适销对路 ,不久即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第三 ,他注重信息来源 ,关心市场行情 ,并据此来决定进货、推销的价格与时机。举凡朋党聚宴、花楼嫖妓或是官场酬酢 ,他都念念不忘搜集各种经济情报。一次无锡客商有五百包大米搁浅于码头 ,愿以贱价批给西门庆 ,但他略加分析 ,吃准此属无利可图的滞销货 ,便以“ 行市已迟 ”为由 ,一口回绝了。相反当他获得扬州食盐紧缺、别处盐商正在筹货的信息后 ,立即派人进行长途贩运 ,结果由于行情抢先一步 ,获得了翻几成的暴利。

第四 ,西门庆善于扬长避短地进行商业竞争。在他躲避株连之祸时 ,江湖郎中蒋竹山趁虚而入 ,不但入赘李家夺了他情人 ,还公然在他对门开了家生药铺 ,由是引起了一场情敌兼冤家间的生死争斗。西门庆深知对头会诊脉看病 ,这点强于自己 ,遂专挑蒋不懂经营企业 ,在当地没有人缘 ,且不讨李瓶儿欢心等弱点 ,给以致命打击 ,最后彻底挤垮了对方。

第五 ,他还颇重视发现和使用经营型管理人才。在一系列竞争中 ,西门庆手下那些老练懂行的“ 伙计 ”、“ 主管 ”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成衣铺“ 经纪人 ”出身的賁四 ,熟谙经营之道的傅伙计 ,以及“ 能言善辩 ”的韩道国等人 ,大抵都能“ 与财主兴利除弊 ”。西门庆用较高的待遇(如傅伙计月薪二两银子 ,而当时买个丫头身价不过六两)将他们网罗门下 ,尝试把传统的主奴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关系 ,说明他是懂得努力使人尽其才的。

再次,他似乎有点“公关”意识。这方面,除了与乔大户等合资“联营”铺子外,他还通过与各色人等的广泛接触招揽客商,时常根据顾主需要组织货源,使人们既怕他、恨他,又离不开他……

至于放债和举高利贷,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西门庆“用足政策”的机敏。明清时经营当铺、典库等“生息银两”的活动,作为中国早期一种金融交易与资金流通形式,被朝廷明文规定为合法事业。既然政府允许,又有高额利润可榨取,“大款”西门庆岂肯轻易放弃?

当然,我们肯定西门庆可算得一位经营有方的商界弄潮儿,乃是置他于中国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就他在商品经济领域的手段与胆识而言的。综观此人的品性、行为,则堪称心地奸险,人伦丧尽,淫欲无度,实属暴富不仁的滥小人。这也印证了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性格。”

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钱币自问世以来便是人类社会活性最大、辐射力最强的一种物质，甚至可以说，它已成为人的本质的物化形态之一。这里面的道理，西方学者卢梭的分析深中肯綮，他认为：“人们通常主要是根据财富、爵位、权势、个人功绩等方面的差异来互相评价的。而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因为财富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他的一切。”

看看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的所想所作所为，可以帮助人们对这个问题加深理解。

西门庆是个彻头彻尾的淘金狂。他原系清河县一个开生药铺混饭吃的破落商人，父亲西门达，早年在甘州做绒布生意，赚了些钱。奈何这浪子惯于吃喝嫖赌，几乎把家私挥耗殆尽。他在书中初出场时，只是个“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

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的浮夸子弟，家宅也仅有当时北方中等人家的五进院落。

可是西门庆却能及时“迷途知返”，他采用奸占人妻、并吞外产、欺行霸市、勾结权贵和高利贷盘剥等种种诡诈手段，迅速地东山再起了。于是：“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不数年竟已腰缠万贯，妻妾成群，成为官授五品金吾卫副千户，又兼有药材、绒线、绸绢、典当、盐业等多家铺子和走标船等产业的暴发户。

驱使破落户西门庆“大彻大悟”，并开始如疯狂的野兽那样拼命聚敛的唯一动力，正是蛰伏于这个其本能深处的强烈的发财欲望，或者说“有钱就有一切”的金钱观念。

《金瓶梅》第五十七回写及的西门庆向吴月娘夸耀的一番海口，最为集中地暴露了他那贪婪的心态和无耻嘴脸——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世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只要拥有泼天价般的财富，便可以尽着性子眠花卧柳，淫遍天下女子；可以独霸一方，逍遥法外；可以穷奢极欲，享尽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这就是集奸商、淫棍、贪官于一身的西门庆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真理、百变不劫的逻辑！

不幸的是，那厮所信奉的“金钱万能论”，恰恰是他观

察社会、总结自己人生经历而得出的现实结论。

仰仗着金钱的魔力,西门庆除续弦吴月娘外(原配夫人即西门大姐的生母早亡),共娶得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五房侧室。大小六个各有风致的老婆,他心下犹嫌不足,或强奸、或和奸、或诱嫖,先后共淫媾了婢女、色妓、伙计媳妇、官府太太和春梅、王六儿母女、李桂姐、贲四嫂、林氏等二十多个妇人,另外还有书僮儿、王经等男妾,过着荒淫丑恶的“快活”日子,直至纵欲过度一命呜呼……

虽然“佛祖”脚下、“阴司”殿前未必一定都能用银子打通关节,但“有钱可使官推磨”,则确是屡试不爽的。由于西门庆在太师蔡京诞辰之日献了四尊尺余高的捧寿银人,两把黄金字壶,还有锦绣蟒衣、汤羊美酒、名贵绸缎、时鲜果蔬等丰厚寿礼,讨得蔡京欢心,转眼间他由一个普通商人平步青云,变为五品武官。借助于太师的赫赫声势,他又买通杨提督、李知县等一大批赃官,连路过清河的新科蔡状元也被他请入府宅,欢宴外加赠送“盘缠”,成为惊动全县上下的一件大事。后来拜了蔡京做干儿子,他愈发无法无天,飞黄腾达起来。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金钱在那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确乎具有神奇无比的效用:

正值西门庆初戏李瓶儿、两下如胶似漆之时,他却忽然绝迹不去李家了,弄得瓶儿朝思暮想,怨恨成疾,一气之下嫁了江湖医生蒋竹山……究其缘由,并非西门庆对情妇不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遇到了平生最大一桩飞来横祸——朝廷查勘兵部尚书杨戩贻误军机要案,株连到西门庆儿女亲家陈洪和他本人,按律法论罪,他理当问斩!

这一来西门庆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哪还顾得上与李瓶儿幽会取乐？忙差来保儿携带丰厚财礼，赶到京城，经过一阵奔波营钻，总算疏通了负责此案的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李邦彦的门路，进贡了五百两金银，赚得李大人将罪犯名册上的“西门庆”改成“贾庆”两字，这才侥幸万分地“捡”回了一条性命。

这些实例，显然使西门庆更坚定了金钱万能的信念，并为他后来对吴月娘所夸的海口大大丰富了内涵。

作为贩药、放债起家的商人，西门庆本来就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而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活生生的事实，又使他对那个时代无官不贪的社会本质了如指掌，进一步深信钱是“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可以主宰一切的。因此他舍得不惜血本地用重金贿赂官僚、劣绅，然后相互勾结在一起，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以榨取更多的金钱……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学界迄今尚无定论。不过他对于“钱可通神”的现实，有着刻骨铭心的洞察与痛恨，则是确定无疑的。上例中那个李邦彦李大人，官居资政殿大学士，职位相当于当朝右相。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财有势、有权柄有名望的一品大官，仍然敢于为了区区“五百两金银”的蝇头微利，公然置国法于脑后，让西门庆“买”了一条命——你看作者将封建统治集团贪婪腐化、唯钱是图的丑恶面目，勾勒得何等生动，何等辛辣，何等深刻！

此外，该书许多赃官、奸商、衙内、市侩、名号中都嵌有“钱”的别称“泉”字，如西门庆自号四泉，花花公子王三官取号三泉，新科状元蔡蕴“贱号一泉”，巡按大人侯蒙“雅号石泉”，等等。

这一苦心设计，自然也含蕴着对那辈贪财图势、附庸

风雅的逐利之徒的尖锐嘲讽 ;我们从中还不难品味出作者那“奸佞不可禁 ,其源皆起于钱”(《汉书·贡禹传》)的无奈和感喟。

钟明奇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几乎就是“淫妇”的代名词，饮此“令”誉，实也不诬。在中国古代“坏女人”的人物画廊里，潘金莲几乎是最丑名昭著的一个。潘金莲主宰其全部生活行为的心理机制即是好淫；由好淫而善妒，由善妒而心狠手辣；她将自己的全部“才华”单奉献在如何专心致志勾引男人，如何处心积虑争宠市爱上；她对金钱与权势不能说不感兴趣，但她的这部分欲望常被强烈的性欲所排挤而埋葬在潜意识层中，活跃在她意识层中的乃是她对情欲满足的永无休止的追逐。

潘金莲最淫荡污秽的生活集中表现在她一度栖身的西门府。在西门府，她激打孙雪娥，羞死宋惠莲，惊死官哥，气死瓶儿，抠打如意儿，大闹吴月娘，暗接琴童，私通陈敬济，时时在西门府鼓起轩然大波。没有潘金莲，《金瓶梅》一书是不可想象的，而春梅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她的另一个“化身”。潘金莲把西门府搅得如此天翻地覆，

并没有别的目的,她只是想压倒众人,独霸西门庆,以满足其特别强烈的情欲。只要能满足情欲,潘金莲几乎可以不顾一切,不惜一切,更无论儿女纲常,人伦道德。在西门府“女儿国”中,潘金莲的淫荡是无与伦比的。

潘金莲由好淫而转为善妒,由善妒而变得毒辣残忍。她几乎终日提心吊胆,神经极度脆弱敏感,任何一点小小的刺激都会在她的心里激起情感的波涛。她处处想争强,十分担心李瓶儿会生孩子,因此夺了她的宠爱。当这种忧虑无情地转为现实的时候,她的精神世界几乎要崩溃了。“这潘金莲听见生下孩子来,合家欢喜,乱成一块,越发怒气,径自去到房里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三十回)。这消息对她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潘金莲嫉妒得快发疯了。西人培根曾说,嫉妒是一种游荡的情欲,在大街上徘徊而不肯居家,所谓“未有好管闲事而不心怀恶意者也”。潘金莲正是如此,她要发泄积愤,必置李瓶儿于死地、夺回西门庆的宠幸而后快。这便演出了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打狗伤人”极度残忍狠毒的一节。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把代表追求直接和绝对满足的生物性本能欲望的精神结构部分称为伊特,也即是本我,与伊特欲相对抗并根据现实实际条件与要求而起作用的精神结构部分称为自我,把代表良心或道德力量的精神结构部分称为超我。潘金莲渴望实现的是本我欲望,可现实环境并不能使她恣意行乐。如今李瓶儿又生了孩子,这真使她又气又恼。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引起她内心极度的焦虑。变态心理学认为,焦虑转过来可以使得许多的心理防御机制中的任何一种发生作用,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最重要的防御机制乃是压抑。但潘金莲的情欲特别强烈,压抑使她更加痛苦,因此就需

要移换，把伊特的欲望驱动引向另一个代替者，这便有了潘金莲歇斯底里或打狗伤人的一幕，以宣泄心中不可遏止的妒意。潘金莲的类似心态《金瓶梅》第八回尚有生动的描写：

妇人打了一回相思卦，不觉困倦，就歪在床上睡着了……约一个时辰醒来，心中正没好气（发觉迎儿偷吃角儿），便不由分说，把这小妮子，跌剥去身上衣服，拿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杀猪也似叫。……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他起来，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说道：“贼淫妇，你舒过脸来，等我掐你这皮脸两下子。”那迎儿真个舒着脸，被妇人尖指甲掐了两道血口子。

这是写潘金莲等西门庆不至的郁闷情绪。与上面不同，这里并没有嫉妒成分，但同样是本我欲望受压抑而借丫鬟发泄情欲。这在潘金莲几乎成了惯用的“伎俩”。

叔本华在《爱与生的苦恼》中写道：“性爱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世袭君主”；“性欲是一种最强烈的情欲，是欲望中的欲望，是一切欲望的汇集”；又说：“女人则只有一桩事情——如何虏获男人的心，对其他的事情都认为是无足轻重，毫不介意。”叔本华的上述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但这些话用来描写潘金莲大约是最恰当不过了，雄踞潘金莲心灵大殿的君主不就是对性欲满足的穷追不舍么？有什么力量能劝阻她稍稍休息一下呢？潘金莲显然已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听过我对于一个女人怎能被救治、怎能‘被救赎’这个问题的答案吗？——让她生一个孩子吧！”19世纪的尼采不期在《瞧这个人》这本书里道出了潘金

莲心中的秘密。潘金莲在西门府十分苦恼自己没有孩子,有了孩子,她就可以牢笼西门庆的心,以填补其无尽情欲的沟壑。

对于“潘金莲现象”的出现,我们不能用近距离太切近功利的眼光去看,而当远距离放在历史的望远镜中去观察。“潘金莲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反映了那个时代婚姻方式与社会制度的罪恶。潘金莲并非天生是淫妇,她的“不道德”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扼杀人性,特别是剥夺女性自由与幸福的“不道德”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潘金莲的“不道德”在客观上是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不道德”的一种无意识的抗争。

潘金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如果仅以荒淫无耻而论潘金莲,那么潘金莲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历代反动统治者大都荒淫无耻,较之潘金莲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记·殷本纪》写纣王“使男女裸”的长夜之饮,《飞燕外传》中写汉成帝与赵飞燕的私狎,《迷楼记》写隋炀帝的放荡,以及女皇武则天的风流韵事,明武宗的浪荡不羁,至少都可以和潘金莲比肩而绝无愧色。潘金莲的淫荡事实上与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潘金莲的放荡也不同于原始的乱伦或者一妻多夫制,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晚明那个时代封建商品经济开始繁荣的伴随物。她与西门庆的结合,与其说是一种偶然,毋宁说是一种必然。庶族地主、奸商,后来成为官僚的西门庆,在其有了相当优越的物质生活之后,必然要寻求感官的刺激。潘金莲不是嫁给西门庆,也必然与另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结合。潘金莲首先没有经济地位,更无社会政治地位,然而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却有着无

穷的欲望。这一点刚好使她与西门庆形成互补关系,同时也必然表现出对西门庆的依赖关系。与李瓶儿等人比较,她进西门府时没有带任何钱财,而西门庆则不惟好色亦且贪财,他对李瓶儿的宠爱以及对其病死的悲恸,大致取决于这一点。潘金莲这方面的“先天不足”,未免又使她增加了一份担忧。潘金莲的这种处境必然使她终日惶惶不安。这实际上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市民女子依附于另一个妻妾众多、淫欲无度、喜怒无常的豪商巨贾时应有的心理。潘金莲的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她的纵欲与历代帝皇后妃的寻欢作乐有着很大的差别。潘金莲太多的精神压抑使她表现出对情欲追求的疯狂性,近乎一个色情狂,这或许正是物极必反之故吧?历代帝皇后妃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他们在精神上决没有潘金莲那样的沉重负担,他们可以恣意行乐,无所顾忌。但他们这种畸形的自由乃是怙恃政治地位而获得的特权。至于后妃之间也会有争宠,然而她们不同于潘金莲那样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潘金莲的产生不可能过早,必有待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正如西门庆的产生不可能过早那样。

《金瓶梅》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开始联姻的时代。西门庆是这个时代孕育的一个怪胎、混血儿。世间必先有一西门庆,然后才有潘金莲。潘金莲在历史的坐标系上是作为双重伴随物而出现的。从纵的历史的眼光看,她是专制时代男性的附属品与玩物,从横的时代的眼光看,她又是封建商品经济发达之后的副产品与牺牲品。

罗德荣

分析潘金莲与武大郎的关系，不应当把他们仅仅看做是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物，而应当把他们看做是两个社会化了的性别角色。

谈到“角色”，社会学家们通常指的是，一套与特定的社会地位相伴随的行为期待。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处于不同的地位，因而也扮演许多社会角色。

社会也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由于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安置到一些特定的地位上，充当特定的角色，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受各种角色模式的规范，从而按这些规范来行事。

就武大而言，他的地位决定他至少充当男人、卖炊饼小贩和庶人这三种角色。在这三种角色中，他被期待的行为，都不甚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异。作为卖炊饼小贩，他是善良的弱者；作为庶人，他是唯命是从

的小民；而作为男人，他却是主宰妻子命运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待潘金莲与武大，就不应把他们看做是一个女人与善良小贩的关系，或与唯命是从的小民的关系，而应看做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即一对结为夫妻的性别角色。否则，便不能把握其关系的社会本质。

作为一对结为夫妻的性别角色，潘金莲与武大的行为被社会化，即被期待以传统的角色模式来行动。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而女子，除了受这三种权力支配之外，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它贯穿到旧中国人民的一切社会生活中，也深深渗透进夫妻性别角色的传统家庭模式之中。中国人民，尤其是妇女，就是在这种封建专制的压迫下，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所以，在家庭中充当丈夫的武大，他对妻子拥有主权，就不是以他个人是懦弱或凶悍、是小贩或巨贾而转移，而是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准则以及法律对他的角色规范所决定。无论武大在社会上多么弱小，也无论他的性格多么善良懦弱，只要他处在丈夫的地位上，他就要充当这一角色，被社会化为妻子的主宰，从而成为“夫权”的一个替代物或具体化身。同样，潘金莲作为妻子，也必定被社会化为男人的附庸而法定为丈夫所拥有。只要武大不休掉她，她就永远没有其它选择的自由；如果她背叛武大，她就必被法律和道德认定为“贪淫无耻坏纲常”的罪人与“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

大凡读过《金瓶梅》的人，大都把武大主要是看做善良的卖炊饼小贩和唯命是从的小民。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误解。在小说中，武大的角色身分，从根本上说，主要

还是潘金莲之夫而不是小贩和小民,或者说,他既是一个小贩、小民,但更是潘金莲之夫。当他以小贩小民的角色出现时,他确实懦弱善良,而当他以潘金莲之夫的角色出现时,我们看到,他却并非弱者而确乎也是一个强者。对此,第五回“郓哥帮捉骂王婆”有一段异常精彩的描写:

只见武大,从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那婆子见是武大来得甚急……只叫得:“武大来也!”那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这西门庆便仆入床下去躲。武大抢到房门首……口里只叫:“做得好事!”那妇人顶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纸虎儿也吓一交。”……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些话,题醒他这个念头,便钻出来,说道:“娘子,不是我没本事,一时间没这智量。”便来拨开拴,叫声:“不要来!”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门庆早飞起脚来,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窝,拨地往后便倒了。西门庆打闹里一直走了。

这里“裸起衣裳”、“大踏步抢入”、“来得甚急”、“口里直叫”、“却待揪他”等语,哪一点能看出武大的怯弱呢?反之,“做手脚不迭”、“仆入床下去躲”、“一时间没这智量”、“打闹里一直走了”数语,又哪一点能见出西门庆的胆量呢?这真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一向专横跋扈的西门庆,竟然一反常态,怕起往日被自己瞧不起的“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来!其间缘由,令人深思。这说明,此时的武大,人虽未变,但角色已变,实际上,已不复是往日那个毫无个人尊严的弱者,而是依照法律拥有对

妻子主权的强者。不论潘金莲对他有无爱情,也不论潘金莲究竟是爱西门庆还是爱他,但他对潘金莲拥有实际上的夫权,即把她作为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却使他敢于面对侵犯他利益的任何强敌,正是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享有丈夫的尊严,完全可以和西门庆平起平坐地理论个高低,只要亲手捉着奸,即使诉诸法律,哪怕那西门庆有权有势,也只能是对他退避三舍,所以,尽管他生性懦弱,但此时却出乎意外地勇猛得像一只能把西门庆吓得“仆入床下去躲”的“纸虎儿”。

不言而喻,作为夫权化身的“纸虎儿”武大,对西门庆与潘金莲所构成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为要在西门庆身上实现自己对性爱的向往和个人权利的追求,潘金莲终于谋杀了他。显然,若从夫妻性别角色的传统模式看,潘金莲所面对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善良的卖炊饼小贩,她所面对的,主要还是一个对她拥有占有权的丈夫。正是这个丈夫,不是凭着爱情而是凭着他的占有权,维系着他和她的关系,才使得她不得自由。可见,潘金莲所谋杀的,究竟是哪一个人的武大,实在是十分清楚的事情。然而,拥有夫权的丈夫和善良懦弱的小贩,毕竟是同一个武大。因此,当潘金莲谋杀了这只“纸虎儿”的亲夫的时候,她也就同时不可避免地谋杀了善良的卖炊饼小贩,而这,正是武大的可悲之处,当然更是潘金莲这个杀人罪犯的可悲之处!

潘金莲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认识这样一个复杂人物,不宜从形象的表层意味对之作道学式的简单化批评,而是应当从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制约人的性格的深刻联系中,去加以认识。若能如此,则从潘金莲命运轨迹的探寻中,自可清楚地看

到 她的一生 ,既是被压抑、被逼迫的一生 ,同时也是被扭曲、被异化的一生 :——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礼制文化 ,制造了人间的不平与痛苦 ,同时又强制性地把她的反抗导入罪恶之途 ,扭曲她的行为心态 ,使之在充满罪恶的希望之路上 ,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踏上礼教的断头台。

罗德荣

在西门家的妻妾争宠中，潘金莲与吴月娘的争斗，尤其值得注意。

吴月娘是在小老婆群之上的大老婆。《释名》云：“夫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又《仪礼·丧服》云：“妾之事女君与妻事舅姑等。”所以，从家庭地位讲，作为正妻，吴月娘虽然也要受夫权的统治，但却仍负有当家理财的职责，享有管束诸妾的权力。

吴月娘在妻妾中的特殊地位，迫使潘金莲不得不在进门之初对她采取亲近拉拢的态度。娶进西门庆家的第二日，潘金莲便“走来后边大娘吴月娘房里，拜见大小，递见面鞋脚”；“过三日之后，每日清晨起来，就来房里与月娘做针指，做鞋脚。凡事不拿强拿，不动强动。指着丫头，赶着月娘一口一声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儿贴恋。”潘金莲的贴恋，显然是对妻权的默认，因而也使吴月娘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

吴月娘对潘金莲的反感，是从来旺宋

蕙莲夫妇遭潘金莲暗算之后开始的。本来,潘金莲暗算宋蕙莲夫妇,与吴月娘并无利害关系,但月娘不愤,站出来说话,指责潘金莲:“如今这一家子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祸乱的贬子休妻。想着去了的来旺儿小厮,好好的从南边来了,东一帐、西一帐,说他老婆养着主子,又说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贼哩,养汉哩,生生儿祸弄的打发他出去了,把个媳妇又逼临的吊死了。”然而,吴月娘果真是为来旺儿夫妇鸣不平吗?小说写道:西门庆要送来旺儿往提刑院去,才待出门,吴月娘走到前厅,向西门庆再三将言劝解,但西门庆偏听潘金莲的话,定要“把奴才打发他离门离户”,剪草除根,所以,对着月娘竟圆睁二目喝道:“你妇人家不晓道理!……”斥得月娘当下羞赧而退。月娘回到后边,就说:“贼强人,他吃了迷魂汤了!俺们说话不中听,老婆当军,充数儿罢了。”足见,对小老婆的话言听计从,奉为圣旨,而大老婆说话却不中听,当军充数儿,才是吴月娘由羞赧而嫉妒,由嫉妒而鸣不平的真正原因。

宋蕙莲事件以后,潘吴矛盾始终潜滋暗长,直到李瓶儿死后,才发展为第七十五回所写的公开冲突。其间,春梅毁骂申二姐,则是潘吴矛盾激化的关键原因。申二姐是西门庆请来的女先儿,住在上房那边给月娘唱小曲儿,自然是月娘的座上客。月娘不在,春梅叫申二姐到前边唱曲儿,申二姐不去,得罪了春梅,当场被春梅骂走,这便无异于打了月娘的脸,故月娘回家,就有几分恼,当即责怪潘金莲“主子也没那正主子,奴才也没个规矩,成甚么道理”!俨然以大老婆的身分教训小老婆,责怪潘金莲纵容丫头使性骂人,主子奴才通同作乱坏了家中规矩。不料潘金莲不吃,马上顶了回去,反责怪申二姐倚着月娘

“拿班儿做势的”根本不把大老婆的教训放在眼里，于是把月娘气得满脸通红。待西门庆回来，西门庆袒护春梅，这就叫月娘更加难以容忍，故而对大妗子说：“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乞他骂了去罢，要俺每在屋里做甚么？”

吴月娘既深感主妇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因此便决意站出来好好管一管。当天晚上，潘金莲走到月娘房中叫西门庆到她那里过夜，被月娘听见，月娘立即干预指骂潘金莲：“没廉耻的货，自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随后便以主家婆身分，把西门庆打发到孟玉楼房里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潘金莲为此事使气，把潘姥姥打发往家去了。月娘知道后，又埋怨道：“也不进来说声儿”，言外之意，仍是责怪潘金莲眼里没她。不巧，此话偏偏被潘金莲闯来听去，于是以此为导火线，一场妻妾争战史上最大的公开争吵终于爆发。

以上便是第七十五回公开争吵之前潘吴矛盾的发展。不难看出，其中大部分矛盾都不是她们之间的正面冲突，而是由他人他事而引发出来的摩擦。摩擦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潘金莲的行动有意无意地冲撞了吴月娘大老婆的尊严，使其主妇地位受到挑战，从而激发她站出来钳制潘金莲而维护其所拥有的妻权。可见，吴月娘正妻固然难做，而潘金莲为妾则更加困难。在她的头上，除了夫权像幽灵一样时时操纵着她的行动外，另一个幽灵——妻权，也在时时约束着她的言行。

第七十五回的公开争吵，就内容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无非是把从前的陈年旧帐翻出来重新数落一番。双方唇枪舌剑，从倒底是谁把拦汉子，吵到该不该尊重大老婆当家理财的权力；从是不是纵容丫头使性子骂人，吵到谁是真材实料谁是趁来的老婆，又吵到李瓶儿之死的

根由等等 ,如是而已。但这却是吴月娘以正妻资格对潘金莲的一次总清算 ,也是潘金莲对大老婆约束自己的一次总反攻。所以 ,争吵的激烈程度空前未有 ,恰似电闪雷鸣 ,翻天覆地。一向泼悍的潘金莲自然硬顶硬撞 ,骂一还十 ,坐在地上“打滚儿赖人” ;一向举止温柔持重寡言的吴月娘 ,也竟然一反常态 ;紫涨了双腮 ,决意争个我高你低。

汉子没回家时 ,胜负难分。孟玉楼和玉箫把潘金莲扯起来 ,送她前边去了 ,争吵才暂告结束。但西门庆回家后 ,一场凭个人优势要挟汉子的争夺 ,又重新开始 :

却说西门庆衙门中审问贼情 ,到过午牌时分才来家。……因进上房 ,见月娘睡在炕上 ,叫了半日白不答应 ,问丫鬟 ,都不敢说。走到前边金莲房里 ,见妇人蓬头瓮脑 ,拿着个枕头睡 ,问着又不言语 ,更不知怎的。

一个“叫了半日白不答应” ,一个“问着又不言语” ,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此处无声胜有声 ,无言中自有深意——吴月娘 ,无非仗着自己是正妻 ,肚子里又有着西门家的“根蒂儿” ,因此不怕汉子不来劝慰自己 ;潘金莲 ,则无非倚仗自己风流伶俐 ,得宠一时 ,因此也不怕汉子不来贴恋自己。

一个宠妾 ,一个正妻 ,经过权衡 ,西门庆终于还是先去了吴月娘那里 :

这西门庆慌了 ,走到上房 ,一把手把月娘拉起来 ,说道 :“你甚要紧 ,自身上不方便 ,理那小淫妇儿做什么 ,平白和他合甚么气?”

取舍十分明确 ,为了保住吴月娘身上的根蒂儿 ,自然必须先稳住她不使她生气。吴月娘看准了汉子的心理 ,乘胜猛攻 ,一面说 :“肚子往下憋坠着疼 ,头又疼 ,两只胳膊都麻了 ,刚才桶子上坐了这一回 ,又下不来。若下来 ,干净了我这身子 ,省的死了做带累肚子鬼 ”;一面又说 :“到半夜寻一条绳子 ,等我吊死了 ,随你和他过去 ”;“我就死了 ,把他扶正就是了。恁个聪明的人儿 ,当不的家 !”这一招果然灵 ,既是未来孩子的嫡母 ,又是当家理财的正妻 ,西门庆哪能不抚慰呢 !于是 “越听越发慌了 ” ,一面把月娘搂抱在怀里 ,大骂潘金莲不识“高低香臭 ” ,一面又“只顾跌脚 ” ,忙叫小厮去请那任医官 ,看了讨药去。

毋庸置疑 ,由于夫权与妻权的联盟 ,吴月娘已稳操胜券。无怪乎吴月娘自豪地说 :“无故只是大小之分罢了汉子疼我 ,你只好看我一眼儿罢了。”至此 ,大局已定 ,孟玉楼于是出来劝导潘金莲 :

你我既在檐底下 ,怎敢不低头 你去与他赔个不是 ,天大事都了了。不然 ,你不教他爹两下里也难 ,待要往你这边来 ,他又恼。

为了保住嫡出的根蒂儿 ,即使西门庆也不得不向吴月娘妥协 ,更何况做妾的潘金莲呢。“寻思了半日 ,忍气吞声 ” ,潘金莲终于同孟玉楼到后边上房内 ;“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 ” ,道 :“娘是个天 ,俺每是个地。娘容了俺每 ,俺每骨秃叉着心里。”

以潘金莲之狡狴、泼悍、凶狠 ,居然也折服于吴月娘的脚下 ,原因究竟何在呢 ?不言而喻 ,潘金莲所折服的 ,

并非举止温柔、持重寡言的吴月娘，她所折服的，实质上乃是那个“天”的“娘”所拥有的一夫之下、数妾之上的妻权！

狡狴、泼悍、凶狠的潘金莲，其性格深层，也同样充满懦怯、屈辱与失意！

许建平

人一降生世上 ,就像一粒种子落地 ,一颗棋子入盘 ,定位于一点 ,周围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把你围个水泄不透。你要发展 ,首先要学会一件本领 :通人情 ,达世理。于是生活中处处都是人情世理 ,官场有 ,商场有 ,男人的世界有 ,女人的世界也有。

小家庭是大社会的细胞 ,也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兰陵笑笑生比他的先辈们聪明 ,他没有祖宗那种“ 以大写大 ” ,大人物 ,大事件 ,反映大历史。而是学会了“ 以小见大 ”的巧妙手法 ,以西门庆一家 ,再现天下国家。以一家人群上下结构 ,一家人事之关系 ,一家之人情世故 ,再现社会之结构、社会之关系、世间之人情世故。说得再具体点 ,就是通过家人媳妇们的争宠斗势 ,影射社会间的勾心斗角 ,通过女人们的人情世理昭示社会生活的人情世理。有人说 ,《金瓶梅》是“ 借事含讽 ” ,真可谓一语中的 ,而且写得那样细腻逼真 ,色彩鲜活 ,读者须当留心 ,莫要匆匆晃过。

西门庆的家庭很特殊。这位青年，上无父母，下无兄弟，独自一身，成为一家的撑天柱，唯一的家长，被一群如花似玉的妻妾簇拥着。月娘为裙钗之首，下有五房姐妹，每房姐妹之下，还有一群供驱使的丫鬟、奴婢、家人媳妇环绕着。这颇有点像朝中的政治组织，皇帝之下有宰相，宰相之下有六部，六部之下又有诸司……由下至上，层层垒起，活似一座金字塔，构成下对上的依附关系。

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名分各定，等级森严，内中的行事，却常常别有异曲、怪调，那内在的因由、奥妙，细细查来，却令人于惊诧之余，感受到另一番情味。事实上女人的地位，是依据西门庆宠爱的程度而定，就连妻妾们居室的位置，也显示出与西门庆关系的疏密来，从潘金莲的“玩花楼”到孙雪娥住的后院，由前向后依次呈现亲近疏远的关系。一切围绕“情”行事，其间哪有什么是非、道理可言！

潘金莲背着西门庆偷小厮，按理应是罪不容诛吧，谁想只因那位高傲的丫鬟庞春梅一句袒护的话，西门庆一肚子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了；李娇儿的丫头夏花儿，偷了一大块金子，西门庆扬言，要抽狼筋鞭子，还令吴月娘让人领出去卖了，又是因李桂姐一句话，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正经妻子吴月娘说句话，若不顺西门庆的心，便好长时间，阴着脸，不瞅，不理她。显然，在这个家庭里，唯有一件东西——情——男女之私情，起着支配作用。

何止家庭，官场不也是如此吗？西门庆不过一介乡民，因向蔡京送了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蔡京一句话，就让他一步登天，做了山东一省的理刑副千户，选官的那套制度，便算不得数了。皇帝下旨，让打了败仗的杨戩的亲族家臣发配充军，西门庆只给管事官送了五百石米（指五

百两银子),便脱了西门庆一家的干系……法、理、制度,在人情的面前,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情高于理,更超越法。人情支配一切,这种现象,不!是这种幽灵,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人情”是令中国官吏最头痛、最感棘手的冤家。

大概也正因此,正因人人都懂得这一人生秘方,所以西门府的女人,个个都学着与那位情郎建立情的纽带。因为与主子有了那层关系,没有地位可以有地位,没有钱财可以有钱财,只要需要,可以毫不费力地得来。方法也再简单不过:以己之有,投主子之所好。

她们各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吴月娘凭得是千金小姐、正头娘子的身价,还有那容许老公随意娶小老婆的宽容大度;孟玉楼靠得是钱财和善解郎意;李瓶儿是个富贵姐儿,又生得白净,还有那宝贝儿子;潘金莲不仅有卖俊俏的手段,更有那掌握西门庆性生活隐私以牵制对方的拿手戏儿;孙雪娥是先头娘子的影儿,又有调汤的特技……

至于再下一等的婢女、家人媳妇和妓女们,除了自身的自然条件外,一般都知从女主子中,找一个中间人做依托。庞春梅与潘金莲狼狈为奸,李桂姐靠干娘吴月娘,贲四嫂靠西门庆“肚里的蛔虫”玳安……宋蕙莲失去了原先的依托潘金莲,孤身奋战,最终难逃房中自缢的悲剧。

裙钗如是,那些官场中的须眉男子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些做梦都想荣迁擢升的人,有几个不讨好上司,不讨好皇上,不寻找靠山,不以己之有,投主子之所好的。西门庆认干爹,顶夏提刑的缺,升了理刑正千户;夏提刑央了林真人,林真人又央朱太尉,太尉对蔡京说:“要将他情愿不管鹵簿,仍以指挥衔在任所掌刑三年”。顶替西门庆原

职的何永寿 ,靠他叔叔何太监 ,亲自从皇上嘴里讨了官
.....

如果说 ,往上爬 ,靠得是走人情讨好上司的话 ,那么同等关系之间 相互倾轧 ,则靠的是智力。西门府的几位有点头面的女子 ,平时像乌眼鸡似的 ,恨不得你吃了我 ,我吃了你。

潘金莲是位头号的妒妇 ,她恨不得将与西门庆发生过性关系的情敌 ,一个个都征服得俯首帖耳 ,大有独霸情场的势头。她不但嘴头子如利剑、“淮洪”一般 ,且心狠手辣 ,狡诈奸邪 ,孙雪娥、宋蕙莲、李桂姐、李瓶儿、如意儿、贲四嫂.....都败在她的手里。她既是幕后的谋划者 ,又是冲锋陷阵的斗士。但终因树怨太多 ,最终被吴月娘撵出家门 ,被逼向死地。孙雪娥、宋蕙莲都属于轻狂女子 ,轻狂得很易被利益冲昏头脑。孙雪娥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价 ,对别人也缺乏分析 ,遇事不问皂白 ,不察原委 ,一味地蛮干 ,乱撞 ;宋蕙莲不知趋避 ,西门庆背地给她点好处 ,都成了她炫耀的资本 ,幼稚得不晓得防护 ,成为众矢之的。她们既无潘金莲那般主动进攻态势 ,又缺乏心计 ,最终成了对手的刀下鬼。这期间那有是非曲直 ,那有黑白善恶 ,唯有强弱的较量。弱肉强食 ,这也似乎是人世间的“公理”。

按理 ,潘金莲并非得势的李瓶儿的对手 ,然而潘金莲事事用心 ,李瓶儿却处处退让。她一方面普施恩惠 ,把银子首饰一把把一件件地送人 ,不但潘金莲得了不少好处 ,连她的母亲乃至丫鬟也受益匪浅。另一方面 ,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一味地委曲求全 ,逆来顺受 ,原以为可感化对手 ,使之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但换来的是对方的恩将仇报 ,在丧子的痛苦中 ,在潘金莲锋芒利剑的频频进击

下,含愤地死去了。强暴战胜了仁慈,邪恶战胜了善良。此所揭示的不单是西门宅一家之现象,恐怕家家如此,普天之下莫不如此吧?

与潘金莲的强暴、李瓶儿的心软不同,李娇儿与孟玉楼则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女人。她们性格内向;“大智若愚”,或站在一旁,隔岸观火;或躲在幕后,调拨策划。李娇儿有自知之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装聋作哑,从不表态,落得做好好先生。一旦潘金莲伤害了自己,也只暗记于心,待到抓住对方致命弱点,便向西门庆告发,让吃醋的主子替自己出气。孟玉楼是位能驾驭潘金莲的女人。她善于利用潘氏达到自己的目的。害死宋蕙莲,她做了无名英雄;潘氏与吴月娘斗气,她出面调停,充当和事佬;潘金莲治死李瓶儿母女,她一言不发。“恼那个人也不知,喜欢那个人也不知,显不出来”,反落个“温柔和气”的好名声。她俩的结局也比别人好。作者这样写,似乎是别有心意的。本来,性格张扬好斗的人,无论胜败如何,最终都没好果子吃。而那些审时度势,善于在矛盾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人,善于在幕后策划的人,往往可免祸得福,作者的描写是真实的,同时也颇耐人寻味。

吴月娘是一部书中的上上人物,从“楼月善良终有寿”的结尾诗来看,作者对这位妇人肯定多于否定。同样在这一女主子身上,更多印下了作者的对处世为人、世故人情的看法。

吴月娘“立身刚正”;“性格宽宏”。小妾们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乐于跟她说,也能从她那里得到安慰。她乐于助人;“替人顶缸受气”;“一时风火性,转眼却无心”,同时也易受人蒙蔽。初蒙蔽于潘金莲,后从宋蕙莲、李瓶儿母子的残死中,醒悟过来,聪明了起来。

在西门府里,吴月娘与众人的最大不同是“立身刚正”。有人评论她是位“贞妇人”,正因其立身刚正,方为“一部书中出色第一人物”。月娘曾与潘金莲议论一件丈母养女婿案,她曾借事言道:“大不正则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还是妇人心邪,若是那正气的,谁敢犯边。”后来潘金莲也偷起女婿来,吴月娘发现后,训斥潘氏道:“常言道:男儿没信,寸铁无钢;女人无行,烂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你有长俊正条,肯教奴才排说你?”这位没有文化的女子,把《论语》中的话都搬了进来,这或许是作者借吴月娘的口来自我表白也说不定。作者在小说第七十八回写贾四娘子先与玳安有奸,后又勾攀西门庆的故事,而后说道:“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由此可见,吴月娘上述的话与作者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这不单是作者对女人行为的一种看法,也包含着对当时朝廷政治生活的认知、企求,试想如果皇帝、大臣都能“立身刚正”,中国百姓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正是由于“上梁不正下梁歪”,才弄得社会乱糟糟的不成个样子。

.....

总之,我们稍一留心宅内的裙钗世界与宅外的男子世界,便会发现在作者笔下,那是个两两相照的世界,且几乎事事对映暗示。譬如,先写李桂姐拜干娘,继而又写王三官拜义父,最后写西门庆拜义父,做干儿子。由此看来,须眉男子与小脚女人,政府官员与妓院粉头,名分有别,本质如一,都是一副附炎趋势的嘴脸,一副奴颜卑膝的灵魂。且作者描写的重点是裙钗世界,不但篇幅多,且写得最细最活,而相比之下官场世界则相形见绌多了。

作者正是通过展现女人生活世界来反映明代中后期

的整个社会生活 ,透过女人生活事理再现整个社会生活人情世理的。

明清老爷少爷特贪也特会享乐，帮闲也就兴盛起来，小说里便出现了他们的形象。崇祯时的《鼓掌绝尘》有四回专写帮闲撞骗，顺治时的《锦疑团》（又名《错错认》，十六回）、乾隆时的《绿野仙踪》（八十回）及嘉庆时的《常言道》（十六回）的帮闲均写得较好，但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对帮闲写得最为成功并受到后世师承的数得上《金瓶梅》了。十兄弟中的应二应伯爵，使人掩卷不忘。

帮闲，总是有闲才帮。穷汉一天到晚忙乎着填饱肚子，自然无闲可帮；而皇帝宰相地主老财活得不耐烦了，百无聊赖，这才有闲可帮。由此看来，世上有了有闲阶级，也就会有帮闲的。远的像西汉的司马相如，近的如晚明的陈继儒，文学形象如严嵩身边的罗龙文，贾政左右的清客，以及浪子温如玉周围的苗秃子、肖麻子（与罗龙文均见李百川的《绿野仙踪》）等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主子，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帮闲。

明范濂在他的笔记《云间据目钞》里,记载着万历时期地方官吏乡绅的诸般帮凶,除了“衙蠹”、“访行”、“恶少打行”,还有“男女帮闲”。南方如此,北方也无例外。可见《金瓶梅》塑造的帮闲形象有现实根据。

我们且看应伯爵的出场。作者这样介绍他:“第二个姓应,双名伯爵,原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的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会一脚好气,双陆棋子,件件皆通。”(十回)第十一回再加重复叙出。到八十回,在前面具体描绘的基础上,作者对他作了如下的总评: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奉承,称功颂德,或肯撒漫使用,说是疏财仗义,慷慨丈夫,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见那门庭冷落,便唇讥腹诽,说他外务,不肯成家立业,祖宗不肖,有此败儿。就是平日深恩,视同陌路。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

这便概括了历代帮闲特别是中下层帮闲的特征,其善恶、妍媸自见。

作者以中国小说常见的无所依傍的白描手法,写应伯爵这类帮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描摹他的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无赖的手段、贪婪的本质,通过他和其他人物的相互关系,在习见的生活场面中图貌绘神,入木三分地镂刻了这一形象。鲁迅在《准风月谈·二丑艺术》里介绍过一种二丑的脚色:“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做‘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既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

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应伯爵就属于二丑这种脚色。他低头哈腰，插科打诨，趋炎附势，舐痔吸痂，用各种方法逗乐他的主子，好从他的主子那里得到一块扔给他的剩肉。帮闲闻财主屁（五十四回应伯爵自己说的）；“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八十回祭文）。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诚如张竹坡在祭文中所批注的：“伯爵辈所为虻虱也。”什么叫帮闲呢？“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篋片！”（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由于主人是个经商掌刑、恣意淫纵的人，所以应伯爵经常出现在妓院、酒会、灯市、郊游以及厅堂、卷棚、店铺之中。奴颜与媚骨固然是帮闲不可少的品格，但却不是他的特质。臣子对皇帝，奴婢对主子也往往显出一副奴颜媚骨相。帮闲却是在品诗赏画、奕棋操琴或者嫖妓听曲、投壶行令，甚而至于婚丧喜庆中让他的主子感到闲得有趣、忙得可图的。不仅方法与手段不同，地位与处境不同，即处在同一线上，如应伯爵与白来抢，他们的能力和能量也大相径庭，受到的青睐与待遇也就大为悬殊了。那应伯爵是个破落户出身，与进学的文人雅士不同，自有他的性情。

应伯爵如同西门庆的影子，西门庆常跟他厮混在一起。

应伯爵又是西门庆的应声虫。他善于揣摩主子心意。诚如应伯爵亲口对西门庆说的：“我恰似打你肚子里钻一遭的。”李瓶儿生了官哥儿，他说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胚胞儿。’西门庆大喜。”（三十一回）官哥得病，应伯爵遂行口令，都是祈保官哥的意思，西门庆

不胜欢喜（五十三回）。李瓶儿死了；西门庆交温秀才起孝帖儿，要开刊去，令写‘荆妇奄逝’，悄悄拿与应伯爵看。伯爵道：‘这个理上说不通。见有吴家嫂子在正堂，如何使得这一个字出去，不被人议论，就是吴大哥心内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与他讲，你且休要写着。’落后温秀才举荐北边杜中书来题名旌；西门庆要写：‘诏封锦衣西门庆恭人李氏柩’十二字，伯爵再三不肯。说：‘见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六十三回）在这里，应伯爵俨然成了颇知礼义名分的正人君子，西门庆反比他矮了一截。然而这是生活。作者真实地写出了这个帮闲的性格的复杂性。他坚持的是儒门至理，恪守的是绅士礼教，因而他也是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与封建规法的正统派，这是帮闲更为可恶可鄙可恨之处。

“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帮闲似乎都是拿文明换取主子赏识的。他不仅懂得犀牛角珍贵，而且会鉴评螺钿屏风这类古董和手工艺品。光是制造‘吃了脸洗饭，洗了饭吃脸’这一套笑料应伯爵还不成其为帮闲。他往往知书达理，熟谙人情世故，具有文化知识，善于应付各种场面，甚至不惜跪在地下，向妓女讨饶，挨两记耳光，讨一杯水酒，除了一张人皮，什么都可出卖，只要能讨得主子欢喜和快乐。

“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鲁迅《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西门庆伙计韩道国老婆王六儿与小叔子韩二通奸，被街坊小伙子捉住；要解县见官去”。韩道国便找应伯爵向西门庆求情，说“事毕重谢二叔”。应伯爵在西门庆

面前就帮衬着说话 ,反诬别人“打砖掠瓦” ;“鬼混欺侮”。在提刑院任职的西门庆便把王氏放了 ,把小伙儿捉起来 ,每人夹了二十大棍 ;打的皮开肉绽 ,鲜血迸流 ,收监等候发落。这四家小伙的父兄“共凑了四十两银子齐到应伯爵家 ,央他对西门庆说”。他怕韩伙计见怪 ,便拿出一半银子收买书童再转央李瓶儿才了事。他娘子说 :“你既替韩伙计出力 ,摆布这起人 ,如何又揽下这银子 ,反替他说方便?”别人两头使钱 ,应伯爵却两头落情 ,他就是这样捞取血腥钱的。至于与西门庆说事过钱、铺谋定计更不在话下了。他确实是西门庆豢养的帮凶 ,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块石头。

李瓶儿死了 ,西门庆哭“我的有仁义的姐姐” ,应伯爵、谢希大鹦鹉学舌地也哭着“我的有仁义的嫂子” ,这是因为他们赖以寄生的主子尚在。等西门庆一死 ,这些“吃过他的” ;“用过他的” ;“使过他的” ;“借过他的” ;“嚼过他的”帮闲们 ,每人却只出一钱银子祭供 ,还要精打细算 ,把骨头里的油熬回来 ,而且很快找到了新的主子张二官。这张二官不仅花了千两金银 ,讨了西门庆刑所的缺 ,而且听从应伯爵之言 ,花了三百两银子 ,把李娇儿娶到家中 ,做了二房。张二官就是另一个西门庆 ,而应伯爵终于也可以继续帮闲下去了。

“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 ,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 (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金瓶梅词话序》)。这就是应伯爵形象的典型意义。作为人的品性 ,他没有独立人格 ;离开全书的中心人物 ,他没有存在价值。写他的实质是为了写西门庆与表现这个商人、恶霸、官吏的起落的这条主线。它的典型性还在于 ,不仅在过去 ,而且在今天 ,这类帮闲进而帮忙甚至帮凶的还大有人在。

兰陵笑笑生发展了传统的小说学。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又一次变革。

首先是小说艺术的空间,因“丑”的发现被大大拓宽了。晚出于笑笑生三百年的、伟大的法国雕塑家罗丹才自觉地悟到:

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这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

罗丹破除了古希腊那条“不准表现丑”的清规戒律,所以他的艺术倾向才发生了质变。而笑笑生也因推倒了那堵人为地垒在美与丑之间的墙壁,才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他从现实出发,开掘出现实中全部的丑,并通过对丑的无情暴露,让丑自我呈现,自我否定,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升华,一种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于是一

种新的美学原则随之诞生。

笑笑生敏锐的审丑力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倾向已经不是一元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生的,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则在小说观上又有了一次巨大发现,即“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的注意力。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没有理想的闪光,没有美的存在,更没有一切美文学中的和谐和诗意。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它如此集中写黑暗,在古今中外也是独具风姿的。笔者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多是杂色的,其实照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的《金瓶梅》的主色调是黑色的,然而黑得美,黑得好,黑得深刻,在中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总之,在《金瓶梅》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虚幻的理想美,更没有通常小说中的美丑对照。因为作者没有用假定的美来反衬现实的丑。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也是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因为所谓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那么它的艺术就越富有属于他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笑笑生发现了“这一个”世界,而又对这一世界做了一次独一无二的巡礼和展现。

对于一个作家特有的对生活的体认、艺术感觉和艺术个性,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说过一段很有启示性的话:

一个生而有才的人的感受力,至少是某一类的

感受力,必然迅速而又细致……这个鲜明的为个人所独有的感受不是静止的,影响所及,全部思想和机能都受到震动……最初那个强烈的刺激使艺术家活跃的头脑把事物重新思索过,改造过,或是明亮事物,扩大事物,或是把事物向一个方向歪曲。

笑笑生所创造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就在于它违背了大多数人们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们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他没有以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去感知生活。

主观的艺术感觉与客观的对象世界的对话和交流的结果是:他所要描述的不是属于常态的世界,他所塑造的是一群变了形也逸出了社会规范的人们。因此我们才说,笑笑生不是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他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美。所以他的美学信念才异于常人。他孤独地、执拗地不愿写出人们已写出了那样众多的乐观主义的诗。他不愧为小说界的一条耿直的汉子。他没有流于唱赞歌的帮闲文人的行列。试想,彼时彼地,而且又是一个“生而有才的人”,只要写出了乐观主义的诗,就意味着他加入了现实中丑的行列。那么,《金瓶梅》就再也不属于他所有,而说部也就会抹掉了这位“笑笑生”的光辉名字。正因他不愿趋于流俗,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才体现出兰陵笑笑生的创作个性和经由他的艺术感觉放大和改变了的一个独立王国。所以我们才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更新的历程中,属于高层次的艺术感觉问题,被兰陵笑笑生无意中提到了小说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还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与叙事方式。对于明代社会,他戴上了看待世间一切事物丑的滤色镜。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他怎能不把整个人生及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血腥、混乱、嘈杂、变态、肮脏、扭曲、怪诞和无聊呢?因为对于一个失去价值支点而越来越趋于解体的文明系统来说,这种“疯狂”的描写,完全是正常的。然而《金瓶梅》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毕竟是极具有时代特征而又真实可信的。对于这一点,至今尚无人提出疑义。

陈昌恒

作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其主要审美价值就在于它用世俗的语言描绘了明万历以来的俗情,塑造了当时社会中俗人的形象。因此,《金瓶梅》的审美凝聚点在于世俗,即俗情、俗人、俗语所构成的艺术美。

小说的五十六回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对“柴米夫妻”:

常时节作谢起身,袖着银子,欢的走到家来。刚刚进门,只见那浑家闹吵吵嚷将出来,骂道:“梧桐叶落满身光棍的行货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尚兀是千欢万喜到家来,可不害羞哩?房子没的住,受别人许多酸呕气,只教老婆耳朵里受用。”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

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进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

这段描写，诚如《金瓶梅》的评点者张竹坡所言，是“一篇柴米夫妻文字”，它不仅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常时节得钞傲妻儿”的神态，而且传神地描绘出常二妻子的感情变化：“‘迎门接住’与前‘进门’嚷将出来’，怒颜喜色跃然纸上”，给了我们一种美的享受。小说通过另一对“柴米夫妻”韩道国与王六儿“出妻献子”行为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俗情。韩道国是西门庆雇佣的伙计，为了讨好西门庆，让西门庆把自己十五岁的女儿爱姐送给太师蔡京的大管家翟谦当小妾。更有甚者，夫妇二人竟合计让西门庆霸占王六儿。小说第三十八回这样写道：

妇人道：“这不是有了五十两银子，他到明日一定与咱多添几两银子，看所好房儿，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韩道国：“等明日往铺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哩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赚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老婆笑道：“贼强人，倒路死的！你倒会吃自在饭儿，你还不知道老娘怎样受苦哩！”两个又笑了一回，……夫妻收拾歇下。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得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艺术感受。奶奶如意儿在西门庆的儿子官哥儿死了之后，谎说自己的男人死了，不惜屈身辱体地事奉西门庆，以使自己不致被解雇。她为什么要这样呢？潘金莲的一番骂

语道出了实质：“天不着风儿晴不的，人不着谎儿成不的！他不恁撺瞒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来时，饿答的个脸，黄皮儿寡瘦的，乞乞缩缩那等腔儿。看你贼淫妇，吃了这两年饱饭，就生事儿雌起汉子来了。”显而易见，如意之所以任凭西门庆在她的身上发泄兽欲，无非是为了图一口“饱饭”。小说中的这些生活画面的描绘，艺术地再现了“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世俗生活，从批判讽刺的角度反映了俗的这些俗情，给我们一种“真”中蕴“美”的审美愉悦。

《金瓶梅》中关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总体性的描写，更能使我们品味再三，兴味无穷。潘金莲与潘姥姥，名为真母子，由于潘姥姥贫穷，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像假母女。李桂姐与吴月娘，吴银儿与李娇儿，名为假母女，而来往密切又像真母女。西门庆与蔡太师，虽是假父子，但俨然与真父子一样。花子虚与花子由等人是真兄弟，可是为了家产竟闹到官府，结果是花子虚家破人亡，妻子改嫁。应伯爵、谢子纯等人与西门庆是结拜兄弟，由于西门庆居官经商，有钱有势，既可以庇护他们，也可以供给他们吃喝穿戴，所以倒像真兄弟一样亲密。而一旦西门庆身亡，应伯爵即寻新的主子，不仅抢走了西门庆的生意，而且诱使张二官娶西门庆的老婆李瓶儿、潘金莲。西门庆与一妻五妾，名为真夫妻，实为假夫妻，而他与姘妇王六儿，妈妈如意儿倒似真夫妻。韩道国与王六儿，熊旺与如意儿，名为真夫妻，倒又像假夫妻。这些各具个性的假父子、假母女、假弟兄、假夫妻、假亲戚的假情、假义、假言、假行，形象地揭示了在金钱的腐蚀下人类真实情感被泯灭的时代现实，生发出一种讽刺喜剧般的艺术诱惑力，让读者在幽默的嘲笑中去否定这个罪恶的社会，去和这

些丧尽人类天性的俗人告别。

当我们在阅读《金瓶梅》时，仿佛置身于明代的市井俗人之中，看到了西门庆的一妻五妾、男女仆人、和尚道士、帮闲篋片、妓女优伶、媒婆尼姑、商人小贩怎样在财色的引诱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揣摩到了他们的变态心理，并把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脑海中。而这些俗人群像的美，是我们在其他古典小说中无法欣赏到的。甚至像武大、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王婆、何九等从《水浒传》中借用过来的人物，也只有在《金瓶梅》这部“世情书”中，我们才觉得一个个“俗态可掬”，鲜活如画。

作为对容与堂本《水浒传》的伪纂物，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传》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还是基本忠于容与堂本，却迥然有别于《金瓶梅》中的四个有关的人物形象。

武松 《水浒传》中的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是农民起义军中的杰出将领。小说在怒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斗杀蜈蚣岭等情节中，虎虎如生地刻画了他报仇彻底、神勇兼备的性格特点。《金瓶梅》出于世情小说的需要，将一个造反英雄改写为推行仁孝的悌弟，着重写他与武大的手足情深，不仅删去了《水浒传》中的其他情节，连杀潘金莲这个情节也作了改动。《水浒传》中武松杀潘金莲，是武松在调查清楚武大郎被害经过之后直接杀了她。《金瓶梅》则是先写武松答应王婆，出了钱，要把潘金莲买回来做老婆，把潘金莲骗回家后才用刀子杀人，而且这个情节是放在小说的第八十七回中写的。显而易见，《水浒传》中主角武松，在

《金瓶梅》中变成了配角 ,并由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变成了一个真讲兄弟之情的小市民。

西门庆 在《水浒传》中 ,西门庆只是一个淫棍的形象。而在《金瓶梅》中 ,西门庆既是淫棍 ,也是奸商 ,同时还是贪官。他由《水浒传》的次要人物而变成了《金瓶梅》中唯一的男主角。《金瓶梅》不仅写他如何奸淫了二十一个妇女 ,而且还写了他以钱谋权 ,以权换钱 ,由一个市井无赖一跃成为蔡太师的干儿子、理刑千户 ,并通过他全方位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吏治、法制、人事、商业、税务、风俗的腐败。总之《金瓶梅》仅只保留了《水浒传》中西门庆淫性十足的一面 ,而极力描写了他揽权、贪财的多侧面 ,把一个性格单一的扁形人物改变成了一个性格丰富的圆形人物。

潘金莲 如果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只是一个淫妇的形象 ,那么《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则是一个淫妇、毒妇、妒妇的典型。她的奸夫除西门庆外 ,还有琴童、陈经济、王潮儿。不惟如此 ,小说还通过她唆打孙雪娥、害死官哥儿、逼死李瓶儿、算计宋惠莲等情节 ,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她阴险、毒辣、刁泼、狡诈等多重性格 ,不仅描写了她的淫欲无度 ,而且还描写了她的权欲、钱欲等方面的贪婪成性。《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不再是《水浒传》中的次要人物 ,而是一个以她为中心来命名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金瓶梅》中的“瓶”与“梅”都是由“金”派生出来另外两个女主角 ,小说用了八十七回的篇幅来写完她罪恶的一生 ,这是《水浒传》所无法比拟的。

王婆 在《水浒传》中 ,她充其量只是一个马泊六。可是在《金瓶梅》中 ,她较之文嫂、薛嫂、冯妈妈、陶妈妈等人来说 ,性格更为丰满。当西门庆为娶孟玉楼丢下了潘

金莲时,王婆为讨好潘金莲,大清早就去铺子里打听西门庆的消息,并到妓院硬把西门庆扯到潘金莲家。一见潘金莲的面,就自我吹嘘地说:“还亏老身,没半个时辰,把大官人请将来!”可是一旦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失了势,她就在玳安面前骂潘金莲忘恩负义,当面骂潘金莲“呆里撒奸”、“把养汉当饭”,并恶狠狠地说:“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她把变卖潘金莲当作赚钱的美差。陈经济要赎潘金莲,出价到80两银子,她不但不答应,反骂他是“来老娘屋里放屁”!周守备出到85两银子要买潘金莲作小妾,她高低不答应,非要100两银子。武松愿出100两银子买潘金莲时,她利令智昏,丝毫没察觉到武松买潘金莲做老婆是假,而要替兄报仇是真,还祝贺武松:“你今日帽儿光光,晚夕做个新郎。”并且她还对吴月娘说:“兔儿沿山跑,还来归旧窝。嫁了她家小叔子,还吃旧锅里粥去了。”最后,她把潘金莲亲自送到武松家,与潘金莲一起被武松杀了。总而言之,《金瓶梅》不仅保留了《水浒传》中这四个人物的性格,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内涵,明显地披露出了这两部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点。

吴礼权

明清时代,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创作数量相当大。但是,较为娴熟地运用白话且取得杰出艺术成就的作品当首推《水浒传》。而产生于《水浒传》之后的《金瓶梅》,则又层楼更上,别有一番新景观,把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语言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金瓶梅》语言的生动化,主要表现在它平实浅近的口语化叙述特色,丰富多彩的谚语歇后语描写词汇,给作品平添了无穷的活力与情趣。众所周知,《金瓶梅》是一部描写市民生活较为地道的世情小说,它没有《三国演义》那样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描写,也没有《水浒传》那样横扫世界的英雄豪侠刻画,更没有《西游记》那样变幻莫测的神魔景观渲染。它所有的只是平凡而真实的现实社会生活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芸芸众生。因此,在整部《金瓶梅》中,我们找不到什么曲折、惊人的情节,寻觅不见轰轰烈烈的军国大事描写;常常

能看到的只是潘金莲、李瓶儿们的“老婆舌头”的争吵，西门庆、陈经济的偷鸡摸狗，应伯爵、谢希大们的帮闲、阿谀等等故事。这些故事虽比不上三国争战历史意义深远，比不上水浒英雄事迹动人，比不上悟空西天取经神奇夺魄，但是它是一幅真实的人间生活图画，使人感到真实，觉得亲切。但是，这幅生动的世俗人情画却不是神奇之笔绘出，而是“笑笑生”用平实浅近的口语化语言或细致铺排、或粗笔勾勒而写就的。“如果我们把《金瓶梅》平实浅近的口语叙述特色比作是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的话，那么《金瓶梅》中丰富多彩的谚语、歇后语等语言成分则浑然而为小溪中欢跃的鱼儿，它伴随着小溪生动地流淌，直至汇入那艺术的海洋”。如“表壮不如里壮”、“篱牢犬不入”（第二回）“远亲不如近邻”（第三回）“妻大两，黄金日日长，妻大三，黄金积如山”（第七回）“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第十二回）“不看僧面看佛面”（第十四回）等几百条谚语的运用；“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第一回）“骑着木驴儿嗑瓜子儿——琐碎昏昏”（第八回）“云端里老鼠——天生的耗子”（第二十回）“东净里砖儿——又臭又硬”（第二十五回）“老鸽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第六十回）“腊月里萝卜——动（冻）了心”（第九十一回）等近百种歇后语的插入，使《金瓶梅》所描绘的世情图画色彩缤纷，让读者不知不觉中也要走进这个图画的世界中。

《金瓶梅》语言的性格化特点，可以说是每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有共同感受的。早在清代，刘廷玑就极口称赞《金瓶梅》：“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通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这种评价对于全书来说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是对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等主要

人物形象来说,实是千真万确的。如小说第四十八回写西门庆一次到王六儿家,看见隔壁月台,问道:“是谁家的?”王六儿说:“是隔壁乐三家月台。”西门庆吩咐王六儿:“你对他说,若不与我即便拆了,如何教他遮着这边风水。不然,我教地方吩咐他。”这一番语言,掩卷默会便知是出自西门庆之口,因为只有官僚兼恶霸的西门庆才能说出,它是西门庆霸道性格的表征。又如第五十七回写潘金莲一次偶然听到李瓶儿与吴月娘在议论官哥儿长大当官之事,她便禁不住破口骂道:“没廉耻,弄虚脾的臭娼根,偏你会养儿子哩!也不曾经过三个黄梅,四个夏至,又不曾长成十五六岁,出幼过关,上学堂读书,还是水的泡,与阎罗王合养在这里的,怎见的就做官?就封赠那老夫人?”无须思考,不冠姓氏,读者便知这是潘金莲在骂街,因为只有嫉妒成性、嘴锐如刀的潘金莲才有如此语言。再如第二十回写李瓶儿正式被西门庆娶为妾后,应伯爵与谢希大等帮闲去西门庆家吃会亲酒,因“见李瓶儿出来拜,恨不的生出几个口来夸奖奉承,说道:‘我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盖世无双。休说德性温良,举止沉重;自有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寻不出来。那里有哥这样大福?俺每今日得见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处’。”这种当面拍马捧屁、大言浮辞而不颜赤的语言只能出自应伯爵之嘴,再找第二个人可能也是难以对上口吻了。这便是《金瓶梅》人物语言性格化的突出表现。

《金瓶梅》语言的形象化主要是通过小说中一系列俗语俚言的组合,利用各个谚语、歇后语所包含的特定含义而造就出来的。如第六十回描写李瓶儿孩子死后,潘金莲却幸灾乐祸,指桑骂槐地说:“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

答谷了。春凳拆了靠背儿 , 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 , 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 , 没指望了。却怎的 , 也和我一般 ! ”短短的一段骂词中所使用的五个歇后语 : 日头过午、斑鸠跌弹、春凳拆背、王婆卖磨、老鸨死粉头等 , 皆颇具形象化特色。又如第八十六回潘金莲因与陈经济乱伦而被吴月娘赶出家门 , 着王婆领回发卖 , 潘金莲因之而斥责王婆 , 王婆便对之进行了一番激烈的嘲骂 : “你休稀里打哄 , 做哑装聋 ! 自古蛇钻窟窿蛇知道 , 各人干的事儿各人心里明。金莲 , 你休呆里撒奸 , 两头白面 , 说长并道短 , 我手里使不的你巧语花言 , 帮闲钻懒 ! 自古没个不散的筵席 , 出头椽儿先朽烂。人的名儿 , 树的影儿。苍蝇不钻没缝的蛋。你休把养汉当饭 , 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 ! ”其中“蛇钻窟窿蛇知道”、“出头椽儿先朽烂”、“人的名儿 , 树的影儿”、“苍蝇不钻没缝的蛋”等俚语 , 极富形象化特征 , 对于潘金莲人品的抨击远比直陈来得生动得多 , 给读者的印象也深刻得多。这便是《金瓶梅》语言形象化之妙。

张 兵

阆苑瀛洲 见《金瓶梅词话》引首。词牌名《行香子》，共四首，元朝中峰禅师作。这四首词，说的是慎独出世的人生观。作者把它们置于全书的“引首”，表明了他的创作主旨。

第一首言“无荣无辱无忧”的人生处世哲学。阆苑，指宫苑，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住处；瀛洲，为仙山；金谷，是地名，晋石崇曾在此建造花园；陵楼，乃高楼大厦的别称。它们都是令人神往的居处。此词开头，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人间仙景。但它们都不如“茅舍清幽”。作者一年四季甘愿居住在“野花绣地”般的山野之中；“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过上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

第二首具体描写日常生活态度。先是对眼前“水色山光”的细致描绘，以构筑隐逸之士日常起居的生活环境：短墙矮窗，池塘绿水，周围山峰环绕。词人于此“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可避免人间的一切烦

恼,多么清幽,多么愉悦,真实地抒发了自己的生活理想。

第三首叙述理想中的“吾庐”是一处清幽、潇洒、宽舒之地。“爱”字是此词的“词眼”。词人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吾庐”的特点:环境幽静,结构精巧。平常在这“水竹之居”处观鱼赏景,求神、读书,富于诗意。

第四首抒发词人慎独出世的怀抱。“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三个“且”字,层层迭进,凸现了作者不慕富贵,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思想。

这四首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一首直接点明题意,第二、三首具体描绘人生理想,第四首照应前词。它们表达的思想意蕴对研究《金瓶梅词话》的思想主旨颇有价值,是揭示小说思想奥秘的一把“钥匙”。

酒丧精神破丧家 见《金瓶梅词话》引首。又名《四贪词》,共四首,都是劝诫世人勿贪欲之作。

第一首是戒酒词。上半阕写贪酒的危害。“背义忘恩”;“疏亲慢友”,词人先用质朴的语言,描绘了贪酒者的形象,再用“多由你”;“尽是他”等不容置辩之辞,予以强调,艺术感染力较强。下半阕点明戒酒的主题,提出“今后逢宾只待茶”之议。

第二首是戒色词。与第一首稍不同的是,此词开篇即提出戒色的问题。“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是词人对世人的忠告,它们置于此词的开首,给人的劝谕意义很强。下半阕再从“人能寡欲寿长年”的角度,指明戒色之好处,符合明人重视生命价值的思想潮流。

第三首是戒财词。上半阕中,词人从封建道德伦理的角度叙述了求财欲之害:“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下半阕全是劝诫之辞。词人从“莫与儿孙作远

忧”入手,强调了积财为儿孙谋的思想。

第四首是戒气词。上半阙指出逞气和灾祸的因果关系:“一时怒发天明穴,到后忧煎及祸身”,为下半阙“劝君凡事放宽情”的诚谕作了铺垫。最后两句点明此词的思想主旨。

这四首词列于小说的引首,表明作者的创作题旨乃在于戒欲。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保护色”,有的研究者将此和万历年间雒于仁的《四箴疏》联系起来,认为它是讽喻明朝时政之作;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未免显得牵强。总之,它值得重视。

丈夫只手把吴钩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此词乃南宋词人卓田所作,词牌名《眼儿媚》。卓田,字稼翁,号四山,福建建阳人。开喜元年(1250)进士。原词如下:“丈夫双手把吴钩,能断万人头。如何铁石,打作心肺,却为花柔。尝观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和原词相比,小说中的引词有六处异文,可能系传抄过程中的误录。

词旨乃题苏小楼。苏小,是南齐名妓,倾倒过当时的文人学士。词人登临苏小楼,缅怀往事,感慨万千。刘邦、项羽,当年曾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烈烈“丈夫”,一个个都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英雄难过美人关,这是历史给人们的深刻昭示。

词一开头,先描写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的伟绩。“吴钩”是古代吴地所造的一种弯形的刀。这里借指武器。男儿凭借着它,驰骋疆场。正如小说在诠释词意时所说:“言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概贯虹蜺”。下面笔锋陡转,在“花柔”(即多情的女性)面前,未免屈志丧节。下半

阕以历史上的刘邦和项羽为例来说明上述思想。一个“愁”字，活现了他们在打天下的戎马生涯中的心灵痛苦。结尾“豪杰都休”一句，是词人发出的不尽感慨。《金瓶梅词话》在引录此词后，有一节关于“情色”的议论：“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小说的思想主旨乃是写情。其实，这是从话本小说《刎颈鸳鸯会》中袭用来的，说明两者的思想是相通的（参见“刎颈鸳鸯会”条）。

拔山力尽霸图隳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诗为七绝。作者写项羽在楚汉相争中“只因宠着一个妇人”，兵败垓下，为乌江所阻，自刎身死的感叹。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前两句“拔山力尽图霸隳，倚剑空歌不逝雅”化用项羽《垓下歌》中的诗句，描绘英雄项羽兵败垓山的情景。“拔山”、“倚剑”皆言项羽的英勇和威武；“力尽”、“空歌”，均语项羽的不得志；“隳”意指毁坏，配合着雅的“不逝”，用动物的亦通人性来反衬，他从不可一世的顶峰跌落到灭顶之灾的深渊，这种巨大的情感“落差”，在生死关头表现得尤为强烈。后两句“明月满营天似水，那堪回首别虞姬”抒发项羽的感慨。他仰望满天星斗垂照下的军营，勾起对爱妾虞姬的情思。“那堪回首”四字，表达了他对往事的眷恋。史载项羽和虞姬情深意笃，是英雄和美人的绝世佳话。现在一切都将“告别”了，其心情自然十分凄切沉痛。此诗虽为史官所叹，实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字里行间隐伏着封建士大夫认为女人是“祸水”的传统观念。

鸿鹄高飞兮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这是一首四言诗，作者是刘邦。题为《鸿鹄歌》，今存。据逯钦立之

《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诗》辑录，全文如下：“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缴，尚安所思。”对照小说中的引录，可见两者有着多处文字上的差异，说明此诗在流传过程中有误录。

此诗写于刘邦的晚年。他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统治。但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却迟迟未定。他想废嫡立庶，又恐朝野反对。在宠妾戚夫人“哭泣不止”之时，作诗安慰她。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叙述自己建功立业的伟绩。“鸿鹄”，是一种鸟名，飞得很高很远，常用来比喻志气远大的人。这里乃刘邦自喻，他在秦末的群雄竞逐中，已“高飞”；“抱龙”，占有天下，四海归一，普天同庆。诗人在戚氏面前的这番炫耀，形象地表现了刘邦的志满意得。后四句是他宽慰戚氏的话。第五六句紧接上文，描写汉王朝的统治十分稳固。虽有商山四皓等人辅助太子，反对废嫡立庶，但终究不能动摇皇帝的宝座。诗中“缴”，是指猎取飞鸟的射具，这里借代战争。因为刘邦在成立汉王朝后，仍面临着巩固政权的历史任务，他灭了韩信等人之后，控制了大局。本诗连珠手法的运用，使全篇吟唱的主题得到强调。小说引录此诗，意在说明刘邦“只因也是宠着个妇人”，才导致后来的宫闱之乱，加速了汉王朝的走向崩溃。

刘项佳人绝可怜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诗为七绝。此诗是第一回“入话”的总结。全诗哀叹虞姬、戚氏的命运，说明《眼儿媚》词中所叙项羽、刘邦“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的道理，诗人强调了“刘项佳人绝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是历史的必然。小说第一回的上述诗词中所表达的题旨，可用“女人亡国”概括之。作者反复强

调项羽和刘邦“只因宠着一个妇人”，和全书的内容似乎并不契合。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小说在改写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由此可见传抄时期的《金瓶梅》其思想主旨是“政治讽谕”，作者借史事以谏时政，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意义（参见“政治讽谕说”条），可为一说。

无形无影透人怀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诗为七绝。武松不听劝阻，在酒店内吃好酒后独身上景阳冈。正待要在树下的大青卧牛石上躺下时，但见青天忽然起一阵狂风。此诗就是对这阵狂风的描绘。诗共四句，首句“无形无影透人怀”是从人的感觉上来说；第二句“四季能吹万物开”叙述了风的作用；第三句“就地撮将黄叶去”写武松眼前的实景；第四句“入山推出白云来”叙风推白云的景观，是视野的拓展。全诗语言质朴、明白，是一首很有特点的“古风”，常为宋元明时代的“说话”艺人所运用。诗人从眼前之景入手，又融铸着主观情感，以唤醒读者的审美体验，为以下的“风过后，跳出一只吊睛白额斑斓虎来”的情节描写和武松打虎的英勇气概，作了气氛上的渲染。

景阳冈头风正狂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这是一篇七言“古风”，引录自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诗共三十句；“单道景阳冈武松打虎”。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打虎前的环境和气氛：狂风蔽日，阴气逼人，遍地草黄，冷云笼罩，活现了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以下八句为第二层，主要描写猛虎之威：这只“兽中王”，张牙舞爪，直扑武松，连山谷中的诸种动物都被惊得四散逃窜。最后十六句为第三层，具体描写武松和猛虎的搏斗情景。这位

“清河壮士”在突然而来的危险面前，表现了惊人的勇武之态。他迎难而上；“拳头脚尖如雨点”，痛打猛虎，终于制服了这个庞然大物。全诗重点是第三层。前二层都是为武松打虎作渲染的，在映衬和对比中凸现了人物的鲜明性格。全诗结构谨严，语言生动形象，在短短的二百十字中，凝聚着丰富的情节内容，说它是我国古代叙事诗中的一篇佳作，并非溢美之辞。

壮士英雄艺略芳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诗为七绝。武松打虎，为民除害，做了巡捕都头；“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小说袭用了《水浒传》中的这一情节，于全书的结构关系不大，后来的“崇祯本”对此作了很大的删削。这首七绝是对武松的赞歌，前两句描绘武松“挺身直上景阳冈”的英雄行为和谋略；后两句叙述武松“自此声名播四方”。它是第一回中“武松打虎”情节的小结。下面“按下武松，单表武大”转入小说正文。

柔软立身之本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这几句“格言”，所用词牌名《西江月》。全词宣扬安分守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上半阙强调“柔软立身之本”、“无争无竞是贤才”；下半阙重在阐述人须“安分”，不须计较的说教。小说在叙述武大“软弱、朴实”的性格时，引用这些“格言”以及有关的议论，是对武大的赞美。武大，是《金瓶梅》世界中的弱者，第一个死于非命。兰陵笑笑生对他的同情乃至赞扬，居于高位者恐怕不易做到。

相当初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这是一首散曲，名《山坡羊》。聪明美丽的潘金莲，被张大户“收用”后，不

为“主家婆”所容，如破烂一般，硬塞给了外形丑陋的武大。她既不能获得优裕的物质享受，又缺乏丰富的感情慰藉，这种伤心愤怒之情，只有在琵琶声中才能得到倾诉，此曲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潘金莲的一腔怨愤。“他乌鸦怎配鸾凤对”，曲中处处把潘金莲和武大对比，如将“鸾凤”与“乌鸦”相对比之外，还连用了“真金”与“高号铜”、“羊脂玉体”与“顽石”、“灵芝”与“粪土”；“金砖”与“泥土基”对比，这一系列两两相对的形象化比喻以及第一人称排比句式的采用，如诉如泣，富于艺术感染力。曲中流露的这种伤感之情，十分真实、可信，亦无可厚非。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说明潘金莲开始意识到自己个体的价值，有了一点自我觉醒。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的人格从不被重视，现在潘金莲高歌自己是鸾凤，是黄金，有其合理成分。”

叔嫂萍踪得偶逢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诗为七绝。正当潘金莲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的时刻，突然闯进了一位打虎英雄。武松高大壮健的身躯，英勇无畏的气概，和卑琐的武大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潘金莲的感情中，掀起一阵难平的波涛，自也属人之常情。此诗写于潘金莲初会武松时，形象地表现了她的神情和心态。她梳洗打扮，“妖娆偏逞秀仪容”，以极其原始的方式，“暗把邪言钩钓武松”。封建社会践踏妇女的恋爱自由，摧残人性的罪恶本质，于此可略见一斑。

万里彤云密布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此为雪景词。作者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描绘了“纷纷扬扬飞下了一场瑞雪”的奇景。作者融汇了古赋铺陈艳冶之长，艺术地

表现银妆世界的恬美。诗中运用了许多的比喻和典故，如以琼花祥瑞喜指雪花，是很形象和生动的。“剡溪当此际，濡滞子猷船”句，是指历史上晋王子猷（徽之）雪夜访戴逵的故事。本源出自《世说新语》。《太平寰宇记》一书亦有记载。“当时吕蒙正，窑内叹无钱”句，借用的是吕蒙正和刘千金爱情故事。这在元明戏曲中是盛为流行之作，如《破窑记》即演其故事。这些比喻和历史典故的运用，使词富有新意，也充满了市井气息。小说插入的这首雪景词，于情节的发展有较大作用。它映衬着潘金莲对武松的“撩逗”，一冷一热，达到了景和情的完美交融。

廿公《跋》对《金瓶梅》有如下的感慨：“不知者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自小说问世后的四百年间，世人多视潘金莲为“淫妇”，实为有失偏颇之论。

雨意云情不遂谋 见《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此为第一回的回末诗，系七律，既总结了本回的内容，又概括了下回的大意，提示着小说情节的发展。“雨意云情”指潘金莲对武松的灼热情欲。“戈矛”，原指兵器，这里喻矛盾和冲突。她和武松的“作寇仇”是她的情欲得不到满足的结果。而对武松来说，拒绝潘金莲的引诱，自是正人君子的行为，历来为人所称扬。但是，综观潘金莲堕落的全过程，作为“骨肉”的他也有某种不可推诿的责任，现代著名作家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对此有所表现，可谓知音之言。

观灯,也叫赏灯、看灯和玩灯,是对于“灯”的审美观照。

灯是夜晚照明之具,始于实用。有了灯,人类就告别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生活方式,丰富了夜间生活。灯是光明的源泉,是人造的太阳。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多半是在灯光下创造的。因为,灯是文明的象征,其本身便有丰富的文化底蕴。随着社会的发展,灯也愈来愈超越了实用功能,进入审美的世界,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了。

中国是世界上“观灯”最早的国家。据说春秋战国时,韩国夫人于元夕在八丈高的大树上装点了一百多盏灯,供人观赏。也有人说,观灯习俗,始于汉代。不管怎样说,中国具有悠久的“观灯”历史,则是人们公认的。

观灯是一种风俗。观灯活动大多在正月十五前后举行。一般为三天,正月十四晚为“试灯”,十五晚为“正灯”,十六晚为

“罢灯”。在这期间,又有观灯、送灯、完灯、转灯、游灯、偷灯等各种风俗。所以,元宵节又叫“灯节”。元宵观灯以唐宋时最盛。唐代长安的安福门外,于元夜搭起一座十二丈高的灯轮;衣以绵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百里皆见,光艳夺目”。宋代的元宵灯市,更是盛况空前。这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多有记载。另从苏东坡“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诗句中,亦可略见一斑。除元宵观灯外,也有中秋观灯的习俗。周密的《武林旧事》云:中秋之夜;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

观灯也是一种艺术。所观之灯,不是日常所用之灯,而是艺术之灯、美化之灯。这灯叫“花灯”,也叫“彩灯”。它有各种质料,各种色彩,各种造型。如南宋时,灯彩艺术,尤为讲究。据《武林旧事》卷二“灯品”中记载:“有_鮫灯,则刻镂金珀、玳瑁以饰之。珠子灯,则以五色珠为纲,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则镞镂精巧,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罗帛灯之类尤多,或为百花,或细眼,间以红白,号‘万眼罗’者,此种最奇。外此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又有深闺巧娃,剪纸而成,尤为精妙。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明代的灯艺虽然没有宋代繁荣,但仍保持了传统灯艺的精华。嘉靖年间,苏州灯艺人赵萼用纸刻成禽鸟之状,敷彩点色,再涂蜡夹纱,制成花灯,供人观赏,称“赵氏灯”。崇祯年间,扬州灯艺人包壮行在灯彩上模仿唐宋名画,闻名全国,被誉为“西灯”。由此可见,花灯是集诗词、谜语、书画、雕刻、影戏、剪纸、刺绣、编织、彩扎、裱糊等于

一体的综合艺术。

观灯更是一种文化。自古以来,观灯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以观灯为龙头,兼及祭祀、宗教、民俗、文学、歌舞、杂技、戏曲、商贸、宴游、集会等活动的多元文化行为。周密评价南宋浙江中秋水灯景观时说:“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因此,汉武帝观灯,是祭祀太乙;汉明帝观灯,是倡教敬佛;宋江观灯,是想要招安;贾母观灯,是宴待家人;文人观灯,志在著文;道人观灯,意在弘道;商人观灯为钱,闺秀观灯是想看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而男人观灯则是想看美女(金圣叹说:“灯下看美人,加一倍袅袅。”);至于讨吉利,求顺达,图前程,不一而足。各人的文化需求不同,所以观灯的旨趣亦不同。不妨说,人人心中各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近年曾红极一时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便是艺术地再现了古老的“灯笼文化”。长期以来,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地的灯彩文化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北京的宫灯,古朴典雅;淄博的抖细灯,素淡大方;苏州的夹纱灯,柔和优美;浙江的硖石灯,玲珑剔透;福州的花篮灯,新颖别致;潮州的屏灯,璀璨华丽;上海的金鱼壁灯,秀逸生动;佛山的秋色灯,惟妙惟肖。

总之,花灯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善,是智,也是美。中国人民创造了千姿百态的灯彩文化,充分显示出其勤劳、智慧和爱美的本质力量。每盏灯上,都凝聚着灯艺人和观灯者不同的人生趣味和审美理想,是锦心的外化,是慧心的寄托。或者说,灯就是心,心就是灯。清代禅师湛愚老人《心灯录》云:“说到心灯,盖谓心有光明。”人皆信诸佛具心灯,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不信自家心灯,亦照三千大千世界。”佛与众生,同此一心,同此一灯。”在国外,

也有类似的说法。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序曲》云：“另有一种光，从我心中发出，它把异样的光辉披洒在落日身上。”柯勒律治受此诗影响，便把心喻为灯。日本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第十九章也有“心如篝灯动水影”的诗句。所以，观灯实质上是观人，是观我，是观心，是追求光明，是追求真、善、美。

《金瓶梅》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楼”，就对元宵观灯有极精彩的描写：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判官灯，钟馗与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蝉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鲇鱼灯，平吞禄藻。银蛾斗彩，雪柳争辉。鱼龙沙戏，七真五老献丹书；吊桂流苏，九夷八蛮来进宝。村里社鼓，队队喧阗；百戏货郎，桩桩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玻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
皇罗，讲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荣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拔游脚僧演说三藏，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娥，鬓边斜插闹春风；
禱凉钗，头上飞金光耀日。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清；虽然览不尽鳌

山景 ,也应丰登快活年。

这段文字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民间的灯彩文化 ,丰富异常 ,无所不包 ,而且亦有灯即人、人即灯的描写。这是观灯的背景。接着 ,作者以神化之笔 ,推出了潘金莲、孟玉楼等人坐在楼上观灯的特写镜头 :

(潘金莲)一回指道 :“大姐姐 ,你来看 ,那家房檐下挂的两盏绣球灯 ,一来一往 ,滚上滚下 ,倒好看。”一回又道 :“二姐姐 ,你来看 ,这对门架上挑着一盏大鱼灯 ,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虾、蟹儿跟着他 ,倒好耍子。”一回又叫 :“三姐姐 ,你看这首里 ,这个婆儿灯 ,那个老儿灯。”正看着 ,忽然一阵风来 ,把个婆儿灯烧了下半截 ,妇人看见 ,笑个不了。引惹得那楼下看灯的人 ,挨肩擦背 ,仰望上瞧 ,通挤匝不开 ,都压擦擦儿。内儿有几个浮浪弟子 ,直指着谈论。一个说道 :“一定是那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一个又猜是 :“贵戚王孙家艳妾来此看灯 ,不然 ,如何内家妆束?”又一个说道 :“莫不是院中小娘儿 ,是那大人家叫来这里看灯弹唱。”

楼上人在看灯 ,楼下人在看人。这情景 ,使我想起了名文《西湖七月半》中的“看月”情景。套用作者张岱的话说 ,潘金莲等人属于“观灯而欲人看其观灯者” ,而楼下人则属于“灯亦看 ,观灯者亦看”之类。这情景 ,又使我想起了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也套用诗人的话说 ,则是 :

你坐在楼上看灯景 ,

看灯景人站在楼下看你。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风俗图画啊！

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观灯时,也要观人,观月,观歌舞,观书画,观一切,调动眼、耳、鼻、舌、身一切感官,全身心地投入,进行多元审美活动。明代画家唐伯虎有几句诗,就深谙此理。诗云: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只有灯、月、春、人一齐观,才能达到观灯的最佳境界。外国有位作家曾风趣地说,灯是月亮下的蛋。所以,中国人在元宵、中秋的月圆之夜观灯,不是没有道理的。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之所以脍炙人口,就是因为文中创造了一个灯、月、水、雾和人物、故事交融一体、幻影朦胧的艺术意境。

对灯境的追求,这就是“观灯”的艺术真谛。

《红楼梦》与《金瓶梅》是两部有血缘关系的古代小说。近年来,随着《红楼梦》的影响渗透到生活层面,出现了“红楼宴”;如今,由《金瓶梅》衍生出来的“金瓶宴”也在有些地方呱呱坠地了。

《金瓶梅》一书写到吃喝的地方至繁至细,名目多至四五百种。它与《红楼梦》不同之处,是常把一份份菜单全部列出,好像唯恐遗漏似的。例如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陪应伯爵喝酒,就有如下一段描写:

说未了,酒菜齐至。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的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_焗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_焗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

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应伯爵吃。

这段文字,尽管作者用了许多形容词,刻意渲染,但我们看到的这几种菜肴,似乎能引起食欲的席上之珍并不多。《红楼梦》就没有那种流水账式报菜单的写法。曹雪芹涉笔成趣,却举出一些典雅新奇的菜名,启发人们情思和遐想。这说明贾府毕竟是钟鸣鼎食的仕宦世家,即使一碟“油盐炒枸杞芽”,也使人想象是清淡素雅的美味甘旨。而《金瓶梅》里的肴馔,充其量是市井暴发户家中的鸡鸭鱼肉而已。在品位上,是有高低之分的。

有人说《金瓶梅》的菜点与徐州有颇深的渊源。近代徐州有一位美食家文若兰,曾写过一本《大彭烹事录》,内有关于“金瓶宴”的“八珍五鼎”的记载。“八珍五鼎”共分四组:第一组为八珍凉盘:凤脯、糟笋、酥鸭、王瓜拌金虾、糟鹅掌、木樨银鱼鲈、火熏肉、豆芽拌海蜇。第二组为五鼎热菜:柳蒸糟鲟鱼、烧鹿花猪、炖鸽子雏儿、油炸骨、滤蒸烧鸭。第三组为坐菜:一品锅鸾羹。外加四小菜:甜酱瓜品、豆豉、香菌、糖蒜。第四组为八点心:酥油松饼、蜜润绦环、黄米面枣糕、桃花烧卖、芝麻象眼、油酥泡螺、艾窝窝、白糖万寿糕。难为这位文若兰先生,他设计的这份食单,精心组合,确实把《金瓶梅》中的佳肴美点网罗殆尽了。

我曾在徐州吃过几次筵席,觉得徐州菜确有特色。大概徐州处在苏鲁豫皖的汇交点上,具有兵家必争之地的粗犷、豪放,山野的独特风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蝎子和狗肉,吃下去后好像胆也大了,心也雄了。所以用徐州菜来制作“金瓶宴”,我看格调比较相近,是大可尝试

的。

但是,任何文学作品最怕按图索骥,对号入座。鲁迅曾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金瓶梅》作为一部写实主义的文学巨著,也必然天南地北广泛积累素材,杂取种种,而不可能囿于一时一地。如果一口咬定《金瓶梅》中写的就是徐州菜,以至推断创作环境也在徐州,作者是徐州一带的人,这就难免有胶柱鼓瑟之嫌。举例来说,《金瓶梅》中凡是写菜肴的地方,一律称之为“嘎饭”(亦作“下饭”),这就是浙东的方言,徐州朋友根本不了解“嘎饭”为何物。因此,我以为“金瓶宴”也同“红楼宴”一样,不必限定是南方菜或北方菜;即使以徐州菜为主体,也不妨吸收别地方的成功的烹饪经验,尽可能搞得丰富多彩些,特别要注意适合现代人的口味,这是最要紧的。

吴 敢

清康熙九年(1670)七月二十六日,在徐州户部山戏马台前彭城张氏家中,候选兵马司指挥张翥的妻子沙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只斑斓猛虎闯入她的卧室,掀髯起立,化为一个黄衣黑冠、气宇轩昂的伟丈夫。沙氏惊觉后,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以评点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金瓶梅》闻名于世的张竹坡。

张竹坡名道深,字自德,以号行世。生而颖慧,两岁即解调声,六岁能赋小诗。一天,父亲接待客人,竹坡立其侧。座客命对曰:河上观音柳;竹坡应声曰:园外大夫松。举座奇之。八岁,入塾读书,以博闻强记倾倒同社,而闻名于闾里。

当时彭城张氏武有张胆(竹坡大伯父、官至督标中军副将)、张道瑞(竹坡从兄、题为福山营游击将军)前后昭继,文有张铎(竹坡二伯父、以内翰出补汉阳太守)、张道祥(竹坡从兄、官至湖北按察使)一脉相承,经文纬武,可谓盛极。长大成人的张竹坡,

就生活在这个簪缨世胄、钟鼎名家之中。然而张翊、张竹坡一支却门庭清肃、布衣始终,在这个望族中,显得很不相称。张竹坡不服这个气,他恃才傲物,使性好胜,慨然以帝师国相自许。他曾经五困场屋,未博一第,却志不少懈,锐意进取。

竹坡既然不能科举中试而步入仕途,其聪明才智,就像是三峡的江水,越被拘束,就越是要奔腾咆哮,夺口而出。康熙三十二年秋,竹坡第四次应举落第,闻说北京有个长安诗社,每聚皆天下名流,极一时之盛。遂北游京师,长章短句,赋成百有余首,余皆惊叹,喻为竹坡才子。

竹坡载誉返徐,度过了他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段平静安定的生活。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张竹坡二十六岁,在徐州家中之皋鹤草堂,评点《金瓶梅》,写下十几万字的评论。张竹坡有一种为事业不惜心神的精神,常连续数昼夜目不交睫,不以为疲,他又才思敏捷,旬有余日,就完成了《金瓶梅》的评点,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奇迹。

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其形式大致为书首专论,回首与回中总评,和文间夹批、旁批、眉批、圈点三大类。属于专论的,就有《金瓶梅寓意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等十几篇之多。明清小说评点中使用专论的形式,始于张竹坡。中国小说理论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体系。张竹坡的各篇专论以及一百零八条读法,是《金瓶梅》全书的阅读指导大纲,而回评与句批,则是该回与该段的赏析示范。

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或概括论述,或具体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画龙点睛,对小说作了全面、系统、细微、深刻的评介,其《金瓶梅》艺术论,最可推许,归纳起来,约分为以下几点:

一是把握风貌,涵盖特色。《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写的是历史、英雄、神魔,着墨最多的是正面人物的刻画与传奇经历的描述。《金瓶梅》则不然,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反面角色,它的情节多系家庭日常琐事。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的人物形象群,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艺术特色。张竹坡看到了这种不同,并从理论上准确地给予了总结。他指出《金瓶梅》与《西厢记》不同,后者是“花娇月媚”文字,而前者则是“一篇市井的文字”(《读法·八十》),并认为“白描”是其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他在《读法·六十四》中说:“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

二是大处着眼,总体立论。《第一奇书凡例》:“《水浒传》圣叹批处,大抵腹中小批居多。予书刊数十回后,或以此为言。予笑曰:《水浒》是现成大段毕具的文字,如一百零八人各有一传,虽有穿插,实次第分明,故圣叹止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止分别字句,细心者皆可为,而反先其大段精彩也。”张竹坡因此不囿前法,别具只眼,提纲挈领,总揽全书,落笔不俗。《竹坡闲话》:“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金瓶梅》是怎样“千曲万折”又“血脉贯通”的呢?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都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读法·三十四》)《金瓶梅》的结构,与《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板块式单线发展的结构方式不同,是以西门庆

一家为主线，旁及清河他家，以及清河以外多家多人，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状形结构。在这一网状结构之中，作者写了几百个人，其中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如此多人“总合一传”，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张竹坡认为说来也简单：“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地被人夺去。”（《读法·一》）张竹坡认为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开卷一部大书，乃用一律、一绝、三成语、一谚语尽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证，则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本回回评）第五十一回又是后半部的关键：“盖此一回，又后五十回之枢纽也。”（本回回评）他还进一步用“冷热”论分析小说结构特点，《读法·八十三》：“《金瓶》是两半截书，上半截热，下半截冷；上半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他把第一回文字就归结为“热结”、“冷遇”，并说：“《金瓶》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冷热金针》）

三是把握人物，寻绎规律。《金瓶梅》在艺术上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张竹坡很好地总结了小说这一方面的创作经验，特别抓住人物个性的发展。如他在第四十一回回评中写道：“上文生子后，至此方使金莲醋瓮开破泥头，瓶儿气包打开线口。盖金莲之刻薄尖酸，必为上文如许情节，自翡翠轩发源，一滴一点，以至于今，使瓶儿之心深惧，瓶儿之胆暗摄，方深深郁郁闷闷，守口如瓶，而不轻发一言，以与之争。虽瓶儿天性温厚，亦积威于渐，以致之也。”小说是如何描写金莲醋瓮开泥的呢？第二十二回回评：“此回方写惠莲。夫写一金莲已令观者发指，乃偏又写一似金莲，……而写此似金莲受制于彼金莲者，见金莲

之恶,已小试于惠莲一人,而金莲恃宠为恶之胆,又渐起于治惠莲之时。其后遂至陷死瓶儿母子,勾串敬济,药死西门,一纵而几不可治者,皆小试于惠莲之日。”李瓶儿终于因此丧生。第六十二回写李瓶儿死时各人的言行,竹坡批道:“西门是痛,月娘是假,春梅是淡,金莲是快。故西门之言,月娘便恼;西门之哭,春梅不见;金莲之言,西门发怒也。情事如画。”(本回回评)张竹坡实际已感觉到小说创作中的“典型”问题。他说:“《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读法·八十四》)《金瓶梅》中写了很多地方贪官、市井恶霸,张竹坡认为:“无非衬西门庆也。”(第四十七回回评)然社会上“何止百千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第四十八回回评)。这就是鲁迅说的“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

四是随文点拨,因故立目。张竹坡为《金瓶梅》的写作手法所立的名目,还有如“两对法”、“节节露破绽处”、“草蛇灰线法”、“对锁法”、“开缺候官法”、“十成补足法”、“烘云托月法”、“趁窝和泥法”、“十二分满足法”、“连环纽扣法”等,虽然没有跳出明清评点派的窠臼,不免琐屑庞杂,其具体阐述,自有真知灼见,用张竹坡的话说是“《金瓶梅》一书,于作文之法,无所不备”(《读法·五十》)。

张竹坡那种锋芒毕露的性格,自然不会受到世人的青睐,他在稗语小说方面的才能,也只会被封建礼教视为异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评点、刊刻、发行《金瓶梅》,弄到贫病交迫、寄人篱下、有家不可归的境地。

康熙三十七年春,张竹坡离开寓居了一年多的苏州,到永定河工地图谋进身之阶。治水是当时的一件大事,

在河工上升官发财的不计其数。然而命途多舛,永定河工竣,他却怀着壮志未酬、才情未尽的遗恨突然病亡,时在九月十五日,年仅二十九岁。

《金瓶梅》的产生,使中国小说取材构思、开路谋篇扩及社会整个领域,写生活,写家庭,写社会众生相,成为小说家的基本思路,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张竹坡的《金瓶梅》艺术论,使中国小说理论摆脱了雕章琢句、随文立论的八股模式,全书立论,总体涵盖,概括了小说的文学风貌,显示了大家气度。

在中国文化史上,张竹坡可算是昙花一现,没有来得及更多地驰骋才志。始料不及的是,他的《金瓶梅》评点,却使他在中国小说史上写下足可称道的一章。

张 群

《金瓶梅》全书一百回，除第五十六回无“茶”字外，其他回均有“茶”字出现。全书饮茶场面据统计共有 234 次，涉及“茶”字 734 个，可谓饮茶之大观也。

《金瓶梅》饮茶场面虽多，但叫得出的名茶却只有六安茶，六安茶是有名的绿茶，属特种炒青，产地安徽六安，因加工后其叶片外形叶缘微翘，状似瓜子之壳，故又名六安瓜片。这种茶自明朝始进贡朝廷，十分珍贵。此茶能消积滞，去垢腻，是一种极好的解酒消食的茶类。《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里说道，正月初十，西门庆的妻妾们轮流作东治席，轮到李瓶儿那天，女眷们齐聚李屋饮酒作乐，吴月娘吩咐道：“对你姐说，下房拣收里有六安茶，顿一壶来俺们吃。”讲的就是众女眷因连日酒宴不断，油腻菜肴吃得过多，故借六安茶来消食解酒提精神的。但书中所讲吃法不似今日之冲泡，而是“顿一壶茶来吃”，这种吃法实际上是外行吃法，破坏了六安茶特有的香气，殊为可惜。

张 群

《金瓶梅》一书中有大量描写饮酒作乐的场面,仅酒具就有数十种之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官宦人家淫乱奢靡生活之一斑。

《金瓶梅》饮酒场面出现的酒具以金、银为主,兼及铜、锡、玉、角,且造型有别,大小各异,都是一些具有较高工艺价值的东西。如,金漆桶子、金寿字壶、注银子、锡酒壶、乌金酒杯、金樽、金菊花杯、银赏钟、玉桃杯、玉盏、犀杯、通天犀杯、描金盘、银折杯、酒托儿、铜甌……。请看第二十七回:六月初一日,天气炎热,西门庆和潘金莲在园里葡萄架下避暑纳凉,春梅为他们准备好了酒肴,西门庆揭开食盒,见“小银素儿葡萄酒,两个小金莲蓬钟儿,两双牙筋儿”,这里的“小银素儿”、“小金莲蓬钟儿”指的就是一对金、银质地的酒具。据专家考证,《金瓶梅》中寿字壶、玉桃杯等酒具与当年权奸严嵩被抄家时物资清单中所标明的此类酒具暗合,看来影射说谓蔡京射严嵩,连酒具都射着了。

新发现的《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

陈 诏

书友芮和军君,在某公司工作,业余时间,雅好收藏《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改编本及其研究著作,十余年来积存至近 400 种,蔚为大观。近日,他又在冷摊书肆中觅得民国时期出版的《金瓶梅》数种,携来请我鉴赏。其中有一部《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引起我的注意,遍翻《金瓶梅大辞典》和《金瓶梅资料汇编》等参考资料,均未见著录,可以肯定为新发现的罕见之书。后来,正在病中的黄霖兄披阅后,亦有同感焉,故特此撰文予以介绍。

此书全一百回,四卷四册,线装石印袖珍本,有封函。扉页背面题“民国九年上海江东茂记书局印行”,未署作者姓名。插图 6 页,绘有书中人物 18 人。书口为《绘图钟情传鼓词》。正文框高 12.5 公分,宽 7.5 公分,每页 18 行,每行 44 字。但全书仅 122 页,共 48000 余字。可见它是一部内容大量压缩而且以鼓词形式的改写改编本。回目基本上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

梅)(崇祯本)雷同,个别之处作了改动。很多回,原著有几万字,经过改写改编,只剩几百字,当然有血有肉的复杂情节只剩下几根骨头,故事也篡改得面目全非。例如原著第二十二回至二十六回,写宋惠莲与来旺受西门庆欺骗凌辱,以致家破人亡,是《金瓶梅》中很感人的一个独立篇章。但《鼓词》的改编者随心所欲地把惠莲改成妓女喜莲,又把来旺与来保混淆在一起,遂使故事前言不搭后语,接不上茬;加上石印时未经仔细校对,文字舛错衍夺,有些地方简直不堪卒读。《鼓词》以俚俗语言描摹人物,铺叙故事,如第一回描写潘金莲出场。鼓词曰:

南门外一位老人本姓潘
他膝下生有一女名金莲
到九岁潘老一病身亡故
依靠着伶仃寡母度日艰
却喜得金莲生得姿容好
一双脚三寸凌波小又尖
就卖在王招宣府学弹唱
十三岁品竹弹丝般般全
妙不过描鸾刺凤能书写
更可喜搽脂抹粉尽态妍...

总之,是陈腔滥调的组合,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不过,此书无猥亵文字,凡原著中的色情描写,全部删改干净,一笔带过,这一点还是可取的。

《金瓶梅》问世以后,深入民间,传播甚广,以至市井瓦舍、农村瓜架豆棚之间演为戏曲、弹词、俗曲、子弟书等

等,难以数计。如明·张岱《陶庵梦忆》中就记载,当时有说唱艺人“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可见流传民间的各种改编改写本一定很多。后来,由于满清政府认为有伤风化,大肆禁毁,遂使许多戏曲、说唱材料的底本湮没无闻。这本《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大概是逃脱文网的漏网之鱼。书名不直接标出“金瓶梅”,改用“钟情传”,也是一种遮眼法,盖可以蒙混粗心的书籍检查官也。但我怀疑,这本如此简略的《鼓词》恐怕并不能供说唱之用,它只能是书商为了牟利,粗制滥造地改成《金瓶梅》的缩写本,为好奇者提供一个管窥“天下第一奇书”的窗口,满足他们尝一尝禁脔的欲望罢了。至于印刷发行此书的“上海江东茂记书局”,大概也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专门印制消费性的通俗读物,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吧?

走笔至此,我突然在一本胡文彬著的《金瓶梅书录》中看到此书的书目,介绍极为简单:“《新镌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全一百回,六卷六册,题‘光绪二十五年菊秋香港依西法石印,云游海外客篆题’。香港石印本,题签‘绣像金瓶梅(日本泽田藏)’。”这就告诉我们,《第一奇书钟情传》出版在前,初版晚清在香港石印出版。《鼓词》是在此基础上改写的。但《第一奇书钟情传》绝少流传,中国大陆未见此书,只有日本人泽田藏有孤本,连胡文彬也未必过目。所以《鼓词》虽然学术价值不高,但作为稀罕之物,有收藏价值,亦弥足珍贵。

王汝梅

在温哥华换乘加拿大航班，飞行四个小时，抵达多伦多。

到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考察该馆所藏汉文古籍，是我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

东亚图书馆慕学勋书库藏汉文古籍 10 万册，其中使我尤感兴趣的是一部清刊本《金瓶梅》。原书四函，一函八册，共 32 册，金镶玉裱修，缺书名页，原序失去，抄补。于安娜馆长嘱笔者帮助考证此部《金瓶梅》的版本归属。东亚图书馆正在做慕氏书的编目，准备编入计算机，供给已联网的北美各大图书馆信息共享。经与中国内地所藏《金瓶梅》比勘，判定此部《金瓶梅》是据张竹坡评点清康熙年间刊本的翻刻本，为张评本中的“全像金瓶梅、本衙藏版”本。该书每回首页盖有一方形藏书章：“佐藤文库、战争关系资料、福岛县立图书馆。”据此藏书章推测，此部《金瓶梅》曾藏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由中国传入日本，由日本返回中国，又由中国慕学勋于 30 年代卖给

英国传教士,运抵多伦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61年,慕氏藏书迁移到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这部《金瓶梅》随之入藏。此部《金瓶梅》尽管不如原刊本精良,在北美各大图书馆藏《金瓶梅》极少的情况下,东亚图书馆藏《金瓶梅》确为该馆的一件珍品。多伦多大学的学者、研究生即据此部《金瓶梅》了解清代刊本面貌。

在西方,早期的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以及日文译本、朝鲜文译本,均据张竹坡评点本翻译。张竹坡评点本在清初以后广泛流传,并对《金瓶梅》在世界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满文译本也是据张竹坡评点本翻译(删除了评语)。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为满族文臣和素译。满文本《金瓶梅》的翻译、刊印,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大壮举。很可惜,今天,满文本已很少流传,在中国内地已不易见。这次访问,在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出乎意料地看到了满文本的全貌。

多伦多大学重视收集珍藏《金瓶梅》明清刊本,也很重视收藏新出版的《金瓶梅》及其研究著作。该馆藏有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本,还有拙著《金瓶梅探索》、《金瓶梅资料汇编》等。

“金学”是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的一个学术热点。米列娜教授研究张评本《金瓶梅》及中国小说理论,已出版多部专著,且有自己的独特视角。1991年,中国老一辈“金学”专家吴晓铃先生应邀到多伦多大学开办了《金瓶梅》研讨班,入班的研究生们写出了一批关于《金瓶梅》的论文,译成中文后,辑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艺术世界》一书中。

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金瓶梅》,看到的是另一番奇妙景象。对潘金莲这一有争议的人物形象,他们没有简单地斥之为“天下第一淫妇”,而是认为:潘金莲这一人物活化了一个封建社会里可怜又可恨的,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畸形的妇女形象。这一文学形象凝聚着小说作者深沉的历史意识:还人性的真实,同时贬斥违人性的败德。(见《金瓶梅艺术世界》)读懂读通《金瓶梅》,对一个中国学者来说,已很不容易。读解《金瓶梅》之难有三:1.《金瓶梅》运用了大量方言俗语。2.表面上写宋代,骨子里写明代,亦宋亦明。3.作者之谜、成书之谜尚未解开。对一位西方学者来说,面对三难,可想而知,该有多少拦路虎。和米列娜教授作学术交流时,经常遇到一些难解的小问题,如“倒插花”、“青刀马”、“盖老”、“歪刺骨”、“丁八”、“打倘棍儿”、“闯寡门”等。友人提出疑问,我回答之后,常常是一阵哈哈大笑。

在多伦多,了解到安大略省法律不允许卖淫嫖娼,所以多伦多没有妓院。有商店专营黄色录像。只要到这种商店货架上浏览一下录像盒带封面,令我们吃惊,各种赤裸裸动作,难以描述。与此相比,四百年前东方的《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则是小巫见大巫。与西方学者谈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彼此都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在传统性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了人之自然本性对于“天理”禁锢的冲击、反抗,把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性联系一起描写,对禁欲主义的压抑,是一种突破。潘光旦先生译注霭里斯著《性心理学》时,曾多次引用《金瓶梅》中的事例,用以说明人类的某种性心理、性行为。从审美、艺术的角度看,“性”在《金瓶梅》中成了人性弱点与罪恶的象征,实多虚少,缺少情的升

华 ,挟带了太多的人之生物本能 ,表现了封建文人的性情趣、性恐怖、性观念。

西方有的汉学家认为 :中国小说有《金瓶梅》、《红楼梦》两部 ,足以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金瓶梅》是属于中国的 ,也是属于世界的。正如壮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 ,它不仅仅属于加、美两国 ,而是可以供全世界人民所共享。

王汝梅

《三续金瓶梅》,是《金瓶梅》的续书之一。它叙写西门庆死去七年后,还阳复活,又活到五十岁这几年的家庭生活与官场经历。西门庆阳魂入壳,复旧如初,重整家园,官复原职。西门庆仍有一妻五妾,月娘为大娘子。春梅还魂永福寺,嫁给西门庆做二房娘子。何千户死去,西门庆补何千户员缺,娶何千户之妻蓝如玉为三房妾,娶葛翠屏为四房妾,黄羞花为五房妾、冯金宝为六房妾。“三续”对月娘、春梅、葛翠屏、黄羞花叙写简略,对蓝如玉着笔较多。蓝氏因生女娃二姐而受宠爱,遭到六娘冯金宝的妒嫉。蓝氏为蓝太监之侄女,西门庆曾多次派来兴到临安给蓝太监拜寿送礼。孝哥会试考中,授历城知县、后补授沂州府知府,调补授泰安府兵备道,皆是蓝太监在朝廷打通关节。蓝太监之侄蓝世贤到清河县探亲巡狩,西门庆盛宴接待,以逞其官场权势威风。

“三续”虽以西门庆的行踪贯串全书,

但更侧重叙写了孝哥的入学、会试、授知县知府，与甘雨儿（云里守之女）结婚等情节。对西门庆的政治活动、商业活动叙写简略。

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回写人物结局。西门二姐与贾守备之子贾良玉结亲。西门庆改恶从善，出家当了和尚。西门庆过五十岁生日之时，倏然悟道，不吃荤不喝酒不近妇女，把金银施舍济贫，以赎罪愆。让丫鬟楚云、秋桂、珍珠儿，分别与男仆春鸿、文珮、王经结婚成家。六娘冯金宝重回妓院，后双目失明。五娘黄羞花原为王三官之妻，被休后嫁给西门庆，现二进昭宣府，与王三官破镜重圆，生了一个儿子。四娘葛翠屏和三娘蓝如玉出家为尼僧，后坐化成了正果。大娘子吴月娘和二娘子春梅，由玳安引路，投奔泰安州小大官西门孝任所。西门孝探母，月娘受封诰，春梅受福，乔大户攀亲（乔之女儿嫁给孝哥）。

西门庆悟道，是作者的“倏然悔过便超升”（结局诗句）思想的注脚。作者不顾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逻辑，主观地要西门庆“向善回心”，不合情理地改变了《金瓶梅》中西门庆自我毁灭的结局。续书中人物春梅得知西门庆要悔悟时说：“若说别人还是有之，这行货子要悟道，竟是放屁。”春梅即认为西门庆是不可能悟道的。

“三续”侧重叙写西门庆与妻妾、与仆妇、与妓女、与戏班女演员、与童之间的频繁的性行为，这些描写均孤立于人物性格心理之外。“三续”在人物之间外在关系、西门庆性行为这两点上与《金瓶梅》貌似而神离。

《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妻五妾，“三续”也让西门庆有一妻五妾。《金瓶梅》中李瓶儿生官哥，遭到潘金莲妒嫉；“三续”写蓝氏生二姐遭到冯金宝妒嫉。《金瓶梅》中西门

庆暴亡,孝哥出家,月娘长寿;“三续”中孝哥升官,西门庆出家,月娘受封诰。《金瓶梅》西门庆有胡僧药;“三续”西门庆有三元丹。“三续”模仿世情书,但未能写出世态炎凉,也不注意刻画人物性格,不注意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只是平面地、单线地、孤立地写日常生活。语言干瘪、重复,写性行为一律是“如漆似膘”,写音乐之美一概是“美耳中听”,写宴席一概是“上了割刀点心”。“三续”作者对《金瓶梅》“不解其中味”,未领会作书人“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之立意,未把握《金瓶梅》之底蕴。作者不但未能继承《金瓶梅》而有发挥,相反,却作了庸俗地接受。严格来说,“三续”不是《金瓶梅》的续书,而是一部不合《金瓶梅》原意的模仿之作,与《金瓶梅》貌似神离,是对《金瓶梅》积极意义的背离。

戴云波

“洁本”与“全本”并不是版本学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对《金瓶梅》的内容进行取舍的一种流传方式而已。其目的是为了免于“坏人心术”。

朱星先生曾在 1979 年第 2 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金瓶梅考证》一文，其中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他提出一个观点：“《金瓶梅》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实际上这个所谓“无淫秽语”的“原稿初刻本”是不存在的。因为朱星的论据来自沈德符《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但沈德符并未在这里提出《金瓶梅》无“秽语”的问题，相反却认为《金瓶梅》“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说明《金瓶梅》自始即是有淫词秽语的。

《金瓶梅》的产生以及为什么有不少淫秽内容的描写，鲁迅先生已作过深入剖析，认为它与当时明代的社会风气及士人所好

关系极大。但自清代始，历代统治者均颁布禁令，严禁刊刻《金瓶梅》一类的“淫词小说等书”，同时在清廷内部却又将《金瓶梅》、《西厢记》等大肆翻译，以致上层社会“人皆诵焉”。显然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公平的。

遗憾的是，解放后我国对于公开出版发行全本《金瓶梅》仍持审慎态度。1932年山西发现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词话》，1933年3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据此影印了120部，1935年上海杂志公司在删节数千字后铅排、校点出版了这部书，虽然每本均附赠一册所删文字内容，但这可能即是《金瓶梅》真正的、也是最早的“洁本”。解放后可能只有齐鲁书社与岳麓书社出版过一次全本，八十年代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刘辉、吴敢整理的《会评集校》本，全本的《金瓶梅》一般读者还是很难见到的。

如何对待《金瓶梅》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人为的删节问题（这可能是古代长篇小说唯一的特例），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打破禁区与限制，就今天的读者层面与研究者所持立场来看，笔者认为已到了取消禁令、公开出版全本，以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认识这样一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作品的时候。其理由可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历来对《金瓶梅》产生的偏见及严禁刊刻的原因无非是因为《金瓶梅》里的一些赤裸裸的性生活描写，但《金瓶梅》并不算第一部“淫书”，实际鲁迅先生已有了明确的界定，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也就是说，《金瓶梅》并不属于“末流”之文；“专在性交”；“如有狂疾”，而是有其“佳处”自在的。

第二，正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科学日益

昌明的今天,人们已不会对有关“性”的问题谈虎色变。如果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西方也有一个长期遭禁的历史,但终究解除禁令,那么以今人的审美眼光与欣赏层次不至让《金瓶梅》这么一部古代长篇小说搅得人心大乱,那样也太夸大了一部小说的社会功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金瓶梅》作为一部较全面反映当时社会现象、暴露黑暗内幕的小说,在今天仍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且不论《金瓶梅》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研究者一般认为《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环),仅《金瓶梅》所包含的丰富现实内容,所刻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蕴含的种种新思想萌芽,对今天的思想界、文化界都有重要意义。长期将这样一部优秀作品排斥、隔离在广大读者层之外,仅在少数研究者与藏书家的圈子里流传,其负面影响终究会显现出来。

虽然《金瓶梅》的确有一些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二)渲染了一种糜烂、荒淫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其中过分的、被人认为是自然主义的描写,不但毫无美感可言,而且也并非小说刻画人物、敷设情节所必需,从中反映出人性“恶”的一面。但我们应当看到,就读者的心理而言,你越防禁不止,越使读者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必欲得之而后已。事实上以《金瓶梅》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与审美价值本也不至享如此盛名,正是一次次的禁毁、删节成就了它。如果让读者了解《金瓶梅》的全貌,自己去判别取舍,辅以适当的学者导读与介绍,其社会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戴云波

在多部古代长篇小说如《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等纷纷被搬上荧屏之后，现在人们又开始关心起《金瓶梅》何时或者说可以拍成电视，让更多的人从电视上了解这一现实主义杰作。

有人认为《金瓶梅》上电视有三“难”，即 1.《金瓶梅》尚未普及，读者尚未取得对作品认识的一致；2.《金瓶梅》内蕴的多义性很难在电视上有充分的表现；3.书中大量的性描写与市井“粗话”俚语不好处理。

这三“难”的确是《金瓶梅》上电视的极大障碍，它的复杂性与操作难度也远远超过其他长篇小说。而且由于对《金瓶梅》的争议较大，迄今公开出版全本尚有困难，能否获准上电视就更是个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有如此多的难题就裹足不前，我们的艺术家与学者也不会放弃这样一次将优秀的古代长篇小说与影响最为广泛的电视媒体结合的尝试机会，毕竟所剩的优秀的

值得上电视的古代长篇小说已不多了。重要的是为《金瓶梅》的普及及搬上屏幕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难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提出可行的对策。

笔者认为,《金瓶梅》作为曾深刻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的艺术作品,观众有权利对它进行直观的艺术感受,艺术家们也有责任把它以艺术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从而使人物从中获取多方面的认识与提高。由于人们的文化层次不断提高,虽然全本《金瓶梅》公开出版较少,但相信相当一部分读者已通过“洁本”等途径了解了这部作品。而且从电视屏幕上直接欣赏《金瓶梅》的故事与人物,能够打消一些人对《金瓶梅》的神秘感与好奇心理,做到客观全面地向大众展示这样一部作品的魅力。

由于《金瓶梅》笔法的灵活多姿,如鲁迅所言“刻露而尽相,幽伏而含讥”,而且作品暴露的成分远大于积极向上的成分,使人很难断定何为作品的主线,主题是什么,是揭露现实的黑暗还是暴露人性的弱点,这都给从文学语言向电视语言、从文学主题向电视视角的转换带来了难题。但任何作品,包括已搬上荧屏的《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有主题多义性的问题,都存在作品原有意境魅力无法在电视上充分展示的问题,这需要编导者的“二次创作”与“加工”,寻找最恰当的突破口。比如《金瓶梅》的核心人物西门庆、潘金莲究竟是什么性格,在普遍性与一般性中又蕴含着什么个性与特殊性,西门庆走的是一条怎样的升官发财之路,从中反映出怎样的现实,更深一层的主题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士流颓靡、特别是官府腐败的根源与本质是什么,等等。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再创作、再想象及对作品再诠释的空间。把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不仅仅是着眼于西门庆的荒淫、日常生活起居的铺

张、各色人物的奉迎等具体而微的细节,就能够提高立意,高屋建瓴地挖掘、反映出《金瓶梅》的丰富内涵。此外,任何作品的解读与表现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应该允许有疏漏、有缺陷,以待以后的进一步完善。当然,至少它应体现出当代艺术家与研究者的水准与今人认识的高度。

如何表现书中大量的赤裸裸的性描写及处理人物的市井土白?笔者认为,在专家严密的考证基础上,一些过于艰涩难懂的土白可用字幕来表现,大多数人物的语言应一仍其旧,保存原书的风貌。对于大量的性描写,一方面不必谈虎色变,以为现代人的神经就脆弱得不得了,一部电视剧就会引起人心大乱,另一方面也应在既能恰当地表现西门庆等人的无耻嘴脸与淫纵面貌,又不至太过泛滥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度,其标准是维持原书的氛围与色调,不宜过多运用删节或暗示的手法。具体操作起来当然很难,但只要能反映出深刻的现实主题,揭示出西门庆的丑恶灵魂,一些适当的床上镜头未必会引起不良影响,相反可能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张 兵

去年春天,我应学林出版社之邀,担任《金瓶梅 和屠隆》一书的责任编辑。校读完全书的清样后,我的脑际突然跳出一个念头:应当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作一呼吁。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我杜撰的语词,乃指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其内涵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和研究者主体间应有某种“本土”关系,他们或同一籍贯,或沾亲带故,或于思想、经济、文化、地域……诸领域存在着某种共同之点。

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研究不甚景气,尤其是人文科学,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有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短平快”,搞学术速成,不愿坐“冷板凳”。虽说也出了几本书,大多系东拼西凑、移花接木而来,不是弥漫着商品气息,就是充满了各种“水分”,真正创新的、富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寥寥无几。这种状况与我们这个奔驰在“四化”建设大道上的泱泱大国很不相

称。如何克服这种学术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提出高见，此处不再赘述。我以为，提倡“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将会有利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国人民富有敬仰前贤、崇拜先哲的历史传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由屈原到鲁迅，无论是秦始皇还是黄道婆，凡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炎黄子孙，都受到后人的崇敬。尤其是在这些“名人”的故里或他们的足迹所到之处，这种崇敬表现得更为强烈。曲阜的百姓，对孔子自然是顶礼膜拜，而沙湾的民众，每一提及郭沫若，则个个会津津乐道。各地掀起为故里名人盖建纪念馆、整修故居、塑造铜像、保存各种文物的热潮，就是国人这种心态的物化。这为旅游业的发展增添了新景观。

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把这种“名人”效应同样视作重要的契机之一。他们在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常常以故里的名人作为首选目标，并以弘扬他们的贡献和美德而自豪。《金瓶梅和屠隆》一书的作者郑闰先生和他的研究对象——明代的著名文学家屠隆——同为浙江鄞县人。要不是有此“血缘”关系，我想郑先生是不会如此不遗余力，穷十年之功而去研究屠隆的。尽管屠隆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几百年来人们对他知之不多，仅此一点就可证明我的这种想法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十年前，当黄霖先生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的新说后，这位历史人物才被较多的学者所关注。但真正花大力气去研究屠隆的，郑闰先生可说是第一人。在《金瓶梅和屠隆》一书中，郑先生全面考索了其研究对象——屠隆的生平、交游、思想、文学活动以及著作等，独特的发现随处可见。如屠隆和《金瓶梅》的关系，郑先生用较多的篇幅作了论证，诸如有关“兰陵笑笑生”署名的由来，《金瓶梅

词话序》的作者欣欣子系何人《开卷一笑》与哈哈道士、《金瓶梅》早期版本的流传情况和屠隆写作《金瓶梅》的年代等学术“热点”，都一一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虽说它还不能定讫，然而，人们倘要推翻书中提出的众多“确证”，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郑闰先生多次说过，他的屠隆研究，乃出于对这位故里名人的尊崇：“屠隆在历史上已被冷落了三四百年，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根本的改变。”正是凭着这种对故里先贤的钟爱和献身于学术的顽强精神，他才在这条艰难的屠隆研究之路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提倡“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在收集资料的工作中，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对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如郑闰先生写作《金瓶梅和屠隆》一书，全沾了屠隆故里的光。宁波市天一阁中珍藏的大量珍贵古籍，成了他进行学术研究的宝贵财富。他埋首其间，几乎把全部藏书浏览一过，爬梳剔抉，单摘录的文字资料不下百万字。一般人到天一阁查书，至少须持有市文化局的介绍信，要是没有熟人，常常只能望而却步。俗语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鄞县人的郑闰先生，在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有着别人无法相比的有利条件。这是奠定他的屠隆研究的重要基石。

同样的例子还有吴敢先生的张竹坡研究。海内外的学者一致公认，他在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目前尚无人能够企及。和屠隆一样，张竹坡也曾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有关他的生平、思想、文学活动及著作等皆不甚了了。八年前，吴敢先生出版了《张竹坡和金瓶梅》、《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两书后，才“彻底廓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见前书的《前言》）。

吴先生填补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在海内外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之所以能在张竹坡研究领域独占鳌头,除了其具有卓越的识见和深厚的学养外,还和他在张氏的故里——铜山县的上属主管地徐州市文化局工作密切相关。综观吴先生的研究,主要得益于张竹坡家谱。这本稀世家谱的获得,系源自张氏后人的无私捐献。吴先生的许多独特发现,显然都和张竹坡家谱的发现有关,它成为研究工作中最基本和原始的资料。我听吴敢先生说过,他的萌生张竹坡研究的动机,也和自己的这一层工作缘由有关。这种独特的有利条件,是吴先生独步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喧嚣一时的敦煌文学和屈原问题之争,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其故里的中国人。学者们已经用各种历史资料回答了海外某些人的诘难,这一事实,亦可作为本文观点的有力佐证。

〔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四辑

作者于是以色欲的追求,涵盖人生一切物质上的追求,以两性的对立,象征了人

生一切物质上的争斗仇视,从而写出了我国文学遗产里,唯一长篇的变形记(《金瓶梅》)。简单地说,《金瓶梅》是一本历史,记述了西门庆如何由人堕落为物的过程。

侯 健

《金瓶梅》真的是淫书吗？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所谓淫书一辞的定义。我们中国人一向大而化之，缺乏对一般名词的明确界说。按英语来说，这个名词相当于 *pornography*，由希腊文“倡妓”和“描述文字”两词构成，所以同于我们的《青楼梦》以至《九尾鱼》一类作品，或者特别可以拿十八世纪英国 *pornography* 为代表。它的引申意义，是指一切“旨在挑动情欲的音画文字”。*运朝自警录* 和 *粤雅堂丛书* 合著的 *蕴藻堂群芳谱* 则有更清楚的说明：

所谓地道的淫书，旨在挑拨读者的性欲幻想，却排除了人类所关切的其他事项，所以描述的是情欲的乌托邦，其中的经验，全不涉及人性的各种冲突或人类努力的失败。因此，其中人物的生理冲动，得到直接与完全的满足，却无情感、精神或道德上的后

果。在这种世界里,刺激读者性幻想的,是几无间断的,逗人的宏丽情欲意象、无穷的性活动的详尽描绘和完美快感的生动叙述。其效果在于把人物的反应,限制于生理的,乃至机械的决定论理,从而剥夺了人物的人性。

另一方面,文学的艺术,呈现的是复杂的实观,虽视性经验为其构成的要素,却要在同时以想象掌握人生中的矛盾、讽刺与缺陷,而把这些结合于人生的道德、精神和感情面,并不仅自限于物质的层次。它的效果,在于增深、扩大读者对复杂人生经验的了解。因此,在文学里,想象力要能透露人类情况的基本真理,而在淫书里,幻想的主要功能,则是挑逗,乃至代替性地满足人们的情欲。

这里的解释虽颇为抽象,意义大抵清楚:淫书既以挑逗、刺激为其功能与目的,则其笔下,必须是男俊(或雄壮,这多少与社会标准有关)女娇,把偷期约会,描述得淋漓尽致,引人遐想,或如西方当代,在变态心理学的支持下,叙说强暴,而两种必然都夸耀力御十女,恣肆放纵,却再无其他意旨。准此来看,西方多年流行的《跳蚤自传》(裁藻也,嘲道,网非,则,撰,云,藻)以及等而下之,纽约时代广场一带的产物,明显属于此类。《游仙窟》以后的多种仿制品,和东偷西窃,直到弃妻从了他人,忽而改悟的《肉蒲团》,自然都是一丘之貉。在另一方面,乔伊思的《攸里西斯》(角,藻,也,撰,藻,哉,道,译,藻)中,茉莉(配,道,用,撰,藻)的长段意识流幻想与回忆,是为了触及女子心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为了提倡我们其实不能接受的道德观;魏而森的《海卡特郡回忆录》(裁,道,也,撰,藻,哉,道,译,藻)中以性

为自虐与报复手段，弥勒的《夏至线》（~~匀藻则云圣则~~
~~劫理理柔柔社蒙~~）中极形肉欲的丑恶，却并不是淫书。当然，另外如甘嫩（~~悦森增~~），全自荒谬滑稽出发，实为讽刺，虽集淫秽小说的一切特质，结果仍是清白无垢的。

本来，男女居室，人伦之始，是少不来的事。从前的淫猥小说，动不动以《关雎》当门面话，但一部《诗经》，不废桑间濮上，所以那种比附，倒也不尽然全出谰言。中国文学尽多投桃赠芍，小说里更是饮食男女，存其大欲。西方的现代小说，更几乎都以恋爱为中心。食色性也，无可禁绝，所盼的也只能发乎情，止乎礼，归之于正而已。

《金瓶梅》当然不是这样的。它不仅未归于正，反而邪得厉害。西门庆拈花惹草，几乎妍媸不辨，以多为胜，甚至不计雌雄，一体笑纳。他每日孳孳营营，所想只有两种东西，其一是狡童荡妇，再一种是升官发财。《金瓶梅》与其他的小说，也有几种明显的差异。我们读小说，例如《红楼梦》，男的少不得自居贾宝玉，女的少不得自居林黛玉。冯小青读《牡丹亭》，便是自比杜丽娘的。但在读《金瓶梅》的时候，有多少人羡慕西门庆或潘金莲、李瓶儿或陈经济、春梅或甚至吴月娘呢？这是显示《金瓶梅》与它书不同的一点。其次，淫书是要挑逗人的性欲的，所以总要把肉麻之处，写得淋漓尽致，歌颂如何男贪女爱，两情欢畅。《金瓶梅》好像也有这种描述，却并不尽然。“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一段里，那位淫妇是被绑起来，当靶子用的，放下来时，已是面色焦黄，几乎昏绝。这是相悦呢，还是相仇呢？

不但如此，据张竹坡的统计，西门庆所蹂躏的，男女两项，共三四十人。自潘金莲开始，直到林太太，追求的方式多半是挟以财势，但到手时的表现却逐渐不同。《水

浒传》和《金瓶梅》里，王婆开出的偷情条件，是潘驴邓小闲，西门庆也自认合于要求，但第一次以后，便需要银托子协助，此后更须借力春药。西门庆对王婆说，他“幼年”颇曾眠花宿柳。那段时间的情形，读者无从知道，但看自潘金莲起，西门庆逐渐良贱不分，美丑莫辨，要的只是滥多。而且工具随身携带，还要各种刺激，春药以外，兼须触觉乃至视觉，包括烧香几炷在女人身上。最后，他因跟汉成帝一样，服药过量，显然患了勃起症（~~早泄~~），乃至昏厥，潘金莲却仍不饶他，使他竭蹶而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说说罢了，有谁能真正羡慕这种下场？这种写法，真正是要使人受到吸引，沉溺于色欲吗？

万历丁巳本里，东吴弄珠客的序说：“《金瓶梅》秘书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得，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奉劝世人，勿为西让庆之后车可也。”这种说法似乎道学气息很浓，也像淫书习有的遁辞，例如《肉蒲团》，便有类似《坎城故事》（~~情到深处则难禁~~）书后的反悔语（~~情到深处则难禁~~）。但弄珠客的话未必定然不是《金瓶梅》的本旨。依全书情节的发展情形来看，除非我们仅斥之为淫书秘籍，不予挂齿，则欲求理解，或者非从我们现在对小说和有关文学形式的知识做出发不可。在叙述艺术（~~情到深处则难禁~~）下，可以分辨的有寓言，包括《~~情到深处则难禁~~》或《~~情到深处则难禁~~》等，讽刺（~~情到深处则难禁~~）、传奇（~~情到深处则难禁~~）和现代小说（~~情到深处则难禁~~）等。这些形式，不必然以纯粹的面貌出现，但在基本上其分界总是相当清楚，足供分辨的。它们都以谈情说爱，而目的不同，表现也相异。传奇大抵耽于幻想，悖于经验常理，而且多

趋于美象，所以与《金瓶梅》的写实倾向不符。现代小说自冲突始，以和谐终，并且要能使读者感情投入；“像”忧亦忧；“像”喜亦喜，与《金瓶梅》之人物，一般不能邀人认同者有别。讽刺种类繁多，总脱不了鞭笞和讪笑，其对象是作品里的人物事迹，装腔作势，孳孳营营，却让局外人或嗤或悯，像是弄珠客想及的反应，但儆戒作用不大。西门庆和他那些粥粥群雌的举止，虽是如此，却不止于荒谬不经。至于寓言，则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特别是藻绘荒唐，原是以榜样为儆戒，~~葬埋罪愆~~以具体事物代替抽象观念，似乎也能和《金瓶梅》相合，特别是我们揣想到，若干从抽象转到具体的观念现象，可以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予以旁证的时候。

按食色性也。食所以维生，色所以延续，本来都不可少，但人之为人，在于解决了生存延续以后，另有可做当做的正经事，所以食色的要求过度，便成了无止境的贪欲。依心理学家的说法，这类欲念，都出于“生命力”（~~造孽因缘~~）而以性欲为主。西门庆毕生努力的，是财势与色的追求。财与势相连，都是西门庆和一般人企求满足欲望的工具，来源同一，则逐财也便是逐色，逐色转而概括了逐势，逐色及其后果由而变成全书的主旨（~~造孽因缘~~），成为整个故事的象征。这情形常是顺理成章，何况舐痛吮痔，乞怜昏夜，乃至纳贿炫势，在人情上都是人人觉得丑恶，除了当事人可以自诩“上进”，再无可取之处。要从引人入胜处表规戒，则仅描述财势的追求，不是好办法。不仅如此。心理学家，特别是弗洛伊德一派，不但视性欲为一切生命力的根源，还认为男女体质构造迥异，形同对立，虽在传宗接代上必须合作，在相对的态度上却是对立的，此所以同样一件事，可称燕好，也可叫做征服，或是投

降、拜倒、甘为奴隶,并且燕好往往要在征服之后,却纵在燕好之际,双方要互予对方的,往往也要掺杂痛苦。《金瓶梅》的作者,虽未读过弗洛伊德,似乎已发现、观察到这种状况。西门庆确是以能使对方在满足中感痛苦,在痛苦中得满足为傲的。

《金瓶梅》的作者,大约是在无意识间,发现了这男女两性之争,从而把这种争斗,视之为宇宙间一切争斗的象征。潘金莲在西门庆昏厥时的表现,岂不像煞了蜘蛛中的黑寡妇(贼道者黑寡妇)? 其实这种比喻仍是厚诬昆虫,因为昆虫如此做是为了传宗接代,潘金莲却只受肉欲的驱遣。作者于是以色欲的追求,涵盖人生一切物质上的追求,以两性的对立,象征了人生一切物质上的争斗仇视,从而写出了我国文学遗产里,唯一长篇的变形记(皂雕以蝶为喻)。简单地说,《金瓶梅》是一本历史,记述了西门庆如何由人堕落为物的过程。

蝌蚪变青蛙,毛虫变蝴蝶,是人人都有的知识。以此例彼,中西文学都多的是变形故事。自奥维德(韵译 43 . . - . . 18)到阿浦里阿(粤译译 枣 . . 125 : 栽藻障藻曾奔)以迄卡夫卡(云译云 燕 1883—1924 : 酝藻皂雕为音),成就不少。中国显然由于诚中形外,相由心造的观念,在正史(如超生化豕)和短篇小说(如《太平广记》以迄《聊斋志异》等等)里,尤富表现。但像《金瓶梅》这样,由物欲的过当,产生精神上的变化,外形依旧,内心逐渐蜕改的长篇努力(译藻译藻藻则),却是再无前例的。这种伟大成就,是《金瓶梅》的奇迹:西门庆追求物欲的满足,属于常情。以肉欲笼括物欲,就渐感其偏。他最初要役物,用的是己力——他自己的“行货”。这是他肉体的一部分,已是物相。这时的西门庆,还注意

到人生其他的需求,如友谊或“上进”之类。渐渐地,他的全部精神,愈来愈多地投入他的“行货”,由役它而成为受它所役,乃至专心致志,殚精竭虑,仅求为它服务,本身不足,辅以机械,机械不足,辅以药物。到他即将昏厥死亡的那一天,他所想的,只有林太太和王三官的娘子。而在昏厥以后,潘金莲跨在他身上的时候,不啻是视西门庆为解决她欲火的工具,一只硕大、包容一切的男性生殖器,潘金莲也只是同样硕大、淹没一切的阴户,他俩表面上仍具人形,但在精神上已堕落为物了。

依全书情节的发展,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书内没有情,没有爱,只有明争暗斗,互相征服克制,全由欲字统治一切,扬其丑而抑其美。书的写法,因此是《天路历程》(先录月感,比孕,理,官,名,期,期,释)式的,也便是寓言(葬,道,和,赠)式的,但更为具体,更为生动。《天路历程》叙述基督徒如何抗拒各种诱惑,寻求拯拔,终能历尽艰险,最后在河水里涤尽尘污,丢下了凡间的包袱,到达彼岸——这一点恰与《西游记》里四众受到接引,上了无底渡船,脱却臭皮囊的情形相同。相形之下,西门庆却在左揽右抱,承受了一切诱惑,终于丧生在原始阴户的水里。基督徒得到了天堂,西门庆显然博来了无间地狱。由人化物,岂不契合耶稣的话:纵得到世上一切荣华,却丧失了自己?这是《金瓶梅》的主题和道德意义,也便是弄珠客的怜悯、畏惧,和勿为西门庆后车的儆戒的根据。

这些说明了《金瓶梅》有正确严肃的主题,写的是讽刺兼寓言,由人到物的可笑可悯可怕现象,涵盖庞大,结构并非完全枝蔓芜杂,却是条条情节,都朝向一个结局(苦,孽,果,实)的。它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奇葩,纵非尽善尽美,却在完备上、洞见上超迈群伦。专以道德意义说,

它应当优于《红楼梦》——那确是一部反社会的巨构。说它是秽书不错，因为它是要以秽去垢的，如佛陀向阿难说摩登伽女。斥之为淫书便是冤枉的，因为它写淫，但不诲淫。我们需要的只是如何正确地读它，不要犯上悦道者某所说，把自己的丑念，带到书里去。

〔标题为编者所加〕

魏子云

当西门庆听了潘金莲说她受到上房奚落她，说我在她跟前顶嘴来，骂我是不识高低的货”，又凑巧碰上了西门庆正恼李瓶儿嫁了蒋竹山，又在他狮子街的对面开起了生药店，可真是小鬼欺负到阎王爷！他在气头上，听到潘金莲这么一番口舌，遂激愤起西门庆说：“你由他！教那不贤良的淫妇说去。到明日休想我这里理他。”不想这话传到吴月娘耳朵里，遂从此之后，吴月娘便与汉子斗起气来，就是见了面也不说话。一直到了西门庆把李瓶儿娶到家里来，这分气恼还没有完。

西门家的堂客，已是六房子了。李瓶儿的花家，就在隔壁，只是一墙之隔。虽然是大大的院子，前后几进，如今李瓶儿嫁过这边西门家来，侍女小厮都跟了过来，只剩下冯嬷嬷一个老婆子看守。于是西门庆又派了来旺夫妇俩搬过去住。来旺的媳妇，是个病人，得人照顾。吴月娘不同意汉子这样处理家事。两人却又好长日子不答腔

啦！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家庭主妇，总是想着这些家事。再加上李瓶儿娶到家里来，汉子作的那些作为，给全家上下人等，制造了不少谈笑的话碴子。轿子到门，没人理啦！新妇入了房，汉子不进门啦！进了房大骂之后，喝令新妇脱光了衣服，挨马鞭子啦！跪在地上哭诉啦——搂起来啦！……什么！什么！被丫头小子说累得五色俱现、五味俱全。这些事，吴月娘听来，心理都不是味儿！

可是，她有啥法子呢！她受到的教育是：“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违夫子！”礼云：“以顺为敬者，女子之教也。”

这天，二房李娇儿、三房孟玉楼在上房陪大娘坐的。忽听见外边小厮，一片声寻来旺(儿)，寻不着。只见平安掀帘子。吴月娘便问：“寻他作甚么？”

平安道：“爹紧等着哩！”月娘半日才说：“我使他有勾当去了。”

原来吩咐下他，往王姑子庵里送香油白米去了。

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说娘使了他有勾当去了。”月娘骂道：“怪奴才，随你怎么回去。”

平安唬得不敢言语一声(儿)，往外走了。

月娘便向玉楼众人说道：“我开口，又说得多管，不言语，我又憋的慌。一个人也拉刺将来了。那房子卖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摇铃打鼓的，看守甚么？左右有他家冯妈妈在那里，再派一个没老婆的小厮，晚夕同在那里上宿睡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养娘抱巴巴，叫来旺两口子去，自他媳妇子七病八病，一时病到了在那里，上床谁扶持他？”玉楼便道：“姐姐在上，不该我说，你是个一家之主，不问你与他爹不说话，就是俺每，不好张主的？下边孩子们，也没投奔？他爹，这两日隔二骗三的，也甚是没意思。看，姐姐恁的：依俺们一句话(儿)，与

他爹笑开了吧！”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这个意。我又不曾和他两个嚷闹，他平白的使性（儿），那怕他使的那脸_痛，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儿）！他背地里对人骂我不贤良的淫妇，我怎的不贤良的来？如今耸六七个在屋里，才知道我不贤良。自古道：‘顺情说好话，干直惹人嫌。’我当初说拦你，也只为好来。你既收了他许多东西，又买了他房子。今日又图谋他老婆。就着官（儿）也看乔了。何况他孝服不满，你好娶他的？谁知道人在背地里，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过水，自瞒着我一个（儿），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里歇，明日也推，在院里歇，谁想他只当把个人（儿）歇了家里来。端的好，在院里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丽胡哨，乔龙画虎的两面刀哄他，就是千好万好了。似俺每这等依老实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儿）？你到如今，反被为仇。正是：‘前车倒了千千万，后车倒了亦如然。分明指与平川路，错把忠言当恶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顿饭，我只当没汉子，守寡在这屋里，随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几句话说的玉楼众人讷讷的，良久……”

我们看这一大段吴月娘当着李娇儿、孟玉楼两人发出的牢骚话，最值得我们研究的是话中的人称，我、你、他三字的“人指”，时时跟随语气在变换。从一开头的“我”是吴月娘自指，说到“看守什么？左右有他家冯妈妈子”的“他家”之“他”，指李瓶儿的花家，我们一看就懂了。下面的“自他媳妇子”到“谁扶持他”的两个“他”，人指是来旺与有病的媳妇，再下孟玉楼口中的“他爹”，人指是西门家的家人等等。吴月娘答话中的“我”与“他”，人指中的“我”是吴月娘自指，“他”则是丈夫西门庆。再下面吴月娘的一番牢骚话，“我当初说拦你”的“我你”是她吴月娘

与西门庆。“你既收了他许多东西，又买了他房子”话中之“他”，人指是李瓶儿，下语“今日又图谋他老婆”中的“他”，人指是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再下“他孝服不满，你不好娶他的”语中的“他”，人指是李瓶儿；“你”字的人指是西门庆。再下语“谁想他只……”与“他自吃人”两语中的他，人指还是西门庆。可是；“在他跟前那等花丽胡哨”以及“乔龙画虎的两面刀哄他”的话中两个“他”，人指就得在语词上推敲了。首先要明白吴月娘口中的那个“花丽胡哨，乔龙画虎”的人是谁？应是潘金莲也。所以下面有吴月娘这么一句：“似俺每这等依老实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儿？”这话中的“他”，是西门庆；“你”则是吴月娘自指，下面的结语是“你到如今，反被为仇”中的“你”，也是吴月娘自指。

这段牢骚话的结尾，说“你不理我，我想求你？”等语中的“我”、“你”，悉吴月娘自指他之与汉子西门庆也。

这段话中，除了人称问题的动变问题，是随着人物的心理情绪起伏而易趣的，其中还有比况的成语运用，如“平白扯淡，摇铃打鼓”以及“顺情说好话，干（憨）直惹人嫌”，以及“花丽胡哨，乔龙画虎”、“分明指与平川路，错把忠言当恶言”，我想，读者十九都能意会。但这句：“作养娘抱巴巴”一词，可能不是大多数读者可以领会的。意思是作养娘的主要任务是跟人家带孩子，孩子随时拉屎洒尿，自然是养娘应作的事；“抱巴巴”意为料理屎尿。“巴巴”，孩子大便的称呼。这话指李瓶儿家既有冯妈妈在，还派来旺夫妇俩去，岂不是多余，房子还有脚跑掉吗！冯妈妈不能兼看房子吗？孩子既有养娘，还能再雇一个铲屎接尿的人儿么！

《金瓶梅》中的这类比况语，非常之多，有不少这类比

况语 ,至今还无人寻出正确的比况出来 ,休说语之出外矣 !

(容后 ,再一一寻出 ,谋求正确的解析。)

吴月娘的这段牢骚话中 ,还有一些加“儿”字音的语句 ,如“言语一声儿”、“一句话儿”、“看他一眼儿”、“使性儿”、“一个儿”、“把个人儿”、“理你理儿”等等 ,都不是说北方话的人士 ,从笔下流泄出的语言。像“使性儿”、“理你理儿” ,又怎能在口语中道出“儿化”音来 ?

文句的语言 ,终究与说话的语言 ,是有距离的。

不过 ,在南方人听来 ,把北方话中的儿化音 ,自以为是的写入文句 ,就是《金瓶梅》语言的形态。

再仔细看看 ,这段话中还有两个字 ,值得讨论 ,前一个“那怕他使的那脸_痞”的“_痞”字 ,究系何意 ?念什么音声 ?连《康熙字典》都没有这个字。梅节先生的校订本 ,改为“格”字 ,音义都感到不妥帖 ,崇祯本的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本 ,据王汝梅校刻本(崇祯本)注五说刻作“落” ,也不妥帖。清朝《第一奇书》的“在兹堂”本 ,也是“_痞”字。此字的音义 ,既然无字书可寻 ,这一“脸_痞”是个什么形态 ?可就难猜了。

若以文句的语气来想 ,西门庆见了吴月娘摆出的那个脸相 ,应是板本起来 ,无丝毫笑纹。这个_痞”字 ,如果读“格”音 ,那就是某地区的方言语助词土音 ,不是义助词。智者 ,不妨朝此方向求之。

还有“他自吃人在他跟前……”的“吃人”二字 ,前一回(十九回)也有“他也吃人念了(他也被人算计了)”。第七十五回也有 ,如“就吃他在前边把拦住了”。再后 ,则改作“乞”字 ,如“不管好歹都乞他骂了去罢”、“吴月娘乞他这两句 ,触在心上”、“把好的乞他弄死了” ,意思跟“吃”字

一样。像这么一句语言，在《金瓶梅》中使用的次数特别多。却未见有人考释。

吾不知此一语态，是何地方言？
南音耶？北语耶？期智者索之。

在《金瓶梅》的小说中，写了不少在史传里可以寻到的人名。除了宋徽宗时代的人物之外，还有不少在明史列传中可以见到的人物。如第六十五回中的“兖州府凌云翼”，第四十八回的“阳谷县丞狄斯彬”，都是明史列传记述到的。其他尚有第十七回中的“总督京营陇西公主晔”，陈诏先生写《金瓶梅人物考》（《学术月刊》一八七年三月号），指是明史卷二一〇附在谢瑜中的王晔。嘉靖十四年进士，官吏科给事中，以论严嵩罢官卒于家，直声甚著，江苏金坛人。虽与明史传文所写名字不符，明史写的是“王晔”，小说写的是“王焯”，但同是一字，自可能是同一人。如“狄斯彬”，在明史卷二〇九列传九十七的杨允绳名下，有“狄斯彬”其人，他是“御史”职，与给事中孙允中附和马从谦（溧阳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劾中官杜泰，若恼皇上，马从谦廷杖死，孙允中、狄斯彬戍边。他如陈诏先生在其他史料中寻出的温玺、曹禾、任廷贵、尹京、王

炜、黄甲、赵讷、陈文昭等人，都是明朝嘉靖间人。像这些写入《金瓶梅》小说中的宋明两代的史有其人的人名，除了符合作者明写宋徽宗朝而实写明代的嘉靖到万历等朝的社会现实而外，自也难免杂入其中的某些隐喻。如黄霖先生指出的“陈四箴”与“何其高”（宋人），有政治讽喻的内涵，良是作者故意把宋明两代人名杂混在一处的用意。要不然，何必非要把史有其人的人名，写入小说呢！

此一政治讽喻问题，乃我第一位指出的研究方向，首先获得响应的便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黄霖先生。他写了一篇《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本文不讨论这些，只从第六十五回的“兖州府凌云翼”其人，来证说《金瓶梅》成书的上限问题。此人有此一问题的关键性答案。

按凌云翼字洋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庆中即累官右佥都御史，万历元年进右都御史巡抚江西。再迁兵部侍郎提督两广军务，剿抚_獠有功，赐飞鱼服。召任南京兵部尚书，再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召回河臣潘季驯，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上摘录明史卷二一二列传卷一一〇）可以说凌云翼是万历朝初年的显要人物。

魏子云

据《国榷》卷七十一神宗八年六月辛酉(廿三)日,记有凌云翼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同潘季驯经理河漕事。潘季驯遂内调兵部尚书,但“仍令俟九月水平赴任”,到了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五月六日,《国榷》记:“戊子,前兵部尚书凌云翼,夺秩闲住。”明史列传说:“召为戎政尚书,以病归,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召夺官,后卒。”当知凌云翼被夺官之年,在万历十六年五月,那么,凌云翼的卒年,可能不会距此太久。总之,万历十六年凌云翼还活在世上。

像凌云翼这么一位在万历十年前后已官居尚书又兼副都御史的显官,当时的小说作者会把他的大名写到小说里吗?衡情度理,也不会有这种事。可是,《金瓶梅》的小说里面,确实写入了一大串出生于嘉靖年间及第于各科进士第的进士。而且都有勋业上了史传的人物。像这种情形,绝难以偶然的巧合来作了结。怎能不令人想到

这种把当代人的真实姓名写入小说的动机，诚如欣欣子序言：“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盖有谓也”呢！

从治河的史实，我们知道潘季驯与凌云翼，曾一同治理南河，时在万历八年六月。按潘季驯是嘉靖二十九年进士，迟凌云翼一科，苏州府乌程人，于嘉靖四十四年由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朱衡共开新河，寻以忧去。隆庆四年河决邱州睢宁，再起故官。理河道，塞决口。工竣后被劾去职。万历四年任江西巡抚，万历五年河决崔镇，黄水北流，清河口淤塞，全淮南徙。河漕尚书吴桂芳卒后，万历六年夏，潘季驯再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再去治理南河。遂有万历八年凌云翼派去接潘季驯治河，要潘季驯待九月水平后，再去南京接兵部尚书任。万历十六年潘季驯第四次再衔命到南河治理河道，凌云翼已是去官谢世之年。潘季驯则在任上积劳成疾，三次乞休不准。万历二十年泗洲大水，城中积水三尺，惠及祖陵。这时，潘季驯年逾古稀，已老病难膺重任，方始归去，归三年卒，年七十五。

我们从潘季驯这一相辅的史实看，凌云翼的大名之被写入《金瓶梅》小说，以情理推想，当在万历二十年以后。说得再真切些，应在万历三十年以后方合情理。

魏子云

以宋徽宗的时代为历史背景，以河北清河为山东地理背景的《金瓶梅》，实际上写的是明朝嘉靖到万历的社会，是江苏清河的地理；而且，《金瓶梅》中的清河之大，有如北京城。

关于《金瓶梅》中的清河，虽明写的是河北的清河，事实上却又写的是江苏淮安附近的清河。在洪泽湖东北方。此一问题，首先拈出的是香港梅节先生，他于一九八九年三月间，为了当年六月十五日徐州召开的“金瓶梅研究会”，写了一篇“金瓶梅成书上限”，以第六十八回中的“南河南徙”一语，洞察了黄河溃决入淮，合淮洪入海，史在万历五年（一五七七），遂断定《金瓶梅》的成书上限，不可能上越于万历五年。

近在《复旦学报》一九九〇年二期，读到周维衍先生的“关于金瓶梅的几个问题”一文，第一个问题，谈到的就是江苏这个清河县在《金瓶梅》中的地理位置，引述了第三十六回、四十九回、七十二回、七十五回，

写到的“新河口”、“新河口闸”等地名，都在江苏这个清河县的近处。足以证明西门庆故事的主要地理描写点是南清河，非近于山东临清的北清河。遂基之推断《金瓶梅》的作者写出的这些有关“新河口”的文字，是由潘季驯建议开置的新河、新河口、新河口闸（新通济闸）而来，认为《金瓶梅》的写作年代不会早于万历六年，又说：“下限则在永济河开成前。（“万历十年（一五八二）总河凌云翼在淮安城南开永济河四十五里，但仍用潘季驯所开运口。”）遂说：“此后‘新河’这些名称，便不复存在了。”又说：“作者如果在万历十年后写的，何必要用上已经过时了的地理名词。”这一推论的理由，未免不合逻辑。

揆诸事理言之，当永济河（渠）开成，纵然早开的新河已淤塞不存，此一既有的“新河”地理名词，似不会忽焉消失。据《国榷》载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八月丁酉（十日），勘河工科给事中张贞观会总河尚书舒应龙总漕陈于陞等人，上言了一篇勘河奏章，文中有言：“司道诸臣：议清口，计费二万有奇。议分黄流，计费三十四万。分黄于淮之上流，先杀其势也。上流必于清河之上十里，不致为运道梗。分于上复合于下，冲海之力专也。合必于草湾之下，恐其复冲正河，为淮城患也。鲍家口王家营必塞者。二决横冲新河，恐散溢无归也。合淮东下，河身涤而渐深，海口涮而渐广，亦事理所可料者。”部议从之。”这里不是还提到“新河”吗？怎能说“这名称（新河）便不复存在”？

再说，清嘉庆间的治河者，以纸本彩绘了一幅《南河黄运湖河蓄泄机宜图说》，也名《黄运湖河总图》（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在这幅图中，还清清楚楚地绘上了一段清黄交汇处的“新河”，位在清河旧县东南。亦足证“新

河”这一名词 ,到了百年以后的清朝嘉庆年间 ,仍旧存在于地理上 ,怎会在万历十年之后“这名称(新河)便不复存在”?

周先生说他是“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的工作者”,想必有他的依据。惜乎未在这篇文章中说清楚。

中国文学发展到元明两代，进入了小说戏曲的鼎盛时期。戏曲方面，北方的散曲、杂剧与南方的戏文、传奇，各领风骚；小说方面，文言与白话，短篇与长篇，相互争辉。元明戏曲与小说，共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也创造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塑造出各形各色的故事人物，让人印象深刻。

它们并且一路走进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使得我们今天即使没看过关汉卿的杂剧，也知道有个感天动地的窦娥冤；哪怕没读过《水浒传》和《金瓶梅》，也晓得武松是个英雄，潘金莲是个淫妇！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英雄与淫妇的话题讲起，让我们来看看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英雄武松与淫妇潘金莲是如何深入民心的？

诞生于元末明初的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描述“官逼民反”下梁山泊一百零八条英雄好汉的事迹。其中第二

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开始，武松“窝囊”登场……

为甚么说这号英雄是“窝囊”登场的呢？因为那时武松避难到横海郡，投奔柴进，不幸染患疟疾，全身忽冷忽热，直到被宋江意外惊出一身冷汗，病才好的。

病好了的武松起程要回家看哥哥武大郎，途经景阳冈。那景阳冈上当时有只吊睛白额的大虎出没，已经连伤了二三十条人命，官府悬赏捕杀，不过都束手无策。武松酒后不听店家劝阻，黄昏时分还坚持独自过冈，果然遭遇恶虎袭击。

话说那景阳冈上的老虎杀人有三招：一扑、一掀、一剪。见到人，忽地一“扑”上前，迎面抓死你；抓不到的话，接着抬起后腿一“掀”，用脚踢死你；踢不到的话，再竖起硬得铁棒似的尾巴一“剪”，把你扫倒在地。如果三招用过，还没成功，那怎么办？没关系！向后转，从头来过！而且一趟比一趟凶猛！

武松面对凶猛无比的恶虎连番攻击，起初也吓得半死，后来强作镇定，终于凭着冷静的头脑与无比的勇气，制服了景阳冈的这只大虎，成了“打虎英雄”。这场武松打虎的惊险过程，后来成为说书场上的热门说段，说得现场听众往往目瞪口呆，叹服不已。

武松此后英雄形象不断垫高。因为继打虎发挥人类体能（像个“超级运动员”被人崇拜）之外，后来杀嫂（潘金莲）祭兄（武大郎）、狮子楼杀西门庆、打击地痞流氓，博人贺彩！之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一连串的作为，则又提升到跟贪官污吏、腐败政权的正面冲突，勇气十足。人气越来越旺，散发出来的英雄魅力更是挡都挡不住了！

有趣的是,大约在《水浒传》二百年后,成书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一百回,虽然同样以“景阳冈武松打虎”开场,但是在打虎却杀不成嫂的情况下,武松丧失了超级英雄的伟大形象,并且在《金瓶梅》作者的导演下,迅速退出舞台,把主要的戏份让给了淫妇潘金莲。

潘金莲在《水浒传》中死得早,所以跟西门庆通奸,谋害亲夫武大郎的罪恶很快就一笔勾销了。《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一样跟西门庆通奸,也亲手谋杀丈夫武大,不过作者显然不希望她早早退场,反而安排她嫁入西门府,好让她跟西门庆的女人们一较高下,彻底丰满她的淫妇形象。

《金瓶梅》里“不能一天没有男人”的潘金莲,跟《水浒传》比起来,年龄增长了几岁,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争夺男人的手段更是凶狠。一进西门府,勾引仆人琴童不说,还跟女婿陈经济暗通款曲;激打孙雪娥,逼死宋惠莲,都是她的杰作。为了遮掩她“醉闹葡萄架”的丑事,害得小铁棍儿被西门庆拳打脚踢,揍倒在地,死了半天;为了跟李瓶儿争宠,一会儿打狗,一会儿养猫,非把无辜的十四个月大的孩子官哥给活活吓死,不肯罢休!

潘金莲淫荡与狠毒的形象,是到了《金瓶梅》才真正塑造完成的。回过头去跟《水浒传》比较,以前的潘金莲似乎有些无辜,因为她被张大户性骚扰时还跑去找老板娘告状;“意下不肯依从”,张大户恼羞成怒,把她下嫁“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武大郎,以示惩罚。婚姻生活不美满的她,诱惑英雄小叔武松不成,掉入老江湖王婆与情场高手西门庆联手设计的陷阱里,于是一步一步沉沦下去……有人企图为潘金莲的淫妇形象翻

案，这在《水浒传》里勉强还行得通。不过，要想替后来《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洗刷淫妇的罪名，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中国明代四大小说当中的两部，有着直接的关联。《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到第二十六回，与《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故事大致雷同，人物形象往后却越差越大。英雄武松只能在《水浒》天地中大显神通，淫妇潘金莲则叱咤于《金瓶》世界里。妙就妙在，英雄与淫妇是不相容的，要武松做英雄，潘金莲就得快快死在他刀下；要留潘金莲做淫妇，当主角，武松便得滚到一边去。

由于小说创作年代不同，背景有别，元末明初的《水浒传》跟明朝中后期的《金瓶梅》，在风格上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期待英雄的年代，跟淫妇辈出的社会，毕竟是截然两样的。小说作品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个明显的例子。当我们现在重新阅读这些文学名著时，如果能够细心比较观察的话，还真是让人感到兴味盎然呢！

孙述宇

《金瓶梅》的成就，是写实艺术的成就。

《金瓶梅》起源于《水浒传》，不但承受了那个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的故事，还承受了这故事的写实手法。《水浒》这小说有一部分是英雄故事，另一部分是写实文学。英雄故事的部分，很夸张地讲刀枪和武艺，讲拔树举鼎，讲好汉打倒坏蛋，讲大碗酒大块肉和大把银子，这些都是使人心大快的事，但是是真实日常生活里绝少见得到的，因此这一部分是逃避现实的浪漫艺术。在英雄故事的尽头《水浒》就开始写实，写真实生活里经常发生的事。《水浒》中的英雄事迹多是在户外上演的——在大路上、山冈上、松林内、演武场和法场中，也在城堡、公堂和酒店里；但在住家里的场景则多半很真实。比方武大郎的家、阎婆惜的家，或是徐宁的家，其中的陈设与生活习惯，样样都很可信的。在这些段落中我们看见一些非英雄的人物，像那个小猴子郓哥，本是跟着西门庆寻点衣食的，但因言语冲突，吃

了王婆的亏，便教武大来捉奸；又如何九叔，一个很懂世情的小吏，他一方面很替西门庆遮掩谋杀武大的事，另一方面也捡起几块骨来应付武松。这些段落里又有些女人，她们不同于别的小说戏曲里的女性，不像大小乔、孙夫人、莺莺、红拂、宝钗、黛玉，乃至本书中的一丈青和琼英那么尊贵脱俗和可羨可佩，她们未必不俏丽，但只能算是庸脂俗粉，出身低贱。潘金莲是个嫁给小贩的婢女，潘巧云是个再醮妇人，阎惜姣是个歌伎，都是在街上就能遇见的角色。她们还认识一些老太婆，很懂人情世故的，舌头很长，没有多少技能和生计，靠说媒扯线来维持。

《金瓶梅》的作者选择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的故事来入手，显然有部分是由于他看到这种写实文学的价值。他觉得这样的写实艺术，比《水浒》其余的浪漫英雄故事，更有意思，于是他拿来发扬光大，让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和很多别的同样真实的角色，演出一整套真实世界里的戏剧。他把这个故事修改了一下，不让武松一下子便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而是让武松杀了一个帮助西门庆的小官吏李外传，于是西门庆和潘金莲逃过了大难，武松却流放到别处去。这样修改后的故事比原来《水浒》中的要合理得多，因为有财有势勾结官府的坏蛋如西门庆者被人清清楚楚地复仇杀掉的事，是或然率很低很低的意外，不是真实世界中的常规。西门庆是要死的，但他是很自然、很合乎逻辑、蠢蠢的死在自己屋里。潘金莲也要死的，而且作者还依着《水浒》，让武松来杀她，但她之所以落入武松手里，一方面固然是命运的捉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的情欲最后远胜过了她的机智。这样的结局比原来的深刻得太多了。

武松在《金瓶》中杀嫂，只比在《水浒》中晚了几年，

《金瓶》的故事就是这几年间在西门庆家中发生的事,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西门庆前后得了几注钱财,开了几家店铺,盖造了新宅;由钱财得官禄,当上了地位有限然而深受畏惧的理刑官员,又由官场关系再赚了些卖盐之类的钱;娶了几个妾,都是些不三不四的妓女寡妇之类,其中李瓶儿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是没养大,瓶儿自己也随着死了;在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他由应伯爵、谢杀大这批帮闲‘弟兄’陪着去嫖妓,由文嫂冯妈妈这些‘马泊六’扯线去偷人,他家里的女人则在节令和各人的生日里饮宴作乐,听妓女、小优和瞎眼的女先生唱曲子,听尼姑讲佛经故事,制衣服,赌叶子,讲笑话,讲闲话,吵架。作者的特殊才能是写家常琐事,通过一般人乃至一般作家都瞧不在眼内的小事,他写下一大段人生,一大段在世界文学中都罕见的人生。他笔下有几十人是细细写出来的,不但各有面目,而且各有生活。后来的《红楼梦》也写出不少各有声音笑貌的人,但没有几个能有个别的生活、追求、与所关切的事。《金瓶梅》画面之广阔,要《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才比得上的。

日常的小事并不容易写,写了出来也不易讨好,因为人的心理都是只注意非常的大事。《金瓶梅》里充满了琐事,而竟然又能吸引读者,是有原因的。比较浅显的一点,是作者能够看到日常生活里的风趣,而且把这种风趣写出来。小说中笑料很多,又是笑话,又是惹笑的人和事;有些人物和事件,表面上并不滑稽,但仔细看深一些,我们就要微笑起来。作者有很生动的幽默感,而且对于世事的表里不一特别感兴趣,这一点,我们在下面会一再提到。但作者能写家常事的一个更深原因,是他的异常的生命力,这生命力表现为对世界与人生的无限兴趣,使

他觉得生活很值得写。

这异常的生命力,是作者的艺术资本。他觉得他周遭的当时当地的世界,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处处都很动人,就已非常可以写,不需要再另外去想象什么粤桂晋苏等省城荣国府里的大观园,或是梁山泊上的忠义堂了。所以他能够写实,拿着晚明时代山东一个县城里士财主的生活,一口气便结结实实地写上几十万字。他笔下的百十个大小人物,可说是没有一个肤浅单调,没有一个是福斯特(转译)称之为“扁形”的概念化人物,原因是他对人性存着一股强烈的好奇,那不是一般世俗浅见满足得了的。他对人的心灵的各种各样反应都极感兴趣,因此书中不但包含了许多医卜星相三教九流的活动,还抄录了许多词曲、宝卷,乃至书札、公文和邸报。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期间有多少是后来书商雇佣的手笔,但是这大量的抄录往往都很有味道,不像是纯粹为了增加字数的填充,读者若读不出味来,在怀疑是否填充字数之时,也不妨怀疑一下是否自己的活力和好奇还不够应付这小说。

本书又常讲饮食男女这两种“人之大欲”。男女之欲的问题复杂,我们暂且不谈;以饮食来说,没有什么小说像这本讲得这么多。书中的饮食不但次数多,而且写得详细和生动;我们看见西门庆和他身边的人吃的几个菜是些什么,怎样煮的,又有些什么点心、面食、汤和酒;时新的水果来了,帮闲的人抢了吃,还偷回家去;新鲜炖的奶,应伯爵一口气喝了自己的一碗后,把西门庆的也喝了。《水浒》里的饮食吓唬我们,那些好汉子独个儿报销了几斤牛肉和半桶酒,确是英雄气概;《红楼》的饮食也吓唬我们,曹雪芹通常并不说吃的是什么,但他让我们那么

震慑和充满了自卑感，开席之时，我们就剩下刘姥姥那么多的观察力了（偶然他透露一点点食物的内容：“茄鲞”，主要的材料是茄子，可是煮法就惊人了。贾太君吃的“红米粥”，那红米原来是皇帝下令试种不成而后来变成非常稀罕的，要不是赵冈研究出来，我们连赞叹都不会）。《金瓶梅》的饮食就只是享受。本来，口腹之欲有谁没有？满足与不满足的经验有谁没有？可是奇怪得很，在文学上很少反映出来。原因也许是由于这种欲望很急很浅，容易过去，容易遗忘，而且一般人也不觉得值得讲。就是大作家中，能够经常采用饮食作创作资料的，恐怕也只有本书作者和狄更斯等少数几个。饮食本不如男女之事能给人假想的代替性的满足，这些作家能写饮食，实在是由于心中对世界人生的兴趣与爱恋所推动。《金瓶梅》的作者觉得这世界是很可恋的。我们在下面会说到，他小说的主题是人生的悲苦；尽管如此，这悲苦人生的背景却是个美好的世界，而这就是这小说的艺术。

〔标题为编者所加〕

(美)韩 南

《金瓶梅》另一意义深长的来源是短篇文言小说《如意君传》。《金瓶梅》和中国小说早期的色情传统有关,这一点以前从未提及。同时我们还得承认由于没有《金瓶梅》成书前的《如意君传》留存于世,两书关系的确切性质还难说。

事实证明题为《如意君传》的淫猥或下流作品在嘉靖年间(1522—1566)已经存在。它当是《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所指的同一作品。《醒世姻缘传》第二回也提到《如意君传》,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它是色情作品。

故事确然无疑。它说的是老年女皇帝武则天和她最后的男宠薛敖曹的相爱。如意君的封号表明男宠满足她性欲的美满程度。文言小说很少有历史依据,这和我们无关。我们关切的是《金瓶梅》成书时,它正在流行。在《金瓶梅》第三十七回的一篇色情韵语《威风迷翠榻》说:“犹如武则天遇敖曹。”他们也为十七世纪初叶的色情小说

《绣榻野史》所提到。它比《金瓶梅》略迟。从上下文得知它的色情描写的特征正是薛敖曹的特大阳物。

就我所知,文言小说最早为日本版刊于 1763 年。全称《则天皇后如意君传》。作者具名吴门徐昌龄。卷首题为《阏娼情传》。这是色情小说。很有可能《如意君传》和《如意传》就是今日所见的《如意君传》。

为确立《金瓶梅》同《如意君传》的关联,有必要就《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关于色情迫害狂的描写同文言短篇小说的相应两小段描写作一对照。关于牝屋的那小段连文字也相同。这未必是彼此借用,可能两者同时引自第三者,如某一淫书。但《金瓶梅》紧接着的后文也和短篇相同,这就排除了来自第三者的可能性。下面是《金瓶梅》的后文:

(西门庆)慌了……于是把妇人扶坐。半日星眸惊闪,苏省过来。因向西门庆作娇泣声说道:“我的达达,你今日怎的这般大恶,险不丧了奴之性命。今后再不可这般所为,不是耍处。我如今头目森森,莫知所之矣。”

文言小说的相应片段如下:

(薛敖曹)大惊,……扶后起坐,久而方苏……
(武后)作娇泣声曰:“兹复不宜如此粗率。倘若不少息,我因而长逝矣。”

在此之前,武后对他说:“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之。”这

是唯一的原文引用。除此之外的相应片段都不能证实《金瓶梅》曾以《如意君传》作为来源的论断。然而只要这看法一被接受,引文就能见出文言短篇对小说的影响何等广泛。例如小说的许多色情情景都可以在短篇中找到。以上引文写的都在室外,《金瓶梅》在亭子旁,短篇则在小阁中。两书所写男女交欢都在女方醉醺醺欲睡时。短篇和《金瓶梅》中数处都写到接近性虐待狂的烧香疤之事。武则天看见鸟儿交尾而想到自己,这使我们想到潘金莲也有几次这样联想。还有,短篇的色情描写的主要依据是薛敖曹的特大型阳物,为此他作为第一名选送到朝廷。短篇的色情描写多半写的是武则天所承受的欢乐的痛楚。《金瓶梅》也如此,至少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从胡僧那里得到药丸后是如此。

要确定《如意君传》作为小说的来源之一,有必要对色情描写的两种手法加以区别。一是含蓄、间接、暗示、比喻的手法,它运用韵文和骈句。有时它用较长的一段韵语描写模拟战争的隐喻。它的作用是避免留下栩栩如生的视觉体验。它和直接手法相反,后者的目的在于唤起尽可能完整的体验。前者主要见于口头文学,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说书人如听众之间不可能采取另一手法。由口头文学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也一样,它遵从口头文学的传统手法。同样自然的是另一手法见于书面文学,作者要把读者群记在心上。

两种手法在《金瓶梅》中都有。它有很多词和韵语,有的采自早期话本。除此外,还有二十来片段蛊惑性的直接描写穿插其间,主要是它们使《金瓶梅》得到色情小说之称。来自《如意君传》的引文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文言短篇引进白话小说,就我们对早期小说的知识而论,它的

含义在于小说作者已摆脱对古代白话小说的依赖,他的作品可说是首次为读者而创作。

我们不应该低估《如意君传》和其他话本对小说色情描写在词汇上所起的借镜作用,使用这些词汇决不表明作者态度冷静,《金瓶梅》所表现的分明无误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啧啧称赏的玩乐态度和短篇并无二致。《金瓶梅》惯于在大段色情描写中插入日常对话,《如意君传》也有同样情况。

很难想象小说作者会受到短篇中人物描写的影响。他们都不过是粗具轮廓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和《金瓶梅》的描写大不相同。宫闱生活中早期武则天的阴谋诡计、野心、淫佚都曾经对潘金莲的塑造有所影响。传说武则天谋死亲生儿子以嫁祸于当时的皇后就是一个特出例子。作者所做的只是将她的传统形象移植到新的社会条件之下即商人家庭中。由于缺少具体的资料作证,这些看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标题为编者所加〕

(美)郑培凯

《金瓶梅词话》中饮酒作乐的场合极多，所饮的酒类也不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十五回以前，书中提到饮酒的场合，都不说明酒的种类，换句话说，即是不曾对酒做过细节描写，只把饮酒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特定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本书前九回基本上袭自《水浒传》，并未表现出《金瓶梅》作者对酒色的特殊兴趣与描绘。在第十回之后，故事逐渐进入《金瓶梅》作者的独创领域，对饮食的描写才逐渐细致起来，但在第十五回之前，仍未提到任何酒的种类，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意识仍未注意到这方面的细节。

由第十回到第十五回，书中提及酒的场合极多，但是对酒的描写却是一般而浮泛的。如第十回，西门庆得知武松刺配孟州，乐得“合家欢喜饮酒”，描写的一段骈文是程式化的文字：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

古玩 ,帘开合浦之明珠。水晶盘内 ,高堆火枣交梨 ;碧玉杯中 ,满泛琼浆玉液。烹龙肝 ,炮凤腑 ,果然下箸了万钱 ;黑熊掌 ,紫驼蹄 ,酒后献来香满座。更有那软炊红莲香稻 ,细脍通印子鱼。伊鲂洛鲤 ,诚然贵似牛羊 ;龙眼荔枝 ,信是乐南佳味 ,碾破凤团 ,白玉瓯中分白浪 ,斟来琼液 ,紫金壶内喷清香。毕竟压赛孟尝君 ,只此敢欺石崇富。(第十回)

再如第十一回西门庆结识十兄弟、梳笼李桂姐的饮酒场合 ,都不曾说明酒的种类。第十三回西门庆私通李瓶儿 ,也只说“小壶内满贮香醪” ,不曾说是是什么酒。第十四回写到李瓶儿在花子虚死后 ,给潘金莲做生日 ,大家饮酒 ,“围炉添炭 ,酒泛羊羔” ,也是程式化的形容文字 ,并非明指“羊羔酒” 。甚至到了第十五回 ,西门家中妇女饮酒作乐 ,有一长段叙述弹唱饮酒 ,却不知道他们喝的是什么。

然而 ,在十五回末 ,写到三个“圆社”提着“两瓶老酒”来孝敬西门庆之后 ,作者再写到酒时 ,就经常说明酒的品种 ,而且对不同品种的酒类都做了具体细致的描写。这显示了作者在十五回之后 ,逐渐脱离了因袭《水浒传》的束缚 ,进入了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 ,也得以展示对于酒类的兴趣与品味知识。

下面我们罗列《金瓶梅词话》中明白指出酒的品种的场所共五十三处 ,作为具体例证 ,以明书中描写各种不同酒类的特性以及不同人物的饮酒习惯。在讨论各种不同酒类的特性之时 ,我们将征引明代各种历史记载资料 ,对《金瓶梅词话》中述及的酒类作一历史性的说明……

由以上的五十三个例子来看 ,金华酒出现的场合最多 ,是全书述及酒类中最经常饮用的品种。金华酒又有

“浙酒”、“南酒”两种通称。可以看出,在作者笔下,书中人物是以金华酒为浙江酒或南酒的代表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金瓶梅词话》反映明人饮食风尚,作出以下几点小结:

第一、《金瓶梅词话》中对酒的描写,忠实反映明代嘉靖万历这一段期间中上层社会的饮酒风尚,特别反映了山东河北交界一带饮酒习尚的历史状况。

第二、书中所写的酒类,以金华酒与麻姑酒为当时富贵人家的主要餐用酒。这两种酒都是甜性较大的黄酒,都是从南方运来的,价格较昂,故亦经常作为礼品馈赠之用。书中凡言浙江酒、浙酒,都是指金华酒,称及南酒,也主要是指金华酒,但不必然排斥麻姑酒的可能性。

第三、我们若考虑到金华酒在嘉靖年间在北方最为嘉尚,而万历年间苏州三白酒风行,南方士大夫对金华酒多有贬辞,那么,对书中盛称金华酒可以得到以下的解释:本书描述嘉靖年间北方人的饮酒习尚,真实准确。而这种饮酒习尚,不适合万历年间的南方风尚。

第四、书中一般妇女都喝金华酒或麻姑酒,主要因其酒性温和。西门庆则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酒类,特别是药香花酒。书中几次写到烧酒的场合,都与潘金莲、王六儿这两个情欲特别强烈的女人有关。因此,作者在书中写各个角色的饮酒习惯时,是考虑到如何以不同酒类配合人物性格的,显示了作者在人物刻画方面观察入微,并且掌握得相当恰当。

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

(美)马幼垣

1976年春天,当我还在史丹福大学代王靖宇兄课的时候,舍弟泰来自芝加哥寄来一条他新发现的《金瓶梅》资料。泰来这几年治明代书院制度和人文递进诸问题,不以转用前人习引的材料为满足,遍查人文集和方志,数以百计。这样大幅度的翻检古籍,自然会有不少意外收获,这条《金瓶梅》新资料就是一例。

在明清说部中,《金瓶梅》可以说是蹇运重重,历代的文禁,书商的随意删改,都不必说,和成书过程有关的史料亦不过寥寥几条,加上语焉不详,考证起来,确是煞费周章。某些专家退而求其次,采用连锁式的办法,由甲得乙,自乙推丙,据丙知丁,再从丁返甲,这种推证,治丝益紊,一关误则全盘错失。最近见的几篇《金瓶梅》新研究,都显然走此途径,追源究始,还是因为史料的奇缺。对弥补此偏差,泰来这新发现,多少总会有一点功用。

兹先把这条资料抄录如下,再略附解

释：

《金瓶梅》跋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_彙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必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_臺枕席之语，_咀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安之从曳逢迎，_奴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_就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_彙，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此岂可与褻儒俗士见哉。此书尚无镂板，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_弁洲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

这篇跋文见谢肇_淞《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页三十下至三十一下。谢书共二十八卷，首有天启丙寅（1626）叶向高（1559—1627）序，原书现藏日本东京之尊经阁文库。

谢肇_淞（1567—1624），号在杭，在明季颇负文名，著

述等身《五杂俎》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关于他的行实，
蕴耀在袁道及 蕴耀在袁道及 蕴耀在袁道及 蕴耀在袁道及 蕴耀在袁道及
《阅微草堂杂记》1368—1644（袁道 1976），页546—550，可参考。

其实只要对近人研究《金瓶梅》的文字稍为留意，对谢肇淞也不会太陌生。以目前已知的资料来说，最先拥有《金瓶梅》稿本的是董其昌（1556—1637），但他仅得前段，袁宏道（1568—1610）自他那里借得后，副录了一份。这事见袁给董的信。据韩南的考证，那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间的事。后来谢肇淞又向袁宏道借来转抄，借了好一段时间仍不归还，致袁函问：“《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袁宏道这封索书信，韩南以为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但魏子云则认为用来支持前后两次关于借书事件的两封信大有可能都是贗品。现在有了这篇跋文，可知袁宏道确有部分《金瓶梅》稿本，而谢肇淞也确曾借来副抄。

至于韩南的论断，以为董其昌和袁宏道均无机会拥有整部《金瓶梅》，在此也可得到证明。还有，谢说他自袁处抄来的仅是全书十分之三，看来以前大家所说董和袁手上有的达半部书之多，可能估高了一点。

谢肇淞另自丘诸城（详后）处得十分之五。两个来源，有时间上的分别，大概这数字是指增补袁本所缺者而言。如此说来，谢所有便达全书百分之八十。他既能说出全书该有多少，和“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好像首尾他都看到了。至于谢所说“弁洲家藏最为完好”，搭上和王世贞的各种传说，显是风闻之语。使用这种资料，时有真讹（不一定是存心作伪）相混的危险，如何辨认，不致一笔勾销，往往是考证成败的关键所在。

魏子云另有一文《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代》,其结论有云:“倘使上述袁氏兄弟的文集,全部刻有那些论述《金瓶梅》的文字,自可证明《金瓶梅》一书早在万历二十四五年间,即流行于世。但也不能证明那个本子就是今之《金瓶梅词话》。可能今之《金瓶梅》也是被改写过的。”这种迂回自卫之词,现有的资料是无法断明是非的。但以当日稿本传抄的情形来看,而我们现在又确实拥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序本《金瓶梅词话》,离袁宏道谢世仅约七年(1617仅是上限,不能算是下限,但此本也有不是初刻本的可能),很难想象会别有一书同名而内容大异者插杂其间。如袁本和今本之间仅是大同小异的版本分歧,除非我们要判断各版间的因承,否则便无关宏旨,因为大家讨论的对象是《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成书年代,而不是个别本子的初刻年代。

时人常用的史料还有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话,里面因《金瓶梅》而提及它的一部续书——《玉娇李》,并说沈德符在邱工部志充处曾看过。魏子云因为觉得《万历野获编》这一条《金瓶梅》资料“全是瞎说”,连《玉娇李》也以为似无其书。现在有了谢肇淛这篇跋文《玉娇李》(谢跋作《玉娇丽》)的存在看来不必只靠沈德符一人的话。

邱志充本身自然是一关键。韩南曾引乾隆二十九年(1764)《诸城县志》来说明邱志充为诸城人(并谓该志作邱志克),我未见该志,未知其详,但他另说邱并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及四十一年(1613)进士,这点则误。“邱”该为“丘”,清代避孔子讳,改丘为邱。万历四十三年(1615)《青州府志》即作丘志充,内并有颇详细的生平资料。丘确为诸城人,万历三十一年中式举人,三十八年参

加会试 ,但未参加殿试 ,四十一年始成进士(二甲)。(会试合格 ,是贡士 ,殿试合格 ,始是进士。)又据《湖南通志》(韩南已引) ,丘于崇祯间官至布政。

换言之 ,藏有《玉娇李》的丘志充和借《金瓶梅》给谢肇淛的丘诸城 ,应是一人 ,此君对小说禁书可真兴致不少。对《金瓶梅》的研究 ,我并未下过功夫 ,因觉得泰来这一新发现应该公诸同好 ,顺便略书己见。这条史料的价值 ,和如何配合其他资料作综合研究 ,还是让大家来探讨。

(美)王冠才

《金瓶梅》在明朝万历年间问世的时候,没有作者署名,民国成立以后,山西发现新版本,有欣欣子作序,说此书是兰陵笑笑生所作,于是引发了无休止的对“兰陵笑笑生”其人的考证。

兰陵有南北两个。北兰陵在山东。荀子曾为兰陵令,人称古兰陵。南兰陵在江苏,晋室南渡后才有,称为侨置。兰陵笑笑生的名字出现以前,都说《金瓶梅》是南方人写的,顺理成章,这个兰陵是南兰陵。可是现在说法改变了,这个兰陵应该是北兰陵。

主张“北兰陵”者,以徐州教育学院教授张远芬持论最力,他的《金瓶梅新证》立说举证,在目前最称完备。他认为作序的欣欣子,就是笑笑生的另一化名,而欣欣子作序的地方“明贤里”,就是古之兰陵,今之峄县。他更下了许多功夫,把《金瓶梅》使用的峄县方言整理出来,得五百二十六条。

如果“兰陵”是北兰陵、古兰陵,笑笑

生”又是那一个人呢？古兰陵的疆界几经变动，现在的枣庄、峄城、犹存古名的兰陵镇以及滕县的一小部分，都曾包括在内。《金瓶梅新证》把明季在这个区域里出现的文士一一进行“审查”。曹操死后有“疑冢”七十二个，教人不知道他的尸体埋在哪里，但后人有诗：“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张远芬教授对《金瓶梅》作者的发掘是同样的过程，这个方法可称之为“穷余推理法”。

嘉靖、万历年间，峄县（今峄城）有个贾三近，做过大理寺卿、光禄寺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来退隐家居，编撰峄县县志。张远芬确认“兰陵笑笑生”就是贾三近，那方法，我们或可称为“意识对比法”，作家无论怎样掩饰，终须在作品中流露他的意识，张远芬从贾三近的诗文奏疏中寻意识，再从《金瓶梅》中寻意识，指出两者相呼应，合符节的地方。这种共同和相似，是可以看成这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

我对《金瓶梅》的作者并无欢喜感谢之意，不在乎他是不是我的同乡，但我钦佩张远芬先生的研究精神。他写《金瓶梅新证》时，国内的研究条件还极缺乏，据小说家韩秀撰文透露，张氏研究这个问题之初，手头连一部《金瓶梅》都没有，必须每天徒步奔波数里到图书馆看书，其艰难可以想象。张氏心极细、极热；“上穷碧落下黄泉”，于人不疑处有疑，于人不见处有见，是一位难得的学人。现在资料普及，交流密切，《新证》圆熟饱满，并未显出有任何因陋就简的地方。

《新证》也说，认定兰陵笑笑生是贾三近，目前证据仍不充分。我们借用法律用语，《新证》所提出的是“情况证据”，而非“积极证据”。也许有一天，有某一本古书、某一件文物，上面赫然大书“贾三近别署兰陵笑笑生”。我们

得承认这几乎不可能。由于《金瓶梅》内容特殊，作者设法隐藏自己无所不用其极；“败露”的机会太小了！谁也不敢保证贾三近就是兰陵笑笑生，但是谁也不能断定绝对不是。《金瓶梅》的作者已有十七个之多，大家都没有积极证据，那么，有情况证据者优于无情况证据者（说王世贞因复仇而作金瓶梅，就连一点情况证据也没有）。情况证据多者优于情况证据少者。现在是贾三近的情况证据最多。

我曾经这样想过：写《金瓶梅》的这个人，一定是非常之自暴自弃，非常之愤世嫉俗，他受的挫折无法复原，他对当时现存的价值系统藐视到极点，他恨所有的人，于是把久藏的一大包泻药拿出来，撒到井里；“他奶奶的，你们喝吧！”依李芳元教授所写的“一代乔岳贾三近”，贾氏正色立朝，是孔孟道统中的佼佼者，虽然在政治上挫退，仍然能经营园林馆阁组织乐队歌童，优游林下岁月，那来这十世不解的满腔恶秉，发为百万长篇的色情描写？上天似乎没有逼他走上绝路，成此伟业。

最近读到山东峄城张振平先生一篇文章，对贾三近的死提出“质疑”。贾氏族谱和地方志书都说贾三近“疾发于背而死”，张振平提出多顶疑问，其中最要紧的，是红卫兵挖掘了贾三近的墓，墓中竟无骨骸。因此，张振平先生的“质疑”，我们必须倾听。

张氏采集有关风说，认为贾三近当年是“诈死”，家中出殡虚应故事，他本人逃到南方藏起来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因为皇帝又要他出来做官，他“宁死”也不干。我认为张氏提供的材料极有价值，把贾三近和《金瓶梅》的关系拉近了一步，让我们想一想，诈死是欺君之罪，可能有灭门之祸，贾三近断然出此，可见他对自己在政治上

扮演的角色何等厌恶 ,对当时的政治舞台——朝廷——又是何等痛恨 ,胸中积懣 ,可想而知。他既然背负着弥天大罪 ,弃家远逃 ,还有什么出头之日 ,对现实社会还有什么“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责任感 ?如此这般 ,他就有了写《金瓶梅》的心情。

据说贾三近逃往“南方”。“假如他是真的” ,《金瓶梅》全书大约是在“南方”完成 ,这就难怪“兰陵笑笑生”所写的这部小说 ,其中也有“南方”的方言和风物。

不过“诈死”和“出走”之说 ,也仅限于“情况证据” ,至于在南方隐身成书 ,就全出于我们的猜想。贾三近这人似有双重性向 :科举的谨严和名士的放诞 ,所以 ,为官治事 ,似范仲淹 ,和好朋友饮宴谈笑似李卓吾。辞官家居后 ,前者渐隐 ,后者渐显 ,诈死逃官以后 ,就“索性”变成一个相反的人了。如果沿此脉络 ,把贾三近的一生写成历史小说 ,以之与《金瓶梅》相互渗透 ,我想一定极为可读。

《金瓶梅》的作者呼之欲出

(加拿大)马 森

对《金瓶梅》素有研究的孙述宇兄尝言《金瓶梅》的艺术在《红楼梦》之上。我差不多要同意他的说法,但还有一些舍不得,因为我真爱《红楼梦》。孙述宇又说:“你们喜欢戏剧的人一定偏爱《红楼梦》!”说的也是《红楼梦》的戏剧性是比较强,但《金瓶梅》的叙事本领实在高明,含意又深沉,比来比去难分高下。其实好的作品,就像人一样,应该各有所长,有的人潇洒,有的人深沉,有的人俊逸,最好的方式是见其长而忘其短!

近阅《人间》,有程步奎先生一篇有关《金瓶梅》的文章,提到《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认为自1933年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发表后,揭穿了以王世贞为作者的“苦孝”说,使“嘉靖间大名士”的说法不能成立,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似乎程先生没有看到较新的资料。程先生的话只可说对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还有些问题。目前虽然大多数研究《金瓶梅》

的学者不再相信“苦孝说”，但却不能完全否认作者可能仍是“嘉靖间大名士”。按明万历年间的沈德符在《野获编》卷二十五所言“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等语，焉知其所指的大名士不是另有其人？难道王世贞是嘉靖间唯一的大名士吗？

最近（1983年）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的张远芬的《金瓶梅新证》，就提出了另一个嘉靖间的大名士，而且张的考证说服力很强，虽尚不能说是定论，但已使《金瓶梅》的作者呼之欲出矣！

在说明张远芬的《新证》以前，我不得不首先声明，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不过是把我认为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种新说介绍给读者，并不想引起任何笔墨官司。国内的魏子云先生研究《金瓶梅》的成就很大，不但功力深厚，而且非常细致，已经出版了好几册洋洋巨著。但魏先生一向主张《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大陆亦有人认为作者为浙人屠隆。张远芬的《新证》，也许可以给魏先生作一个参考。

以前研究《金瓶梅》的学者，像郑振铎、吴晗等，多认为此书乃出自山东人之手，最大的根据乃因此书用了大量山东的方言俚语，连绍兴人的鲁迅，也认为对话全用山东方言，非江苏人的王世贞可为。但是叫人无法苟同的是“山东方言”一词太过笼统。山东地方很大，语言相当复杂，鲁西一带绝不同于胶东，反倒接近河北、河南和苏北，因此泛泛地说是山东方言，意义不大。张远芬的《新证》，正是在这一点上下功夫。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其中的“方言考”。张远芬本人是山东峄县（古称兰陵）人，张在《金瓶梅》中选出了八百个词语，于1980年和1981年两度返峄县进行方言调查，发现其中有六百多个词语全是

峰县的方言。其余的一百多个则属于北京方言、华北一般方言和元明戏曲中常用的词语。张总结谓：凡是外地人（包括峰县以外的山东县份）不懂的俚语，几乎全是峰县一带独有的词汇。其余外地人懂的，峰县人也用。不但词汇，连句子的结构和语气也符合峰县人的语言习惯。这种峰县的方言和语气在《金瓶梅》一书中不是偶然的点缀，而是从头至尾贯穿全书的。因此张远芬的结论是《金瓶梅》的作者不但是山东人，而且非峰县人莫属。峰县既然古称兰陵，兰陵笑笑生的籍贯自然应该是峰县了。

同时张远芬也解决了《金瓶梅》中常见的为人疑为出自南方的金华酒的问题。张举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一条：“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也就是李白曾颂赞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的兰陵酒。一酒而三名。原来峰县附近就是古代的东阳邑，所以峰县一带产的酒，既可名兰陵酒，又可名东阳酒。所以名金华者，以其色正黄，如金花也，花与华相通，非指浙江金华地方。

张远芬最后的结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嘉靖间另一个大名士峰县人的贾三近。贾三近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山东乡试省魁，文名大噪。隆庆二年（1568）赴京会试中进士。以博学鸿词选翰林庶吉士，后擢太常少卿，再迁大理左右少卿。因与张居正不睦，辞官返峰县。张居正死后，复官光禄寺卿，继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府。后因父母疾病请告返乡，即未再出。死于万历二十年（1592），享年五十九岁。明史有《贾三近传》。此外焦竑《国朝献徵录》、朱彝尊《明诗综》等也都有贾三近的传略。

张远芬所考证的贾三近的生平事迹，以及宦游处所、人生经历、习脾嗜好、著作目录等，使人觉得兰陵的贾三

近实在是最接近兰陵笑笑生的一个人物。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不知为《红楼梦》的作者浇泼过多少墨水，英美人也为莎士比亚剧作的真正作者争论不休，几乎是每隔几年就要翻一次案。今后怕该轮到《金瓶梅》了吧！

“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

(法)雷威安

明代末年,社会上流行随笔,日记,书信,我们知道早在十六世纪末,《金瓶梅》就以不太完全的手抄本的形式,在文人之间流传。他们在谈论中立刻就认出这是一部从来不曾有过的最吸引人的小说。这倒并不使我感到怎么惊奇,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新近去北京期间,又听到同样的说法,此书问世三四百年之后出自杰出的中国小说史家之一的孙楷第之口,他已八十四岁高龄。他说是冯梦龙(1574—1646)之功,他在小说分类上把它列为“四大奇书”之一,以与初等教育必读的官方古典文献即孔子的《四书》相抗衡。

这种不敬之至的对比,是以《四书》与十六七世纪之间写定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这四部书作对比。

需要回顾一下历史吗?这部小说的诞生,就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来说,相当于西方十六世纪,与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同

时。新的文学体裁即使不借此为捷径，它本身至少是人类历史新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的新产品。事实上，在这小说的威力对整个广大的领域施加这样大的影响的世界里只有两种文化，这就是我们的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及其所属的东文文化。

这部小说在当时反映较好。就词源学的意义而论，这部小说是用俗语俚语撰写的，人们口头上说的，与相应的文学语言相距甚远，这正如罗曼诸语之对于拉丁语一样，其差异之大，虽不超过，至少差不多。——这种情形，欧洲人是可以想象的，如果罗马帝国持续不衰，直至二十世纪，拉丁语也许早已占有古代汉语的地位了。

“讲故事的人”，即叙事小说的最后源泉，肯定曾流行一时。但到发展成为长篇小说，时间却还长着哩。中文的传播曾借助于印刷术的早期发展及纸张的便宜。自从十世纪起，印刷术很普及——因为存在对它的要求，就会有满足这种要求的方法。在这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情况，即小说盛行：人们对于历史故事图画和文字游戏的兴味，使说书艺术逐渐成为一个行业了。

在中国边远的西北敦煌偶然发现了约有好几万卷的藏书，它揭开了在印刷术发明前，最初试用通俗口语的叙事文本即已存在。这一决定性的时期约当十至十三世纪之间，此时，世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城市化发展很快，这种情况，很出色地被雅克·热尔内《宋末蒙古人入侵前夕的中国日常生活》一文写到。

正是这些宋代的说书艺术家们，中国小说文学应把自己所具有的最鲜明的原始特征归功于他们。他们的活动除了简要一提之外，不为人所知，他们反反复复讲述所依据的话本的可靠性也还有争论的余地，但我们所知所

闻的许多事情正足以估计他们在同行之中最受漠视，那些讲简短故事的即席说书人，总是以各种真情实事为依据，已经算是讲唱文学的革新家了，算是连小小细事也有真凭实据的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了。

中国历代文人所分门别类，而又集成一起的历朝案卷，给予这些历史的普及作家们以丰富多采，切合环境的长篇故事的形式，一场紧接一场；“回”这个字经常用以表示书面的叙事文本的一个段落。

话本从口头讲到书面写定止，不可能不经过多次讲说，与此相反的论断是经不起评论家的批驳的。我们手头掌握着一些证据，不管它们怎样琐碎，但可证明公众需要消遣的书。当然，无论如何，宁可要各种“节录”本，节录本似乎一上来就有或多或少成功的希望，令人想起口头演出的方式，甚至于还可以把它用书面形式重新写出来。

别再纠缠这些问题了。元代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进占中原之时，中国已有小说和戏曲。很久以来一直认为那是他们带给中国人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新主子，按照他们自己消遣的口味，对戏剧和小说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尽管他们对古典文化无知，以及他们对文人蔑视。“平话”时代似乎给十四世纪的小说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个术语的意义，人们追问也属徒劳。从词源上来考虑，它的意思是短篇（历史）评论（或“简要”历史评述）。我们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这部小说第七十回就是这样写法的。“四大奇书”中的三部都经过“平话”时期，虽然这也许不是对《水浒传》有关的事情的猜测，说它也是曾经一度叫做《水浒传词话》。所谓长篇，毫无疑问，当不至于不间断地一气到底，也还得分成“卷”（卷者

也)——我们法国叫“书(通簿) (书者册也)——有时再下分为“节(节音折也)。“场(场者回也)的分法是后来出现的,约当十六世纪初,那时书写力求去适应和接近口语形式,以至到干涉说话人的地步。

《金瓶梅》中如此具有特点的日常生活琐碎而细致的现实主义手法,以罪恶,财富,以及堕落腐化的性生活为其内容,又重新找到了这种短小精悍每回自成格局的文章体裁。这些《祸不单行》(法国侦探小说丛书名——译者)式的短篇故事人们知道的有不少,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和《西山一窟鬼》,此外还有别的翻译短篇小说,载在论文集《中国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之研究》。毫无疑问,这决非偶然,像这样的一类作品在我们这部长篇小说中,自始至终,在同一结构交织成趣,反复重现。

似乎是十六世纪这个时代导致中国小说文学走向第三种形态,而在十七世纪,这种形态就使几部长篇小说得到肯定,一起被认为是真正的“古典小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小说艺术的主要特点,从这个时候起才得确定下来:表现在说书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所讲内容除了就原有的故事加以敷衍之外,对其内容和形式无创造革新之意。至于动作,也像故事中人物一样,只见他们的“外表(而不见内心世界的描写)。这种表演的模仿性,使人回忆起法国的“四钱戏”中往往在一篇现实主义的叙述过程中保持对白的独特地位,而这种叙述则又往往以最为动人心魄、引人回忆的描写寄托于抒情。抒情本是人们惯用的手法,包括彼此关联的几个部分,然而用以平衡叙述过程中所强调的和评论的那些章节,是很有必要的。

是什么原因把当代读者弄得那样手足无措,如果他

们打算用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或左拉的自然主义的老框框去衡量一部小说,一见其中带有滑稽可笑的模仿片段,就一口咬定它是超现实主义和超自然主义的作品。

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金瓶梅》可根据中国的小说传统进行改革。就像那些书中人物赖以体现其形貌和灵魂深处的思想,有时有意无意之间强调地借以倾吐其对环境的讥刺的诗词,都可以加以革新。读者——听众方面的指责已早有所闻,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数目倒有所增加——已超过五十来条;同是对未来事件的预料,前后呼应往往拿不准,如在第二十回或八十二回。但是我们这部小说对于丰富和繁荣中国小说传统所作贡献的重要意义却另当别论。

时间和地点之紧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部活动不超过十年,而小说素材的三分之二,约有五十万字,先后只不过包括两三年的时间。住屋和花园,描写得玲珑剔透,充满浪漫作用。正如史梅蕊在一篇未曾出版过的通信中所指出的,西门庆布置的大花园也许会被人认为就是《红楼梦》中所设计的大观园的原图。

小说中间部分那几回认为是长回,其中所描述的西门庆官场活动种种早已成为《官场现形记》作者灵感的源泉。如果说《金瓶梅》有时候把文学上滑稽模仿的场面弄得荒唐可笑,可是它也知道把直率的讽刺和细腻的讥笑结合起来使用,其讽喻影射之妙,使现代读者往往难于理解。

然而《金瓶梅》只不过是《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的赘生物而已,大而无当,刻毒无比:它是一幕妇女社会处境的惨剧。关于男性的故事,文笔简练,对男人性机能的叙述有疏漏不全之处。武松机智灵巧,为对杀

害其兄的同谋者报仇雪恨 ,对他来说 ,现在只剩下一个女人 ,那可怜的潘金莲无可逃脱 ,被杀而取其心 ,但是这段叙述文字 ,大都并不完美。

当然 ,文体的生命力 ,来自文体的创始人。这部以罪恶活动为其描写对象的小说所开创的文体 ,达到了天花乱坠、令人头晕目昏的程度。如果不是一位天才的作家 ,怎能写得出这么样的一部作品呢 ?这就是为什么几百年来 ,有好些文人自告奋勇冥思苦想 ,想把作者是谁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但只是徒劳而已。

《金瓶梅》的特质

(日)小野忍

《金瓶梅》是将《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的一部分敷衍而成的。武松的故事由武松打虎、武松嫂嫂潘金莲同西门庆的私情,潘金莲杀夫,武松复仇,武松判刑流放,武松在流放地的活动等等组成。《金瓶梅》的作者借用其前一半、武松遭到流刑处置为止的部分,即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到第二十七回。可是,由于《金瓶梅》描写武松不是目的,在这部小说里,可以说他不过是戏剧里跑龙套的角色。西门庆被作为主人公,潘金莲被作为女主人公中的一个。

地点在山东省的清河县,时间是宋徽宗统治时期,政和三年(1113年)起至靖康之变(1126年)结束。合起来共十四年,但最后的五年写得比较简略。把故事的时代说成宋代,不仅因为它是根据《水浒传》改编,而且因为通俗小说的作者不得不回避当时时代的忌讳。《金瓶梅》描写的是明朝万历年代。这一点,根据在这部小说里,出

现的许多宋徽宗时代所没有的官名和制度,而其中有些正是明万历时代的,也可以知道(吴晗氏的说法。那些主要的地方加了注记)。故事分前后二段,前段写西门庆用不正当的手段蓄积财富,用贿赂踏入官场,和财富一起得到了名誉与权势而极其横暴的经过,详细地描写了这个新兴商人及其一家的日常生活;后段叙述他正在得意之极时,一个晚上,由于潘金莲给他饮用了过量的淫药而暴亡,此后一家离散的状况。全篇自然而然地成为西门家的兴亡史。《金瓶梅》的命名,取用了环绕主人公的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中的各一个字。在作品的女性中间,似乎指出这三人特别重要。

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此外还有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第三夫人孟玉楼,第四夫人孙雪娥,西门庆的情人女妓李桂姐、西门庆的捧场者之一应伯爵,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管家韩道国和他的妻子王六儿等。特别是绝妙地描写出女性的各式各样的典型,分外引人注目。男性中以帮闲应伯爵的形象最为鲜明。

作者有意识地排除了传奇的因素而彻底写实,除了个别描写“饮食男女”之处外没有极端的夸张。在故事里也未必有特殊的波澜。作者大体上在西门庆的宅邸内设定舞台,始终描写在那里居住着的他的家族、仆人,以及出入其间的差役、军人、宦官、学者、商人、荐头人、算命者、医生、产婆、道士、和尚、尼姑、妓女和戏子等等人物(特别在前一段)。这部小说,在写出西门家兴亡史的同时更广泛地显示了清河县乃至中国的缩影。

明代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勃兴的时代。前期产生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后期产生了《西游记》和《金瓶梅》,分别具备独特的特性,至今尚未失去生命力。

《金瓶梅》的特点在于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生。这类小说尽管在《金瓶梅》以前也有，其有代表性的是见于称作“话本”的短篇小说中，但具备这种特质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最初的一部。从这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后出现的《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长篇小说里，《金瓶梅》的影响很浓。《儒林外史》在某种意义上可称《金瓶梅》的后裔，它的某种“儒林”的模特儿，甚至早已在《金瓶梅》中见到过了。

《金瓶梅》的素材

(日)小野忍

在中国,通俗小说的作者开始具备创作意识,被认为在《红楼梦》乃至《儒林外史》以后。在《红楼梦》第一回可以看见作者的小说论就是一个证据。那以前的通俗小说作者,从现成的作品中借用素材不用说是十分普通的(甚至让人怀疑这已被有意识地作为小说创作方法之一)。《金瓶梅》的作者也不例外。前面说到,它从《水浒传》中借用了许多内容。当然,在先的词话本比后出的新刻本同《水浒传》的联系比较紧些。新刻本从西门庆和应伯爵等朋友盟誓结义的故事开始,但词话本从武松打虎开始。从武松和兄长相遇到第六回为止,两本都和《水浒传》以完全相同的顺序展开情节,文字也借用《水浒传》的(但仍然是词话本比较相近)。借用《水浒传》的情节和文字之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例如词话本第八十四回,吴月娘至泰山烧香回来,被劫至山寨,被那里一个头目王英(《水浒传》中的豪杰,但很好色)“求欢”的场面。

幸得在座的宋江加以劝止。这就是从《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借用来的(新刻本已删削)。

在《金瓶梅》里,此外还有从“话本”中借用的。第一回从《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和《志诚张主管》(《京本通俗小说》)等(前者新刻本已删削)第三十四回从《戒指儿记》(见《雨窗欹枕集》)第九十八——九十九回从《新桥市韩五买春情》(见《古今小说》),都存在着这类借用的情况。这里所举之例都是从前已被发现的主要几个,假如仔细些,此外也还能找出同样的例子吧!

然而,必须指出,借用也好,脱胎换骨也好,手法都非常漂亮,头尾都衔接得不露痕迹了。

还有,即使从《水浒传》借用第一到第六回,一仔细看,也有十个左右《水浒传》中没有的人名,作为其伏线。其中之一王婆的儿子王潮进入第八十几回开始登场,所以作者还是颇有自己的主意的。

《金瓶梅》对后世的影响

(日)志村良治

《金瓶梅》在“四大奇书”中,可以说没有英雄豪杰的故事,在英雄、群盗那里,他们的活跃作为人们想象中社会正义的代表而变成酣畅的行动。《金瓶梅》却并非如此。它把视点集中于现实社会中丑恶的局面,揭露其根底上的颓废。描写这一切的精神,就是大胆地,随时随地地嘲弄人;完全舍弃作为社会一般观念的某种礼教的束缚和寻常的对人际关系的顾忌;摆脱世俗的规范。现实地描写同时代的社会和人,在这样的视点上取得成功,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明代在文学史上是复古,即新古典主义的时代。主张诗应当从宋诗的日常性中摆脱出来,回复到盛唐去。反世俗的文人们和这些主张复古主义文人们的精神,在根底上是相通的。这是因为他们具有想要用自己的眼来观察,想鉴别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志向。因此,《金瓶梅》中怪异性可以说就消失了。作为中国小说传统的怪异的

故事,在《金瓶梅》中完全没有出现。没有《三国演义》中从南华老仙得到洞中天书三卷的故事、《水浒》中一百零八豪杰从伏魔殿散往四方的故事等等,进行题外的假设。小说中神怪要素的剥落,在宋代的话本中已可见其端倪,而在长篇之中,《金瓶梅》堪为嚆矢。可以说,是对现实的注视剥落了这种神怪性,以达到了全篇由现实主义构成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认为是朝近代小说的靠近。前面提到的“白描”手法,对《儒林外史》有影响。吴敬梓是否读过《金瓶梅》尚不清楚,但在出以公心进行的批判和讽刺中,“白描法”是经常出现的。《金瓶梅》给《红楼梦》以影响这在前面已谈到过,但不仅在对于女性群像的分别描写上,在全部用因果报应之理来设计的构想上,在人物的结局以出家来结束的情节等方面,也都可以看到有着影响。后来,可以说这种写实手法的传统,被作为“现实主义”而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标题为编者所加〕

(日)泽田瑞穗

在清王士禛的《香祖笔记》卷十二中，有着如下的记录：

山东兖州阳谷县西北有一座墓，那里称作西门冢。在此附近的大族中，有吴、潘二氏，分别自称是西门庆的正室吴氏与妾潘氏的一族。某年村中庙会上，吴氏一族使演《水浒传》一剧，潘氏一族以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因而聚众大哄，互控于县。县令大笑，各抓了一二人，负枷游街，并作了这样的判决：“无耻犯人某某示众”。据说潘、吴二氏最终也不悟。并且，王氏清楚地写着这件事是他的从侄经过阳谷县时亲眼目击的，因而大概不是生造出来的吧！

清代梁绍壬（译者按：作者原稿为梁章钜，误）《两般秋雨斋随笔》卷四在引用上述记事时增添了怀疑：“小说所记，或亦风影其词欤！”还有盲用引书的我国的森鸥外有这样的说法：“想来也许另有一种传说，说《水浒传》是取材于此。”（《鸥外全集》卷十九）不管究竟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恐

怕是将在山东阳谷县实际存在的吴氏与潘氏作为模特儿而小说化了吧！

在地方传说成为小说素材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像吴、潘二氏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西门庆的正室吴月娘的一族还可一提，而臭名远扬的杀夫“淫妇”潘金莲的娘家将如何评论呢？恐怕除金莲之外没有更有名的了吧！而以这样的家系自傲真是不能令人理解的。但是，我认为在世界上确有不问善恶而只为出名而高兴的风气，由于为了发财，有时候就纯粹地利用它来作为宣传。随着宋元以来的水滸传说在世间流布，说话和演剧的流行，在阳谷县偶尔有将吴、潘两家看作小说中人物的后裔的，结果连两家也不知不觉地变得相信这个家族世系了。虚构的名作传说化，并在某些地方固定下来的例子是很多的，像从《四谷怪谈》产生的“阿岩稻荷”，以及从《金色夜叉》产生的热海的“阿宫的松树”，都是常人所知的事情。吴、潘两家的那件事也不能不看作是由于名作的影响而弄假成真的。

没有廉耻的两家纷争之所以令人感到滑稽，大概是因为小说《金瓶梅》是其出发点。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吴、潘两家还不太知道小说中的事情吧！这就可以料到他们对知县的挖苦性的判决毫不领悟。而且，纷争的根源是由于戏剧《水浒传》，这好像暗示了潘氏也是第一次才感到被侮辱。

作为西门家的墓地也殊属可疑，因为只有墓，而西门庆的子孙是没有的。这是由于西门庆死后，西门一家离散，他的儿子孝哥也入了空门。可是，作为传说的东西是不容易捕捉到事物真相的，因为在清代方濬师的《蕉轩随录》卷二中，在阳谷县另有别种传说。它引用了包倦翁的

《阐河日记》一书云：今阳谷县库中藏有传为武松于景阳冈打死的老虎的皮，景阳冈在阿城（阳谷所属）东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阳谷知县武姓者，甚贪虐。有二妻，一个姓潘，一个姓金，都帮助丈夫恣意婪索。在西门有庆大户尤其受到毒害，所以民人切齿痛恨，呼他为武皮匠，意味着他剥削。又呼为卖饼大郎，意思是说在小民口边求利云云。

在景阳冈被打死的老虎的皮即使是可爱而且漂亮的，也不明白武松和武知县有什么样的关系。西门的庆大户被武知县压榨而民人切齿痛恨，也把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至于武知县的二个妻子潘氏与金氏，也是把一个潘金莲分成二人的姓。这些都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归根到底，传说是道听途说，或者是本末倒置，或者已流散为片段。西门一家的传说，尽管没有离开山东阳谷县的地方，但也变成了这样的情况，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缘故吧。

(日)泽田瑞穗

皮影戏与木偶戏等民间艺术,作为所谓人民艺术,在当今的中国似乎也相当流行,但不知是否同过去一样还只是在陋巷的一角演出,并在街头任意流浪。

北京的傀儡戏是操纵稚拙的木偶供孩子们快活的街头艺术。影戏的发源地似乎在河北滦县,木偶戏的发源地是在津浦线沿线的河北吴桥县,但是,以前即使在北京,经常从城北方向走来装作阎罗殿上臣子的男人,用扁担挑着装木偶的行李,穿街走巷。

同拉洋片演出一样,当这一带有许多孩子来看时,就背着土墙把装有木偶的行李卸下来,设立了一只小小的舞台,舞台的下面用深蓝色的布围住,自己在这当中隐蔽起来操纵木偶并念着台词。

通常演出的品种似乎不太多,不论路经胡同观看还是被叫入门内演出,同样只是《西游记》和《金瓶梅》两种,恐怕是由于这两种拥有最多的观众、其演出也最拿手

吧！

关于《金瓶梅》，一般有武大郎被杀的一段。武大郎的木偶像完全弄成孩子般拙劣的矮小形状，使人感到这是粗制滥造的东西。然而，潘金莲的木偶做得稍大，在脸上涂上粉，发型和衣服好歹像个人的样子。在操纵武大郎时，潘金莲倚着小舞台一端的栏杆上。当将凭倚着栏杆的金莲稍作上下提动时，由于角度的关系，她的眼睛似乎看着远方。眼眸子始终未动的金莲，此时不知为什么能使人仿佛感到具有表情。演出时虽然未必考虑到如此效果，但就在这一瞬间，这幼稚的木偶确是意外地具有人间的美。但这种美，毕竟还是毒妇的淫荡之美。她有的只是那对蛊惑人心的眸子。